

画说西学经典^②丛书

精美漫画轻松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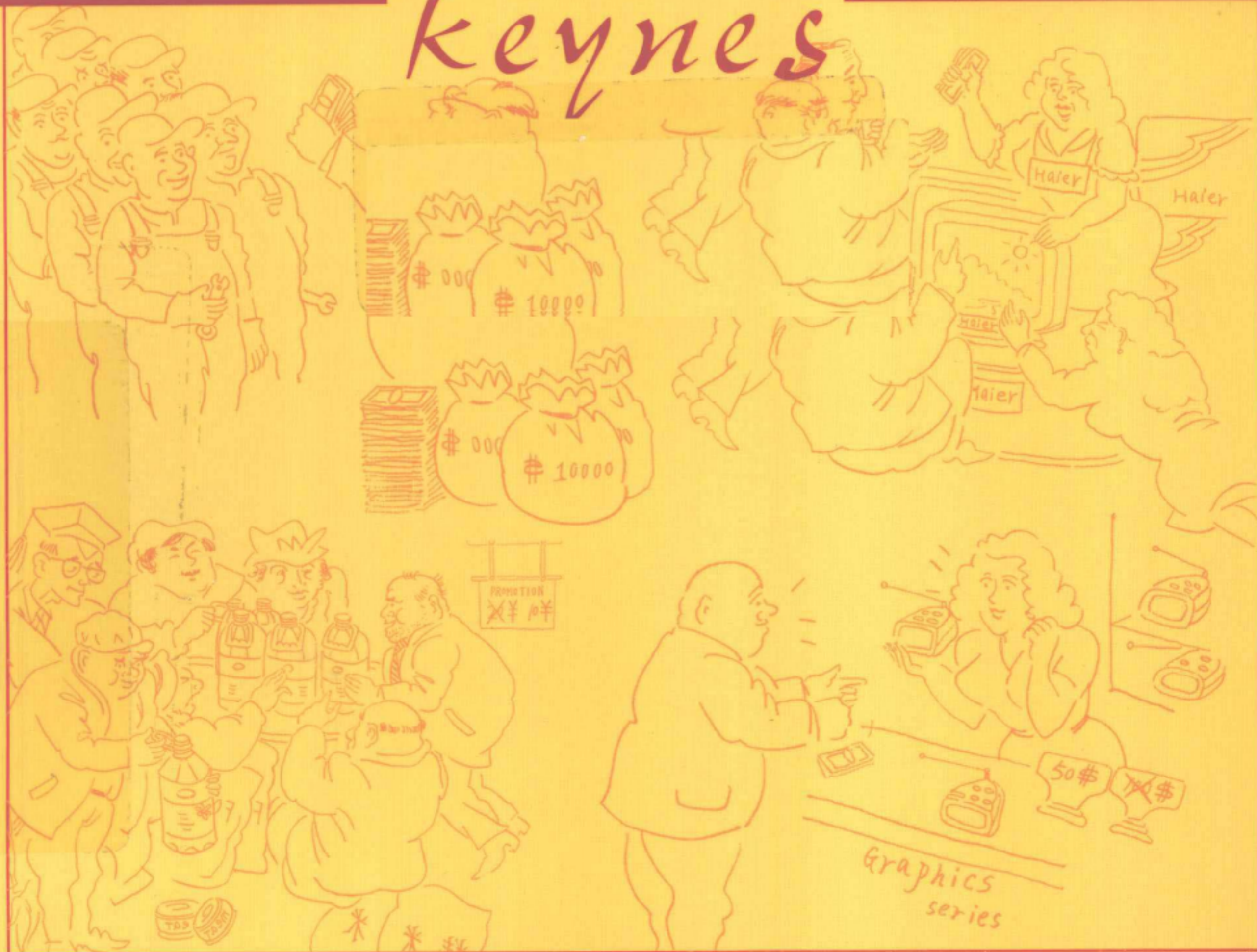
·“战后繁荣之父”写给我们的拯救金融危机的方案之书·

吉林文史出版社【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 甘强 王军波·编译/陈果·插图

漫画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Keynes





“经济学巨匠”凯恩斯全面解析 就业利息货币拯救世界经济之谜



金融危机盛行，引爆重读经济学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热潮，
在各国，重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不仅有**青年知识分子、白领、
企业家、失业人员**；还有**政界要人，银行家和经理**。

当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仍然认为，如果你不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就没有资格谈论经济学，**就无法获得自我创富的原动力**。

ISBN 978-7-5472-0076-6



9 787547 200766 >

定价:39.00元

画说经济经典



• “战后繁荣之父”写给我们的拯救金融危机的方案之书 •

缩译彩图案例珍藏本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原著 甘强 王军波·编译/陈果·插图

漫画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 甘强 王军波编译.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472-0076-6

I. ①漫… II. ①甘…②王… III. ①凯恩斯主义—通俗读物
IV. ① F091.34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724 号

Manhua Jiuye Lixi He Huobi Tonglun

书 名 漫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作 者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甘强 王军波 编译
选题策划 陈涌 翟飏 周海英
责任编辑 周海英 李畅
装帧设计 冯波
版式执行 曾杨
插 图 陈果
责任校对 刘玥凤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印 张 20.25
字 数 368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72-0076-6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凯恩斯赠予我们获得财富的力量

以英国经济学巨匠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形成的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思潮中最大的一个流派，不管是对西方经济学说，还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都产生了巨大而长远的影响。《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一时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轰动，有人把他的理论誉为一场像“哥白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一样对人类有突出贡献的革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西方经济社会以“有没有读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为衡量“有没有财富头脑”的标准。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反映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充分暴露出来的诸多实际问题，如失业严重、消费倾向、资本产品大量过剩、就业量高低、有效需求等等。同时还提出了缓解这些矛盾的对策，为当时束手无策的资本主义世界指明了一条摆脱困境实现富裕的光明坦途。

凯恩斯被世界誉为“战后繁荣之父”。本书就是他在二战时期的严峻局势下，所作的拯救世界金融危机方案的“三部曲”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的历史性重大转折，在这次经济大萧条中，其广度、深度和持续时间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终日惶惶不安，完全陷入了濒临崩溃的绝望之境。原本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传统的放任经济对策更是手脚无措。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进入了一种悲惨可怜的混乱状态之中。就在垄断资产阶级朝野广大人士对资本主义制度前途的信心产生动摇之时，凯恩斯站了出来，并创立了拯救世界经济的新学说。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预期可给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资本家按此社会总需求决定他们的产量并提供就业机会。当社会对企业生产产品的需求不断减少时，资本家也就不再增加投资（需求）了，就业量就会减少，这就是失业的直接原因。失业的终极原因是资产所有者的货币愿望（爱好货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欧洲推行的正统的反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了滞涨，而美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成效，两种不同的情况让一些年轻的理论家们对凯恩斯主义持怀疑的态度。但从更科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理论无法通过计量经济学的验证。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还没有能与凯恩斯主义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理论。由此，凯恩斯经济学得到了世界各国振兴经济的广泛认可和运用。

凯恩斯认为，“人口缩减”所形成的“失业魔鬼”是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这远比“人口过剩魔鬼”更加可怕。那么，应该怎样降低失业呢？凯恩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扩大有效需求，让失业人口重新上岗。其实，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实施了这种宏观的经济管理方案才使经济得以复苏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对国民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充满了幸福感，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公众中，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都受到了高度的尊重。但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和滞涨，又将大众引向了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宏观学派，甚至供应学派。让人庆幸的是，1979年之后由于美国 and 整个欧洲的经济秩序衰退，无疑让新古典——新货币主义者的那些观点一败涂地。他们认为，只要提前宣布货币紧缩是肯定不可避免的，那么反通货膨胀就不会太痛苦了，或许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

当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仍然认为，如果你不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没有资格谈论经济学，就无法获得自我创造财富的原动力。

本书原著是一部卷帙浩博的经典巨制，其高古深奥、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表述，给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造成了障碍。鉴于此，我们采取全新的编排体例，以幽默漫画完美诠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实用性，以贴近当代人生活的经典案例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趣味性，并在准确缩译、精炼编著的基础上，以知识点的方式对书中的核心内容进行精彩补述，延展了读者的阅读面，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知识性。这样一来，不仅突出了原著的思想精髓，还将让很多读者犯难的学究气避而远之，一切尖端高深的思想变得易于理解和掌握，一切玄奥的知识变成了当下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实用常识。

编译者

2009年10月28日

原序

这部书主要是为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写的，我希望普通人也看得懂。本书主要讨论一些理论上有所困扰的问题，至于如何把理论应用于实际，还是次要的。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关键不在于它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逻辑上一般是没什么错误的，而是在于它的前提不普遍，一般人难以理解。为了让经济学家能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考虑一些基本假定，我只好很抽象的论据，为此产生许多争辩，尽管我不想争辩。我觉得：我不但要讲清自己的观点，还要指明我的观点在哪些方面和一般的理论不同。我想那些推崇经典学派理论的，要么认为我一无是处，要么认为我没有新观点。谁是谁非，只能让别人来判断。以下这些争辩的内容，目的就在提供材料，使别人判断时有所依据。为使不同学说有所区别，我的争辩可能很尖锐，如果有这种情形，我得说声抱歉。我攻击的理论，以前我也深信不疑，想必我不会忽略了它的优点。

我们所争执的对象是相当重要的。假如我的解释是对的，那么我要先说服我的同行们，然后再及群众。现阶段的争论，我们只能欢迎群众旁听，一同把经济学家之间之意见分歧点了解清楚。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分歧，让经济理论在目前好像不再重要了，如果不加以解决，它更难以像以前那般重要。

本书和我之前写的《货币论》有何关系，也许我自己比别人要明白些。我认为只是历年思索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在读者看来，可能会觉得是观点改变，让他们无法适应。这种困难，不会因为我改换名词而减轻。名词有不得不改的地方，我下文将会指出。这两本书的关系，可简述为：早期我开始写《货币论》时，还遵循着传统观点，把货币看作是供需理论以外的一种力量。《货币论》写完后，我观点已有变化，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扩充成社会总产量论。不过当时成见太深，不易摆脱，所以对于

产量改变所引起的后果，并没有充分讨论。现在看来，这是该书理论部分的显著缺点。该书所说的“基本公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前提下所得到的瞬间图形。在此假定下，那些公式皆为了指出：为什么会有一些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使产量非改变不可。至于动态的发展，反倒不完全非常模糊（有别于瞬间图形）。本书则不同：着重在于研究什么因素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然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暂且不讨论。货币经济的特征，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的方向，还可改变就业量。现今的经济行为，虽常受人们对于未来看法的影响，且看法常变，但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的途径，也只能是供求的互相变化影响。那么本书的分析法与价值论就可衔接。于是我们有了新的理论，而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学派理论，只是这个理论的特例而已。

写这样一本书，我必须另辟新径。本书的写作太仓促，为了减少错误，还希望朋友们的批评和讨论。一个人如果独自思考太久了，即便是无稽之谈也会暂时深信不疑。各种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尤其是经济学，因为我们不能以个人的见解，单凭逻辑的或实验的方法，作决定性的试验。感谢卡恩先生的建议和批评，书中有好些地方都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改定的。另外本书承蒙罗宾逊夫人、郝特雷先生及哈罗德先生校阅过，很有帮助。

本书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假如我的努力没白费，那么读者读这本书时，也会有同感。书中所含思想，虽然表达方式比较复杂，但其实很简单，应当人所共知。很多人都是深受古典学派的影响，传统观点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于我的理论本身，而在于摆脱旧的学说。

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



凯恩斯小传



凯恩斯全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6月5日生于英国剑桥市。凯恩斯中学时代是在英国著名的私立中学伊顿公学念的,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之后,他又师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教授。

1906年,凯恩斯进入英国外交部的印度事务办公室;1908年,回到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一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之后成为英国财政部顾问团顾问和苏格兰银行董事。1929—1933年西方爆发经济危机并席卷全球后,他担任了英国内阁财政部顾问委员会主席。二战期间,他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由于对英国作出的巨大贡献,凯恩斯于1942年被封为勋爵。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



联合国金融会议,大会期间,参与规划和创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5年,凯恩斯率英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同美国当局讨论美国给英国的特别贷款问题。除政府公职外,凯恩斯也经营私人企业,并从事过金融投机行业。

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在英国索塞克斯郡病逝。

凯恩斯出生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曾在剑桥大学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师,母亲弗洛朗斯阿达·布朗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之一。

凯恩斯早年是一位同性恋,并且不避讳他的性取向。他最为重要的爱侣是画家邓肯·格兰特。两人自1908年相识后就一直交往甚密,直到20世纪20年代,格兰特都在凯恩斯的感情和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另一位重要伴侣是作家立顿·斯特拉其。1921年凯恩斯陷入了对俄国著名芭蕾舞演员的热恋。两人在1925年成婚,被认为是智慧和美丽的结合。据说两人的婚姻美满幸福,但没有子嗣。

凯恩斯的第一本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是1913年的《印度的通货和财政》。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发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阐述他对德国赔偿问题所持看法,引起欧美经济学界的极大争论,也使他成为当时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

凯恩斯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剑桥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不利于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就业增长。在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他甚至还坚持认为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1936年其代表作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通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已经从传统的剑桥学派理论过渡到自己创立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凯恩斯的学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有西方经济学家称《通论》的出版是经济学界的“凯恩斯革命”。

除《通论》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1923年的《论货币改革》和1930年的《货币论》。这两部著作是其研究货币理论的代表作,但是都没有摆脱其老师马歇尔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此外,1932年有《劝说集》问世。货币理论的两部著作和《劝说集》的多篇文章,均是凯恩斯观察思考一战后英国经济发展停滞,出口和对外贸易的竞争能力削弱的现象后,提出政府实行金融货币管理政策的主张的体现。

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泰晤士报》在凯恩斯去世时发表的讣告这样描述他:“如果要找到一位同他的影响同样大的经济学家,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亚当·斯密。”即便说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毫不夸张。

1920年,凯恩斯因《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而广为人知。在《通论》之前,凯恩斯就已经对英国的经济产生了影响。二战时期,凯恩斯重回英国财政部,更是成为英国战时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人。

凯恩斯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以来,凯恩斯就密切关注着美国的时局,并多次发表文章为“新政”出谋划策。罗斯福政府的很多官员就是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凯恩斯在1933年底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这样说:“如果你成功,各国将进行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试验,而我们也可以把你任总统之日,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罗斯福新政的政策诸如以工代赈、反对金本位、财政赤字措施等,都是凯恩斯所倡导的。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创造性的成功实验。

凯恩斯在二战后参与创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仍有极大影响。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从发表至今一直产生影响,在目前的经济政策制定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继续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思想。



Contents

目 录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漫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序 1

原序 1

凯恩斯小传 1

第一编 引论

第一章 古典经济学关于就业与失业的假设 2

就业的基本前提 3

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 5

经济学家对产品购买力的推断 13

↔【解析】工资与就业量 14

↔【案例】城乡青年失业对比分析 14

第二章 有效需求原理 18

就业相关术语 19

就业量与有效需求 21

李嘉图的迷惑性学说 24

↔【解析】就业量决定因素 26

↔【案例】消费需求不足是金融危机“祸根” 26

第二编 定义与观念

第三章 单位的选择 31

古典经济学未解释清楚的概念 32

就业量的决定因素 33

供给函数 34

↔【解析】货币价值量与就业量 35

↔【案例】效率工资理论的应用 36

第四章 预期和就业 40

预期影响投资和就业量 41

预期所决定的就业量 43

↔【解析】企业家的期望值决定就业量 44

↔【案例】企业到底应该追求什么目标? 44

第五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48

多种因素的成本及收入的定义 49

补充成本与意外损失 52

投资和储蓄 55

↔【解析】储蓄等于投资 57

↔【案例】消费者太“瘦”投资率只有上升 57

第六章 再论储蓄和投资的意义 60

投资的定义及其对资本的影响 61

储蓄与投资的不同点 63

论强迫储蓄 64



对储蓄和投资的现实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66

↔【解析】 储蓄和投资 67

↔【案例】 居民储蓄动机与高等教育收费改革 68

.....

第三编 消费倾向

第七章 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 73



消费量 74

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 75

消费量与收入 78

消费量的决定因素 80

↔【解析】 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 83

↔【案例】 我国居民旅游消费 10 年快速增长 83



第八章 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 87



不利于消费的主观动机因素 88

利率影响储蓄和投资 92

↔【解析】 主观动机及利率影响消费倾向 93

↔【案例】 1988 年中国居民出现“排浪式消费”抢购潮 93



第九章 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97



边际消费倾向及乘数 98


投资量变动及出乎意料的变化 101


古典学说的荒谬结论 105


↔【解析】 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影响就业量 106

↔【案例】 1998—2000 年间国债投资效应值得推敲 107

第四编 投资引诱

| | | | |
|------------|--------------------------|------------|---|
| 第十章 | 资本边际效率 | 112 |  |
| | 投资需求曲线决定投资诱导 | 113 | |
| | 对常用概念的辨析 | 115 | |
| | 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因素 | 117 | |
| | 影响投资的两类风险 | 119 | |
| | 资本边际效率的重要性 | 120 | |
| | ◀【解析】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 | 120 | |
| | ◀【案例】新加坡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与政府投资 | 121 | |

| | | | |
|-------------|----------------|------------|---|
| 第十一章 | 长期预期状态 | 125 |  |
| | 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及信任状态 | 126 | |
| | 资本投资 | 127 | |
| | 投资市场的不可靠性因素 | 129 | |
| | 投资市场 | 132 | |
| | 影响经济稳定的因素 | 134 | |
| | ◀【解析】长期预期与短期投资 | 136 | |
| | ◀【案例】亟须引导的民间投资 | 136 | |

| | | | |
|-------------|----------------------------|------------|---|
| 第十二章 | 利率的一般理论 | 140 |  |
| | 利率与流动性偏好 | 141 | |
| | 货币投资与贮藏 | 145 | |
| | ◀【解析】影响利率的因素 | 146 | |
| | ◀【案例】28年前温州搞起浮动利率：中国首迈利率改革 | 147 | |



第十三章 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 151

- 古典学派的理论 152
- 古典学派的理论错误之因 156

- ↔【解析】古典学派利率理论的错误及贡献 158
- ↔【案例】台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 159

第十四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业务动机 162

- 投资动机及利率变化 163
- 流动性偏好函数与各类动机的函数关系 166
- 决定利率的因素及货币数量 169

- ↔【解析】流动性偏好动机与储蓄 171
- ↔【案例】我国公开市场操作 171

第十五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 175

- 储蓄影响投资和消费 176
- 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 177
- 资本同边际效率及利率的关系 179
- 通过利率控制影响经济和社会 180

- ↔【解析】个人储蓄及资本的稀缺性 181
- ↔【案例】海尔集团的发展与资本运营 181

第十六章 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187

- 利率的特征 188
- 不同类型资产的利率 190
- 货币的特点 193

| | |
|--------------|-----|
| 货币利率为唯一重要利率 | 196 |
| 财富持有方式及土地货币化 | 198 |
| 自然利率和最优利率 | 198 |

- 【解析】货币利率的特点决定货币的不可替代性 200
- 【案例】二战后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 200

第十七章 就业通论提要 203

| | |
|-----------|-----|
| 经济体系的三种因素 | 204 |
| 就业通论概要 | 205 |
| 保持经济稳定的条件 | 206 |

- 【解析】投资量与就业量 209
- 【案例】欧洲青年失业的治理及成效 209

第五编 货币工资与物价

第十八章 货币工资的改变 215

| | |
|-------------------|-----|
| 古典学派关于劳动需求的错误理论 | 216 |
| 货币工资通过三种因素对就业量的影响 | 218 |
| 弹性工资政策和弹性货币政策 | 220 |

- 【解析】货币工资如何影响就业量 223
- 【案例】“零工资就业”与“大学生过剩说” 224

第十九章 就业函数 227

| | |
|-------------|-----|
| 就业函数与就业弹性函数 | 228 |
| 有效需求的弹性因素 | 231 |

- 【解析】有效需求和就业函数的关系 232



- ↔【案例】 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矛盾 233



第二十章 价格论 237



- 经济理论划分及物价的决定因素 238
 影响货币数量的因素 240
 货币数量变动对价格的长期影响 245
- ↔【解析】 价格论的分析对象及分析目的 246
- ↔【案例】 货币和价格的决定 247



第六编 通论引起的几篇短论

第二十一章 略论经济周期 252



- 经济周期运动 253
 经济衰退的根源 253
 救治经济萧条及失业的方法 256
 其他经济学派的理论 258
- ↔【解析】 经济周期的根源及特征 260
- ↔【案例】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及其特征 260




第二十二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说 266



- 重商主义及贸易顺差 267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 271
 禁止高利贷法 274
 格赛尔的理论 275
 消费不足和过度储蓄 278
- ↔【解析】 重商主义等理论的不足及科学成分 280

◀▶【案例】美日贸易摩擦及各自的对策 281

第二十三章 略论《通论》可引起的社会哲学 287 


社会财富分配及食利者 288

政府干预与个人主义 290

后论 291

◀▶【解析】国家干预经济和市场自我调节 292

◀▶【案例】美国扶持农业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 293

附录一：凯恩斯年谱 296 

附录二：经济学名词术语速查索引 299 

第一编

引 论

就业理论不仅适用于充分就业情况，还适用于各种非充分就业的情况；古典学派的理论忽略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古典学派忽视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他们认为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而二者也表明了市场体系也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组成；凯恩斯认为，以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有效需求为理论可说明充分就业和非充分就业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本卷精彩内容导读目录

失业与就业图解 / 9

◎案例：城乡青年失业对比分析 / 14

◎案例：消费需求不足是金融危机“祸根” / 26

Chapter 1

第一章 古典经济学关于就业 与失业的假设

古典学派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下：完全竞争市场中，就业者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单位而引起的产值的净损失；就业量既定，工资效用与该就业量边际负效用相等。二者即就业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古典学派没有考虑到非自愿失业的情况。



就业的基本前提

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定前提之上的：

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

这就是说，一位就业者的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单位所引起的产值的净损失。所谓的净损失是指在减去由于产值下降而减少的其他成本之后的损失。但这是有约束条件的相等，因为，当竞争和市场出现不完全性时，这种相等关系就会被破坏。

就业量既定，工资的效用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

这就是说，根据就业者自己的估计，每一位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正好可以使原有就业量继续维持不变。与竞争的不完全性会破坏第一个假定所遵循的约束条件相类似，第二个假定所要求的单个劳动者地位平等的约束条件会由于劳动者结成工会而被破坏。此处，负效用必须被



生产技术不革新，产品无人问津，企业被迫倒闭，工人“光荣”加入失业大军。

古典经济学派

古典经济学派发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间经过大卫·李嘉图、萨伊和马尔萨斯等人的理论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终结于约翰·密尔的《经济学原理》。古典学派可以这样定义为：尊重亚当·斯密的理论传统，采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信奉李嘉图的分配论、价值论和地租理论，遵循自由贸易主义的原则的经济学派。

需求曲线

需求曲线是显示价格与需求量关系的曲线。即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商品量的表（或曲线）。需求曲线可以以任何形状出现，但需求量不能被观测。需求曲线通常是以价格因素和需求量为纵横轴线。在一条向右下倾斜、且为直线的需求曲线中，在中央点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于一，以上部分大于一，而以下部分则小于一。

供给曲线

供给曲线表示在商品的每一价格水平下能够供给多少某种商品。供给曲线本身同样不能说明商品价格，也不能说明供给的数量。它只说明在给定的价格下，生产出售者愿意且能够供给的数量。供给表和供给曲线还表明了最低供给价格，即厂商供给最后一单位产品所要求的最低价格，或者说是导致厂商供给某一定量产品的最低价格。

理解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导致其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接受在他们看来效用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工资。

第二个假定前提不会与所谓“摩擦”失业相冲突。因为，在把它运用于实践中的时候，应当允许在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误差，从而导致不能持续保持充分就业状态。例如，由于错误的计算或者需求的不连续，专业化资源相对数量暂时失去平衡而产生失业；或者，由于出乎意料的变化而产生的时滞；或者，转换工作时所必然花费的时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一个非静态社会中，总有一部分资源因“在不同工作间转换”而无人雇用。除了“摩擦”失业，该假设前提也不会与“自愿”失业相冲突。“自愿”失业是指：由法律规定或社会陈规，劳动者为进行集体谈判而结成工会，对变革反应迟缓、人们的惰性以及人们拒绝或者无法接受相当于他们边际生产率的产品价值的工资而产生的失业。在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下，“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即为失业的全部内容，而不容许还可能存在第三类失业，这也就是我以下将定义的“非自愿”失业。

根据古典学派理论，这两个假定前提决定了就业的资源数量。第一个假定前提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需求曲线，第二个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供给曲线；就业量被决定于边际产品效用与边际就业负效用相等的那一点。

非自愿失业

非自愿失业是指工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但却找不到工作，从而形成的失业。即有就业能力并且有就业要求的人口没有就业机会的经济现象。凯恩斯认为如果工资品的价格稍微较货币工资有所上涨，劳动者愿意在当时的货币工资下提供劳动供给，而在同一时期的总劳动需求都大于现在的就业量，那么就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现象。

由此推知，只有四种有可能增加就业的方法：

- (1) 改进组织结构或者增强预见性，从而减少“摩擦”失业；
- (2) 降低以实际货币工资表示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将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可供雇用，从而减少“自愿”失业；
- (3) 提高工资品行业劳动者的边际实物生产率；

(4) 提高非工资品对工资品的相对价格，同时，非工资收入者把他在工资品上的支出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据我所知，以上就是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的实质内容，也是现在仅存的古典学派关于就业理论的详细论述。



“两耳不闻窗外事”，庇古闭门造车写《失业论》，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认为经济会自动调节，使就业达到“正常”水平。

自愿失业与非自愿
失业

古典学派这两种失业范畴，真的能够概括一切失业现象吗？但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是他们却找不到工作。通常而言，按照现行货币工资水平，只要对劳动力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古典学派认为这种现象和他们的第二前提并不矛盾，

经济萧条

1929—1933年间发生的由美国开始，进而波及世界的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被称为经济大萧条。这次经济萧条的影响比之前的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萧条的原因是由于20年代美国股市预期的财富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实质经济能支持的速度，社会又没有及时的纠错机制来制止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的进一步分离，导致了经济泡沫的膨胀。其后果是大规模的失业。

原因是尽管在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供给量可能大于劳动力的需求量，然而产生这种现实是因为劳动者之间公开或默认的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不为低于现行工资水平而工作，而且只要全体劳动者同意降低货币工资水平，就业量就会扩大。故这种失业表面上是非自愿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而应把它纳入上述由于集体工资谈判等原因而造成的“自愿”失业。

这个现象引出了两点值得考察的地方，第一点涉及到劳动者分别对待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真实态度，这在理论上并不具有重大意义，但第二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导致失业的原因

我们暂且假定，在较低的货币工资水平下劳动者不愿意就业，并且，降低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一部分已经就业的劳动者就会通过罢工或其他方式退出劳动市场。是否可以由此推论出，现行实际货币工资水平就准确地度量了劳动者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因为事实上，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会导致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当工资品价格提高而导致的现行货币工资购买力下降时，却不一定产生同一现象。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要求的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而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古典学派一直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即这种现象不会对它们的理论产生实质性的改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实际工资不是劳动力供给函数的唯一变量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将彻底瓦解，实际就业量将非常难以确定。古典学派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除非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否则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将随着每一次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因此，他们的方法是和他们的特殊假定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能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运用。

日常经验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一定限度内，劳动者要求得到的不是实际工资而

是货币工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劳动者一般都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但工资品价格的每次上升并没有导致他们因此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有人说，劳动者不抵制降低实际工资而抵制降低货币工资的现象，是不符合逻辑的。无论逻辑上是否成立，经验事实证明，劳动者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古典学派认为经济萧条情况下的失业现象，是因为工人不肯降低货币工资而引起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认为美国1932年失业问题的原因，不是劳动者固执地抵制削减货币工资，就是他们坚持要求的实际工资高于经济机构的生产率所能负担的水平，那么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证明，在劳动者的最低真实需求或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变化时，就业量却出现过巨大的波动。劳动者在萧条时期不会比繁荣时期更蛮横——远远不是，他们的物质生产率也不会更低。这些经验中得来的事实，构成了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适当的充分理由。

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

看看货币工资变动与实际工资变动之间实际关系的统计调查结果，是颇有趣味的。在考察某一具体行业的具体变化时，我们也许会期望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变化方向一致。但在考察整体工资水平的变化时，我们将会发现，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远不是按照同一方向变动，而通常几乎是按照相反方向变动。即在货币工资上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工资却下降了；而在货币工资下降的时候，实际工资却上升了。因为，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分别基于独立的原因，与就业量的下降发生联系，在就业量下降的情况下，劳动者更容易接受削减工资，同时，由于



25%的失业率，多达200万的流浪人口；失业男子远离家园寻找工作，妇女小孩挤居于狭窄房屋艰难度日，领取救济食品的人群排成了长龙。这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众生相。

产量的下降，劳动者在既定数量资本设备下的边际生产力将会上升，而实际工资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

如果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确实已经到了最低限度，在工资水平低于这一限度的情况下，愿意被雇用的劳动者无论怎样也不会超过现行的就业量。那么，只有摩擦失业，而不存在自愿失业。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即使工资品价格上涨，实际工资下降，但在通常情况下，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的劳动者常常比现在实际就业的人多。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与现行货币工资相等价的工资品就不能准确地表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于是，第二个假定前提就是不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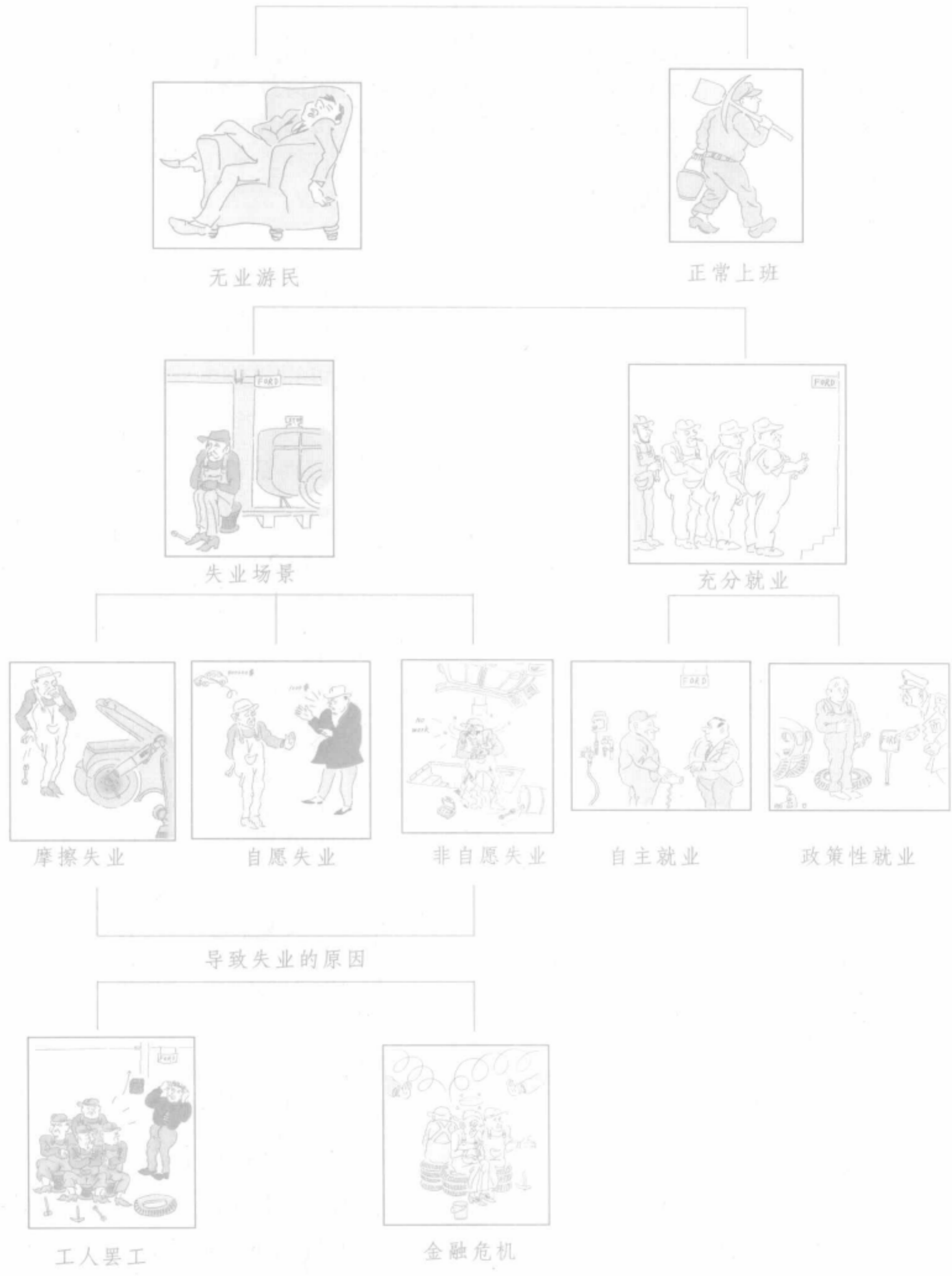
不过，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非议。古典学派的第二前提源自这样一个观念：实际工资决定于劳动者和雇主就工资所进行谈判的工资议价。尽管古典学派承认双方实际协议的内容是货币工资，甚至也承认劳动者肯接受的实际工资与当时的货币工资相关，然而他们认为，工资议价决定货币工资，货币工资决定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水平还是被认为决定于协议所确定的货币工资。所以，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对于劳动者来说，削减货币工资，他们的实际工资也总是会下降。实际工资趋向于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的假定，显然是认为：劳动者自身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能够决定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实际工资，尽管他不能决定这一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

总之，传统的看法，认为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决定实际工资。如果雇主之间存在互相竞争，劳动者之间又没有社团组织的限制，那么，若劳动者愿意，就可以使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与这一工资水平下雇主愿意雇用工人数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希望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趋向于相等。

需要注意的是，古典学派的结论是打算被运用于劳动者整体的，而不是仅仅指单个劳动者可以通过接受被其他劳动者拒绝的、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就业。他们的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在封闭社会中，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下降时，实际工资至少在短期内将会随之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个结论还被适用于开放社会。

令人诧异的是，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的假定，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但几乎没有人试图检验或驳倒这一观点。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决定于边际直接成本，而边际直接成本又大部分决定于货币工资，即当货币工资降低时，价格将随之降低，从而实际工资与就业量大致保持不变。那么对于劳动者有什么得失，是因为边际成本中有其他因素并没有变动的原因而导致的。值得可惜的是，

失业与就业图解



摩擦失业

指由于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缺陷所造成的临时性失业，一般是由于求职的劳动者与需方提供的岗位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而形成的失业。摩擦失业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具有动态属性、现行经济制度的缺陷和就业供需信息不对称、不完善所造成的，它具有这样的特点：行业广且涉及人员多，失业期限较短。

鸡蛋涨价了，猪肉涨价了，工资却仍然没动静；CPI 飙升，生活成本提高，这是实际工资降低的表现。



工资谈妥了就签合同；货币工资谈判其实是实际工资总额在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分配。



古典学派并没有循此思路追究下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劳动者可以自己决定实际工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物价决定于货币数量。而且，劳动者可以决定实际工资的命题一旦成立，便与另一个真命题相混淆，难以辨认。这一真命题是：劳动者总可以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在何种实际工资水平下就业，从而达到充分就业。所谓的充分就业，就是指在一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就业量。

由此可知，关于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前提，存在两个非议之处。第一个非议与劳动者的行为有关。货币工资不变时，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一般不会使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供给量低于上涨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假设劳动供给量确实会下降到那样的程度，那就相当于认为所有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未能找到工作的人们，只要生活费用稍微提



高就不再愿意工作了。

第二个更基本的非议，源自于我们所怀疑的实际工资一般水平直接决定于工资协议的假定。因为，对于劳动者整体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方法使相当于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工资品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也可能没有别的方法，使劳动者整体能够通过修改与雇主们就货币工资达成的协议，而将实际工资水平降低到某一给定值。我们将努力证明：实际工资一般水平主要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决定的。

谈判货币工资的影响

货币工资谈判所影响的不是每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而主要是实际工资总额在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分配。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由经济体制中的其他力量决定。

幸运的是，劳动者们倒是比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更具理性的经济学者，尽管是无意识地做到的。就抵制削减货币工资而言，即使现行货币工资的实际商品购买力高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尽管这种货币工资的削减很少或从未涉及全体劳动者；相反，他们不会抵制实际工资的减少，而实际工资的减少是与总就业量增加相联系的，尽管此时货币工资仍保持不变，除非减少的数量大到可能使实际工资低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这时，不论对货币工资的削减数量多么小，每个工会都将会采取一些抵制措施。但是，既然没有一个工会想着为生活费的每一次上涨都罢工，因而工会并非像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对就业量的任何提高都增加阻碍。

第三类失业的可能性

尽管古典学派不承认第三类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我把这类失业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

显然，这里所谓的非自愿失业并不是指有工作能力却未被利用。例如，我们不会认为劳动者每天可以工作十小时而认为八小时工作日为失业，也不会认为劳动者不愿意接受低于某种限度的工资而不去工作的为非自愿失业。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不包括“摩擦”失业。我对“非自愿”失业定义是：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有轻微上升时，如果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在此工资水平下的劳动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就业量，那么劳动者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

萨伊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是19世纪初欧洲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使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通俗化和系统化，但同时也抛弃了斯密学说中的科学因素。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三分法，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三部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供给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的观点，即所谓的“萨伊定律”。

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作出了系统的贡献，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也是成功的商人，金融和投机专家，并且积累了大量财产。李嘉图最著名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发展了有关地租、工资和利润的理论。由李嘉图开创的经济学理论学派，被称为“李嘉图学派”。

由这一定义可推论出，第二个假定前提所作的实际工资等于就业量边际负效用的假设，在现实中的意义，相当于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状态。这种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状态，我们称为“充分”就业。“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与我们所定义的“充分”就业是相容的。“充分”就业与古典理论的其他特征也是相符的，因此，古典理论最好被称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一种分配理论，只要古典学派的假定前提能够成立，以上定义的非自愿失业是不会出现的。

显然，如果古典理论只能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运用，那么，在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的情况下，把它用来解决非自愿失业的问题则是错误的。我们要颠覆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的前提，并建立一套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有可能存在的经济运行理论体系。

在组织、设备和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和产出量之间是唯一相关的。一般来说，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工资将随之下降，因为当就业增加时，在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边际产品递减必将导致实际工资的降低。但是，我们否定了第二个假定前提后，虽然与就业量的下降必然相联系的，是劳动者会获得在价值上与较多数量工资品相等的工资，但就业量的下降却并不必然是因为劳动者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而引起的；而且，部分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水平的货币工资，并不就是解决就业问

《鲁滨逊漂流记》

《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笛福的代表作，它表现了强烈的资产阶级进取精神和启蒙意识。书中的鲁滨逊是当时中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西方文学中第一个理想化的新兴资产阶级者形象。面对人生困境，鲁滨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硬汉子的坚毅性格和英雄本色，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

题的最好办法。

经济学家对产品购买力的推断

从萨伊和李嘉图时代到现在，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讲述的是：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全部生成成本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购买产品。

该理论的一个推论，就是得出这样一个假设：任何有购买力的个人节制消费的行为，必然导致因此而释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等量地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对于这一推论，战后经济学家的思想中过多地掺入了与之相反的倾向和从经验中得来的事实。但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出有影响力的结论，而且对他们的基本理论也没有进行修正。

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把从《鲁滨逊漂流记》中自产自销经济关系中得出的结论运用在了现实世界。另外，古典学派因需求而带来的销售收入，总能补偿生产成本的结论，似乎有很高的可信度，因为它容易与另一个看来相似但准确无误的命题相混淆，这个命题是：社会中从事某一生产活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必然等于这一生产活动总产出的价值。

与此相似，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在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情况下，个人财富得到增加，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必定会使整个

作家自己写作、出版和销售书籍的一条龙模式，同小农经济的自产自销颇为类似。



社会财富得到增加。所以，个人的储蓄行为必定会带来与之相应的投资。

但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的人其实都被视觉幻影欺骗了，从而导致把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假设存在一种自动调整的机制，来协调决定抑制现在消费和决定准备未来消费，这是错误的。

可以这样认为，这条社会总产出的需求价格等于社会总供给价格的假设，相当于几何学中的“平行线公理”。承认这一点，其余的就自然成立了——私人和国家的节俭对社会有益，传统的利率论、失业论、货币数量论以及自由放任主义在对外贸易中必然产生利益，等等。古典学派的理论依次取决于以下假定条件：①实际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②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③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其含义是：在产出和就业的任何水平下，总需求价格都与总供给价格相等。

【解析】 工资与就业量

本书命名为《通论》的用意就在于，打破古典学派只能被运用于特定情形的假设条件，将一些经济理论普遍地运用于实践。因为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前提之下的：一是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即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就业者的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单位而引起的产值的净损失；二是当就业量既定时，工资的效用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根据古典学派理论，第一个假定前提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需求曲线，第二个假定前提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供给曲线，就业量就被定于边际产品效用与边际就业负效用相等的那一点。古典学派所宣扬的是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只要劳动者愿意降低工资标准就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量。但考虑这样的事实，现实中还有很多愿意降低工资标准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人，特别是经济萧条时，即所谓的非自愿失业。因此，古典学派所谈的均衡是根据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前提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这仅仅适用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均衡。

【案例】 城乡青年失业对比分析

案例适用：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在当前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失业问题也更加突出。城乡青年失业问题日渐突出，调查发现，城镇青年自愿失业问题突出，农村以非自愿失业为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德文、吴要武和蔡昉利用国家统计局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1%抽样资料,计算、比较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按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分组的劳动力失业率差异。(见表1)

表1:按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分组的城市劳动力失业率比较(%)

| 组别 | 所有劳动力 | 本地劳动力 | 农村迁移者 | 城市迁移者 |
|--------|-------|-------|-------|-------|
| 全国 | 8.3 | 9.1 | 3.6 | 7.9 |
| 按性别分组 | | | | |
| 男 | 7.5 | 8.4 | 2.4 | 6.2 |
| 女 | 9.1 | 9.8 | 5.0 | 10.1 |
| 按年龄分组 | | | | |
| 15-24岁 | 16.2 | 23.0 | 4.5 | 9.3 |
| 25-34岁 | 7.1 | 7.9 | 3.4 | 7.1 |
| 35-44岁 | 7.5 | 7.8 | 2.3 | 8.8 |
| 45-54岁 | 5.0 | 5.1 | 2.7 | 6.1 |
| 55-64岁 | 1.7 | 1.8 | 0.7 | 2.7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1%抽样资料。

数据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15-24岁青年中,城市青年失业率最高,达23%,同期农村迁入城市的青年失业率只有4.5%,非农村的城市青年迁移者的失业率为9.3%。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因为,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影响及政府干预等人为因素致使农村的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城市,农村的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保健等资源更是极度稀缺,因而农村青年素质通常情况下低于城市。而基于全国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却似乎表明农村青年的就业竞争力最强。

细究之下,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与非自愿失业形式的下岗不同,城镇失业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主动或自愿失业。很多失业青年不是不能就业,而是由于他们的就业期望过高,不愿迁就造成的。根据上海市黄浦区团委2003年进行的《黄浦区失业青年目前状况抽样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城市青年失业人员的就业意识堪忧。虽然大部分失业青年表达了对就业的强烈愿望(占65.7%),但其中47.7%的失业青年表示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考虑就业,该特定条件包括薪水待遇、个人发展及所学专业等。对工资期望的调查显示,没有工资要求的人员仅占8.6%,更有59.5%的失业人员要求工资超过1000元。



城镇青年就业的期望值过高，而又眼高手低，不愿迁就低等工作，造成自愿失业。



毕业等于失业，大学生找工作难的就业瓶颈，产生了“被就业”的数字游戏，不知是对这个现象的嘲讽还是自我安慰。

另一方面，农村青年更多的是被迫失业。由于农村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隐性失业问题十分严重。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农村青年纷纷向城镇流动，已成为城市农民工中的主体。而留在农村的青年则多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这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和农业的季节性作业密切相关。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相比，流入城市的青年农民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强。然而，城乡体制隔离使得他们处于边缘化地位，常常被迫陷入失业境地。由于农村的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城市，农村的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保健等资源更是极度稀缺，因而农村青年素质通常情况下低于城市，使其在市场经济潮流中面临着比城市青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尽管有数据显示，从全国水平来看，农村迁移者的失业率不到城市本地劳动力失业率的一半，但农村青年更多的是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压力更大。

案例评析：

青年的就业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城乡青年劳动力就业差异化明显。因为农村青年劳动力各个方面的教育及知识储备不及城市青年劳动力，他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想就



业而不能就业，即所谓的非自愿失业，所以，在就业过程中，只要自己能胜任的工作都尽可能地把握。相比而言，城市青年往往多出于自愿失业，很多脏活、累活或工作环境不好的工作都不愿意干，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

由此，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我们在避免非自愿失业的同时更要尽量避免自愿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问题。今年，国家连续出台好几项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其中第一项就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为此，尽管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降低期望值依然可能找不到工作，即非自愿失业状态，但相对来说就业机会将大得多。在促进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和学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就业，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选择，减少非自愿失业；另一方面，大学生本人要积极深入基层，降低标准，减少自愿失业。

（资料来源：徐章辉、毕先萍：《青年失业现状与再就业政策评估研究》，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Chapter 2

第二章 有效需求原理

要素成本既定时，社会总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预期的收益决定的就业量。就业量取决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之点，此点的总需求即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新的投资量。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消费不足或投资不足。



就业相关术语

我们首先提出几个概念。当技术、资源和成本既定时，企业家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他们会因此而产生两类支出：第一类，是因生产要素提供了现行服务而产生的支出（不含给其他企业家的支出），称为所考察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类，是因购买了其他企业家产品的支出，以及折旧，称为所考察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产出的价值超过要素成本与使用者成本之和的部分就是企业的利润，我们把它称为企业家的收入。在企业家看来，要素成本就是生产要素的收入。因此，该企业家所提供就业量的总收入就是要素成本与企业利润之和。企业家将努力使企业家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了企业家提供就业量的多少。对企业家来说，既定就业量所产生的总收入（要素成本与企业家利润之和）称为该就业量的收益。另一方面，在一定就业量下产出的总供给价格恰好等于企业家认为值得提供这一就业数量的预期收益。

因此，在技术、资源和每单位就业量的要素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任何单个厂商、行业和社会总就业量就取决于企业家预期能从该就业量下的产出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因为，企业家所要努力维持的就业量，是能使利润实现最大化的就业量。

设 Z 为雇佣人数为 N 时产出的总供给价格， Z 和 N 的函数关系可写成 $Z = \phi(N)$ ，我们把它称为总供给函数。同样，设 D 为企业家雇佣 N 个劳动力时的预期收益， D 和 N 的函数关系可写成 $D = f(N)$ ，我们把它称为总需求函数。

当 N 一定时，如果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 D 大于 Z 时，那么企业家将有



成本

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之为成本。从更广的含义看，成本是为达到一种目的而放弃另一种目的所牺牲的经济价值，在经营决策中所用的机会成本就有这种含义。

雇佣

是指两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其中一方为雇佣者，另一方为被雇佣者。从法律意义来看，雇佣是通过双方契约约定，被雇佣者为雇佣者工作（出卖劳动），并由雇佣者提供报酬的一种法律关系，属于民法的范畴。一个机构需要进行生产行为以获得商业利润，具体从事这种产出行为并以此获得工资报酬的人称为雇员、职员。



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家的投资预期得到实现，自然暗自窃喜，社会总就业量也保持在较高水平。



萨伊是在欧洲大陆传播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第一人，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产业经济学教授。

动力把就业量提高到大于 N 的水平，而且，在必要时，企业家之间还会争相购买生产要素，从而导致成本上升到 N ，使得 Z 与 D 相等。于是，就业量就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的那一点，因为此时企业家的预期利润达到了最大，这一交点处 D 的取值则被我们称为有效需求。这便是就业通论的要旨。以后各章将主要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两个函数。

另一方面，古典学派所谓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假定意味着：对于 N 的任何取值，都能使 $f(N)$ 与 $\phi(N)$ 相等，即在产出和就业的任何水平下它们都是相等的。所以，当 Z 随 N 同时增加时， D 必然随着 Z 做等量的增加。换句话说，古典学派假定意味着：总需求价格常常与总供给价格相一致的，故不论 N 取何值，收益 D 与总供给价格 Z 都是相等的。那么，有效需求也将不是一个唯一确定的均衡值，而是由无穷多个且都能被接受的均衡值组成的数值系列；并且除了由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所确定的一个上限外，就业量也是不确



定的。

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就会促使就业量上升，直到总产出的供给达到失去弹性的那一点为止，即有效需求数量进一步上升，但产出并不会随之有任何上升。显然，这就相当于充分就业状态。

充分就业是指这样一种情形，总就业量的产出对有效需求增加的变化缺少弹性。这样，根据萨伊定律所说的：总产出的总需求价格在任何产量上都等于它的总供给价格，也就是说，实现充分就业是没有任何阻碍的。

就业量与有效需求

假设货币工资率不变，每雇佣一个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也都保持不变。这样是为了便于论述，以后我们将取消它。不论货币工资等是否会发生变化，该理论的本质是不受影响的。

我们的理论可简单地表述为：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总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但社会的心理状况却反映为，总消费量会随着实际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其增加的幅度却比收入的增幅要小。因此，如果全部增加的就业量都被用来满足增加的现期消费，对企业家来说将会遭受到损失。这样，如果要保持既定的就业量不变，那么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现期投资，来补偿在就业水平既定时总产出超过社会愿意消费数量的那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数量的投资，企业家的收入将会少于使他们提供这个就业量所必要的数量。因此，对于既定的社会消费倾向来说，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将取决于现期投资数量，而就业量的均衡水平也就是企业家整体再没有动机来扩大或缩小就业量的水平。现期投资数量又依次取决于我们将要说的投资引诱，投资引诱又被发现时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与针对不同期限和风险的各种复合贷款利息率之间的关系。

这样，在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一定的条件下，就只有一个与均衡水平相一致的就业量。这个均衡水平下的就业量不能大于充分就业量，即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一般来说，我们也不应期望均衡水平下的就业量与充分就业量相等，因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人为操纵的情况下，使现期投资产生的需求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引起的总产出的总供给价格超过充分就业时社会愿意消费量的差额，它才能存在。

这个理论可以总结为：

(1) 在技术、资源和成本既定的条件下，收入（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 N 。

(2) 该社会的心理特点决定了社会收入和社会愿意用于消费的数量（用 D_1 表示）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消费倾向。也就是说，在消费倾向不变时，消费数量取决于总收入水平，进而取决于就业量水平 N 。

(3) 有效需求 D 决定了企业家决定的雇用劳动者的数量 N ，而 $D=D_1+D_2$ ，此式中， D_1 为社会愿意用于消费数量， D_2 为社会愿意用于新投资的数量。

$$D = D_1 + D_2$$



(4) 由于 $D_1+D_2=D=\phi(N)$ （其中 ϕ 为总供给函数），又由结论 2 所述， D_1 是 N 的函数，我们可以写作 $x(N)$ ， x 取决于消费倾向，故有 $\phi(N) - x(N) = D_2$ 。

$$D_1 + D_2 = D = \phi(N)$$



(5) 因此，均衡的就业量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①总供给函数 ϕ ；②消费倾向 x ；③投资量 D_2 。这就是就业通论的要点。

(6) 工资品行业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了实际工资，而劳动边际生产率又随 N 的增加而递减。因此，结论 5 受以下这个条件的约束：当实际工资降低到与劳动边际负效用相等时， N 即达到其最大值。这就是说，并不是 D 的任何变化都能保证货币工资不变。因此，为了全面阐述我们的理论，有必要取消货币工资不变这一假定。

(7) 根据古典学派的理论，对于 N 的任何取值，都有 $D=\phi(N)$ 。只要 N 小于其最大值时，就业量都处于中性均衡状态。因此，通过企业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能使 N 达到最大值。在古典理论中，只有在这一点（ N 取最大值时）上才会存在稳定的均衡状态。

(8) 在就业量增加时， D_1 也将增加，但它的增幅小于 D 的增幅；因为，随着我们收入的增加，我们的消费也会上升，但消费上升的幅度小于收入的幅度。我们可以从这一心理规律发现现实问题的关键。从这条心理规律可以推导出：就业量越大，在



此就业量下产出的总供给价格 Z 与企业家预期通过向消费者出售产品而收回的总额 $D1$ 之间的差额就越大。如果消费倾向不变，除非 $D2$ 同时增加，来弥补 Z 和 $D1$ 之间不断增加的差额，否则就业量就不可能增加。因此，除非真像古典学派所假定的那样，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若干因素使得 $D2$ 增加到足够弥补 Z 与 $D1$ 之间逐渐扩大的距离，否则可能 N 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时候，经济体系已经达到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因为， N 的实际水平取决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交点。

因此，并不是以实际工资衡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决定了就业量，而是在实际工资既定时，所能提供的劳动供给量决定了就业量的最高水平。可以说，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共同决定了就业量，就业量又决定了实际工资——而不能反过来说。若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实际就业水平将会下降到低于现行实际工资可能产生的劳动供给水平，而均衡的实际工资就会大于均衡就业水平的劳动边际负效用。

以上分析可以用于解释富裕中的贫困这一悖论。因为只要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话，那么就业量常常在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以前就可能不再增加。尽管劳动的边际产品在价值上仍然大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事实上，有效需求不足通常会阻碍生产。

而且，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因为贫穷的社会一般会倾向于消费掉它很大一部分产出，所以很小的投资就能达到充分就业；相反，在富裕社会中，需要更充分的投资机会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更糟的是，在富裕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更微弱，而且因其资本积累已经很多，如果利率不能以足够快的速度下降，将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利率理论，并分析利率不会自动下降到应有的水平的水平的原因。



社会发展均衡，富裕的西方社会，物质生产极大丰盛，社会总体消费水平趋于高档，奢侈之风盛行。



大卫·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终结者和最后一名代表性人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鼓吹他的人口学原理。人口过剩不是天方夜谈，计划生育早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因此，分析消费倾向、边际资本效率的定义和利率理论就成为我们现存知识中必须加以填补的三个主要空白点。在完成这些工作后，我们会发现，通论中一个组成部分中的价格理论的地位也就确定了。我们还会发现，货币在我们的利息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将尽力把货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揭示出来。

李嘉图的迷惑性学说

“可以忽略总需求函数”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学习的经济学的基础。事实上，对于李嘉图的有效需求不会不足的观点，马尔萨斯曾经猛烈地批判过，但没有起作用。因为马尔萨斯仅从日常观察中得来的事实进行批判，但他没有提出另外一个理论以阐述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李嘉图经济学征服了英国，他的观点为金融界、政治家以及学术界所接受，从而使得争议停止，使得其他观点消失且根本不加以讨论。因马尔萨斯不能解决有效需求这一难题，故该观点也消失在经济学

文献中。在马歇尔、艾其伟斯以及庇古教授的手中，古典学派的理论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在他们三人的著作当中，根本没有提到过有效需求这几个字眼。

然而，有效需求的观点，只能隐约地出现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盖赛尔或道格拉斯少校这些不被社会关注的看法中。

马尔萨斯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是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最为人所知的著作是《人口学原理》。在书中,马尔萨斯作出一个著名的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没有限制,人口是呈指数速率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线性速率增长。

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也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均衡价格论,他认为,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是同时起作用的。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是德国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作家、革命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

李嘉图经济学的胜利是因为,它为资本家的自由行为提供了辩护的理论依据,得到了掌权者身后的主流社会力量的支持。但是,该学说在科学预测上的失败,极大地损害了那些把它运用于实践的经济学者们的威望。

传统经济理论的乐观主义,似乎已经使经济学者们脱离了现实世界。我想,这种乐观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不足对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一个社会只要符合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就显然存在着向最优就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



盖赛尔是早期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似乎已湮没在历史的旧纸堆中，不为人所知。

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引起了各国政府领导人、金融家、经济学家和全世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业量靠近的自然趋势。古典理论或许代表了我们所希望的经济体制运行方式。但是，如果假设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那么就相当于我们的困难都被假设掉了。

【解析】 就业量决定因素

在技术、资源和每单位就业量的要素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任何单个厂商、行业和社会总就业量就取决于企业家预期能从该就业量下的产出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因为，企业家所要努力维持的就业量，是能使利润实现最大化的就业量。因此，就业量是取决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的那一点，而这一交点处的总需求便是有效需求。现实中，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将随之增加，但增幅较小。那么，就需要注入新的投资来维持企业家的收入，从而维持既定的就业量水平。假如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率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就业量就可能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停止增加，从而阻碍生产。因此，有效需求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有效需求不足常常表现为消费的不足或投资的不足。考虑这两个因素，便可促进就业量。

【案例】 消费需求不足是金融危机“祸根”

案例适用：消费需求不足

2008年，由美国始发、迅速向全球蔓延



纵观当前各国政府采取的救市举措,以及关于增加流动性、加强监管和透明度等措施,都是金融家们传统理论思维的表现。他们就行业本身分析问题,习惯于从行业范畴谈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没有把金融危机置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下去研究和思考。这种思维模式引导人们局限于操作和技术层面,难以触及实质性问题。由于没有着力寻找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也未能提出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这次金融危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而且也难以避免金融危机日后再次发生。

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最深刻的原因,是由于在旧的、传统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和金融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消费资本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消费需求不足和消费资本缺位,才是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许多金融家和政府领导人,还没有从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束缚和影响中走出来。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有一种资本,即货币资本。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完整的市场经济的资本构成应包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是三种资本在拉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单一的或者唯一的货币资本。



世界性金融危机下,失业成了热门词语,绝望自杀者甚众,上至企业高管,下至一般员工,金融危机成了“死神危机”。



“四千美金起,还不带讲价!”电影的台词有点唱反调,金融危机下,房价下跌,人们却也无力承受。

但多年以来，我们的市场经济一直是货币资本一枝独秀，它的作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货币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也得到充分的保证。而知识资本，特别是消费资本，却长期处在被淡化甚至缺位的状况，从而使二者长期处于被动的消极状态，形成单一地依靠货币资本发展经济的局面。虽然经济也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依靠货币资本这一单一要素发展经济，资本短缺、创新乏力、消费萎缩等问题不可避免。所以，知识资本，特别是消费资本缺位造成的市场萎缩、总需求不足才是世界经济不断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最深刻的原因。

在分析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时，一些金融专家把美国次级贷款看成是这场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其实是不对的。它掩饰了金融危机产生的真实原因。因为次级贷款在房价不下跌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房贷机构资产和财务收支状况恶化。只有在房价急剧下跌的前提下，次级贷款才会造成房贷机构资产和财务状况恶化并引发危机。

其次，房贷机构和保险公司、银行、券商联手，把房贷证券化并包装上市，推向全球金融市场，用虚构的高预期回报制造虚假需求，使金融衍生品无限制泛滥，形成一条长长的金融泡沫链。但最终由于实际的消费缺失，金融泡沫破裂，金融链断裂，造成银行体系的崩溃和资本市场的瘫痪，极大地加重了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

另外，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刻原因是广大消费者“相对贫困”。消费者“相对贫困”是由于分配不公所产生的“二、八”现象的直接结果，即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80%的人们购买住房的愿望十分殷切，但却无力购买而不能形成有效需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当今世界依然严重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状况，着力解决消费者“相对贫困”的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分配不公、广大消费者“相对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为了寻找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必须对分配制度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在世界各国流行的、现行的分配制度本身是不公平的。

在现行分配制度所形成的分配格局下，货币资本所有者几乎独享企业所有利润；知识资本所有者只享有少许利润；而消费资本所有者长期以来甚至处于缺位状态，完全不参与分配，无利可获。这是社会分配不公的源头和始发原因，也是造成消费者“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如果就金融谈金融，解决办法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就等于是在金融泡沫链上下功夫。这是舍本求末的做法。我们应该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入手寻找解决危机的根本途径。

案例评析：

新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资本构成应包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种资本，而经济发展方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所以，解决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银行、保险公司等各金融企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总的思路应当是继续充实货币资本，高度倚重知识资本，大力开拓消费资本。由单一货币资本发展经济的传统发展方式，转化为货币资本和知识资本相结合的发展方式，再转化“消费资本导向、知识资本创新、货币资本推动”的三种资本融合、联动的新型发展方式，是世界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所必然遵循的总的趋势，也是市场经济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规律。从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入手将成为寻找解决危机的根本途径。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2009年03月02日：《消费需求不足是“祸根” 破解金融危机的新思维》)

第二编



衡量单位的不同，导致经济总量只能用价格的总和来表示，经济概念模糊不清，造成经济理论难以理解；选择计量单位以适用于研究所有整体经济体系中出现的问题，确定预期在经济分析中所起的作用，规定收入的定义，是本编的任务；明确国民收入的概念及其所引起的问题，对分析整个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卷精彩内容导读目录

- ◎案例：效率工资理论的应用 / 36
- ◎案例：企业到底应该追求什么目标？ / 44
- ◎案例：消费者太“瘦”投资率只有上升 / 57
- ◎案例：居民储蓄动机与高等教育收费改革 / 68

Chapter 3

第三章 单位的选择

有必要选择一些单位，以用来研究经济体系中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有经济学家们常用的单位：国民收入、实际资本存量、一般价格水平。在论述就业理论时，可使用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货币价值量和就业量。

古典经济学未解释清楚的概念

在写本书时，有三个疑难之处严重阻碍了本书的写作进程，而在没有设法解决这些疑难之前，我将不能顺畅明了地表达出我自己的意见。这三点疑难是：第一，如何选择计量单位，该单位能适用于研究所有整体经济体系中出现的问题；第二，如何确定预期在经济分析中所起的作用；第三，如何规定收入的定义。

经济学家们常用的单位使人不满意的地方，可以从国民收入、实际资本存量和一般价格水平这几个概念得到说明：

国民收入

正如马歇尔和庇古教授所定义的那样，衡量的是现期产出量或者实际收入，而不是衡量产出量的价值或者货币收入。而且，国民所得是一个净概念，必须从现期产出中减去折旧（已有资本在现期中的损耗），二者之差才是所得，才是社会资源的净增量，它可以用于消费，也可以留作资本投资。古典学派想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量



马歇尔是剑桥学派的重要人物，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弹性的概念和计算弹性的公式。

的科学。然而这个定义的一个严重不足之处是：由于社会的商品和劳务是性质不同的复合体，因此严格地说，除了某些特殊情况（所有产品都以同一比例增加）外，这个复合体是不能被计量的。

实际资本存量

当我们为了计算净产出量而设法计量资本设备的净增量时，遇到的困难更大。因为，要对现期内生产的新设备与已经损耗掉的老设备在数量上进行比较，我们就必须找



出两者之间某个共同的基础。在计算净国民所得方面，庇古教授做了一些尝试，庇古教授减去“可以大致预料到的正常的折旧”，但是他并没有以货币作计算单位，即减去的并不是一笔钱，所以他是假定着物质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其价格量改变了，也就是说，他还是暗中引入了价值变化的概念。但是当生产技术改变，新设备与旧设备不相同，庇古教授想不出满意的办法来比较两种设备的价值。就经济分析来说，我相信庇古教授所尝试的概念是正确而恰当的。但是，除非先采用令人满意的单位体系，否则，很难给出精确定义。

一般价格水平

人们都知道，一般价格水平这一概念具有的模糊不清的性质，而这也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性质使得该概念很不适合被应用于因果分析，因果分析应该是非常精确的。这些概念不仅缺少精确性，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显然，在我们的定量分析表达方式中，必须不使用任何在数量上模糊不清的概念。并且事实上，一旦我们尝试着去做定量分析，没有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事情反而变得更加清晰。

尽管两种在数量上无法比较的东西不能用作分析材料使用，但我们仍然可以作约略、笼统的比较（因为它们无须精确计算，只要大致正确就可以了），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统计比较倒显得健全和有意义，实际产量、一般价格水平等等都采取的是这种方式计量的。因果分析需要绝对精确的数值，即使我们无从得知有关数量的实际值。

就业量的决定因素

我们要明白，在每一个特定场合，企业家们都需要做出决定：在既定量的资本设备条件下，采取何种规模来满足其生产。当企业家预料到需求将增大（即总需求函数提高），那么他们将在既定量的资本设备上雇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扩大其产量。如果就一厂或一行业来说，他们生产的是一种商品，那么产量的增减是好计量的。但是，当我们将社会各厂的产出加总时，除非用特定资本设备上的就业量为标准，否则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产量到底是增是减。为了叙述产量增减的方便，我们假定：产出量可以用一特定资本设备上所用劳动者数量来衡量。也就是说，产量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尽管二者增加的比例不同。

故在论述就业理论时，我建议只使用两个基本数量单位，即货币价值量和就业

量。其中，前一个单位是严格同质的，后一个单位可以人为地使其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别的劳动者以及领取薪金的办事员来说，他们获得的是相对固定的报酬。我们可以把普通劳动者工作一小时的报酬作为计量单位，而按一定比例把特殊劳动者的工资换算成他的劳动时间，例如，报酬是普通劳动者两倍的特殊劳动者每工作一小时，计作两个工资时数，对我们的目的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就业量的定义是很充分的。我们把衡量就业量的单位叫做劳动单位，并把每一劳动单位的货币工资称为工资单位。从而，假设 E 表示工资（和薪金）总额， W 表示工资单位，而 N 表示就业量，就有 $E=N \cdot W$ 。

$$E = N \cdot W$$



显然，单个工人在特殊技能以及对不同职位适应性方面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但这个事实不会推翻劳动供给具有同性质的假设。我们所作的劳动单位具有同质的假设不会带来任何问题，除非在不同劳动单位的相对报酬间出现极大的不稳定性。而即使真的出现了不稳定性，我们也可以通过作劳动力的供给和总供给函数的形状都会快速改变的假设，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们把经济体制的运行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时，如果严格限定只使用两个单位，即货币和劳动，将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把产量和设备的特定单位留待我们独立地分析单个厂商或单个行业的产出时使用，并把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例如：总产出量、总资本设备量和一般价格水平，用于某种历史比较的场合，而历史的比较在一定（也许还很宽广）的限度内是不严密和近似的。

供给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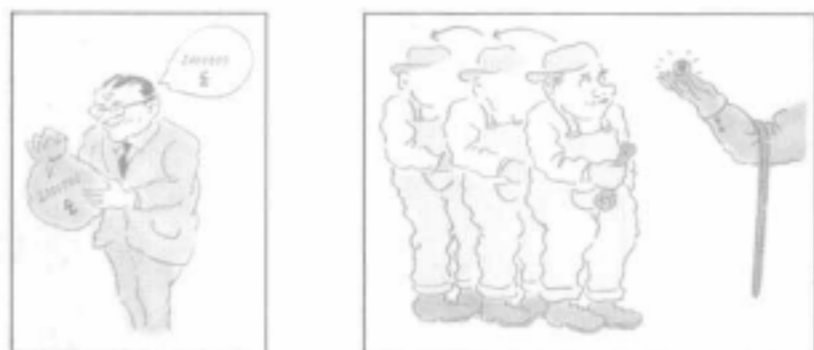
我们将用在现有资本设备上雇佣的劳动者数量（不论他们被用于生产消费品，还是新的资本设备）来衡量现期产出的变化，熟练劳动者根据他们的报酬进行折算。

我们还很容易地说明，不论是对一个具体的厂商或行业，还是对经济活动整体来说，都能根据我们所选择的两个单位，来表示供给状况以及供给弹性，而不需要涉及



产出量。因为一家具体的厂商（对于一个既定行业或全部行业也基本是这样）的总供给函数式为：

$$Z_r = \phi_r(N_r)$$



这里， Z_r 是能诱使企业家雇用劳动者就业量为 N_r 的预期收益。设就业量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为 $O_r = \psi_r(N_r)$ ，即就业量为 N_r 时，产量为 O_r ，则可以推导出：



$$P = \frac{Z_r + U_r(N_r)}{O_r} = \frac{\phi_r(N_r) + U_r(N_r)}{\psi_r(N_r)}$$

上式就是一般情况下的供给曲线。其中 $U_r(N_r)$ 表示的是在就业量为 N_r 时，企业家所预期的使用者成本。这样，在每一种商品都具有同质性的情况下，对于每一种商品， $O_r = \psi_r(N_r)$ 都有确定的含义，我们就可以用通常的方法来估计 $Z_r = \phi_r(N_r)$ ，但我们不能用对 N_r 求和的方法对 O_r 求和。因为， $\sum O_r$ 是不能用数值来表示的。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在既定的环境下，既定的总就业量在不同行业间分配的方式是唯一的，以致 N_r 是 N 的函数，那么，问题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简化。

❁ 【解析】货币价值量与就业量

古典学派在论述经济问题过程中引入的常用单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有必要选择几个单位，使其在处理有关整个经济体系中出现的问题研究时都能适用。由于社会商品和劳务是性质不同的复合体，在衡量产出量的增减时，我们假定的是产量可以通过特定设备上使用的工人数量来衡量，即二者是同时增减的。这样我们就只需要引入两个基本数量单位，即货币价值量和就业量。虽然，后一个单位会因劳动者本身素质和对工种适应程度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是我们选用劳动单位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即把普通劳动者每一小时工作量作一劳动单位，若特殊劳动者的每一小时劳动量是普通劳动者的两倍，那我们就记作两劳动单位。因此，工资量就由就业量和劳动单位的工资量的乘积决定，从而可以使总供给曲线得到简化。



福特首次向工人支付 8 小时 5 美元的工资，引起当时美国社会的轩然大波，改变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方式。



坦桑尼亚的效率工资举措，对种植园主是灾难，却给产业工人带来了福音，让他们迸发了工作的热情。

【案例】效率工资理论的应用

案例适用：特殊劳动与工资

所谓效率工资 (efficiency wage) 是使劳动总成本为最小的工资。与效率工资紧密相关的是市场出清 (market clearing) 工资。市场出清工资是使劳动市场出清的工资，也就是使劳动供给等于劳动需求的工资。效率工资一般高于市场出清工资。效率工资理论的假设条件是生产率 (productivity) 受企业支付工资的影响。当工资影响生产率时，减少工资导致的是成本的增加而不是降低。因此，效率工资理论认为，支付比市场出清工资更高的工资，劳动总成本可能最小，厂商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实际生活中，效率工资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充分应用。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的故事。1914 年 1 月，亨利·福特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一天 5 美元，是当时一般工资的 2 倍以上（不过，这种翻一番的工资标准只对那些至少已在公司中工作了 6 个月的工人有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公司又规定新的求职者必须至少已在底特律地区居住 6 个月以上）。高工资提高了工人士气，工人们为了争抢工作岗位几乎发生骚乱。在 1913 年 3 月到 1914 年 3 月之间，福特公司雇员的辞职率下降了 87%，解雇率下降了 90%。类似的，1913 年 10 月至 1914 年 10 月之间，缺勤率也下降了 75%。高工资带来了高生产率，福特的汽车价格比对手便宜得多，汽车销售量从 1909 年的 58000 辆直线上升至 1916 年的 730000



每天5美元的工资使福特工厂的风头一时无两，工人削尖脑袋往里挤，颇具广告效应。

辆，巨额利润也随之滚滚而来。效率工资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坦桑尼亚(Tanzania)的效率工资就很成功。东非的坦桑尼亚于1961年刚独立的时候，大多数工人都在大种植园工作，工人的工资很低，生产率也很低。独立后，坦桑尼亚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大幅度提高种植园的工人的工资。这项法令对种植园主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是由于效率工资的作用，种植园主雇用了优秀工人，劳动力队伍稳定，生产率提高，产量成倍增加。例如，西沙尔麻的产量增加了3倍。坦桑尼亚政府可谓成功地运用了效率工资理论，这种必要的政府干预，无疑是好的，有效地弥补了市场失灵的不足。

效率工资理论在国外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遗憾的是，在我国的运用却很不令人如意。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长期推行低工资制度，1964年以后甚至停止了调资，从1964—1978年这10多年时间里，职工工资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这种低工资，主要是当时的政府选择了尽可能通过压低国民消费的方式，将那些没有分配用于消费的资源用来进行投资，使得整个国家实际上进行高储蓄，并得以实现重工业化。政府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劳动者在主人翁的光环下，能充分理解。但是，长期的低工资毕竟极大地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在当时高度管制的背景下，劳动者不能选择流动，但是在勤劳与偷懒之间，他可以选择偷懒，“磨洋工”，出工不出力。低工资也严重影响劳动者健康，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才51元一月，上要赡养父母，下要抚养子女，一家三代同居一室，营养严重不良，工作中

能有多高的效率？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1980年这三年中，职工工资总额迅速增加，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1980年达19.4%。这三年工资总额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带有归还欠账的性质。工资的增长，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84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职工工资再次大幅度增长，增幅达21.3%。但是1986年以后，伴随着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职工实际工资增长相当缓慢。经过20余年改革，国有企业低工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目前，国有企业大批优秀员工流向外企，严重制约国有企业的发展。人才为什么流向外企？根本原因无疑就是外企的薪酬高，高薪酬成为外企吸引人才的“杀手锏”。国有企业薪金报酬比外企低得多，并且被政府严格管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优秀人才不流向外企，这才是咄咄怪事。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防止人才流失，让优秀员工眷恋企业。稳住优秀员工有很多招，但主要的还是高薪留人，所谓感情留人、政策留人如果缺乏经济基础，就靠不住。因此，面对外企“挖人”攻势，国有企业必须进行薪酬革命，高级职位的工资要大幅度上升。道理很简单，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要支付效率工资。

有人或许会说，国有企业本已困难重重，支付效率工资，加大企业成本，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其实不是这样。效率工资理论昭示，高生产率是高工资的结果，而不是高工资是高生产率的结果。支付效率工资能稳住和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提高生产率，使劳动总成本最低，恰恰不是雪上加霜，而是雪中送炭。振兴我国国有企业，不妨学学亨利·福特，学学东非的坦桑尼亚，科学运用效率工资理论，推进薪酬革命，不断完善薪酬设计机制。

案例评析：

众所周知，现在效率工资已经被我国企业广泛接受和应用，也是企业争夺优秀人力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同时，效率工资充分显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与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同的是，多劳多得。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所带来的报酬肯定要比普通劳动者的报酬高得多。效率工资理论昭示，高生产率是高工资的结果，而不是高工资是高生产率的结果。支付效率工资能稳住和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提高生产率，

使劳动总成本最低，恰恰不是雪上加霜，而是雪中送炭。科学运用效率工资理论，推进薪酬革命，不断完善薪酬设计机制。

（资料来源：陈乐一：《效率工资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 2008-08-18）

Chapter 4

第四章 预期和就业

预期可分为长期预期和短期预期，二者共同影响生产决策，进而改变就业量；任何特定时间，经济运行中都存在着大量互相交错的活动，其根源是过去对未来的各种预期；就业量既取决于当前的预期，也取决于过去某段时间里存在着的众多不同的预期。



预期影响投资和就业量

所有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然而，从生产者投入成本到产品最终被消费者购买之间会有一个时间（有可能还较长）的间隔。同时，企业家（包括生产者和投资者）必须尽可能地进行若干预期：在这段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后，在他能为消费者提供（直接或间接地）产品时，消费者愿意花多少钱购买这些产品。如果他所从事的生产确实存在这样的时间间隔，那么没有别的选择，他就只能根据这种预期来做出生产安排。

企业家制定决策所依据的预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我们把它称之为短期预期，它所关注的是价格。即一个制造商决定开始生产某种产品时，他期望能从他的制成品（从制造商的角度来看，制成品是指已经能够使用或可以卖给另一方的产品）中得到的收益。第二类，我们把它称之为长期预期，它所关注的是预期收益，即如果企业家决定购买（或生产）制成品以增加资本设备时，他期望将来能从中得到的收益。

这样，单个厂商决定其日常产量的依据是短期预期。即对各种可能产量下生产成本的预期和对产出销售收益的预期。即使在增加资本设备，甚至向中间商出售产品的情况下，其他



靠低廉的价格打入市场，可能会获得短期利益，但价格战绝不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



有战略眼光的投资，是对生产的原材料和科技研发长期投入，这是长期预期的有效手段。



方面的长期（或中长期）预期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短期预期。正是这些种种不同的预期决定了厂商所提供的就业量。只有当生产和销售的实际结果能导致下一次预期改变时，它们才能对就业量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家在每次做出决策时，虽然会考虑现存的设备和存货（有可能是上一次预期导致的），但对未来成本和销售收益的预期才是制定决策的依据。

一般来说，预期改变（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对就业量的影响力是逐渐发挥的，待其全部发挥出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预期改变而导致的就业量的改变，在预期改变后的第二天不同于第一天，第三天又不同于第二天，依此类推。这是因为，不论短期还是长期预期，都必须经历一个修正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能导致就业量的改变。

如果某种状态的预期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致它对就业量的影响力全部得到发挥（即根据持续不变的就业预期而产生的充分就业）。那么，这时达到的稳定的就业水平，可被称为与这一预期相对应的长期就业量。可见，虽然预期会经常改变，会导致实际就业水平可能从来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达到与现行预期状态相对应的水平。但是，每一种预期状态都可以有与之相对应的确定的长期就业水平。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预期的一次性改变后，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是怎样过渡到长期预期状态的。如果新的长期就业量比原来就业量高，则一般来说，开始时受较大影响的只有投入的速度，即新生产过程早期的工作，而消费品的产量和原生产过程后期的就业量将保持不变。如果还有半制成品存货，那么，这个结论可能要作一定的修正；但是，“就业量在初始阶段的增加是有限的”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就业量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另外，还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个阶段，就业量可能会高于新的长期就业量。这是由于，在为满足新预期状态而投入资本设备的过程中，可能引致比新的长期状态所能产生的更多的就业和现实消费。因此，预期的改变可以导致就业水平逐渐上升而达到一个顶峰，而后又下降到新的长期水平。如果新的长期就业水平和原来一样，那是因为：预期的改变是由消费倾向的改变所引起的，并进而导致某些生产过程及资本设备被淘汰时，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如果长期就业水平比原有水平低，那么在过渡时期，就业量可以暂时低于新的应有的长期就业水平。因此，在预期的改变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仅是它本身的改变，就会产生像经济周期那样的波动。

现实的达到一个新的长期状态的过渡过程将更加复杂。因为，预期在不断地改变

着，在前一个改变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新的预期又会叠加上去。因此，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经济运行中都存在着大量互相交错的活动，其根源是过去产生的对未来的各种预期。

预期所决定的就业量

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时候的就业量，既取决于当前的预期，也取决于过去某段时期里存在着的许多不同的预期。然而，过去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预期体现在现在的资本设备之中，它对企业家的决策的影响力，仅限于它所体现的资本设备对决策的影响范围内。可见，无论上述影响怎样，都可以正确地认为，是依据今天的资本设备而做出的，今天的预期决定了今天的就业量。

强调对现行长期预期的参照是难以避免的，但对短期预期却可以不这样做。因为修改短期预期的过程，在事实上往往是逐渐的、连续的，大部分是依据实际结果而作出的，故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是相互影响的。虽然产量和就业量决定于生产者的短期预期，而不在于过去的结果，但是新近的实际结果往往对这些短期预期有着不可忽视的支配力量。企业家不需要在每一次生产过程时都要作短期预期，这样不但很麻烦，



企业家根据过去产量的销售状况决定增加投入资本，发展生产，对就业起到了刺激作用。

而且还浪费时间，因为通常情况是短期内预期是没有多大的变化的。除非对预期的变化有确定的理由，企业家在假设“最近实现的结果将持续下去”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是合理的，他们是不会根据凭空臆测而逐渐改变其预期。因此，根据最近过去产量的实际售价而形成的预期对就业量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不能忘记：在生产耐用品的情形下，生产者的短期预期是建立在投资者的现行长期预期基础上的，不能在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根据已实现的结果来检验，这是长

期预期的特征。

❁ 【解析】企业家的期望值决定就业量

厂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消费者以获得收益。然而，厂商在生产的过程中无法预期所生产的商品的售价及收益，只能根据若干预期来推测，从而决定现期投资量及产出量，进而决定所要提供的就业量。这种预期可分为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它们共同影响厂商生产的决策，进而影响就业量的改变。而预期的影响力又是逐渐发挥的一个过程，即若是某种状态的预期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致对就业量的影响力得以全部发挥，此时，便达到了稳定的长期就业水平。但事实上，预期状态常常都是在不断改变的，在前一个改变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新的预期又会叠加上去。因此，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经济运行中都存在着大量互相交错的活动，其根源是过去产生的对未来的各种预期。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时点上的就业量，既取决于当前的预期，也取决于过去某段时期里存在着的许多不同的预期。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期的就业量还是取决于现期的预期。



片面追求广告效应，而不是从品质上下功夫，广告投入远大于研发投入，导致了三株的失败。

⑤

❁ 【案例】企业到底应该追求什么目标？

案例适用：利润最大化

前不久，国家权威部门曾对一些著名企业的企业家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企业管理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所在的企业实际上的管理目标是什么？回答认为企业目标应当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占84%，但在实际执行中有31%的企业采取的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而55%是采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事实证明，利润最大化容易导致短期行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放弃长期利益保当年利润。另外，利润最大

化还会导致冒险行为。这种情况不仅在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中存在，就是在一些民营企业中也有许多例子。应该说在我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失败的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三株口服液的案例了。

1994年8月，吴炳新投资30万元在山东济南成立了三株实业公司，开始生产销售他们研制的“三株口服液”，并且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老实巴交的吴炳新怀着胜利的喜悦和报效祖国的心情，提出了自己企业的目标——“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和“振兴民族工业”。他以娴熟的营销手段和投入巨额广告费开路，在产品销售上取得巨大的成功。1994年他的销售额达到了1亿元，1995年达到20亿元，到1996年，三株的销售额一跃而达到了巅峰的80亿元。这三年，三株累计上交利税18亿元。他所上交的利税远远超过我国一些非常著名的特大型企业。但是由于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没有将赚来的钱用在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上，没有将更多的钱用在产品开发和科研上，没有将钱用在对自己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的研究上，致使三株公司不具备一个优秀企业所必须有的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抗风险的能力。后来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事故，导致三株公司这个庞然大物在几个月内就彻底垮台了。

相反，海尔集团和联想集团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实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楷模。经过短短15年的时间，海尔集团从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迅速成长为中



永恒的优势创新是海尔的核心竞争力，海尔产品畅销全球，印证了那句话“创新决策未来，远见引领前行”。



谨慎行事，不轻言放弃，“以品质赢得荣誉，靠荣誉吸引用户”，企业价值最大化使联想充满竞争力。

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海尔成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到目前，海尔产品已经有 58 大门类 9200 多个品种，企业销售收入以平均每年 81.6% 的速度高速、持续、稳定增长，近几年，海尔集团的年销售收入达到 200—250 亿元。海尔的产品已经销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世界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 2 亿美元。1999 年 4 月，美国海尔宣告成立，目前海尔已经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开设了十几家工厂和数以千计的销售网点，海尔已经成为初具规模的跨国集团。

1997 年，美国《家电》杂志公布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家电企业，海尔超过 GE、西门子等世界名牌，名列榜首。

1999 年 12 月 7 日，英国《金融时报》公布“全球 30 位最受尊重的企业家”排名，海尔总裁张瑞敏荣居第 26 位，这是中国企业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最高声誉。

海尔创造了世界名牌，海尔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海尔不断扩大的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海尔的忠诚服务精神成为中国企业的楷模。尽管海尔的利润额并不突出，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海尔是中国最好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

联想集团成立于 1984 年，中科院计算所投资 20 万元人民币，由柳传志等 11 名科技人员创办，到今天已经发展成我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和在 IT 行业内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2001 年联想拥有员工 11200 余人，营业额达到 206 亿元。1994 年联想在香港上市，是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从 1996 年以来联想计算机连续 6 年位居国内市场销量第一，2002 年第二季度，联想电脑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27.7%，连续 9 个季度获得亚太市场（除日本外）第一；2002 年第二季度，联想台式电脑销量首次进入全球前五名，其中消费电脑在全世界排名第三。联想已经成为中国 IT 业的领头羊，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2003 年 8 月，由北京大学案例教研室、新浪网和经济观察报联名发起的评选 2002 年度最受尊敬的企业评选结果揭晓，海尔集团、联想集团被评为第一、二名。



案例解析：

大多数企业追求的目标即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即是企业生存的原则，也为我们普遍所接受。但是，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利润最大化容易导致短期行为，为了追求利



利润最大化可能放弃长期利益保当年利润。另外就是利润最大化还会导致冒险行为。这些都会使得企业在面临经济冲击时立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现在很多企业选择了企业价值最大化,如海尔和联想等。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不仅能保证持续的利润,而且可以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故在这种情况下,不论预期经济形势将如何发展,企业都有能力去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资料来源:锦葵:《《总经理学基础》讲座》,百灵网2005-08-05)

Chapter 5

第五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收入影响企业家在既定生产规模上提供的就业量。净收入为收益减去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的部分，净收入极大影响消费。储蓄为收入超出消费支出部分。投资乃当前生产活动中产生的资本设备价值的增加值，即未被消耗的资本价值。

多种因素的成本及收入的定义

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家把他的制成品卖给消费者或别的企业家，所得的款项我们用 A 来表示。他又从别的企业家那里购买制成品所支出的款项，我们用 A_1 表示。最终，他所拥有的一些资本设备的价值，包括半制成品存货和制成品存货等，我们用 G 来表示。



$A+G - A_1$ 中有一部分并不是本期生产的，而是在本期生产开始时已经拥有的资本。因此，要得到我们所说的现期收入，我们就要从 $A+G - A_1$ 中减去一笔款项，这笔款项不是来自本期获得，而是上期留下来的设备在价值上的贡献。一旦找到合适的计算方法来计算这笔应被减去的款项，我们就可以解决收入的定义问题了。

计算这笔款项有两种可能的方法：一种与生产有关，另一种与消费有关，两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我们将依次加以分析。

要素成本

资本设备在本期期末时的实际价值 G 是企业家得到的一个净值，由两方面因素造成。一方面，他向其他企业家购买或者自己生产设备，以用于在本期内对资本设备进行维护和改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产品而导致资本设备的损耗和折旧。即使企业家不生产产品，他们对设备进行维护和改进也将支付一笔适度的款项。假设企业家对设备进行维护和改进支出了 B' ，包括这

资本家前期购买的生产设备以及维护和改进设备的耗费，属于要素成本的范畴。



总需求函数

总需求曲线表示在每一种物价水平时，家庭、企业、政府和外国客户想要购买的物品和劳务量的曲线。它告诉我们在任何一种既定的物价水平时经济中需求的所有物品和劳务量。从图形上看，总需求曲线总是向右下方倾斜，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下降会增加物品与劳务量的需求。相反，物价水平的上升减少了物品与劳务的需求。

笔支出，资本设备在本期期末时的价值将为 G' 。那么， $G' - B'$ 就是从上一期继承下来的资本设备，在不用于生产产品 A 时的最大净价值。这个净价值超过 $G - A_1$ 的潜在价值就是由于生产 A 而被消耗掉的部分。我们称之为： $(G' - B') - (G - A_1)$ ，也就是 A 的使用者成本，用 U 表示。企业家为了得到其他生产要素的服务而支付的款项（从要素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们的收入），我们称它为 A 的要素成本 F。要素成本 F 与使用者成本 U 的和就是产品 A 的直接成本。

由此，我们对企业家的收入可以定义如下：本期销售的制成品的收益超过直接成本的部分，就是企业家的收入，即企业家的收入被认为与通常意义的毛利润相等，而毛利润是在现有的生产规模基础上，企业家希望其最大化的一个数值。又由于企业家的要素成本与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相等，因此，总收入就等于 $\Sigma (A - U)$ 。

以这种方式定义的收入是一个有明确意义的数量。由于企业家决定向其他生产要素提供怎样的就业量时，收入超过支付给其他生产要素的部分即利润就是他努力使其最大化的数量，正是这个数量对就业量具有因果关系的重要意义。

当然，不难设想可能存在这一种情形： $G - A_1$ 可能大于 $G' - B'$ ，以致使用者成本成为负数。例如，如果我们碰巧选择了这样的时期，在此期间内，投入品的数量已经增加，但增加的产出却还未达到完成和销售的阶段，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只要投资是正数，但如果行业规模达到了企业家为他们自己制造大部分设备的程度，那么使用者成本也将为负数。此时，既然仅仅只有在企业家自行制造资本设备的情况下，使用者成本才是负数，那么，在一个企业家的大部分资本设备由其他企业家制造的实际经济中，通常可以认为使用者成本是正数。除此以外，很难设想会出现与 A 的增加相联系的边际使用者成本，即不是正数的情形。



对整个社会来说,本期总消费(C)等于 $\Sigma(A - A_1)$,总投资(I)等于 $\Sigma(A_1 - U)$ 。而且,如果不计入 A_1 ,即企业家从其他人手中购买支出,则U是该企业家全部设备中自行制造设备的负投资($-U$ 是他的投资)。所以,在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经济系统中(在此, A_1 为0),消费等于A,投资等于 $-U$,即等于 $G - (G' - B')$ 。



上述情形会由于 A_1 的引入而变得有点复杂,但这只是由于希望对非一体化的生产体系提供一个通用的方法。

此外,有效需求只是企业家们希望从他们所决定提供的现行就业量中获得的总收入,这个总收入还包括他们需要支付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总需求函数把各种假定的就业量和与之对应的预期产量的收益联系起来;而有效需求就是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在这一点上的需求之所以是有效的,其原因是,把总供给状况联系起来,它所对应的就业量能使企业家预期利润达到最大值。

企业家补充成本

除要素成本外,还有资本设备的非自愿损失(或增益)。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超出了企业家的控制或与他的当前决策无关。例如,由于市场价值的改变和老化,或者仅又由于时间的推移所造成的损耗,或者由于战争和地震灾难所产生的破坏。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却是可以被预料的,如不论是否使用,由于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损失和所谓的“正常”老化。现在,我们把非自愿的、意料之中的设备折旧,即预期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部分,称为补充成本,用V表示。

所以,在我们计算企业家的净收入和净利润时,通常要从上述定义的收入和毛利润中减去估计的补充成本的数量。这是因为:当企业家考虑他能自由消费和储蓄的数量时,在他心目中,他已经将补充成本从毛利润中扣除了。当企业家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看,在投入设备生产时,直接成本和毛利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他站在消费者立场上看,则补充成本在其心目中的地位能与直接成本相媲美。因此,如果我们在给总净收入下定义时,把补充成本和使用成本从产品销售款项中减去,那么总净收入就等于 $A - U - V$,它还是一个与消费数量相联系的概念。



战争、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给经济生产造成了损害，企业家增加了非自愿损失成本。



“一个人做一回报表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报表，那才是最难的！”有智慧的会计会“做自己的报表，让别人审去吧！”

还有资本设备价格的变化，它们产生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未预料到的市场价值的变化，或者是由于意外的老化及灾难产生的破坏，它们都是非自愿的，并且，从广义上说是无法预料的。这些项目中的实际损失，我们可以称之为意外损失。在会计记账中，我们将其计入的是资本账目，而非所得账目。

净收入具有重要因果上的意义，是因为V的数量对现行消费量在心理上的影响。因为我们假定，一个普通人在决定其消费量时，作为现期他能自由支配的净收入是必须要考虑的。当然，净收入并不是在他决定消费的数量时所考虑的唯一要素，资本账目上还有很多意外损失对他的消费量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补充成本和意外损失对消费的影响还是有些差别的：补充成本改变，正如企业家毛利润将改变，其消费也将受到影响；而意外损失，虽然也将影响企业家的消费决策，但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尽管意外损失和补充成本的数量是相同的，但前者的影响将小得多。

补充成本与意外损失

现在我将讨论的是如何划分补充成本和意外损失的问题，也就是说，何为补充成本，应当记入所得账目上；何为意外损失，应当

记入资本账目上。这个划分的标准，通常所采用的是来自惯例上或者是心理上对补充成本的估计，而对补充成本的估计并没有一定的原则，其大小也是依据所选取的会计方法不同而不同。当资本设备购置初期，其预期的补充成本是一个具体的价值量，但

投资

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投资可分为实物投资和证券投资。前者是以货币投入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一定利润。后者是以货币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间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投资涉及到财产的累积以求在未来得到收益。投资一般有扩大再生产投资和对外扩张的投资（包括为获得股权、债权所支付的现金）。

在以后的重新估计时，因预期状态的改变而预期的补充成本与原来的估计是不一致的。这就是说，在原来的预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 $U+V$ ；在后来的预期中，也存在着一系列的 $U+V$ ，那么将这两者之差折成现价就是资本设备的意外得失。在商业会计上存在着一个普遍使用的原则，而且经过英国内地的税务机关的肯定，即在取得一资本设备时，便对该资本设备的补充成本与使用者成本之和定于一个数值，不管以后的预期是否改变，这个数值都将维持不变。这样，任何时期的补充成本都将是这个数值与实际使用者成本的差额。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在资本设备生产的整个过程中，都将不存在意外损失，即为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各种形式下，每经过一特定的会计期间（比如说一年），便会根据当前的售价以及当前的预期重新估计补充成本，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有人采用。即在资本设备购置初期，原来所预期的补充成本可以称为基本补充成本；而以后根据当前售价以及当前预期重新估计的补充成本可以称为当前补充成本。

对补充成本的定义，只能到此为止，而无法更为准确。因为补充成本就好比一企业家在以宣布股息或决定当前消费量为目的，在计算净所得时，应当从所得中减去的项目。而且我们不能将资本账目上的意外损失完全忽略不计，因此，对我们无法肯定的项目，就将其记入资本账目；而很明显的属于补充成本的项目，我们才将其记入所得账目。

此处的净收入，与马歇尔的收入定义是相接近的。马歇尔援用的是税务机关所采用的惯例，即一般说来，凡是该税务机关根据历来经验而认为是收入的，马歇尔也这么认为。因为税务机关对所谓净收入的判断，是经过最审慎和最广泛的调查而决定的。而我所谓的净收入，又与最近庇古教授对收入的定义（即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



“税收工作纪律严，公正执法是关键，地税干部作风正，清廉！”税务局收税忙，企业掏钱慌，先来三句半，撑场！



《货币论》是凯恩斯经济思想过渡时期的作品；1930年，凯恩斯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时，致力于《货币论》的写作。

所以特别，是因为在当时我对总收入中企业家收入这一部分下定义时，既不是采取企业家当前生产活动的实际利润（不论是毛利润还是净利润），也没有采取他们在决定从事当前生产活动的预期利润，而是采取了一种所谓的正常或者均衡利润。现在回想

相当的。

尽管如此，由于净收入建立在意义不明的准则上，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它的含义仍然不甚明确。例如，哈耶克教授曾经说过，一个资本品所有者，也许他将设法维持投资收入于一个不变的水平，而一旦其投资收入有下降的趋势，那么他就会首先从收入中提出一部分，从而抵消投资收入带来的影响，而剩下的，便是可以自由支配用于消费的部分。这种人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但如果将此作为计算净收入的一种心理标准时，在理论上也是无可非议的。哈耶克教授因此而推论，储蓄和投资也因这种心理而含混。但如果他指的是净储蓄及净投资，那么他的推论是对的。然而，与就业量相关的是储蓄与投资，他们的定义是客观的。

净收入只与消费决策相关，而且与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与当前生产决策相关的只是收入本身。因此，不遗余力地强调净收入，但忽视收入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拙著《货币论》中定义的收入，含义有点特别。之

储蓄

储蓄是人们将暂时不用或结余的货币收入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种存款活动，又称为储蓄存款。储蓄存款是信用机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储蓄是货币收入中没有被用于消费的部分，以个人为考察单位的话，个人的实际储蓄就由个人实际金融资产的增加以及实物资产的增加来表示。

起来，假设生产规模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所谓的正常或均衡利润的意义是没有充分定义的。依照《货币论》中所定义的，储蓄超过投资的数量，便是正常利润超过实际利润的数量。我恐怕该名词的用法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混乱，因为很多结论（尤其是关于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只有将我所用的名字与我的特别意义来解释才是对的。但可惜的是，很多人没有发觉，他们常常引用我的结论，以为我所用的名字的意义就是社会所熟悉的。正因为这样，再加上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采用我以前所定义的名词来表达我的观点，因此我将弃用那些名词。对于已经引起的许多混乱，我感到非常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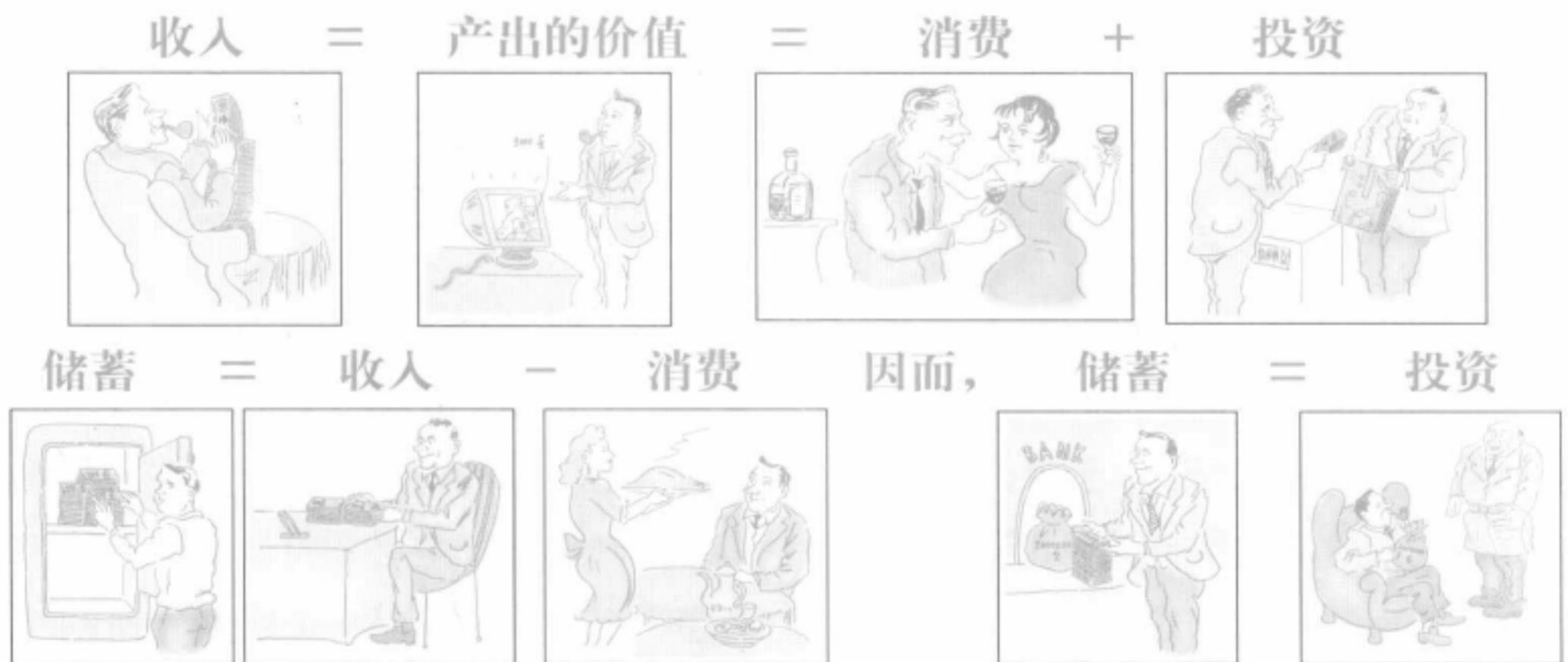
投资和储蓄

尽管大家对名词的用法存在各种分歧，但储蓄是收入超过消费支出的部分，这是一个共识。收入一词，我们已经在上文下过定义。而一期的消费支出，一定等于该期售于消费者的物品价值。于是问题便出现了：何为消费品购买者？对于哪些人是购买消费品的消费者这个问题，我们的处理办法就是，其划分标准必须符合我们划分消费者和企业家的标准。这样，在我们把 A_1 定义为一个企业家向另一个企业家所购买的产品价值时，这个问题无形中就得到了解决。因此，消费支出可以被明确地定义为 $\Sigma(A - A_1)$ ，这里， ΣA 是这个时期的总销售量， ΣA_1 是同时期各企业家之间的购买量。为方便起见，我们在以下的论述中都将略去 Σ ，把该时期的全部销售量计为 A ，把企业家之间的相互购买量计为 A_1 ，把全体企业家的使用者成本之和计为 U 。

在定义了收入和消费之后，也就得到了储蓄的定义，它表示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由于收入等于 $A - U$ ，消费等于 $A - A_1$ ，从而储蓄也就等于 $A_1 - U$ ，同样，我们可以用净储蓄来表示净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它等于 $A_1 - U - V$ 。

根据收入的定义，可以推导出期投资的定义。现期投资是指在本期生产活动中产生的资本设备价值的增加值。它显然与以上定义的储蓄相等。因为，储蓄就是现期收入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那一部分。在任一期生产活动结束时，企业家出售了制成品后得到了价值 A ，当企业家之间的相互购买为 A_1 时，资本设备因此而损耗的价值用 U 表示（如果为改进，用 $-U$ 表示）。同一期间，制成品价值中有 $A - A_1$ 的部分被用于消费。而 $A - U$ 中超过 $A - A_1$ 的部分（即 $A_1 - U$ ）是资本设备的增加，它是该时期生产活动的结果，因此也就是该时期的投资。相似的，考虑到资本设备即使不使用时也会产生价值的正常损耗的情形，以及在意外损失或者增益不计入资本账目的情形下， $A_1 - U - V$ 也就是资本设备的净增加额，即该时期的净投资。

尽管储蓄数量是独立消费者整体行为的产物，而投资数量是独立企业家整体行为的产物，但这两者必然相等，因为它们都分别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同意：收入与现期产出的价值相等，现期投资与现期产出中未被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当，而储蓄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相等，从而，储蓄也必然与投资相等。可简单表示如下：



交易双方的性质决定了储蓄数量等于投资数量，一方是生产者，另一方是消费者或购买资本设备的人。生产者出售产品的所得超过生产者成本的部分形成收入；对于总产品来说，不是卖给消费者就是卖给别的企业家；一个企业家的先期投资又与他从别的企业家那里购买的资本设备超过自己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相等。因而，在总量上，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即我们称之为储蓄的部分，必然等于资本设备增加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投资。净储蓄和净投资也与此相类似。储蓄，事实上只是一个余额。收入取决于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的共同作用。如果投资决策得以实施，企业家们必然

会因此减少消费或增加收入。这样，投资行为本身就必然使得我们称之为储蓄的部分以相同的数量增加。

当然，人们在分别决定储蓄的数量和投资的数量时，可能会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以致没有可以实现交易的价格均衡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术语将无法运用。因为，产品的市场价值是不确定的，在零到无穷大之间，价格没有一个静止之处。但是，经验表明，事实不是这样的。由于心理反应习惯，能够实现购买意愿等于销售意愿均衡的状态，产出具有一个市场价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它还是货币收入具有一定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使单个储蓄者们决定的储蓄量总和与单个投资者们决定的投资量总和相等的一个充分条件。

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最好的办法可能是从消费决策或抑制消费的决策方面来考虑，而不是从储蓄决策方面来考虑。是否消费的决策确实是个人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是否投资的决策也是这样的。总收入和总储蓄的数量，是每一个人对是否消费和是否投资自由选择产生的结果。但是，两者都不能被认为是与消费或投资决策无关，而从一系列分散的决策中得到独立的数值。根据这个原则，在下文中，储蓄意向或倾向将被消费倾向这个概念所替代。

【解析】 储蓄等于投资

企业家的收入是一定时期销售产品的收益扣除其使用者成本的部分。在就业理论中，收入影响了企业家在既定生产规模上提供的就业量。故有效需求只是企业家们希望从他们所决定提供的现行就业量中获得的总收入。总需求函数把各种假定的就业量和与之对应的预期产量的收益联系起来；而有效需求就是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在这一点上的需求之所以是有效的，其原因是它所对应的就业量能使企业家预期利润达到最大值。而净收入可以定义为收益减去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的部分，其中补充成本是指非自愿的、意料之外的设备折旧，即预期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部分。净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大。储蓄是收入超出消费支出的部分，投资是本期生产活动中产生的资本设备价值的增加值，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资本价值未被消耗掉的部分，因而，储蓄与投资两者是相等的。

【案例】 消费者太“瘦”投资率只有上升

案例适用：消费和投资



老财主们存钱的传统手法是墙角挖个坑埋藏，而今不兴这个，改存银行了。

近年来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的迅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占GDP比例的上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一降两升”的现象，与总需求增长率偏高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但绝不等同的关系。把握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首先，在总需求增长率偏高即出现通货膨胀率偏高倾向的时候，投资率总是很快上升的，也就是投资的增长率很高。但是，当总需求增长率经过一起一落回到原位的时候，投资率还是上升了。这就是说，即使保持总需求的平稳增长，投资率也有上升的趋势。原因在于，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无可避免地要下降。

2006年8月，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本外币储蓄存款加流通中现金的83%）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9%。这个增长率大约只比目前的名义GDP增长率高1—2个百分点。

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中，居民持有的本币货币资产的增长率平均比名义GDP的增长率高8.8个百分点，使得前者与后者的比例从1978年的10.6%上升到了2003年的88.4%。考虑到货币储蓄是家庭金融储蓄的主要部分及其非常高的增长率，即使不考虑其他储蓄，也可以认为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但是，在2004年和2005年，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与名义GDP的比例都低于2003年，从目前数据看，2006年的比例也会比较低。

居民其他金融资产包括债券和股票以及保险等。在最近几年，这几项的增长率都比较低，A股市场的融资额干脆大幅度下降（这里不考虑股票价格变化引起的损益）。从这些情况来估计，居民金融资产总值及其年度增加额的增长率应当显著低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居民购买住房的支付（首付和还贷）也应当算为储蓄，这部分的增长率比较高，但是历史比较涉及到住房制度变化的问题，难以把握。不考虑这方面情况

的话，居民总储蓄的增长率在2004年以来低于经济增长率。

由此来看，国民总产品分配中“一降两升”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居民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储蓄，而是收入的增长率太低。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可能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了。在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占比下降还只引起消费占比下降。当收入占比下降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连居民储蓄占比也下降了。

即使在居民储蓄占GDP比例上升的情况下，储蓄倾向也是很难改变的。在居民储蓄占GDP比例下降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储蓄倾向来刺激消费的想法更不现实。这样的话，可以选择的方向只有两个，一个是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或者较高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增长率，另一个是相当大幅度地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政府直接控制的工资收入只是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的人员工资。提高这部分工资的主要效果是改变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对于提高整体居民收入的效果是次一位的，也是很小的。降低个人所得税具有提高整体居民收入和扩大收入差别的双重效果，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的长期效果主要是提高居民收入，但中短期效果可能主要是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相比起来，降低增值税对于提高整体居民收入的效果最大而其他效果最小。除了减税之外，提高存款利率还有很大的空间。从预测的角度看，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可能性几乎不大，所以短期内现实的做法还是增加投资。

案例解析：

一般而言，居民消费是和其收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总需求上涨时，将会大量刺激投资行为，收入也将增加。但是，收入的增长率过低，使得其消费停滞不前，自然储蓄也不会有太大的增加。因此，居民消费占GDP比例迅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占GDP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居民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储蓄，而是收入的增长率太低。收入的降低，势必影响消费的减少。

（资料来源：宋国青：《消费者太“瘦”投资率只有上升》，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6-11-7）

Chapter 6

第六章 再论储蓄和投资的意义

投资和储蓄，在数量上是相等的。既定情况下，如果预期投资超过储蓄部分继续增加，则企业家就增加就业量和产量，而二者的改变又会影响收入。收入改变反过来又影响储蓄和投资。



投资的定义及其对资本的影响

根据我们对储蓄和投资的定义，它们在数量上必定是相等的，因为，从社会整体看来，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但是，当代的几位学者（包括我在《货币论》中）曾对它们下过特别的定义，并认为它们并不一定相等。还有其他学者未给出任何定义，但他们的论述却是建立在储蓄与投资不相等的假设上的。因此，考虑到前述对这个术语的相关论述，对一些与当前用法相似的法进行分类是有益的。

据我所知，大家都认为，储蓄是收入超过被用于消费的那部分。关于消费支出的含义，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观点。所以，各位学者名词用法的差别就在于产生于投资或收入的定义不相同。

先来分析投资。投资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个人或公司购买新的或旧的资产。偶尔时候，投资专指在证券市场上购买一件资产，但是我们对购买房产、购买机器或购买一批制成品或半制成品，也都称为投资。一般说来，所谓的新投资（非再投资）是指从收入中，购买一件资本资产。如果我们把出售一项投资看做是负投资，那么我的定义与通常的用法是相一致的，旧投资的相互买卖一定是相互抵消的。当然，我们必须顾及债务的产生与清偿（包括信用或货币数量变化），但是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总债权的增加或减少一定正好等于总债务的增加或减少，因此，在讨论总投资时，我们可以不必考虑这个因素了。这样，如果通常意义上的收入与我定义的净收入相一致，那么通常意义上的总投资与我定义的净投资就是相一致的。这里，净投资是指在已经考虑到旧设备在价值上的变化后，所有类别的资本设备的净增加额。

以这种方式定义的投资包括一切资本设备的增加额，不论所增加的是固定资本、运营资本还是流动资本。所以，除了投资和净投资之间的差异外，如果投资的定义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异，那么必定是因为有人所谓的投资并不包括所有一切资本设备的增加额在内。

现在以郝特雷为例。郝特雷对流动资本的改变，即对未出售的存货量的意外的增减，是非常看重的。他提出了一个投资的定义，把流动资本的变动排斥于投资之外。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是近代西方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柏姆·巴维克都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该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



如超市的商品因质量问题而致存货量突然增减，是郝特雷经济理论中所重视的流动资本的改变。

在这种定义下，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实际上是未出售的存货量的意外增加了，也就是流动资本的增加。郝特雷并没有让我信服：为什么要看重这个因素呢？郝特雷的观点，是把所有着重点都放在如何矫正不可预期的变化上，而忽视可预期（不论预期是否正确）的变化。郝特雷认为企业家在决定生产规模的时候，今天的产量之所以与前一天的不同，是因为他们依据的是未出售的存货量的变动量。若这些存货都是消费品，那么未出售存货量的变动，自然对企业家所作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影响企业家的决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我不知道郝

特雷为什么不涉及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因此，我看重的是有效需求的全面改变，而不仅仅是有效需求的局部改变（即上期未出售的存货量的增加）。另外，若这些存货都是固定资本，那么还未使用的能力的增加或者减少，就将影响生产决策而论，它的效果应该与未出售存货量的增减相当的。同样，我也不知道郝特雷为什么没有去处理这些同样重要的因素。

可能奥国学派他们所谓的资本形成与资本消耗，它们的意义与以上所述的所谓的投资与负投资或净投资与净负投资的意义是不同的。在特定情形下，如果根据我们的

定义，资本设备的价值显然是并没有减少的，但是在奥国学派看来，有资本消耗的发生。无论如何，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将资本形成与资本消耗这两个概念论述明了的。例如，在生产时期延长时便有资本形成的发生。显然，这对我们的研究毫无益处。

储蓄与投资的不同点

若收入的意义不同，那么储蓄（等于收入减消费）的意义也随之不同。在此，我们接下来分析储蓄与投资不相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收入的特殊定义，进而由对收入超过消费部分的定义引起的。我本人在《货币论》中用的术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货币论》中所定义的收入，与我现在定义的收入是不相同的。因为在《货币论》中计算收入时，我并不是以实际利润作为企业家的收入，而是用某种意义上的“正常利润”作为他们的收入。故《货币论》中所谓的储蓄超过投资，实际上是指：在现期生产规模下，企业家可以从资本设备所有权上取得的利润少于正常利润。因此，《货币论》中所谓的储蓄超过投资的数量的扩大，意思是说实际利润正在减少，这时企业家有缩减生产的趋势。

正如我现在所想，是企业家决定了就业量，其目的在于使他现在和将来的利润达到最大。同时，使其利润达到最大的就业量又决定于总需求函数，而总需求函数取决于企业家在各种不同的假设情况下，分别由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总和的预期。在《货币论》中，所谓的投资减储蓄的差额的变化，实际上是利润的改变，但是在该书中，我没有明白区分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在当时，我认为投资与储蓄之

罗伯森的观点是：当期的收入等于前期的消费和投资，当期的储蓄等于前期之投资和前期消费与当期消费之差额。



强迫储蓄效应

强迫储蓄效应是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效应之一。假定经济已经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来强制储蓄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涨。这里所说的储蓄，是指用于投资的货币积累，主要来源于家庭、企业与政府。在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按原来的模式和数量进行的消费和储蓄，两者的实际额均随物价的上涨而相应减少，其减少部分则大体相当于政府运用通货膨胀实现的强迫储蓄的部分。

间差额的变化，将推动产量随之改变。因此，我的新论点基本上只是发展了我的旧观点，但更精确，也更容易理解。我的新观点可以表述为：在以前的就业量和产量为已知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投资超过储蓄部分将会增加，就会导致企业家增加就业量和产量。我现在及过去论点的重要性就在于试图说明：是企业家对有效需求的预期决定了就业量。

按照罗伯森的定义，今天的收入等于昨天的消费加昨天的投资，今天的储蓄等于昨天的投资，再加上昨天消费与今天消费的差额。因此，他所定义的储蓄超过投资，在我看来，就是昨天的收入超过今天的收入。他所谓的储蓄超过投资，与我认为收入正在降低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储蓄增加是与我所认为收入降低是同一意思。今天的预期通常取决于昨天的实际收入，那么今天的有效需求，将等于昨天的收入。因此，虽然罗伯森和我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但我们都致力于区别收入与有效需求二者，这在因果分析上是非常重要的区别。

论强迫储蓄

虽然一些学者没有明确地解释“强迫储蓄”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即“强迫储蓄”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货币数量或者银行信用变化的直接产物，它可以用这些数量的变化来衡量。

显然，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确实会使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发生改变；工资单位的改变，既会引起以货币计量的总收入的改变，也会引起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收入的重新分配。以上这些改变都会引起储蓄数量的改变。货币数量的改变，可以引起利率的变化，进而改变收入与分配的数量。因此，货币数量的改变会间接地导致储蓄数量的改变。但相对于因客观条件改变而产生的储蓄数量的改变来说，这种储蓄数量的改

变不会有“强迫储蓄”的性质。故除非我们将某特定情形下的储蓄量作为标准，否则我们无法区别强迫储蓄与非强迫储蓄。另外，一定货币数量的改变所引起的总储蓄数量的改变具有很强的变化性，它是其他很多因素决定的。

所以，除非我们将储蓄量规定一标准，否则“强迫储蓄”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相当于充分就业时的储蓄量作为标准，那么“强迫储蓄”的定义就是：实际的储蓄量超过长期均衡条件下充分就业时应具有的储蓄量的部分。这个定义具有很好的意义。但按照这个定义，被迫地超过储蓄（标准）将是一种很少见，而且很不稳定的现象。被迫地低于储蓄（标准）倒是经常出现的事。

哈耶克教授在其文《强迫储蓄学说的发展简论》中表明：上述定义就是该名词的本意。“强迫储蓄”或者“强迫节俭”是边沁提出的概念。边沁明确地表示，他所想的是在“所有劳动力都被以最有利的方式雇佣”的情形下，货币数量增加（相对于货币可购买的物品来说）所导致的结果。边沁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实际收入是不可能增加的，进而，过渡期所产生的额外投资会引起“以降低国民生活水平和违背国家正义为代价”的强迫节俭。所以涉及这个问题的19世纪的学者实际上对这个问题都有相同的观点。但是，很难把这个非常清晰的观点用于低于充分就业的情形。我现在还未曾听到，对“强迫储蓄”感兴趣的当代学者们把这个观点推广到就业增加条件下的任何尝试，他们似乎一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要想把边沁的强迫节俭的概念扩展到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形，就要做一些说明和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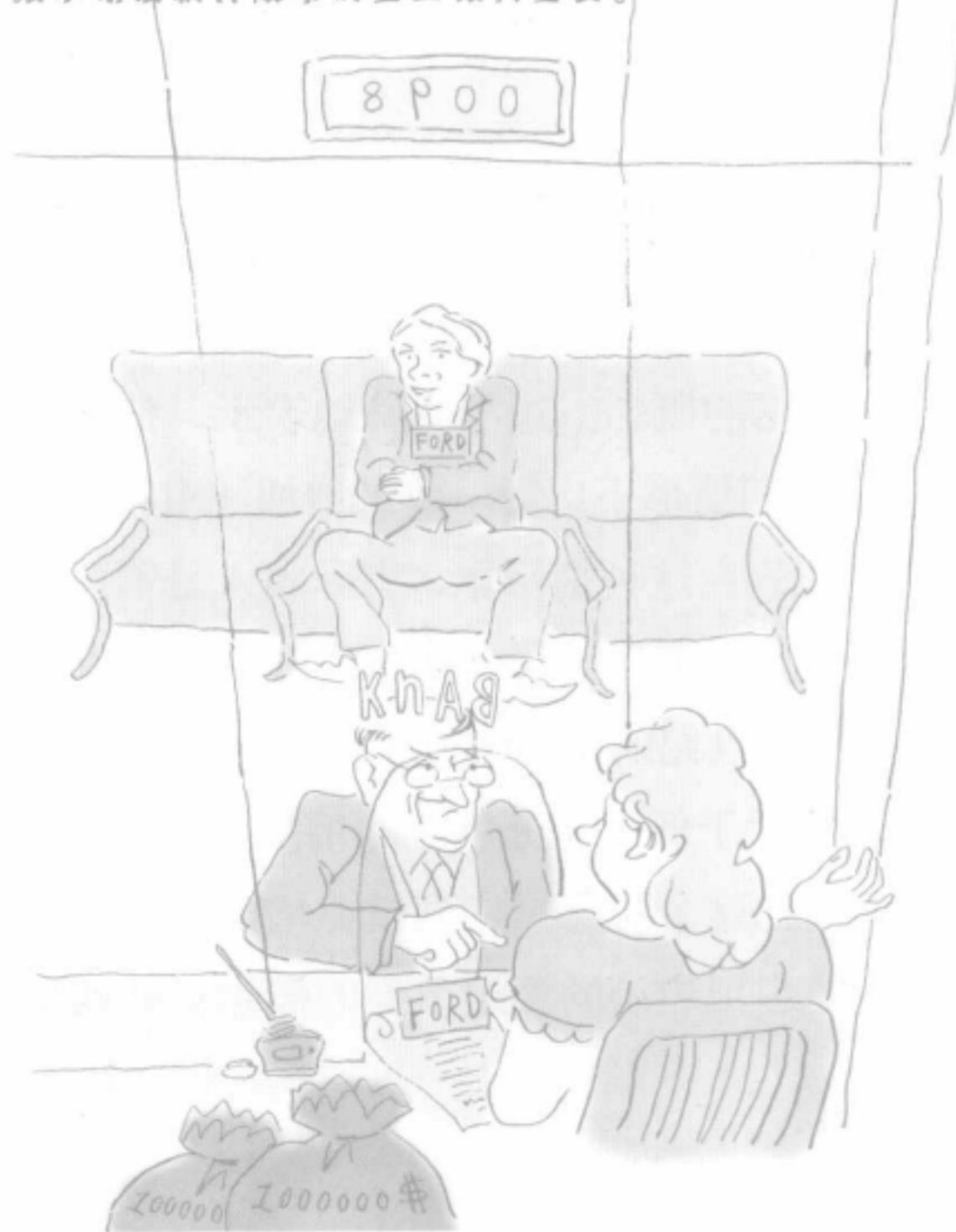
哈耶克把储蓄按性质划分为资源储蓄和强迫储蓄，生产规模扩大的资金来源于由于银行提供过多的货币而产生的强迫储蓄。

对储蓄和投资的现实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在我看来，认为储蓄与投资可以不相等的观念能够流行的原因，可以用视觉错误来解释。单个存款者与银行的关系事实上是双边交易，而这种视觉错误却把它看成了单边交易。因为，不论是用现金资产、债权，还是资本品，没有人可以不通过获得一项资产而形成储蓄的，而且，没有人能够得到一项他不曾拥有的资产，除非，要么是生产出了相等价值的新资产，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把资产转让给了他。在前一种情形下，会有一笔相应的新投资；在后一种情形下，则，这个人必定动用了等量的储蓄。而且，如果是银行系统转出了一项资产，那么必定是某人转出了一笔现金。由此可知，社会上所有个人储蓄之和形成的总储蓄必定与现期新投资的数量相等。

认为银行系统创造信用，进而能产生没有与“真正的储蓄”相对应的投资的观点，是孤立看待银行信用增加产生的一个结果而不及其余这种做法的产物。确实，在某个特定方向上出乎意料的投资增长会使总储蓄和总投资产生无规律的变化，而在投资增

“借鸡生蛋”是向银行贷款的显著特点，资本投入对通过技术研发获得成功的企业极其重要。



长能被充分预料到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银行提供贷款会产生三种趋势：①产量将增加；②用工资单位来计量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将上升（在报酬递减条件下，产量必然随之增加）；③以货币来计量的工资单位将上升（这常常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产生）。实际收入在不同人群间的分配可能会受这三种趋势的影响。但这些趋势是产量增加这种状态所固有的特征，而不论产量增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银行增加了贷款。只有不采取任何可能提高就业量的行为，才能避免上述趋势的产生。

所以，储蓄总会引致投资这种老式的见解是不完整的，而且会产生误

导。它的错误来源于貌似合理的推断，即个人储蓄会使总投资等量地增加。诚然，个人的储蓄能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但上述这个结论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个人储蓄的行为可能会对另一个人的储蓄起反作用，进而对另一个人的财富起反作用。

储蓄与投资是恒等的，但个人的储蓄又有明显的“自由的意愿”，即不论他自己或其他人的投资为多少，他都可以自由地决定他的储蓄。这两者能协调的原因主要是，与消费一样，储蓄也有两个方面。因为，尽管个人的储蓄不太可能对其收入产生重大影响，但他的消费量会对其他人的收入产生反作用，从而不可能使所有个人同时进行任何既定数量的储蓄。每一个人都试图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的行为，会使收入下降到这样的程度，直至这种行为失败。当然，就社会整体而言，储蓄小于现期投资量同样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收入必定会提高到使个人愿意储蓄的数量总和正好与投资量相等的水平。

以上所述与下面这个命题很相似。即怎样把每个人都有改变他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的自由，与每个人所持有货币数量的总和又必须与银行系统所提供的先进数量相等并与之相协调。上述两个货币数量的相等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与他们的收入或者各种物品的价格是相关的，购买物品是除持有货币之外另一种保存财富的方式。这样，收入和价格必然会变化到这样一个水平，在这个新的收入和价格水平上，直到个人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的总和与银行系统提供的货币数量相等。这是货币理论的基本命题。

这两个命题都是来自同一个事实，不能只有买者没有卖者，也不能只有卖者而没有买者。虽然个人交易量与市场交易量相比是很小的，因此可以忽视需求不是单方面交易的事实，但当我们考察总需求时，忽视这点将会使理论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总体经济行为理论与个体经济行为理论之间最重大的差异。而在个体经济行为理论中，我们可假定，个人需求的改变不影响他的收入。



【解析】储蓄和投资

根据我们对储蓄和投资的定义，它们在数量上必定是相等的，因为，从社会整体看来，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储蓄是收入超过被用于消费的那部分。关于消费支出的含义，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观点。所以，各位学者名词用法的差别就在于产生于投资或收入的定义不相同。投资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个人或公司购买新的或旧的资

产。也有时候，投资专指在证券市场上购买一件资产，但是我们对购买房产、购买机器或购买一批制成品或半制成品，也都称为投资。在以前的就业量和产量为已知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投资超过储蓄部分将会增加，就会导致企业家增加就业量和产量。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确实会使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发生改变；工资单位的改变，既会引起以货币计量的总收入的改变，也会引起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收入的重新分配。以上这些改变都会引起储蓄数量的改变。储蓄与投资是恒等的，与消费一样，储蓄也有两个方面。因为，尽管个人的储蓄不太可能对其收入产生重大影响，但他的消费量会对其他人的收入产生反作用，从而不可能使所有个人同时进行任何既定数量的储蓄。每一个人都试图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的行为，会使收入下降。当然，就社会整体而言，如果这样做的话，收入必定会提高到使个人愿意储蓄的数量总和正好与投资量相等的水平。

❁ 【案例】居民储蓄动机与高等教育收费改革

案例适用：储蓄

高校收费改革始于1989年，它遵循的原则是：作为非义务教育，可按学校实际培养成本收取适当比例的学费；必须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坚持积极、稳妥、审慎的指导思想。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家长们的心理预期“望子成龙”，转化为对子女教育的长期投入，可归入长期预期的行为行列。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免费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的地区试招自费生。1989年，国家教委、财政部、国家物价局等三部联合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当时的收费标准很低，每人每年收费100—300元。1990年国家教委正式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自费生的规定》，允许一部分学校招收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

生并存的“双轨制”。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逐步取消了自费生制，实行普遍收费上学的制度。

(一) 高等学校杂费逐年上升

并轨试行后，全国高校生均学费逐年上升，1996年，高校学费越过了20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广大考生家庭似乎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变化。但2000年的收费标准猛涨，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超过了4000元。全国高校生均杂费也在逐年增长。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800—1200元，如果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支

出的费用在万元以上，四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此外，研究生报名人数也在逐年增多，并且招收规模连年快速扩大，带动了“考研经济”的发展，2000年全国考研消费约10亿元，2003年就超过了20亿元，而2004年已增至30亿元。未来的收费改革将进一步增加居民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收费改革以来普通高校的平均学费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 1989 | 1993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4 |
|--------------|------|------|------|------|------|------|------|------|------|-----------|
| 普通高校 平均学费 | 200 | 610 | 1200 | 2000 | 3000 | 3500 | 3200 | 3550 | 5000 | 5000—6000 |

资料来源：2001年及之前的数据来自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0—2002年间的各年份）；2004年数据来自张东臣、李晓晔、赵佳：《十年上学流行十个词》（《中国经济时报》，2004.10.28）

目前，虽然高校收费呈逐年上涨的趋势，但公办高等教育的经费仍主要依靠政府财政的投入。2000年至今，国家规定收取学费的比例，占学校年生均日常运行成本

的25%。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政府拨款在高等教育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相应地，学生个人和家庭、社会团体、私人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比例上都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高校收费改革以后，学生及家庭所承担的比重增幅较快。高等教育收费改革使政府部分卸掉了财政教育支出负担，也推动了居民的教育储蓄。与此同时，高校学杂费总额占高校经费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03年已经达到29.3%，比1996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另外，高校学杂费占全校学杂费的比重也在逐年攀升，特别是从1998年以来，这一比重迅速上升，2003年达到48.9%。也就是说，目前高校学杂费已占全部学校学杂费的一半左右。

(二) 居民出于子女教育的目的增加储蓄

近年来，城乡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导致储蓄存款大幅上升。如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分别为23.8%和25.6%，见下表：

1995—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率

| 年份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 |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 城镇居民储蓄率(%) | 农村居民储蓄率(%) |
|------|--------------------|--------------|--------------------|---------------------|------------|------------|
| 1995 | 4283.0 | 1577.7 | 3537.6 | 1310.4 | 17.4 | 16.9 |
| 1996 | 4838.9 | 1926.1 | 3919.5 | 1572.1 | 19.0 | 18.4 |
| 1997 | 5160.3 | 2090.1 | 4185.6 | 1617.2 | 18.9 | 22.6 |
| 1998 | 5425.1 | 2162.0 | 4331.6 | 1590.3 | 20.2 | 26.4 |
| 1999 | 5854.0 | 2210.3 | 4615.9 | 1577.4 | 21.1 | 18.6 |
| 2000 | 6280.0 | 2253.4 | 4998.0 | 1670.1 | 20.4 | 25.9 |
| 2001 | 6859.6 | 2366.4 | 5309.0 | 1741.1 | 22.6 | 26.4 |
| 2002 | 7702.8 | 2475.6 | 6029.9 | 1834.3 | 21.7 | 25.9 |
| 2003 | 8472.2 | 2622.2 | 6510.9 | 1943.3 | 23.1 | 25.9 |
| 2004 | 9421.6 | 2936.4 | 7182.1 | 2184.7 | 23.8 | 25.6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5年间的各年份），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为子女教育而储蓄有关。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曾多次对居民储蓄目的进行过调查，在这些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住房与养老。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

进行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2003年第一季度有20.2%的居民储蓄动机是“攒教育费”, 在居民储蓄动机中占第一位, 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末的调查显示, “攒教育费”仍然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 其次分别为养老、买房装修和预防意外, 比例分别为18.9%、14.1%、11.8%和10.7%。

案例评析:

高校收费改革自从实施以来, 收费水平越来越高; 居民出于子女教育目的的储蓄动机也日益增加。这种上升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是因为我国人均收入较低, 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实施高校收费改革后, 政府部分地卸掉了财政教育支出的包袱, 增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 也推动了居民的教育储蓄增加。另外, 居民为子女上学所承担的费用远不只是上大学的开支。事实上, 从学龄前教育到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教育, 居民都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费用, 这使很多家庭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为其积攒教育费用。飞速上涨的教育费用很快就被计入了普通居民的家庭预算, 推动了其储蓄倾向上升。

增速过快、水平过高的高等教育收费, 大大增加了居民的预期支出, 从而减少了当前消费支出。面对如此沉重的教育负担, 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理性选择是减少即期消费、增加教育储蓄, 这直接降低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倾向, 增加了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和储蓄倾向。

(资料来源: 李晓西等:《宏观经济学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第三编



影响人们消费动机的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人的心理特点、社会习俗和制度，客观因素主要有工资单位以及收入与净收入的改变等因素；大致可用“消费倾向”函数来总括消费量等消费动机的其他因素；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对就业量产生作用。

●本卷精彩内容导读目录

◎案例：我国居民旅游消费10年快速增长 / 83

影响消费的因素图解 / 90

◎案例：1988年中国居民出现“排浪式消费”抢购潮 / 93

◎案例：1998—2000年间国债投资效应值得推敲 / 107

Chapter 7

第七章 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



工资单位的改变、收入与净收入的改变、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预期收入的改变等等，是影响人们消费动机的客观因素。可以用一个大致的“消费倾向”函数总括取决于总收入（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消费量。

消费量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找到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就业量。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得到初步的结论，即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决定了就业量。总供给函数主要决定于供给方面的物质条件。

总需求函数涉及到任何就业水平与该就业水平预期能实现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既定的就业量水平下，“收益”是社会消费的总量与投资总量的和。这两个量是由差别很大的因素决定的。本编主要讨论的是：当就业量一定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量。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假定就业量一定，那么用于消费的数量是多少？严格地讲，我们应把消费量（C）与就业量（N）联系起来讨论。为了便于论述，我们讨论 C_w （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消费量）是与 Y_w （相当于某一就业水平 N 下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相联系的，但略有不同的新函数。对于这个新函数可能会有一点疑问，即 Y_w 不是 N 的唯一函数。因为在总就业量 N 一定的条件下，Y 会因劳动力在各行业的分布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应考虑这一点，但在一般情况下，假定 Y_w 由 N 唯一决定还是可行的。所以，可以定义如下：消费倾向 C_w 与就业水平 N 下的收入 Y_w 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X。

$$\text{即 } C_w = \times (Y_w) \quad \text{或 } C = W \cdot \times (Y_w)$$



显然，社会用于消费的数量：第一，部分地取决于社会总收入；第二，部分地取决于其他客观环境；第三，部分地取决于社会成员的主观需求、心理偏好和习惯，以及成员之间收入的分配。影响人们消费动机的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人的心理特点、社会习俗和制度。除非在反常的或革命状态下，短期内它们不会有大的改变。在做历史的研究或不同类型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必须

考虑主观因素，分析主观因素的改变是怎么影响消费倾向的。但在下文中，我们将大致假定主观因素不变，即假设消费倾向仅随客观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

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要客观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工资单位的改变

显然，与其说消费（C）是货币收入的函数，不如说是实际收入的函数。在技术、偏好和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不变的状态下，实际收入随着劳动者所支配劳动量的增减而增减。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是随着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的增减而增减：虽然当总产出增加时，由于受报酬率递减规律的影响，一个人实际收入的增加额不如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增加的多。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假定：在就业量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单位发生改变，那么消费也会像物价一样随工资单位的改变而作同比例的改变。尽管我们必须考虑某些特殊情况，例如，当工资单位改变时，有可能改变企业家和食利者之间的收入分配，从而有可能影响消费。但除了这种情况外，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工资单位自身的改变，因为，我们是依据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来定义消费倾向的。



普通工人家庭均为大众化消费，其消费水准受工资单位的起伏影响而改变相当明显。



富有阶层的消费，虚荣性和奢侈型消费占了很大比重，一般工资单位的改变对其影响不大。

偿债基金

偿债基金也称作“减债基金”，是国家或公司为偿还未到期公债或公司债而设置的专项基金。偿债基金一般是在债券实行分期偿还方式下才予设置，每年从国家或公司盈余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也可以每年按固定金额或已发行债券比例提取。偿债基金制度的采用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但有些国家的偿债基金只是一种制度上的存在，现实中并未发挥作用。

收入与净收入的改变

上文已指出，消费量与其说由收入决定，不如说由净收入决定。因为根据定义，净收入是一个人在决定其消费量时首先要考虑的。在某一给定情况下，收入与净收入之间存在着唯一的函数关系。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当收入改变而净收入不变时，由于其与消费无关，这种改变必须忽略不计。同样，当净收入改变而收入不变时，则必须要考虑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但是，除非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始终对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表示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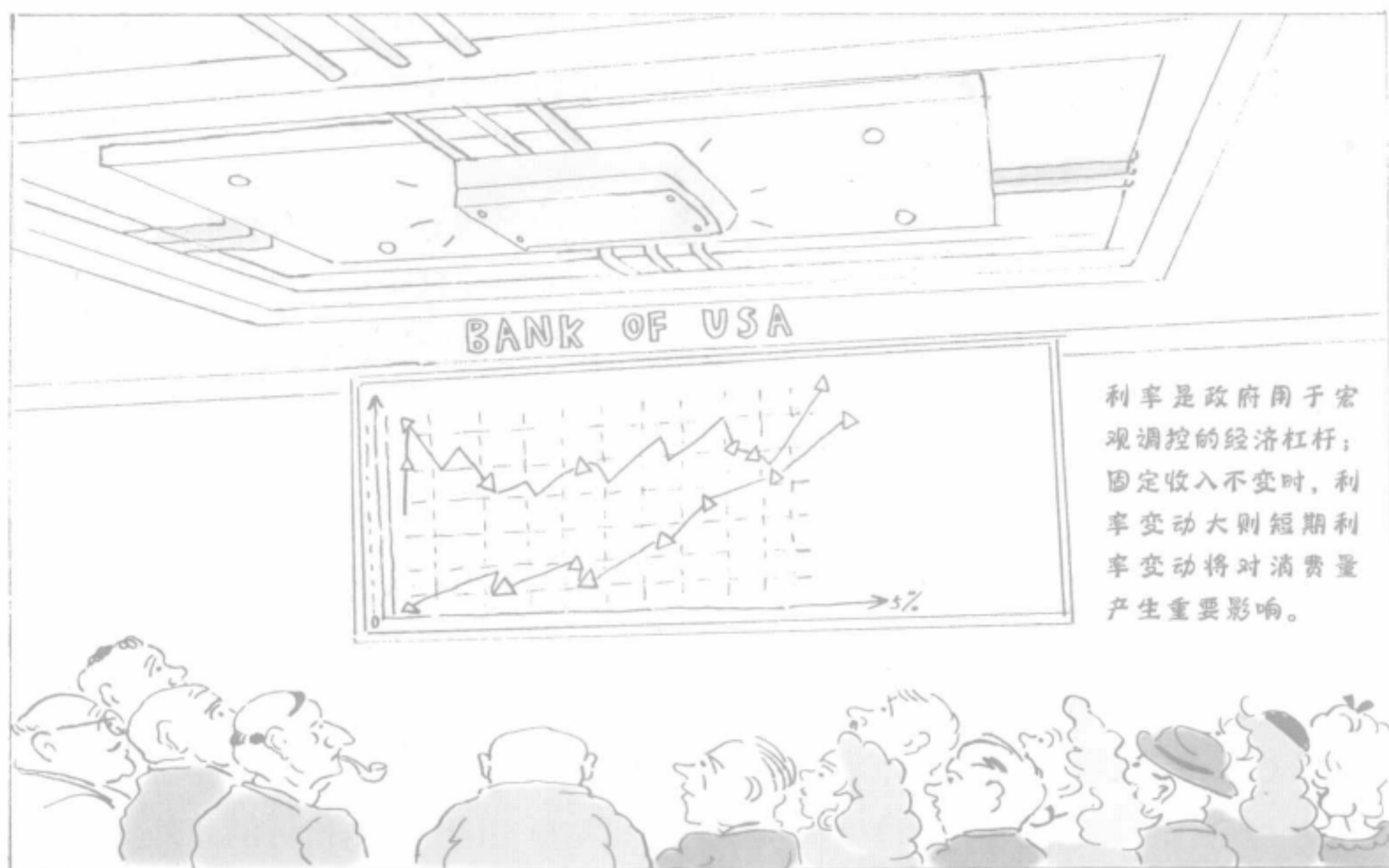
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

在计算净收入时，我们没有考虑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这些意外变化在改变消费倾向方面比收入与净收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具有重要性。因为这些意外变化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或没有规律性的。富有阶层的消费量或许会由于这些意外变化而变得非常敏感。这应该算是短期内可有使消费倾向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时间贴现率的改变

时间贴现率即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间交换的比例。时间贴现率并不完全等同于利率，因为前者考虑到了所能预测的未来购买力的变化和各種风险，例如没收性的税赋、早亡等。但作为一种粗略的估算，利率可以被认为等同于时间贴现率。

利率对于某一特定收入下消费量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古典学派利息理论认为，利率可使储蓄的供求相等。所以由此可以推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化。但一般认为，利率变动对当前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而且是很复杂的，需要视几种相反力量的强弱而定。因为，当利率提高时，有些增加储蓄的动机会得到满足，而有些动机则会削弱。在长期中，如果利率有实质性的改变，则有可能大幅改变社会习惯，从而改变主观消费倾向。但除非有事



实为根据，否则很难确定影响的方向。至于利率的短期变动，如果变化不大，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消费。利率变化对于消费的间接影响也许要多一些，但作用的方向也不完全相同。利率影响消费的最主要途径，也许是当利率改变时，证券以及其他资产会因此出现增值或贬值。当一个人的资本有意外增值时，他会倾向于增大当前消费；反之，当一个人的资本有意外贬值时，他会倾向于减少当前消费，虽然就收入而言，他的资本价值与以前一样。

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不变，除非利率变化非常大，否则短期利率的变动对其消费量的影响是次要的。如果利率确实降低到很低的水平，致使一定数额的钱所能购买到的年金与该数额金钱每年的利息之比上升到造成负储蓄的程度，那么这个上升的比例将促使人们去购买年金，以备年老所需。消费倾向受到剧烈影响的反常情况（此时人们对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具有极度不确定性），也应被归纳在这一点中。

财政政策的改变

由于决定个人储蓄的因素是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因此，不仅利率对储蓄有决定作用，而且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储蓄也有决定作用。所得税、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

其他类似的税赋都和利率一样对储蓄产生影响。而且，至少在预期上财政政策所能改变的限度比利率的大。如果财政政策被人为地当作收入分配平均化的手段，那么它在提高消费倾向方面的影响还将更大。

偿债基金是政府为了偿付债务而设立的，其来源是税收，它会对总消费倾向产生影响。由于偿债基金代表了一种集体储蓄，大量设置偿债基金可以降低消费倾向。因此，当政府从借债政策转向设置偿债基金政策时，它能导致有效需求严重缩小；而政策向相反的方向执行时，会使有效需求出现显著的扩张。

人们改变其对现在和未来收入水平差距的预期

这个因素对个人消费倾向的影响可能比较大，但对全社会消费倾向的影响，很可能会因每个人预期改变方向的不同而彼此抵消。另外，一般来说，该因素的不确定性很大，不会对消费倾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在既定的条件下，如果抛开以货币来衡量的工资单位的改变，那么消费倾向这个函数可以被认为是非常稳定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利率与财政政策的重大变动固然是可以改变消费倾向的，但是除了这些情况外，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它们的影响不可忽视，但通常情况下，它们不具备很强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消费支出主要由就业量和产出量决定。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大致“消费倾向”函数来总括其他因素。即使其他因素可以改变，但作为总需求函数组成部分的消费量一般还是取决于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收入。

消费量与收入

既然承认消费倾向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函数，所以，一般来说，总消费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量（这两者都以工资单位来计量），而消费倾向自身的变动被认为只有次要的作用。那么消费倾向这个函数的普通形式是怎样的呢？

从人类本性和实践经验来看，有一条基本心理规律：一般来说，人们的消费会随着其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没有收入增加得快。即如果用 C_w 表示消费量， Y_w 表示收入（都以工资单位来计量），那么 ΔC_w 和 ΔY_w 正负号相同，但后者大于前者，也就是说： $\frac{dC_w}{dY_w}$ 的值为小于 1 的正数。



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短期情况，事实更是如此。在所谓就业的周期波动期间，人们此时的习惯不同于更持久的心理倾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由于人们通常会先从收入中扣除他们已习惯的生活水平所需的开支，而倾向于把实际收入与这个开支的差额用于储蓄。或者，如果人们确实随着收入的改变而调整其开支，短期内的这种调整是不完全的。因此，储蓄常常会随着收入的增减而增减，且开始时的变化规模会比以后的大。

除了收入水平的短期变动外，较高的绝对收入水平显然一般也倾向于使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扩大。而且，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往往会把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储蓄。但不论人们是否会把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我们可以承认一下这条任何现代社会中基本的心理规律：当社会实际收入上升时，其消



“工资存银行，存折老婆管”，对工薪阶层来说，将收入存进银行是渴望稳定生活的人生态度。

费增加的绝对数量不会等于收入增加的绝对数量，所以，若非其他因素同时出现剧烈且不平常的变化，该社会较大的绝对数量必将被用于储蓄。这意味着：如果就业量增加，进而导致总收入也增加时，新增加的消费量不会把所有新增加的就业量都消耗掉。

另一方面，当就业水平的下降导致收入也下降时，如果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则有可能使消费超过收入，这不但是由于他们花费了其在经济状况较好时积攒的储备，还有可能是由于政府有意或无意地产生了预算赤字，或通过借款来发放失业救济。因此，当就业量下降至低水平时，总消费量减少的数量将比实际收入减少的数量要小。

其原因既是由于个人的习惯行为，也是由于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也是为什么均衡状态通常能在适度的波动幅度内形成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业和收入的下降一旦开始，就有可能持续到很低的程度。

预算主要是用来满足一国的政府财政支出的，一般地说，要保持基本平衡。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突然经受波动，政府可以动用更多的支出来熨平经济波动，即使是出现预算赤字。

由此可见，这个原理得出的结论与过去的一样：就业量只会随着投资的增长而上升，除非消费倾向确实发生了改变。这是由于：在就业量增加的情况下，因为消费者的支出会比不上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如果增加的投资不能弥补两者之间的差额，那么就业量的增加将是没用的。

消费量的决定因素

上述事实是很重要的：就业量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消费又是净收入的函数，也就是净投资的函数（因为消费+投资=净收入）。也就是说，在既定的投资水平下，需要在计算净收入之前扣除的财务储备越多，对消费、进而对就业的提高就越不利。

当所有的财务储备（或补充成本）在现期都被用来维持现有的资本设备时，其作用不容易被忽略。但往往不能被人们所理解的是，因储备金额超过现期维持费用而对

人不是蜗牛，不能随时带着个窝；窝的收益在频繁重建的动态经济体系中深受影响。



就业量产生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一超出额既没有直接增加当期投资，也没有被用于消费。所以，必须要有新投资来弥补这个超出额。但是，对新投资的需求，和因旧设备的损耗而形成的财务储备几乎是完全独立的，从而导致能够形成当期收入的新投资相应地减少，而要达到既定的就业量，对新投资的需求就应该加强。以上观点，也适用于关于使用者成本的损耗，只要该损耗在



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弥补。

设有一房屋，在没有拆毁或是放弃之前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该房主人从每年的租金中提取一笔款项，将其作为折旧基金。但是这笔款项既不是用于修缮房屋，也不是将其视为净收入而用于消费，那么，这种折旧储备在整个房屋的整个寿命期间，对就业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重建房屋时，这笔款项都将花费殆尽。

但是在一个静态的经济体系中，我们可以不考虑这个因素的影响。因为，在静态的经济体系内，在每一年中留作房屋折旧用的款项恰好等于该年用于建造新房的费用，旧房拆毁或弃用的速度恰好等于新房建造的速度。但是在一个非静态经济体系中，在对耐用资产的投资以后的这段期间，这个因素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家对现有的资本设备将提出一笔较大的折旧基金，但这些资本设备非常耐用，将全部折旧基金用于它们维修的时间还没有到来。故将有一大部分的新投资被折旧基金所吸收，因此收入很低，就像总投资得不到提高那样。因此，在旧设备需求重置（提出折旧基金的目的）之前的一段很少的时间内，折旧基金将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折旧基金减少了当前的有效需求，而只有当折旧基金用于重置旧设备的时候，有效需求才会得到提高。另外，如果实行稳健财政的政策，即提出的折旧基金远远超过该设备实际的折旧率时，这种影响将更为严重。

拿美国来说。在1929年，由于过去五年的资本投资扩张急剧，故偿债基金和折旧基金的数量都比较大，但是现有的设备并不需要重置，结果是很大一部分新的投资被二者所吸收。当时，几乎没有希望找到更多的新的投资，以便一个富裕社会在充分就业的情形下愿意提供更多的新储蓄。仅仅这一个因素，就可能引起经济的萧条。然而，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有许多大公司仍然致力于稳健财政的政策，那么这将严重阻碍经济的复苏。



工人无工可做，企业哀鸿遍野，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资本过度扩张引起的经济萧条后果严重。

现在以今天（1935年）的英国为例。一战后大量的住宅建筑以及其他的新投资，使得现有的偿债基金远远超过当前实际所需要的修理费和重置费。若该投资者是地方当局或公共机关，那么他们就会因为拘泥于所谓的“健全”财政的原则，常常在重置的时间还没来临之前就将投资成本全部提出。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即使个人愿意将其全部净收入都全部用于消费，但是同时由于这些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正在依其原则而提出大量的偿债基金（不论他们有无新投资），因此，充分就业是很难恢复的。然而，受卫生部门政策的坚持，地方当局每年提出的偿债基金都超过每年投资支出的一半以上，这种政策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

应该要强调的是：如果社会拥有大量资本存货，要得到一般情况下可被用于消费的净收入，对社会收入就必须做一定数量的扣除。因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扣除，即使在大众愿意将其很大一部分净收入用于消费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会低估使消费倾向降低的因素的作用。

所有经济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和对象，即消费。就业的机会必然也会受制于总需求的程度。总需求只能来自于现期消费和现在为未来消费所做的准备。对一个社会来说，我们只能用现期的物质产品来为将来的消费做准备，而不是财务上的方法。但在我们的社会和企业组织中，财务上为未来消费所做的准备，与实物上为未来所做的准备是截然分开的，所以使前者得以实现的措施并不必然也使后者得到实现。正像很多事例所证明的：谨慎的财务方法倾向于使总需求减少，并因此使社会福利遭到损害。而且，我们为未来消费准备得越多，我们事先为将来消费做准备的难度就越大，从而在总需求的来源中我们将更加依赖于现期消费。但遗憾的是，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会随着我们收入的增加而拉大。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新的方法，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除非社会保持足够多的失业，让我们贫困到这样的程度：使消费与收入的差额，不超过今天为将来消费而生产的物质准备的价值。

问题又出现了。消费一部分可以用当前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而一部分又可以用过去生产的产品来满足，即用负投资来满足。若用后者来满足消费，那么当前的消费需求必将随之降低，故一部分当前的消费支出，并不能吸收为净收入。反之，当该产品在本期生产，但其目的是用于未来消费，那么当前的消费需求将随之增大。一切资本投资，迟早都会变成负投资，因此如何在通常情况下，使得新的资本投资超过资本，以弥补净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这显然是一个重大难题。而且，这个难题会随着资



本投资的增加而愈加难以解决。因此，只有当人们预期的未来消费的支出将会增加，当前的新投资才会超过原来的资本的负投资。而每一次我们采取增加投资来取得今天的均衡，那么这样便会增加取得明天的均衡的困难。

还有一件难以琢磨的事情。如果投资者为政府机关，例如政府建筑道路或住宅，一般人们都会似乎意识到某个难题的存在。人们之所以会反对政府用投资的方式来增加就业，通常是因为这些投资给未来的就业增加困难。他们常常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政府把一个社会体系中人们所能够满足需要的住宅、道路、市政大厅、水电厂等等都建造起来后，政府还能做什么来提高就业呢？”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即使私人从事投资或是扩张投资，也会产生同样的难题。

在这些实例和许多关于资本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所出现的思路不清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是不能独立于消费的。相反，消费倾向作为一种持久性生活习惯的代表，它的每一次减少都必将使对资本品的需求和对消费品的需求减少。

【解析】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

影响人们消费动机的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人的心理特点、社会习俗和制度。除非在反常的或革命状态下，短期内它们不会有大的改变。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单位的改变、收入与净收入的改变、在计算净收入时，我们没有考虑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以及人们改变其对现在和未来收入水平差距的预期等。在既定的条件下，如果抛开以货币来衡量的工资单位的改变，那么消费倾向这个函数可以被认为是非常稳定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利率与财政政策的重大变动固然是可以改变消费倾向的，但是除了这些情况外，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通常情况下，它们不具备很强的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消费支出主要由就业量和产出量决定。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大致的“消费倾向”函数来总括其他因素。即使其他因素可以改变，但作为总需求函数组成部分的消费量一般还是取决于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收入。

【案例】我国居民旅游消费 10 年快速增长

案例适用：收入与消费

旅游消费是居民消费需求的组成部分。近 10 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主观上对旅游休闲有了更多的需求，客观上也拥有了更多的收入可用于支付旅游开

支。于是，我国的旅游消费逐年增长。

(1) 国内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旅游业也跟着兴旺起来，欧美、日韩、新马泰……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全球。



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数急剧膨胀，境外消费花费也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新兴客源输出国。

从国内旅游消费来看，1994年至今，我国国内旅游消费逐年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可知，我国国内旅游规模从1994年的5.24亿人次提高到2004年的11.02亿人次，平均每年增长8.0%，而由此带来的旅游收入则从1994年的1023.5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4710.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7.3%。其中，只有2003年“非典”期间国内旅游经历了短暂的下滑。但是，之后又表现出迅速的可喜发展，显示出一种滞后的爆发力。2004年全国国内旅游收入比2003年增长了36.8%，比2002年增长了21.5%。其中，城镇居民旅游消费3359.0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39.7%，比2002年增长了17.9%；农村居民旅游消费1351.7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30.2%，比2002年增长了31.2%。

旅游消费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从1994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国内旅游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长期保持在13%以上的水平，最高达到14.55%。与此同时，农

村居民人均国内旅游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则出现整体上升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左右上升到21世纪初的10%左右。

(2) 出境旅游消费成为新亮点

中国出境旅游特点是因私出境旅游发展迅速。国家旅游局提供的世界旅游组织的相关统计表明,中国已跻身全球出境旅游消费前十位,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客源输出国。据调查,中国出境旅游总人数从1995年的452万人次增长到2003年的2022万人次,年均增长20.6%。其中因私出境旅游人数年均增长达到28.04%。同时,从出境旅游人数增长及旅游目的国的消费水平推算,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统计数据低估了我国居民出境旅游的实际消费水平。目前,还没有哪项研究对我国出境旅游者的人均花费做出准确估算,大多数研究只是通过国外一些单位的调查,估计出中国居民出境旅游花费是非常高的。

(3) 居民消费渐趋个性化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居民消费质量进一步提升,人们在旅游消费的支出上更加理性,个性化突出。居民的旅游消费动机从“半军事化、拉练式的、追求看最多景点”的观光旅游逐渐转向“以放松心情、追求舒适静谧”为主要目的的休闲消费和“体现个性审美”要求的特色旅游消费。于是,“红色旅游”、“民俗游”和“农家乐”等成为新近的旅游消费热点。

“红色旅游”使旅游者在消费过程中感受到了更多弥足珍贵的东西。于是,位置偏僻、条件并不优越的革命老区在最近几年成为中国居民旅游者的新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革命书籍、纪念章、宣传画等成为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的一项特殊消费支出,旅游者在居住、饮食等消费的选择中更多以“忆苦思甜”为目的,体现了对历史的追忆、对英雄的敬仰、对现实的珍惜,以及对自身的教育。截至目前,对于“红色旅游”的人数和收入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但专家估计,以发展“红色旅游”为特色的城市已有几十个,各类“红色旅游”接待点数以万计;每个“红色旅游”接待点的接待规模差距较大,小的数以千计,中型的数以万计,大型的几乎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如延安、井冈山)全部的接待人数,如果遇到大的纪念周年,接待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万,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从局部的统计结果我们也可窥见一斑:在2005年春节旅游黄金周的七天假期中,中共一大会址接待游客3336人次;井冈山每天接待游客4000多人次;而革命圣地延安推出“延安大过年”春节旅游活动,黄金周期间接待游客达11万

人次。

被人们渐渐淡忘的“民俗”，在最近几年重新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全国各地旅行社推出的以乡土风情为主打的“民俗游”产品的销售持续升温，产品品种也日益丰富。比如：“到平遥农家睡大炕”、“到陕西住窑洞”、“到东北住雪房子”、“到藏民家开篝火晚会”等都受到游客们的欢迎。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作和生活压力也相应增大，于是居民更加重视休闲消费的质量。依托都市周边的农家庭院的“农家乐”，由于其方便、经济的特点而成为短途旅游的最佳选择。不仅都市人因为图新鲜而对“农家乐”乐此不疲，甚至连农村人也因为其方便省事而喜爱上这种“家门口旅游”的特殊消费方式。

案例评析：

我国的旅游热已经从国内旅游延伸到国际游，从长假扩大到双休日，从单纯的游玩观光到“红色旅游”、“生态游”、“民俗游”等多种形式，突出体现了当今人们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以实物消费为主转向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带动相关产业的结构升级，拉动新兴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进而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起到极大的作用。而消费又与收入密切相关。当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居民只能首先考虑生存的温饱问题；而当收入增加并逐步稳定后，居民手中掌握了更多的资金，居民的消费需求会渐渐提升，他们将更加重视教育、文化、娱乐和健康等各方面的需要。旅游作为居民休闲娱乐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会成为居民的普遍行为。因此，旅游消费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收入的增加。

（资料来源：李晓西等：《宏观经济学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Chapter 8

第八章 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



总收入既定时，主观的和社会的动机将决定消费支出量。消费的短期变化取决于收入的多少，而非既定收入下消费倾向的改变。利率的变动对储蓄量有重要影响。利率上升时，储蓄和消费都将下降。

不利于消费的主观动机因素

如果客观因素不变的话，还有第二类影响一定收入中用于消费量的因素：在一定的总收入（以工资单位计量）和一定的已论述过的客观条件下，主观的和社会的动机决定消费支出是多少。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不会涉及到新的观点，所以在此只列出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点。

一般认为，有八个主观性动机使得个人不把收入用于消费：

(1) 为不能预见但又有可能发生的费用而储备一笔资金；

(2) 为了预防将来的收入要比现在低，而家庭将来的花费要高于今天的花费，所做的储备。如：为了养老、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对不能自立的人的抚养；

(3) 为了得到利息和增值，即有人愿意牺牲一部分现在消费，而获取更多的将来消费；

(4) 为了满足逐渐增加的生活开销，因为，尽管人们享受能力可能会下降，但普遍都有一种希望生活水平能逐渐得到改善的本能，而不是相反；

(5) 为了满足独立和有能力做出事业的意识，尽管就具体行动而言，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目的；

(6) 为进行投机或商业项目而积累资本；

(7) 为了能够遗留下财产；

(8) 为了满足纯粹的吝啬的愿望，即那种不合理但一贯坚持的反对消费的行为等。

这八个动机可以被称为：谨慎、远虑、筹划、改善、独立、进取、骄傲和贪婪的动机，我们还可以列出一系列与它们相对应的消费动机，例如，享受、短视、慷慨、失算、炫耀和奢侈。

除个人进行储蓄积累外，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公司进行的储蓄。这种储蓄在类似英国或美国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占总储蓄量的1/3至2/3。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储蓄动机相似但并不相同，这些动机主要有以下四个：

(1) 进取动机——取得资金，为了不必通过负债或在市场上融资就能进行更大的

资本投资。

(2) 流动性动机——取得流动性资产，来应对紧急情况、困难和经济萧条。

(3) 改善动机——取得逐渐增加的收入，这还能顺便让管理者们免受批评。因为，很难把因积累带来的收入增加与因效率带来的收入增加区分开来。

(4) 财务上的谨慎动机和处在“正确地位”的愿望使得资金储备超过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以便于能在资本设备实际磨损和报废的期限之前（而非之后），偿还负债并收回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资本设备的数量和特征，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决定了这个动机的强弱程度。

与这些使人们把一部分收入不用于消费的动机相对应，有时也存在着一些动机使消费超过收入。上述的对个人储蓄产生正面影响的因素，在日后负储蓄的情况下，会产生相反的影响，例如，把储蓄用于家庭开支或养老的需要。用借来的钱发放失业救济金可以被认为是负储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这些动机的强弱程度会由于这些因素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假定的经济社会的体系和组织；因种族、教育、传统、宗教和因当前道德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当前的希望和过去的经历；资本设备的规模与技术；以及当前的财富分配和现存的生活水平。在本书中，我们将把分别决定储蓄和消费的主观动机和主要背景当做给定的事实。至于财富的分配，它基本上决定于永久性的社会结构，可以被认为是只在长期中才会缓慢改变的因素，所以，在本书的上下文中，它被认为是给定的。



纸醉金迷，夜夜笙箫，富人们的生活及消费习惯了“限量版”，远离大众的消费视界。

影响消费的因素图解



当前可支配收入、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人们收入的差距和物价水平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购买欲望。

主观因素



良莠不齐的商品，高低起伏的物价，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消费者越看越茫然。

客观因素



许多客观因素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令他们举棋不定，模棱两可。

主观因素

谨慎型消费



远虑型消费



筹划型消费



改善型消费



独立型消费



进取型消费



骄傲型消费



贪婪型消费



工人工资的降低



收入的改变



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



客观因素

时间贴现率的改变



财政政策的改变



收入水平的改变



利率影响储蓄和投资

一般来说，使消费倾向改变的主观和社会的动机变化缓慢，利率和其他客观因素变化所产生的短期影响只是次要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消费的短期变化并不是取决于既定收入下消费倾向的改变，而是主要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量）的多少。

现在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解。上面说的是利率的轻微变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一般是不大的，但并不是说利率变化对实际储蓄量和实际消费量的影响甚微。相反的是，利率的变化对实际储蓄量有很重要的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向与通常所假定的方向是相反的。即使提高利率确实对降低消费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利率的提高将减少实际的储蓄量。这是因为，总储蓄取决于总投资，而利率上升就会使投资下降，除非投资需求曲线的相应改变能抵消利率上升的作用。因此，收入必然会由于利率的上升作用而下降，且其绝对数量会大于投资下降的绝对数量，所以，利率上升时，储蓄和消费都将下降。

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尽管利率上升确实可以增加一定收入量中用于储蓄的数量，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投资需求曲线不变，则利率上升一定会减少实际的总储蓄量。不仅如此，在假定其他情形都不变的条件下，我们还可以知道，当利率上升时，收入将会减少多少。因为在资本边际效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利率上升，那么投资必将减少，则收入会随之减少，进而减少当前消费倾向下用于储蓄的数量，最后使得储蓄量与减少后的投资量相等。因此，我们可以由此而计算出收入减少的数量。

只有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利息率上升时，我们才会进行更多的储蓄。但是，如果较高的利息率对投



利率上升，改变了货币流动性，企业家加大了对生产的投入。

资产产生阻碍，那么，我们的收入必然会下降，直到储蓄能力的减少足够抵消较高利息率所导致的储蓄积极性。我们越是品德高尚，越是厉行节约，我们的国家和个人的财务越是恪守传统的原则，则当利息率相对于资本边际资本效率有所提高时，我们收入的下降也就越多。僵化不变的态度所带来的不会是受益，而是惩罚。因为这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因此，实际的总储蓄量和总消费量不取决于谨慎、远见、骄傲和贪婪等动机。善行和恶习对它们都不起作用。在考虑资本边际效率的情况下，是利率对投资的有利程度决定了它们。当然，这种说法有夸张的成分。如果利息率能被控制于使其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的程度，节俭的美德仍然会发挥作用；此时，消费倾向的微弱程度仍将决定资本积累的速度。所以，古典经济学家赞扬节俭美德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暗含了利率始终能被控制在维持充分就业水平的假定。

【解析】主观动机及利率影响消费倾向

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还有第二类因素会影响我们的消费倾向，即主观因素。如个人储备一笔资金，用于预防未来不测之变或是满足未来家庭费用的增加；政府企业等出于各种动机都将提取一部分资金等等。总的说来，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一定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数量。然而，一般来说，使消费倾向改变的主观和社会的动机变化缓慢，利率和其他客观因素变化所产生的短期影响只是次要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消费的短期变化并不是取决于既定收入下消费倾向的改变，而是主要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量）的多少。但是还存在的一个误解便是，虽说利率的轻微变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不大，但却并不是说利率变动对实际储蓄量和实际消费量的影响甚微。因为，利率的变动对储蓄量的影响非常重要。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由于资本边际效率不变，当利率上升时，投资必将减少，则收入会随之减少，进而减少当前消费倾向下用于储蓄的数量，最后使得储蓄量与减少后的投资量相等。因此，利率上升时，储蓄和消费都将下降。

【案例】1988年中国居民出现“排浪式消费”抢购潮

案例适用：主观价格预期

一、“排浪式消费”抢购潮的背景

1985年以后，国家放开了除粮、棉、油等11种重要农产品之外的全部农产品价



在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的时候，日常生活商品如大米粮油就成了抢购的热点。



物质生产单调，消费结构趋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电器成了消费热点。

二、“排浪式消费”抢购潮的特点

1988年的抢购潮带有明显的“排浪式消费”特征，即当人们收入差距不大时，在商品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下，大多数居民的消费热点趋同，主要集中在如自行

格，放开了生产资料计划外部分的价格。1985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8.8%，在国家及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了宏观调控之后，当年第四季度物价渐趋平稳，但是，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并未消除。1986年初，由于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市场滑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放松银根（1986年贷款规模净增1685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贷增加最多的一年），导致了货币流通状况的恶化，通货膨胀再度出现，并且愈演愈烈。1986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为6.0%，1987年为7.3%，1988年猛增至18.5%，其中，1988年12月高达26.7%。

人们对于1988年的通货膨胀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当年的排队抢购潮：从城市到农村，许多人不顾天气炎热，蜂拥而至商店，抢购家用电器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百货公司门前常常出现整晚排队等候购货的长龙，商品供求关系严重失调。在这一背景下，物价大幅上涨，1988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8.8%，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上年增加24.8%，增幅比上年大13.9个百分点，也高于当年的价格涨幅。

车、手表、缝纫机、洗衣机、电视机等商品上，往往呈现出集中抢购的特点。总体说来，1988年“排浪式消费”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消费结构具有较强的趋同性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行业、各地区的收入水平总体较低，且相差不大，据统计，1988年全部行业年平均工资为1747元，除农、林、牧、渔、水利业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外，其他行业都基本接近。各地区平均工资差距也不太大，东、中、西部地区工资收入基本没有差别。由于收入差别极小，人们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的消费层次，没有明显的消费差别和消费梯次，在规模、数量、品种、质量严重趋同而又没有明显的消费梯次和消费差别的情况下，这种消费的整体式推进必然导致市场需求的突发性膨胀和萎缩：当消费热点形成时，需求巨大，刺激生产急剧扩张；但消费热点一过，又会出现积压和供给能力过剩的状况。

2. 市场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卖方市场特点

“排浪式消费”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产物，在人们收入增长较快和商品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原来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释放，人们在从众和攀比消费心理的影响下，容易形成盲目购物和冲动消费，导致消费的爆发式增长和价格的快速上升。从供不应求的短缺商品到供过于求的滞销商品，从批发到零售，从普通消费品到生产资料乃至文教、卫生等行业服务，物价全面上涨。

3. 市场上出现特别热门紧俏的消费品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耐用消费品零售额快速增长。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之后，居民消费热点出现“新三件”，即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1988年底，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的社会拥有量分别增长了29.5%、23.6%和63.2%，而相应的销售额则分别增长了42.50%、36.69%、和110.03%，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平均水平。根据计算，1988年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三大件销售占到全部社会零售额增量的10%，说明“新三件”已成为销售热点。

三、“排浪式消费”抢购潮出现的原因

第一，“排浪式消费”抢购潮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国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总供求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保持价格稳定和低工资制度，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甚微，居民消费被限制在较低水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主动调整价格结构，使短缺经济时代的隐性通货膨胀显性化，为了减轻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

的不利影响，国家对城镇居民发放价格补贴，并提高工资水平，使城镇居民收入由长期冻结到快速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日趋强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供给增加并没有跟上总需求增加的步伐，因此，总供需缺口有所增大。第二，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商品匮乏的条件下，人们的消费心理极不成熟，具有攀比心理。这种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导致消费需求在短时间内“排浪式”释放。第三，价格改革预期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随着国家各项物价改革措施的出台，物价水平逐年上涨，人们的消费预期也逐年扩大，因此任何对价格有冲击的因素都会触发居民的抢购潮。

案例解析：

1988年中国出现了“排浪式消费”抢购潮对经济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迅速变迁。因为消费需求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这种集中消费直接引发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又会诱发物价全面上涨，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而这种“排浪式消费”抢购潮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转轨经济特征和时代烙印，其直接原因在于当时的价格改革和居民的价格预期。这种现象表现出计划经济时代供给短缺的显著特征，体现了居民对通货膨胀现象的不适应和消费心理的不稳定。此后，居民从实践中得出了抢购商品获得的利益小于保值储蓄获得的利益这一共同经验，逐渐成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理性决策的消费者。可以说，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主观心理部分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资料来源：李晓西等：《宏观经济学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Chapter 9

第九章 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 边际消费倾向衡量的是当收入增加一定量时，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分配。乘数则表明总投资率和投资增量的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也存在相互关系。

边际消费倾向及乘数



卡恩在《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中首先提出了投资与失业的乘数概念。

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现在，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深化。我们可以用乘数来表示收入和投资之间确定的比例关系。再采取某种简化的方式，在总就业量和直接被用于投资的就业量（我们称之为初期就业量）之间建立一个确定的比例。这一步是我们整个就业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有了这一步，当消费倾向不变时，我们就可以在总就业量、总收入与投资量之间建立一个确切的关系。乘数的概念是由 R·F·卡恩先生在其论文《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载《经济学杂志》，1931年6月号）中首先提出的。在他的这篇文章中的论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在各种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以及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如果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或其他公共机关采取刺激或阻挠的投资的措施，

那么就业量就会随着投资数量的净增减而增减，即就业量的变化就是投资净增减量的函数。这篇文章的目的要旨在建立一些一般性原理，并用这些原理来估算净投资增量与因此而导致的总就业量增量之间的实际数量关系。在讨论乘数之前，有必要先对边际消费倾向这个概念进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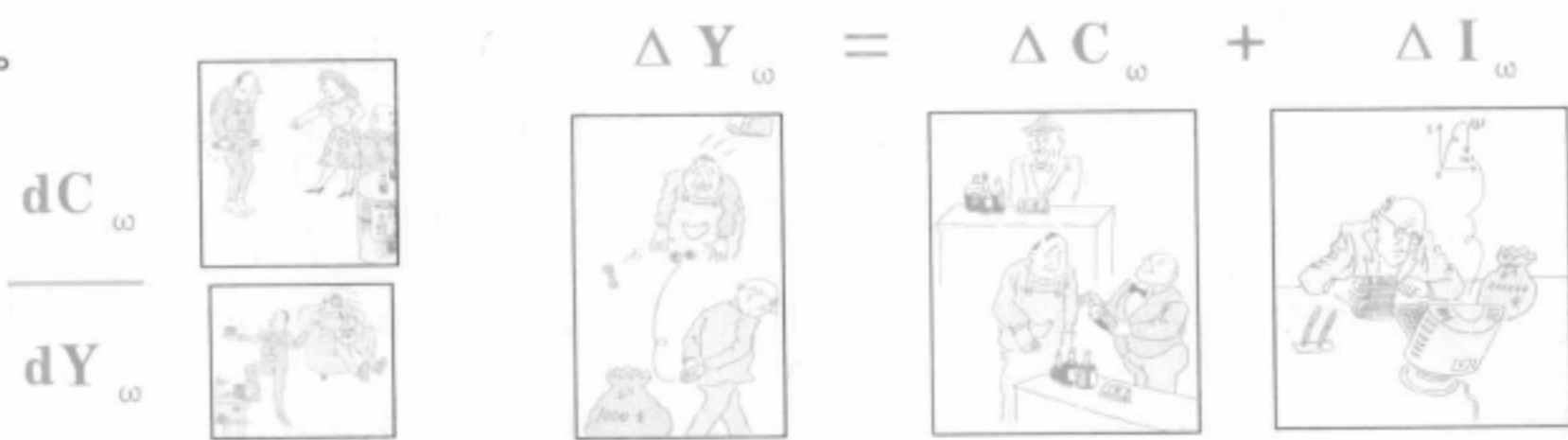
在本书中，我们所说的实际收入变动的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一特定资本设备上就业人数的变化，因此，实际收入是随着就业量的增减而变化。当一特定资本设备上增加

雇用劳动力时,将有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那么用工资计算的收入增加的比例将大于就业量增加的比例,而后者又大于以产品数量计量的实际收入增加的比例。但是在短期内,资本设备的改变是非常小的,因此用产品数量计量的实际收入是随着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增减而增减的。由于实际收入无法用精确的产品数量来计量,因此,衡量实际收入变动的实用的指标,是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Y_w)。在某些情况下, Y_w 的增减比例一般比实际收入的增减比例要大,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总是同时增加或减少(这几乎可以使它们相互替代)。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心理规律是:在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其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增减的速度没有实际收入那么快。在某些条件的约束下,这条心理规律可以被改写成这样的一个命题,即 ΔC_w 和 ΔY_w 的正负号相同,但 $\Delta Y_w > \Delta C_w$ 。式中, C_w 是用工资单位来计量的消费量。我们可以把 $\frac{dC_w}{dY_w}$ 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



$\frac{dC_w}{dY_w}$ 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因为我们从这个变量知道,当产量再增加一些时,这个增量在消费和投资之间是怎样分配的。由于 $\Delta Y_w = \Delta C_w + \Delta I_w$, ΔC_w 和 ΔI_w 分别是消费和投资的增量;所以,可得 $\Delta Y = k \Delta I_w$,此处 $1 - \frac{1}{k}$ 等于边际消费倾向。



我们把 k 称为投资乘数。由此,我们知道:当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加量等于投资的增加量乘以 k 。

卡恩先生的乘数与此有微小的差别,被称为就业乘数,用 k' 表示。因为卡恩先生的这个乘数衡量的是,投资品行业的初期就业量的增量与因此而导致的总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投资的增量为 ΔI_w ,所引致的投资品行业的初期就业量是 ΔN_2 ,则总就业量的增量即为 $\Delta N = k' \Delta N_2$ 。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一般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小于求）。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意指整体物价水平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之市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

一般说来，我们没有理由假定 $k=k'$ 。因为，没有必要假定不同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相关部分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使得一个行业需求增量与由此引起的就业量增量的比例，与其他的行业都相等。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相差甚远，则 $\frac{\Delta Y_{\omega}}{\Delta N}$ 不等于 $\frac{\Delta I_{\omega}}{\Delta N_2}$ ，因为在这个时候，消费品需求改变的比例与投资品需求改变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事实上，设想出这种比例不相同的例子并不难，但是为了阐明它所包含的思想，采用简单化的方式使得 $k=k'$ ，还是很方便的。



由此可见，如果社会的消费心理使得人们采取这样的消费方式，比如说，消费掉其收入增量的 $9/10$ ，那么乘数 k 就是 10 。以公共工程为例，假定其他方面投资不减少，因公共工程增加所带来的总就业量，就等于公共工程初期所提供就业量的 10 倍。只有在社会的消费量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就业量增加并进而导致实际收入增加，就业量的增加才会被限制于公共工程本身所提供的初期就业量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愿意把任何收入的全部增加部分都用于消费，则经济将会变得不稳定，价格将会无限制地上升。因此，在正常的社会心理情况下，只有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倾向同时发生改变，才会出现就业量增加和消费量减少的现象。例如在战争年代，人们的消费就会受社会形势的影响而减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投资品行业的就业量就会影响消费品行业的就业量。

显然，如果公众不准备增加其工资单位计量的储蓄量，那么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投

投资量将不可能增加。一般来说，只有工资单位计量的总收入得以增加，公众的储蓄量才会增加。如果公众的心理倾向和我们所假定的一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一条规律：投资所增加的就业量必定会刺激消费品生产行业，进而增加总就业量，而增加的总就业量是投资本身所必需的初期就业量的一个乘数。

由上文可知，当边际消费倾向趋近于1时，投资量的轻微变化都能使就业量产生很大的变化，即较小的投资量就能引致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当边际消费倾向趋近于0时，投资量的轻微变化只会使就业量产生相应的轻微变化，故需要很大的投资增量才能引致充分就业。实际当中，边际消费倾向似乎处在

0和1之间，但更接近于1。其结果是，在一定意义上说，两者最坏的情况都同时存在：就业量的波动相当巨大，同时，为达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投资增量会大到难以获得的程度。

当社会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后，如果投资继续增加，那么不论消费倾向为多大，价格水平将无限制地上涨。也就是说，会造成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但是在充分就业以前，总实际收入将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增加。

投资量变动及出乎意料的变化

我们在上文中所讨论的是投资的净增加量。所以，如果想要把上述理论不加限制条件地运用在分析增加公共工程的作用上，我们就必须假设：没有因其他方面投资量减少而产生的抵消作用，并假设没有与其相联系的社会消费倾向的改变。引入卡恩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物资均投向战争，生活消费物资匮乏，消费水平全面下降。

生文章的目的在于，探讨哪种因素产生的抵消作用比较重要，这是不容忽视的；并设法对这种抵消作数量上的估计。因为在实际情况中，除了某一种给定投资类型的具体增加额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最终结果。因此假设政府在公共工程上增加雇用十万人，而乘数为四，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总就业量将增加四十万人，因为这项政策可能还会对其他方面的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卡恩先生的观点，以下这些似乎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而且不容忽视的因素：

(1) 如果政府要实施某项政策，就必须筹款；而且，当就业量增加时，价格水平随之而上涨，那么政府对周转资金的需求将增加。这些都有可能使得利率上升。除非货币管理当局设法阻止利率的上升，否则利率的上升将阻碍其他方面的投资。同时，资本品成本的增加会使私人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因此，要消除这个抵消因素，就必须使得利率下降来补偿，甚至使得利率低于政府实施某项公共投资政策之前的利率水平。

(2) 由于经常出现的心理混乱状态，而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会对“信心”产生影响，从而可能使流动性偏好上升，或使资本边际效率下降。除非采取抵消其作用的措施，否则其他方面的投资将会受到阻挠。

经济衰落时期，失业人员只能靠领取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金度日。



施，否则其他方面的投资将会受到阻挠。

(3) 在一个对外开放经济体系中，则一国部分投资增加的乘数作用，会因为促进了外国就业量而被消耗。因此，若我们只讨论本国就业量所受到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降低乘数的值。另一方面，由于乘数作用在外国所引起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会对我们国家产生有利的反应，我国会因为这种反应而收回一部分外泄的利益。

另外，如果我们所考察的变化具有相当大的数量，就必须考虑到边际消费倾向发生的累进的变化，

因为，边际的位置在逐渐改变，进而乘数也在改变。并不是在任何就业量水平下，边际消费倾向都保持不变，一般的规律是，随着就业量的上升，边际消费倾向有下降的趋势。

以上便是一般规则。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使边际消费倾向发生改变，进而使乘数发生改变。而这些因素并没有使上述一般规则的趋势减弱，反而加强了。这是因为：第一，当就业量增加时，企业家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在增加，但是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远远小于社会全体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的；第二，当有失业现象存在时，就会同时有一部分人（私人或政府）作负储蓄的行为，因为失业者为了维持生存，就必须依赖于自己或亲友的储蓄，或是依赖于政府的救济，而政府救济金多半是来源于政府的负债。只有当失业者减少时，这种负储蓄的行为才会相应减少。因此，存在两种方法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一是失业者重新就业；二是当实际收入增加相同的情况下，降低企业家边际消费倾向减少的速度。

因此，当净投资额比较小时，乘数的值较大；当净投资额大时，乘数的值较小。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般取基于该投资增量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平均值的乘数平均值为依据。

投资只占国民收入中比较小的一部分，但是当投资数量变动时，却能够使得总就业量与总收入的变动程度，远远超过投资量本身的变动。这种现象，在我们了解了乘数的作用后，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进行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总投资的变动事前已经被预料到，所以消费品行业和资本品行业能在事先足够长的时间里同时增加产量，所以，除了产量增加所产生的收益递减之外，消费品价格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说，我们必须要考虑这样的情况：由于完全出乎意料的投资品行业产量增加而产生的变化。显然，这种原因产生的变化，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其对就业量的作用才能全部发挥出来。但我们发现，在讨论这一事实时，可能会引起混淆：一方面，乘数这个合乎逻辑的理论在任何连续的时点上都成立，而且没有时间间隔；另一方面，资本品行业扩张的影响，由于时间间隔的原因，它的作用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逐渐发挥出来。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明如下：首先，资本品行业中出乎预料的和没有完全



资本品行业的新就业者将其收入部分用于消费，造成消费品如电器等价格上涨。

预料到的扩张对总投资量不会立即发挥它的全部影响，使投资量逐渐地增加；其次，边际消费倾向在它的影响下会暂时偏离正常值，然后又逐渐地回到正常值。

因此，资本品行业的扩张在经历一个时间间隔后的一段连续时期中，产生一系列的总投资增量，并在这一段连续的时期中产生一系列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这些数值与预料之中的投资品行业扩张时的数值不同，也与整个社会新建立的总投资水平的数值不同。但是，在每一段连续时期中都有：总需求的增量，与总投资的增量乘以边际消费倾向所决定的乘数相等。

还有一种极端情形可以说明上文，即当事先没有预料到资本品行业中就业量增加时，消费品的产量却没有增加。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品行业中的新就业者将其一部分收入用于消费，便会造成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这样就会产生以下几种结果：一是一部分消费暂时延期；二是消费品行业利润增加，收入得到重新分配，有利于储蓄；三是消费品存货量减少。这时，消费品达到暂时的供求平衡。而达到均衡状态，一部分是因消费暂时延期而使得边际消费倾向以及乘数都暂时降低；另一部分是因存货量的减少使得总投资的增量暂时小于资本品行业中的投资增量。随着时间的流逝，消费品行业便会逐渐适应新的需求。因此，当因暂时延期的消费得到满足时，边际消费倾向暂时将超过其正常值，其超过的程度恰好可以与以前不足的程度相抵消；当存货量逐渐恢复原状时，总投资的增量将暂时大于资本品行业中的投资增量。

某些情况下，出乎预料的改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对就业量发挥其全部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对经济周期进行分析时，情况也是如此。但这对本章所建立的乘数理论并没有什么影响，也不妨碍把乘数作为指示器，来衡量资本品行业的扩张对

就业产生的影响。

古典学说的荒谬结论

如果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也会越大，对于一个既定的投资变化来说，对就业量的影响也会越大，这也许会产生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在一个贫穷的社会中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所以前者的乘数要大于后者的乘数，因此前者的就业量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后者。

但是，这个结论没有看到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与平均消费倾向的作用之间的差别，因为，如果投资变化的比例一定，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高时，它产生的影响也较大；但是，当平均消费倾向的数值也较高时，它影响的绝对量却依然是比较小的。

在两个社会中，贫穷的社会之所以比较贫穷，一定是由于就业不足。但如果是由于工作不熟练、技术和设备落后等原因造成的，那么上述论证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适用。虽然贫穷社会中的乘数较大，但在富裕社会中，由于当期投资在现行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大，那么投资量的波动对就业量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当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时，劳动的边际负效应则小于（甚至远小于）劳动的边际产品的效用。对一个长期失业者来说，一定量的劳动产生的是正效用，而不是负效用。如果这一点能够被接受，那么，在收支相抵之后，“浪费式的”举债支出还能使社会财富增加，就可以用上述理论来解释。当我们的政治家们所接受的古典学派经济学理论阻碍了产生更好的方法时，建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被作为增加财富的途径。

难以理解的是，为了摆脱荒谬结论（古典学说所得出的），常识使我们往往倾向于采取全部“浪费式

“两堆牛粪创造一亿元GDP”的故事值得深思，开采金矿不仅没增加真实财富，反而引起劳动的负效用。



的”举债支出的方式，而不采取部分浪费的方式，这是因为：部分浪费式的方式没有把全部都浪费掉，所以，对这种方式是按照严格的“企业经营”的原则进行判别的。例如，人们更容易接受用借款筹集来的资金发放救济，而不愿接受把筹集来的资金用于效益小于现行利率的设备改造。同时，开采金矿不过是在地上挖窟窿，它非但不能增加世界的真实财富，还会引起劳动的负效用，但它却是所有解决办法中最容易被接受的。

如果财政部把旧瓶子里塞满钞票，然后把它们埋在废弃矿井中合适的深度，再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最后，任由私人企业按照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要经过投标才能进行开采），这样就不会再有失业，社会的资本财富和实际收入受此影响后，都会有所增长。当然，建造房屋或类似的事情会更有意义，如果在此过程中遇到困难，那么，我们宁愿选择挖洞的方法。

因此，我们的理智，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于一个谨慎的理财家，当我们为后代建造房屋时，都要认真考虑给后代增加的“财务”负担，这样，我们就失去了避免失业问题的简单办法。我们必须接受社会中存在失业的现象，它产生于把私人的“致富”之道运用于国家事务，但私人的“致富”之道只是使私人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对于享用财富的权利，他们并不打算在任何一定时期行使。



【解析】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影响就业量

当社会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也将随之增加，但是后者增加的幅度要小于前者。这点可以通过边际消费倾向来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衡量的是当收入增加一定量时，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分配。而乘数理论是告诉我们，设 k 为投资乘数，当总投资率增加时，收入增量是投资增量的 k 倍。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之间的关系是一定的，即 $\text{边际消费倾向} = 1 - \frac{1}{k}$ ，



即当边际消费倾向为0.9时，则 k 为10，那么当政府投资增加一定量时，社会总投资将10倍于该投资量，因此引起的就业量也将是投资初期就业量的10倍。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政府的这种决策将可能引起利率的上升，从而抑制其他的投资，乘数作用的效果因此而降低。一般说来，边际消费倾向趋近于1，故投资量较小的变动就会引起就业量较大的变动，因此只要投资量增加少于1便可以达到充分就业。

❁ 【案例】1998—2000年间国债投资效应值得推敲

案例适用：投资乘数和消费倾向

1998年到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这3年，我国经济增速基本止住了下滑趋势，2000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比1999年有了恢复性的增长。但是，当前宏观经济仍未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的局面并未根本缓解，以扩大国债投资为核心的财政政策能否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性的积极变化还是一个未知数。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算，1998—2000年发行的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国债投资分别带动各年经济增长1.5个、2个和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国债投资的作用，3年的经济增长将只能维持在5%—6%左右，甚至更低。但是上述估算的合理性仍然值得推敲。一方面，虽然国债项目要求地方、部门以及银行各配套部分资金，地方资金到位情况普遍不好，因此，国债资金对其它投资的直接带动能力并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计算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以把每年国债投资额作为国民收入增加



长期建设国债，带动了地方部门等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拉动经济增长。



企业利用国债投资，扩大了产能，提高了企业效益，获取更多的利益。

额考虑，由此计算，3年国债投资分别带动经济增长1.3个、1.4个和1.8个百分点。也可以把国债投资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增加额考虑，先计算固定资本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再根据国债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增加额的比例，估算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结果分别为2.0个、2.1个和1.8个百分点。结果都与有关部门估算数据有一定差距。

我们还可以用其它方法对国债投资的效应进行分析。财政投资的效应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即财政投资引起的投资增量以及投资乘数。由于国债投资的扩张，1998—2000年间国家预算内投资大幅增加，仅1998年预算内投资的增加额就是1993—1997年间5年增加额合计数的1.4倍，1998—2000年预算内投资增量占当年预算内投资额的比例保持在20—40%之间，明显高于90年代中前期水平。但是，国债投资(预算内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并未带来全社会投资的同步增长。1998—2000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量占当年全社会投资额的比例平均只有8%，明显低于90年代中前期。因此，导致1998—2000年间预算内投资增长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这说明，近3年间全社会投资对国债投资的依赖性大大提高了，而国债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投资乘数主要由边际消费倾向所决定，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越大。计算90年代以来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乘数变动情况，结果发现：1998—2000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致使投资乘数趋于提高。依投资乘数计算，3年财政投资拉动国民收入增加7580亿元，占同期GDP增加额的54%。这似乎又证明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但是，第一，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更多地得益于各类直接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与财政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关联度不大；第二，加入政府部门分析国民收入决定，必须考虑税收因素，这时的投资乘数公式中，边际消费倾向要作税收的扣除，因而小于不考虑税收因素时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考虑税收因素时的投资乘数也就小于不考虑税收因素时的投资乘数。1998—2000年，考虑税收因素时的投资乘数分别小于不考虑税收因素时的投资乘数0.12、0.38和0.35，且差距呈扩大趋势，这是由于平均税收水平不断提高的消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消费扩张对投资乘数扩大的积极作用。

国债投资效果分析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我们对一些潜在因素，例如对其它投资的拉动能力；以及对一些负面影响因素，例如税收增加或进口增加(在开放经济中，

进口是乘数作用过程中的一种漏出，因此，边际进口倾向越大，乘数越小)难以把握造成的。由于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会给国债投资效果的评价带来多样化和不确定的结果。

我们需要作的是充分考虑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规律，力求客观认识问题。必须看到国债投资利用了相对富余的社会资本和资源，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促进了总需求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在国债资金的支持下，建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改善了人民生存和生活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所形成的产业链条较短，对经济的直接及间接拉动作用较小，很难明显带动民间投资的扩大。国债投资扩张强化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和行政色彩，审批的力量在膨胀，各类徇私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旧体制的复归。现有的政府垄断的基础设施经营管理体制降低了基础设施的效率，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早应成为改革的方向，但是，国债投资却在继续地、大量地繁衍这种低质量的国有投资公司和经营性企业，为未来的企业改革增添成本和负担。

这3年实践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单调性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单纯依赖国债投资，而忽视其它财政政策手段运用，将会影响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就像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要谋求协调一样，财政政策内部各项政策之间也要形成合力。在上文中，由于宏观税收水平的明显提高，使得近年来国债投资可能拉动的国民收入增加额减少；减少额在1000亿元以上。近年来，政府出台一系列财税政策，力图拉动企业投资，但是，总体来讲，社会与企业的税费负担仍然较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显著。在我国的税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税收的主要部分，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实施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因为这种税制对设备投资和厂房投资的进项税不作抵扣，不但加大了企业的负担，而且遏制了企业和社会投资的热情。而在服务业和建筑安装业中实施的营业税，实际税率比生产型增值税还要高。

案例评析：

通过发行国债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短期效果来看，效果是明显的。也是政府惯于使用的方式之一，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投资效应的不稳定性，只有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并使其作用方

向一致，才会真正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这3年的实践证明：由于缺乏完善的体制保障和有效的传导机制作用，通过扩大国债发行筹集资金，由政府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和短暂的，且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改革的深入。

(资料来源：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国债投资效应值得推敲》，东方财经网2001-4-23)

第四编

投资引诱

投资量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相对高低决定，即取决于投资引诱；利率是特定时期内放弃资本流动性的报酬，资本边际效率代表借款者愿意付出的代价，而利率则是贷款者索要的代价。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资本的投资意愿；利率制约着新生产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也对就业水平有限制作用。

●本卷精彩内容导读目录

- ◎案例：新加坡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与政府投资 / 121
- ◎案例：亟须引导的民间投资 / 136
- ◎案例：28年前温州搞起浮动利率：中国首迈利率改革 / 147
- ◎案例：台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 / 159
- 货币需求量图解 / 165
- ◎案例：我国公开市场操作 / 171
- ◎案例：海尔集团的发展与资本运营 / 181
- ◎案例：二战后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 / 200
- ◎案例：欧洲青年失业的治理及成效 / 209

Chapter 10

第十章 资本边际效率

资本边际效率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贴现率，它使得资本资产在其寿命期间内所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值，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相等。对某种资产增加投资，都会使其资本边际效率随投资量的增加而递减。资本边际效率就是新增加一个单位资产的预期收益和其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



投资需求曲线决定投资诱导

一个人在购买投资品或资本资产时，他购买到的是一系列未来收益权。未来收益是在资产的寿命期间里，他预期出售产品的所得减去为得到这些产品而支出的经营费用。我们可以把 Q_1 、 Q_2 …… Q_n 这一系列的年收入称为投资的预期收益。

与投资的预期收益相对应的，是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并不是现实中在市场上购买该资产所付出的市场价格，而是指能诱导制造商再生产一件相同的资本资产的价格，也可以被称为重置成本。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它的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也是新增加一个单位资产的预期收益和生产该单位资本资产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它向我们表明了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更准确地说，资本边际效率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贴现率，它使得资本资产在其寿命期间内所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值，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相等。这是特定种类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这些不同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中的最大值可被认为是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现期供给价格都被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所涉及。如果一笔钱用于购买新资产的投资，那么资本边际效率就取决于这笔钱在货币上可得到的预期收益率。

任何时期中，对任何一种资

资本家获得新的投资，用于购置新的生产设备，则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该投资可得到的预期收益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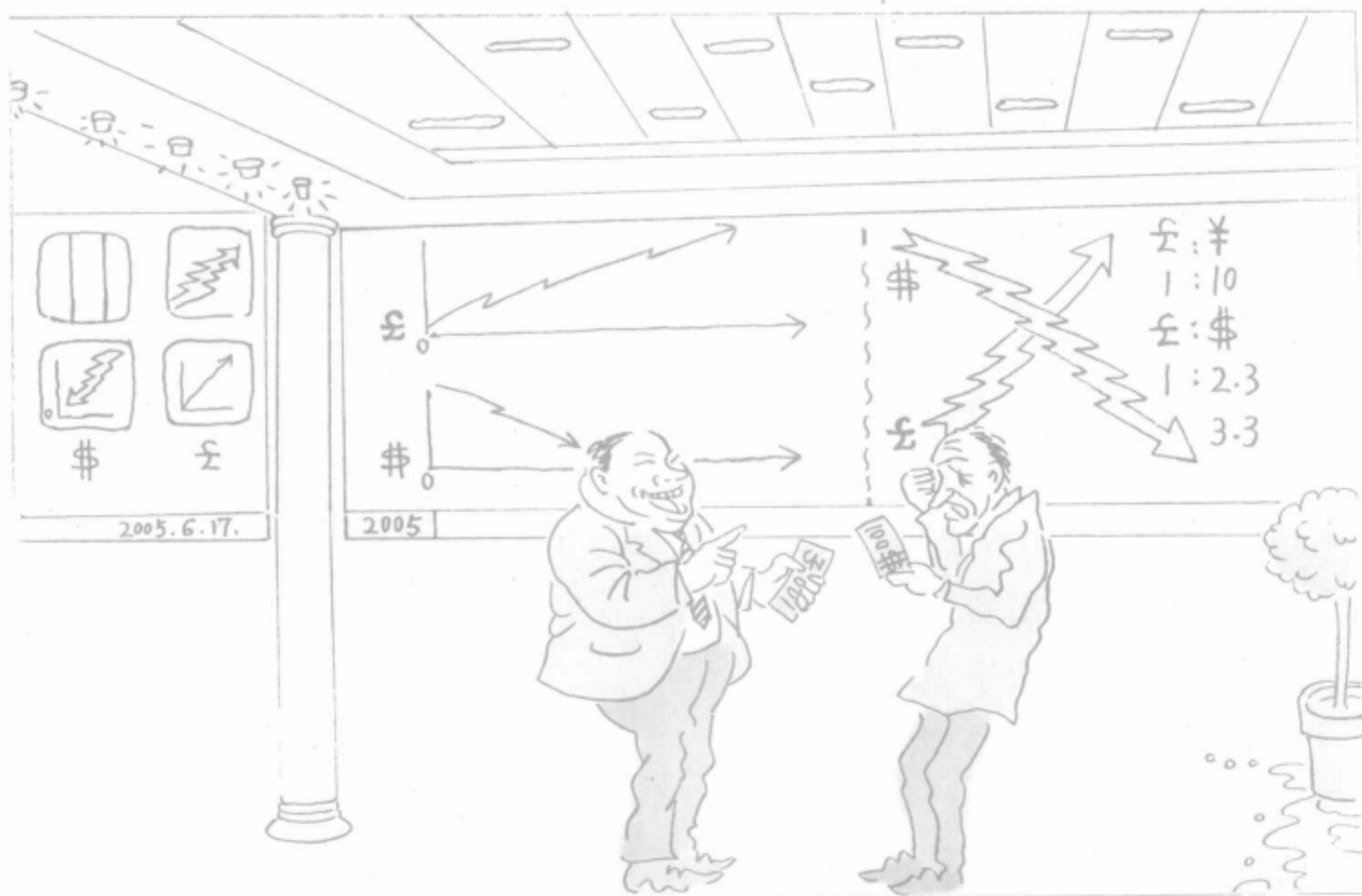


产增加投资，该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会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递减。它有两部分原因：第一，预期收益会随着该种资产的供给量的增加而下降；第二，通常情况下，制造某种资产的设备会由于该种资产产量的增加而承受压力增大，进而导致其供给价格上升。短期内，后一种因素对于均衡状态的形成有更重要的作用，但时间越长，第一种因素就变得越重要。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对每一种资产都建立一张表格或曲线，由此来说明：在一个时期内，需要增加多少投资量，才能使资本边际效率等于某一个给定数值。我们把所有不同种类资产的表格或曲线进行汇总以得到一张表格或曲线，用于说明：总投资量与其所导致的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为投资需求表（或曲线），也可以叫做资本边际效率表（或曲线）。

可见，投资量会增加到投资曲线上的这一点，此处，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与现行的市场利率相等。

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述：如果 Q_r 是一项资产在时间为 r 年时的预期收益， dr 是 r 年后 1 英镑按照现行的利率折算的现在值，则 $\sum Q_r dr$ 是投资的需求价格。投资将达到使 $\sum Q_r dr$ 等于投资的供给价格的那一点。另一方面，如果 $\sum Q_r dr$ 比供给价格低，

2009年1月英国央行下调基准利率0.5个百分点至1.5%。这是英国央行1694年成立以来的最低利率水平。



《利率理论》

《利率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的重要贡献，是坚实地奠定了利息理论，并澄清了一些流传甚广的谬误。如金钱的价格不是利息，而是购买力。解释了一系列的定义如收入、回报、回报率、利润和亏损等。费雪在文中说到：“风险与知识呈反向变化。”

那么，我们所讨论的这类资产就不会有现期投资。

综上所述，投资需求表（或曲线）部分地决定了投资诱导，同时，利率对它也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读者应该注意到：即使知道一项资产的预期收益，或者知道该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也不能使我们得到利率或该资产的现在值。我们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才能确定利率，然后，再通过对资产的预期收益的“资本化”，来衡量一件资产的价值。

对常用概念的辨析

上面定义的资本边际效率与我们通常使用的类似名词有什么联系呢？资本的边际生产效率、边际收益、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效用都是我们常用而熟悉的术语。但是，我们很难在经济学文献中找到有关经济学家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试图表达的确切意思。

我们在这里至少要辨别三个地方。首先是关于物质与价值的区别。我们所关注的究竟是单位时间内由于增加一个物质单位的资本而引起的物质产品的增量，还是由于增加一个价值单位的资本而引起的价值产品的增量？由于前面涉及到规定物质资本单位的困难，我想这是很难决定的。当然，可以认为，如果10个劳动者在既定量的土地上有更多的机器供他们使用，那他们产出的小麦也会更多。但我知道，如果价值单位不被引入，我们将很难把这句话的内容转换成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字比例。然而，论述者对此并没有明确地阐述，但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许多论述，它们关注的似乎仍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本的物质生产率。

其次是关于绝对数量和比例的区别。资本边际效率究竟是一个绝对数量，还是一个比例呢？从使用它的场合来看，资本边际效率好像应该是一个比例。然而，通常没有说明构成这个比例的两项数值究竟代表什么。

欧文·费雪

欧文·费雪（1867—1947）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之一，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在经济学中，费雪对一般均衡理论、数理经济学、物价指数编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都有重要贡献。其主要贡献是在货币理论方面阐明了利率如何决定和物价为何由货币数量来决定。



马歇尔运用边际效用理论说明了需求价格和需求规律，即“需求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

最后，必须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正是由于对它们的忽视，往往造成混乱和误解。一个是：在当前情况下，通过使用既定的资本增量而得到的价值增量；另一个是：在所增加的资本资产的整个寿命期间内，预期能得到的一系列价值增量，即 Q_1 与整个系列 $Q_1, Q_2, \dots, Q_r, \dots$ 之间的区别。这包含了预期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的所有问题。资本的现期收益总和与它的边际效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在生产边际上，资本现期收益（即产品的供给价格所包含的资本的报酬）是它的边际使用者成本，这与资本边际效率没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我上述的定义已经接近马歇尔使用该术语时的意义了。马歇尔本人使用的术语是资本的“边际净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效用”。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个观点似乎已经被他接受，即在资本边际效率既定的情况下，利率决定了新投资将要达到的数量。

欧文·费雪教授虽然没有使用“资本边际效率”这个词，但在《利息论》（1930年）中，他却使用了与我所论述的“资本边际效率”是完全相同的定义，即“超过成本的收益率”。他是这样定义的：“超过成本的收益率是这样一种利率，如果用它来



计算一切成本和一切收益的现在值，将使这两个现在值相等。”他进一步说明，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超过成本的收益率与利率的比较，即要引诱新投资，则超过成本的收益率必须大于利率。这个因素在论述投资机会时所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这使我们看到，费雪教授所使用的“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与我们所使用的“资本边际效率”，其意义和目的是完全一样的。

欧文·费雪曾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任董事职位；美国大萧条时期他撰写了其代表作《利息理论》。



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因素

我们经常混淆资本边际效率的含义和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它不只取决于资本的现期收益，还取决于资本的预期收益。应该指出，产品未来生产成本预期的改变，会对资本边际效率产生影响，不管它是由劳动成本（即工资单位）的变化造成的，还是由发明和新技术的产生造成的。由今天生产的机器设备在其寿命期限内生产的产品，将与以后生产的机器设备生产的产品相竞争；而以后生产的机器设备，或许是由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成本比较低，或是生产它们的技术有了提高，从而价格明显较低。同时，以后的产量也会有所提高，直到其产品价格下降到容许的较低程度为止。另外，如果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较低，那么，企业家不论是从旧设备还是从新设备上得到的利润（用货币来计量）都将下降。只要这个结果有可能出现，已经生产出来的资本品的边际效率，都会相应减少。

正是通过资本边际效率这个因素，预期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可以影响当期产量。若预期货币购买力下降，则投资会上升，因此一般也会增加就业，因为这个预期可以使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投资的需求曲线）上升；反之，若预期货币购买力上升，那么就会对当前的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波及就业。

费雪教授原来关于“增值与利息”的论述，其道理也在此。他分别论述了货币利



庇古教授认为物价水平下降造成金融资产实际价值的增加，从而产生消费刺激效应，此即“庇古效应”。

率与实际利率，说明了后者是前者币值矫正的结果。但是费雪教授没有讲清楚，到底币值的改变是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以外，因此我们无法理解。这个论述有个无法避免的两难，即如果不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则对当前行为毫无影响；如果在人们意料以外，则现有的物品价格将立即得到调整，因此持有货币与持有物品的效果又将等同。这样利率也没有必要变动，货币持有者也不会因贷款期间币值的改变而蒙受损失或得到好处。庇古教授曾经试图采取这种方式来躲避这个两难，但他也没有成功，即他假定币值的改变，是在一部分人的意料之中，但在另外一部分人的意料之外。

费雪教授和庇古教授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误认为未来币值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利率，而其实只是影响既定量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现有资产的价格，常常随着人们对未来币值预期的改变而立即调整。这种预期的改变，可以影响到资本的边际效率，进而影响新资产的产量。假定人们预期的物价水平将上涨，那么这种预期之所以会刺激新资产的产量，其原因不是提高利率，而是提高一特定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当利率上升的程度与资本的边际效率提高的程度相同，那么物价上涨的预期将对产量不发生刺激作用。因此，要达到刺激的作用，则利率上升的程度必须较小，而资本边际效率提高的程度必须较大。费雪教授的论述，可以利用实际利率的概念表达清楚，即实际利率是这样一种利率，在该利率下，产量不会因人们对未来币值的预期而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预期未来利率的降低，会使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下降。尽管这种预期的作用不是很强，但仍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今天制造的机器设备，在其寿命期末生产的产品，会与新机器设备生产的产品竞争。由于在今天制造的机器设备的寿命期之后利率仍会较低，所以新机器设备只要求较低的收益。

我们要重点理解：既定量的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改变。正是由于这

种关系的原因，才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产生相当剧烈的波动，可以用这种剧烈的波动来解释经济周期。

影响投资的两类风险

有必要区分两种影响投资数量的风险。第一类，即企业家或借款者的风险，企业家或借款者怀疑他们是否能得到自己所期望的未来收益，从而产生了这类风险。如果一个人是用自己的钱进行冒险，那么对于他来说，这就是唯一存在的风险。

放贷和借款体制出现以后，当借款者要用自己的动产或不动产作为借款的担保时，第二类风险就出现了，这可以称为放款者风险。造成放款者风险的因素包括：可能是由于借款者缺乏道德（赖账）造成的；也可能由于担保不足造成的；还有可能存在第三类风险，它是由于货币价值下降而使得货币贷款不如不动产安全造成的，即使在不动产的价格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一类风险是一种实际的社会成本，通过平均化或提高预期的准确性，可以降低这种成本。而第二类风险相对于投资成本来说是一个纯粹的增加额，



放贷者不考虑风险，将资金贷给借贷人，这是很多呆账坏账的根源。



信用的缺失将造成坏账飙升，建立完善个人信用体系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议程。

如果借款者和放款者是同一个人时，就不会有这个增加额。而且，这个增加额还重复计算了企业家的风险，使得在引致投资的最小预期收益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次纯利率。这是因为：如果一项投资的风险很大，那么借款者会要求预期收益比他认为值得付出的利率有一个较大的超出额；同时，处于同样的原因，放款者也要求在他索取的利率与纯粹利率，有较大的超出额，这样才能诱导他放款（除非借款者足够富有并具有实力，以便他能充分地保证贷款的安全）。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强调过，这一部分风险可能被重复计算。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很重要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经常会低估借款者的风险和放贷者的风险。

资本边际效率的重要性

通过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使得对将来预期的影响能够持续到现在，因此，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是很重要的（比利率重要）。认为资本边际效率主要用资本设备的现期收益来计量是错误的，这只有在静态中才是正确的，而在静态中未来对现在是没有影响的，这个错误认识导致今天与明天在理论上的联系被切断。利率是一个现期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资本边际效率也转变成现期现象，那么，我们在分析现期均衡时，就会阻碍将来对现在的直接影响。

事实上，今天的经济理论总是以静态假设为前提，使得经济理论中加入了大量非现实的成分。但我认为，将上文中已经定义的使用者成本和资本边际效率引入，并把它们需要修改之处限制在最低限度后，经济理论又能被运用于现实。

由于耐用性机器设备的存在，才使得经济上的未来和现在能够联系起来。所以，对未来的预期会先影响耐用性的机器设备的需求价格，再影响现在。这与我们思想的一般原则相容且一致。

【解析】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

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它的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也是新增加一个单位资产的预期收益和生产该单位资本资产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它向我们表明了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更准确地说，资本边际效率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贴现率，它使得资本资产在其寿命期间内所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值，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相等。任何时期中，对任何一种资产增加投资，该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会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递减。它有两

部分原因：第一，预期收益会随着该种资产的供给量的增加而下降；第二，通常情况下，制造某种资产的设备会由于该种资产产量的增加而承受压力增大，进而导致其供给价格上升。我们把所有不同种类资产的表格或曲线进行汇总以得到一张表格（或曲线），用于说明总投资量与其所导致的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可见，投资量会增加到投资曲线上的这一点，此处，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与现行的市场利率相等。

【案例】新加坡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与政府投资

案例适用：投资原则

新加坡不仅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政府也对经济生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这使新加坡有自身独特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政府投资在这一管理模式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政府拥有重要的经济资源

新加坡政府拥有大量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灵活地调节和管理。在新加坡，全国土地的75%归政府所有，其余25%的土地政府仍有权力随时征用，而且征用价格比市场价格低30%。政府又是人力的最大雇主，全国就业人口的20%是政府雇员。政府还是最大的资本占有者，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公共机构收入和中央公积金等渠道，控制了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特别是国内建设资金的主要部分

2. 政府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经济生活



新加坡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投入资金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获益良多。



淡马锡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航空、地铁、航运、电力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的企业。

新加坡政府的投资活动主要通过两个基本途径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一是投资于企业,二是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

(1) 投资于某些企业

其目的在于:第一,填补民间资本的投资空白,促使经济全面发展。在新加坡,政府的投资方向首先是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或者由于利润较少,民间资本不愿投资的部门,或者由于投资批量的起点高,民间资本无力投资的部门。政府通过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创造条件。第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对新兴产业的投资是新加坡政府的投资重点之一。政府通过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并为民间资本投资提供心理保证,对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动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和领导作用,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实现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第三,为了打破垄断、保护自由竞争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是投资于企业。外国资本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支柱作用,跨国公司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新加坡本地的私人企业很难与之竞争和抗衡,在某些经济领域有可能形成外国资本的垄断。为此,新加坡政府在某些有可能形成外国资本垄断的重要经济领域进行投资,发展国家资本,造就出能够与外国资本相匹敌的国营企业,以保护自由竞争,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维护国家主权。

新加坡政府向企业投资的方式,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直接投资是通过政府的控股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胜利控股公司和国家发展部控股公司)向企业投资取得企业的股份,间接投资是通过政府参与部分投资的新加坡开发银行或国际贸易公司取得企业的股份。目前政府投资参与的领域涉及制造业、金融、贸易旅游等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其中国家资本在金融业发展最为迅速。

(2) 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

其目的在于:第一,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国资本的投资。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就意识到,要尽快实现新加坡的工业化,本地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上都难以承担如此重任,必须吸引外国投资者前来开办企业,为此必须改善投资环境。于是,新加坡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特别是那些投资需要量大、投资回收期长、资金周转慢的基础设施,包括港口码头、机场等交通设施,水电、电仪设施,工业区所需的各种设施等等。新加坡政府还将大量资金投入于医疗卫生保健、教育和



建造公用住宅等方面,极力推动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些都使新加坡对外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第二,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进行,形成良性的相互推动,避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社会停滞不前的不良状况。

3. 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政策与法令规范和调控社会经济生活

首先,新加坡政府通过调整和替换经济发展战略,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自新加坡实行自治以来,已实行过诸如“发展劳动密集型替代进口工业的战略”、“发展出口工业为主的经济战略”、“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战略”、“发展高新技术和国际服务业的战略”等等,在政府有力的调控下,这些战略基本上都得以实现。其次,政府制定财政金融政策、外资政策、工资政策等调控经济活动,实现政府的意图。最后,新加坡的财政支出按照用途分为两部分,即经常性支出和发展支出,经常性支出主要用于国防、安全、文化教育、公务员薪金等国家活动的日常支出,发展支出主要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从1966年到1990年,新加坡发展支出从1.8亿新元增加到46.17亿新元,增长了25.65倍,同期经常性支出从4.4亿新元增加到95.19亿新元,增加了21.63倍。发展支出的更快增长,反映出新加坡政府极为重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

案例评析:

在新加坡,政府的经济政策调控几乎涉及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即使是对某些自由度较高的经济活动,政府的政策也以其特定的方式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作用。例如,新加坡实行自由价格制度,但决不可就此认为政府对价格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恰恰相反,新加坡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价格的形成,却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利率的调整和消费基金的支出等积极地影响价格总水平,使之保持稳定的状态。这使新加坡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中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而且跻身于世界范围内物价稳定国家的前列。

新加坡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通过政府投资对企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扶持,为新加坡经济的全面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动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和领导作用,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

代,实现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在防止外国资本垄断、发展国家资本、保护自由竞争、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新加坡政府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推动社会的进步,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进行,形成良性的相互推动,又避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社会停滞不前的不良状况。

可以说,新加坡政府投资不仅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说明的是,新加坡财政支出的政策重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体上说,在新加坡独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财政支出的重点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随着新加坡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财政支出的重点逐渐转向教育和科技事业。

(资料来源: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公共财政学精品课程教学案例:《案例十:新加坡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与政府投资》)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长期预期状态

长期预期可以影响到现期资本边际效率。信心状态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故通常根据现在的情形推测未来；投资市场的不可靠因素也影响到对投资的预期。

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及信任状态



价格、品质或售后服务，以及公众形象问题，是消费者对某商品购买是否积极的主要因素。

投资规模取决于利率和与不同规模的现期投资相对应的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同时，资本边际效率又取决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和它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本章将考察：一项资产预期收益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关于未来收益的预期，它部分地取决于现存的事实，我们可以假定这是确定的；它还部分地取决于未来的事实，这是根据信心的多少来进行预测的。在前一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列举出：现有各种资本资产的存量、现有资

本资产的总量、消费者现期对商品需求的强弱程度，以及有效率地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相对较多的资本。在后一个中，可以列举出：资本资产的种类和数量的未来变化、消费者偏好在未来的改变、在投资品寿命期间内有效需求的大小，以及在此期间可能出现的工资单位（以货币来计量）的改变。为了与短期预期相区别，我们可以把涵盖后者的心理预期称为长期预期状态；而根据短期预期，企业家会做出估计：假如他在今天用现有的设备进行生产，在产品生产出来后，他将得到多少收益。

当我们在作预期时，经常把一些非常不确定的成分看得非常重要，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假定存在这样的两类事实：一是对于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却知道得很少，很不清楚；二是对于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的关系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但我们却对此很了解，很有把握。因此，我们不能把根据第二类事实所做的预



期完全否定掉。由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现有事实对长期预期影响的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一般而言，我们常常是根据现在的事实来预测未来的发展，除非有相当肯定的理由预测未来的发展会改变，否则我们总假定未来情况和现在相似。

长期预期状态是我们决策的基础，它不仅取决于我们最有可能的预测，取决于我们做预测时的信心，还取决于最好的预测转变为错误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我们预期到会发生大的变化，但还不能十分确定变化的形式，那我们也就没有足够的信心。

这种所谓的信心状态，是务实的人们一直密切关注和担心的。但是，经济学家们对其通常只是泛泛而谈，没有仔细分析过。特别是没有阐明：信心状态能与经济问题发生关系，是因为它对资本的边际效率有重大的影响。有两种并非截然分开的因素影响投资量，即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和信心状态。其中信心状态很重要，因为它对前者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与投资需求曲线又是同一事物。

对于理论上的信心状态，没有说明的必要。我们的结论必须主要地建立在对市场和经营心理实际观察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以下论述为什么脱离本书大部分内容，而处于不同的抽象层面的原因。

在讨论有关信心状态的问题时，为方便起见，假定利率保持不变，把投资数量的变化看作是由于未来收益的预期发生变化所引起的，而不是由于未来收益资本化的利率发生了变化而引起的。当然，把利率变化的影响叠加到信心状态变化的影响上去并不难。

资本投资

事实很明显地表明：我们赖以对未来收益做出估计的知识是非常不可靠的。关于一项投资在几年后的收益，我们对其决定因素了解得很少。例如，我们无法根据现在的知识估计十年以后，一条铁路、一座铜矿、一个纺织厂、一所伦敦市中心建筑等等的收益是什么，即使将其年限缩短为五年，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试图认真对长期投资的收益进行评估的人通常为数甚少，以致他们的行为不足以左右市场。

以前，当企业的所有者主要是创业者或者他们的朋友和合伙人时，投资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具有乐观性格和事业心的个人，他们经营企业不是真正依赖于对未来利润的精确计算，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的方式。尽管经营的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经营者的能力和品质，但运气的好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营者们参与的是技巧与运气相混合的游戏。然而，即使在事后，也没有人知道成功投资的平均收益



对于长期预期投入及其收益的评估，如建筑物、铁路等，很少能够左右市场行为。



证券交易所每天对投资项目的重新估价，对现期投资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是否超过当期利率。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考虑开发自然资源和垄断，即使是在经济的上升和繁荣时期，那些创业者也可能对投资的实际平均收益失望。如果人类不被投机所引诱，同时从建造工厂、铁路、矿井和农庄中也得不到乐趣（获取利润除外），那么，冷静的计算是不可能产生更多投资的。

不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个人，在旧式的私人企业中，投资决策在执行后是不能被收回的。但在今天，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和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发展，有时方便了投资，而有时又使经济体制的不稳定性因此而增大。在没有证券市场时，试图经常对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投资再次估价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证券交易所每天都要对很多投资项目进行重新估价，而个人又因此得到了变更投资的机会。证券交易所每天进行的重新估价，虽然是为了方便旧的投资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转移，但它对现期投资量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如果建造一家新企业的成本大于购买一家现存企业所需的费用，那么，建造新企业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一个数量巨大的新投资项目，它的股票能在证券交易所转让出去，并且能够立即获利，那么，这项新投资就具有吸引力。这样，某些种类的投资不是取决于企业家的真正的预期，而是像股票



价格所显示的那样，取决于那些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人们的平均预期。那么，这些很重要的，每天甚至每小时对现期投资所进行的重新估价在实际中是怎样做的呢？

在现实中，一般都会认为人们做事都以一条成规为依据。这条成规的实质是：人们总是假设现存的事物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除非有明确的理由表明事情会发生变化。这并不代表我们真的相信现期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不常有的。一项投资在经历很长时期后，最初的预期与实际结果保持一致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即使我们不能合理地解释我们的行为，也不能认为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一个人对前景预期的各种可能性都是相等的，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一个统计学上的平均预期值。因为，这个数值不是唯一正确的，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事实不能为计算出正确的数学期望值提供充分的依据。事实上，许多决定市场价格的因素，与本来收益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只要我们相信这条成规可以继续被维持，那它对于我们的事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的。

因为，如果我们相信这条成规能被维持下去，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存在的条件下，投资者就有理由使自己相信存在的唯一风险是：与将来有关的信息和形势会发生真实的改变，而他对于改变的可能性又有自己的判断，并且，这种改变也不会很大。如果大家都遵守这条成规，那么也就只有这种改变才会影响到投资的价值，因此投资者不用担心投资十年后的价值是多少。对于单个投资者来说，在短时期内，投资就是“安全”的。因此，不管经历了多少个短时期，只要能够确定这条成规不会被打破，并且在事态恶化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改决策和更改投资，那么相对来说投资仍然是“安全”的。因此，对社会来说投资是“固定”的，而对个人来说则是“流动”的。

正是根据类似的思想基础，我们的几个最大的投资市场得到了发展。从绝对的观点来看，成规是很随意的，因此它不免会有弱点存在。而它的不可靠性，又阻碍了我们当前得到足够多的投资。

投资市场的不可靠性因素

以下几个因素增强了这种不可靠性：

外行人掌控资本

一部分社会的总资本投资被那些既不从事管理，又不了解经营环境的人所掌握。

华尔街

华尔街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一条大街道的名字，全长不过三分之一英里，宽仅11米，是英文“墙街”的音译。街道狭窄而短，从百老汇到东河仅有7个街段。1792年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侵犯而建筑一堵土墙，从东河一直筑到哈德逊河，后沿墙形成了一条街，因而得名。华尔街以“美国的金融中心”而闻名于世，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在这里。

伦敦交易所

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伦敦有证券交易所、国际石油交易所、金属交易所、伦敦交易所另类投资市场等金融投资场所。伦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4大股票交易所之一。此外，伦敦还有众多的商品交易所，从事有色金属、羊毛、橡胶、咖啡、可可、棉花、油料、木材、食糖、茶叶和古玩等贵重或大宗的世界性商品买卖。

一个商业项目的启动，需要投资方和融资方的相互了解，对于合作方缺少了解，增加了投资的不可靠性因素。



由于这部分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例逐渐上升，使得拥有投资和计划进行投资的人在估算投资价值时，所需的基本知识严重不足。

利润的日常波动

现有投资利润的日常波动，显然具有短暂而无意义的特点，它容易对市场产生过大甚至荒唐的影响。

成规及突如其来的看法

成规是一无所知的个人所形成的群众心理的产物，由群众心理决定的市场价值容易受突如其来的看法的波动的影响而产生突然的改变，但这些看法可以来源于与未来收益没有多大关系的因素。特别是在非常时期，大家都不相信目前的状况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即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预期未来的发展将有变动，然而市场也会一时受到这种悲观情绪的支配。这种情形，虽然是不理性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却是合理的。



“击鼓传花式”的投资心理

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市场专家们的知识和判断能力超过普通投资者，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缺乏知识的个人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但实际情况是，专业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大部分精力和技能却被用在了其他方面。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主要关心的，是能比普通公众早一点预测到基于成规的股价是如何变动的，而不是对投资项目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可能收益作很好的长期预测。而且，这种行为并不是错误和固执思想的产物，它是按上述方式组织起来的投资市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因此，在被经验证明最能影响市场群众心理的新闻和社会氛围中，专业投资者被迫致力于预期即将产生的变化。这是按照所谓“流动性”观念组织起来的投资市场避免不了的结果。确实，在传统的理财准则中，崇尚流动性是对社会最不利的观念。崇尚流动性的原则认为，投资机构把他们的资源集中起来持有具有“流动性”的股票是一件有正面意义的事。但它却忘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没有所谓的投资的流动性的。

在专业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一项智力斗争，它只预测几个月后由成规决定的股价的基础，而不预测一项投资在若干年后的收益。因为，这种智力斗争就像是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游戏中，谁能在鼓声停止前把传递物传递给与他相邻的人，谁就是获胜者。尽管参加的人都知道，这个人们都不要的东西在循环传递之中，在鼓声停止的时候，总会有人得到（成为游戏的失败者），但类似于这样的游戏还是充满乐趣的。

读者或许会说，一个不受这种流行消遣游戏影响的高明的投资者，一直根据他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长期预期来购买投资品，他必定会从其他参与者那里长期得到很高的利润。但是，我们的回答是：首先，确定存在这种严肃认真的人，并且，他们的影响能否超过那些做游戏的人，这对投资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现代投资市场上有多种因素降低了这种人的影响。现在，依据真正的长期预期来投资，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根本无法实现。试图这样做的人，必定会付出更多的精力、冒更大的风险。而经验中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对社会有利的投资策略是获利最大的。其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类的本性希望能迅速得到答案。人们在快速赚钱方面有着特别的兴趣，一般人对于较长期限后的收益会打很大的折扣；再次，一个倾向于忽视短期市场波动的投资者，为了安全从而需要有较多的资金，但借来的钱是不可能从事这种大规模经营的；最后，长期投资者是最能促进公共利益的人，但在投资基金由委员会、董事



长期投资者对投资持谨慎态度，最能促进公共利益，但却是受到批评最多的。

灾难性的反作用，而投机信心和信用状态中的任意一个减弱又都会造成股票价格的崩溃。虽然两者中任何一个减弱都会使经济崩溃，但是经济的复苏却又不需要两者同时上升。信用的减弱会造成经济的崩溃，而它的强化却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投资市场

经济学家们不应该忽视这些考虑，但应该用正确的方法来看待它们。如果我用“投机”来表示预测市场心理的活动，用“干事业”来表示预测资产在它全部寿命期间的未来收益，那么，事实上投资并不常常支配我们干事业。然而，随着投资市场组织的改善，投资的风险确实被增大了。在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之一的纽约市场，上述意义的投机影响巨大。当投机者像是企业稳定发展潮流中浮着的泡沫时，或许不会带来什么损害。但是，如果企业变成了投机漩涡中的泡沫时，形势就变得很严峻了。在一个国家里，当资本的发展变成赌博场的副产品时，资本发展是很难做好的。作为一个机构，华尔街正确的社会目标是依据未来收益把新投资引入最有利的途径，但它因此而取得成功的方法不能被当作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最杰出的代表，这并不让人感到意

会或者银行管理的任何地方，他们却是受批评最多的人。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古怪的、非传统的、莽撞的。社会中的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在名誉方面，恪守成规的失败要比不守成规的成功要好得多。

信用状态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投机者或投机性投资者自身的信心状态。我们必须还要考虑信心状态的其他方面，即放款机构对向它们借款的人的信心，有时也称其为信用状态。股票价格的崩溃对资本边际效率具有



外；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华尔街最聪明的人事实上已经被导向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与社会功能是不同的。

这些偏离社会功能的倾向，是我们已成功组织起来的“流动性”投资市场几乎难以避免的产物。人们通常认可：为了公共利益，赌场应该是难以进入的，而进入的代价也应该是高昂的。对证券交易所来说，或许也同样如此。正是由于伦敦交易所高昂的费用，使得伦敦交易所的祸害比华尔街少。要进入伦敦交易所进行交易，需要



伦敦交易所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其流动性大为减少，很多证券交易都在华尔街进行。

缴纳介绍费、高额的经纪费以及向英国财政部缴纳转手税，且税额繁重。因此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伦敦交易所的流动性大为减少，使得很多交易都在华尔街市场上完成。但在另一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在每星期二结账一次的做法，又增加了该市场的流动性。因此，政府对一切交易征收的高额的转手税，或许是美国减少企业经营被投机所压倒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由于现代投资市场的奇怪现象，我有时会倾向于这样的主张：把购买证券投资变成像婚姻一样的永久性事物。这或许是矫正现代弊端的有效方法，因为，这样的话，投资者就不得不专注于长期期望。但稍加考虑就会发现，这个方法又会使我们面临两难的处境。正如所显示的那样，尽管投资市场的流动性有时不利于新投资的产生，但它也常常为新投资提供方便。因为，每个个体投资者都自认为他的投资具有“流动性”，而这样可以平息他的紧张情绪，并使他更愿意承担风险。如果个人投资者所进行的投资没有流动性，他只要有其他保持储蓄的方式，他就不会进行投资，这样就会严重阻碍新投资的产生。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处于两难的处境。

信心危机严重影响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而治疗它的唯一激进方法是：使个人在把他的收入消费掉和购买具体资本资产的产品之间没有选择的权利，尽管购置这些资本

资产的产品并不能被当作是他最有利的投资方式。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当他对未来产生严重疑虑时，在这种疑虑状态中他可能增加消费并减少投资。即使这样，也可以避免因他处于疑虑状态而产生灾难性的、积累性的、深远的反应：他的收入既不进行消费，也不进行投资。

那些强调储藏货币对社会不利的人们，他们的某些想法和上面说的相似。但是，他们忽视了在储藏货币数量不变或者数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也有可能出现。

影响经济稳定的因素

“幸福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欲望”，有钱人的享乐主义或许加大了经济的不稳定。



经济的不稳定，除了是有投机造成的，还有可能是由人类本性特征造成的。因为我们很大一部分积极行为不是来自数学预期，而是来源于人自身产生的乐观情绪，不论这种乐观情绪是否源自于道德、享乐主义或者经济上的原因。我们所做的大部分积极活动的决策，可能只是源于迫切地要行动、而非静止的这种动物精神，而不是由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而得的加权平均数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动物精神衰退，自发的乐观情绪减弱，我们除了数学计算之外无法依赖时，企业最终会走向衰亡——尽管担心损失的

根据并不比以前希望得到利润的根据更合理。

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企业是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但只有当合理的计算得到动物精神的补充和支持时，个人的主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把那种削减创业者意志，且被认为终将要失败的想法抛在一边，就像健康的人不去考虑死亡一样。

然而不幸的是，这不仅会加深经济萧条的程度，更使得经济的繁荣与社会政治风



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当社会政治风气与一般工商界相处融洽时，经济才会繁荣发展。因此，如果害怕工党或政府实施新的政策，这将给企业带来消极影响。而这些影响并不是因为企业没有精确计算，也不是因为某种政策阴谋，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发的乐观情绪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打消。所以，我们在预测投资的前景时，必须考虑到一些人的勇气、兴奋状态甚至消化状况以及对天气的反应，而这些人又是自发行动所主要依赖的。

我们不应该根据这些，得出所有的事情都依赖于非理性心理波动的结论。相反，长期预期状态一般是稳定的，即使在它不稳定的时候，也会有其他因素来发挥补偿作用。我们只是在告诫自己，人们所作的影响未来的决策，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政治或经济的，都不能只依赖于精确的数学期望值，因为进行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不存在的。

此外，在现实中还有某些重要的因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对未来缺乏知识所造成的影响。由于计算复利的影响和时间的流逝可能产生的老化，一些个人投资项目主要考虑是否能在较短期内用预期收益收回成本，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建筑业是长期投资中最重要的一类，拿它来说，投资者往往把风险转移给住房者或和他们共同分担。公用事业也是长期投资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其未来收益的很大部分，实际上是由垄断特权和保证一定利润的定价权来保障的。还有一个投资类别，它越来越重要且由政府来进行或承担风险。对于这类投资，政府考虑的只是社会的未来收益，并不考虑其商业效益的波动有多大，也不刻意要求投资收益的数学期望值至少要与现期利率相等——即使政府需要支付的利率，在决定其财力所及的投资规模问题上，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

关于长期预期状态在短期内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在充分考虑其重要性后，依然可以认为：利率并不是影响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但它至少是在正常情况下影响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经验才能说明：究竟要对利率进行何等程度的管理，才能持续地刺激投资，并使其达到适当的数量水平。

我本人现在有些怀疑，仅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利率，其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一般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来计算长期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同时承担起更多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根据上述原则计算出来的，不同种类资本边际效率的市场估计值波动过大，致使任何可行的利率变化都难以抵消这种波动。

【解析】长期预期与短期投资

长期预期可以影响到现期资本边际效率，它不仅受现有事实的影响，更容易受到对未来的信心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对未来收益的长期预期的基础知识是非常欠缺的。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哪些因素决定一项投资的未来收益。因此，以前的投资往往都根据个人对未来的信心，拥有一种乐观、热心的态度。这也包括在证券市场上的投机行为。然而，信心状态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一旦信心被击碎，其造成的经济影响也不可低估。故而通常情况下，我们往往根据现在的情形推测未来，除非我们有可信的理由使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改变，否则我们总是假定未来的情形和现在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这条成规能被维持下去，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存在的情况下，投资者就有理由使自己相信存在的唯一风险是：与将来有关的信息和形势会发生真实的改变，而他对于改变的可能性又有自己的判断，并且，这种改变也不会很大。对于单个投资者来说，在短时期内，投资就是“安全”的。因此，不管经历了多少个短时期，只要能够确定这条成规不会被打破，并且在事态恶化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改决策和更改投资。

【案例】亟须引导的民间投资

民富则国强，民间资本是推动中国走向强盛的生力军，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民间资本力量已经相当壮大。



案例适用：投资预期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注定了流动性泛滥的模式在2009年下半年将难以复制。在此背景下，有关部门不得不思索如何发挥杠杆作用，以带动更多后续的民间资本刺激经济。启动民间资本的话题被再次提到桌面上。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2009年6月11日提出了一份旨在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20条意见”，旨在加大刺激力度，以激活目前投资不畅的民间资本。“目前发改委等一些相关部门还在各地调研，可能会出台激活民间投资的一些措施。但是能不能将民间资本启



动起来，进入到一些垄断行业，这还需要另谈。我认为，困难很大。”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按照一般理解，学者们普遍将民间资本定义为“非政府拥有的资本”，即民营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中国民间资本的盘子有多大，目前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官方数字。但有观点指出，就当下民间资本几十万亿的存量而言，释放其中的1/10，其绝对量也堪比一次巨额的国债发行。

事实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资本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相当雄厚。但是与其巨大的投资力量不相称的是，由于种种准入门槛的限制，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甚为狭窄。“现阶段，中国的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一般性领域，其中以制造业为主，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投资甚少。”保育钧告诉记者。

“以温州为例，因企业主大都不具备资本经营的资格和能力，但资金充足，另外国家相应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民企均采取相对保值的投资策略。目前有近80%的温州中小企业以房产、股票、黄金为主要投资项目，他们投资仅是为了货币保值防通胀而已。”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水良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其中投向房地产和股市为大部分企业的选择。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谈道，在温州老百姓手里的民间流动资本大致有6000亿元，温州估计投资在房地产上的资本达到了2000多亿元，光在上海跟北京两个城市，就几乎达到1000亿元民间资本的规模。此外，广东东莞市樟木头湖南商会会长邹云霞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在广东、深圳等地也不例外。综合近年来的情况看，民间资本均以炒房、炒股、炒煤、炒矿等居多。很多时候，由于投资不利，亏本的不在少数。”

当下，经济提振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而规模可观的民营资本却没能被合理利用。从资本本质看，民间资本也是逐利的。来自官方的意志，则是力求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引导整个宏观经济健康发展。那么，如何使双方的利益趋于一致是关键。用保育钧的话说，“把民间资本用在该用的地方，发挥作用。但要启动民间资本就必须强力打破垄断，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国有企业不能把所有的有利资源都给占据了。否则，民间资本只能面临‘玻璃门’的困境。”

保育钧告诉记者：“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就要求放宽市场准入，4年过去了，但贯彻落到实处的并不多。”当年下发的“36条”就已经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



“春江水暖鸭先知”，处于市场前沿的民营企业深谙市场行情，显得更有活力。

入垄断行业和领域，以及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等。

“非公36条”的出台，标志着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在法律上没有了障碍，在宏观政策层面上也没有了瓶颈。但事实上，民资在进入垄断领域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并没有因此减少。“一些垄断行业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号下，以种种手法把民间资本排斥在外了。”保育钧对记者说，国有企业把有利的东西都拿走了，民间资本怎么进入？“垄断只能产生腐败和低效率，要真正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必须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

资本参与竞争，通过竞争激发活力，提高经济能力。”

民营资本的尴尬的确在于此。即便在宏观政策准许进入的情况下，它也难逃被继续排斥在一些垄断行业之外的命运。

值得庆幸的是，有关知情人士透露，相比“非公36条”，此次调研的目的是要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而近期一些迹象似乎也显示了民间投资回暖之势。天相投顾6月1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1-5月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40.6%，增速较上月提高1.3个百分点，而非国有投资同比增长27.7%，增速较上月提高3.2个百分点，国有投资和非国有投资增速的剪刀差缩小至12.9个百分点，显示民间投资在政府投资带动下，正在迅速增加。

案例评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资本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相当雄厚。但是与其巨大的投资力量不相称的是，由于种种准入门槛的限制，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甚为狭窄。现阶段，中国的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一般性领域，其中以制造业为主，基础设施和基

础产业领域投资甚少。其中，投资环境和投资预期是使得民间资本投资不足的两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完全打破国有企业对投资市场的控制，让民间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力求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引导整个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资料来源：晏琴：《亟须引导的民间投资》，中国产经新闻 2009-7-8)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利率的一般理论



利率不同于资本边际效率。利率是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利率取决于储蓄的供求相等之点。储蓄又受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投资动机的影响。利率与货币需求量是相互影响的。

利率与流动性偏好

尽管有多种因素驱使投资量增加或减少,进而使得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但资本边际效率本身与现期利率不是同一件事物。可以说,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所涉及的是,想要进行新投资而借入资金的人所愿意支付的代价;而利率所涉及的是,现期供给资金的代价。所以,为完善我们的理论,我们有必要知道究竟什么决定了利率。

到现在为止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大都认为,利率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与心理储蓄倾向的相互作用。这是把利率当作一个平衡因素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利率使得在不同利率下新投资量对储蓄的需求,与不同利率下由社会心理状态所决定的对储蓄的供给相等。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仅根据这两个因素是不能推导出利率的,而这种观点也将被推翻。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呢?

需要通过两种不同的决策,才能完全地揭示出一个人心理上对时间的偏好。第一种涉及到我们所谓的消费倾向的时间偏好方面,消费倾向在种种动机的影响下,决定了一个人把他收入中的多大部分用于消费,多大部分被以某种支配权形式保存下来,为将来的消费做准备。

做了这个决策以后,他还要进一步做另一个决策:以哪种支配权形式,来保存他从当期收入中或从他过去的储蓄中保留下来用于未来消费的部分。他是否打算用随时具有流动性的支配权形式来保存?还

我国的信用卡消费已经进入了普及期,银行卡促进消费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是打算以这种暂时放弃即使支配权,以债权或股票等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转换的形式来保存?也就是说,他的流动性偏好是指:对于给定数量的资源(用货币或工资单位计量),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愿意把其中的多大部分用货币的形式保存起来。

我们将发现,已经被接受的利率理论,其错误的原因是:对于构成心理上的时间偏好的两部分,它们仅仅试图根据第一部分来推导出利率,却忽视了第二部分,正是这个被忽视了的第二部分,我们要努力对其进行补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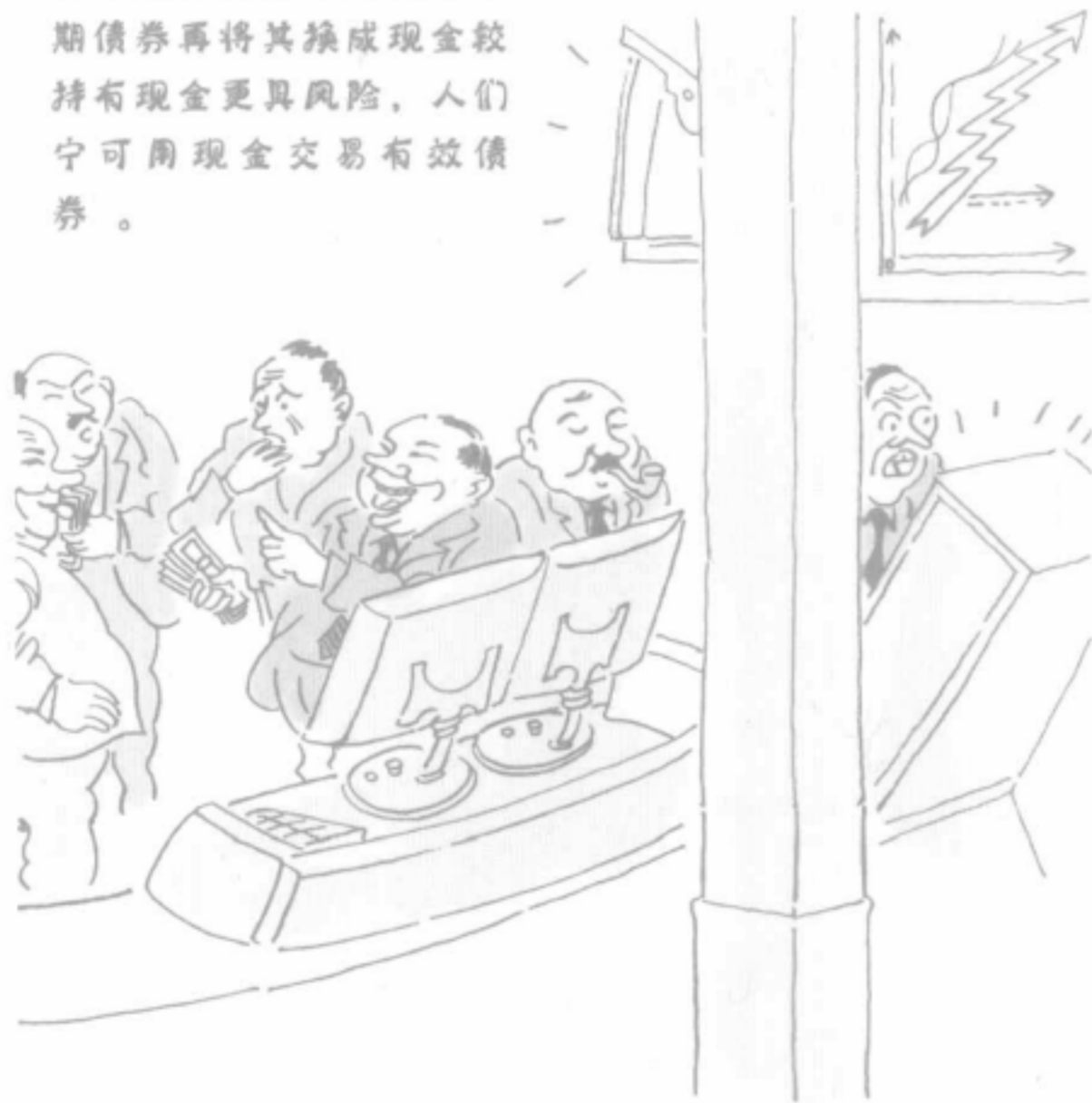
很明显,利率不可能是储蓄或等待将来的消费的报酬,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相反,通过利率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利率是在一段特定时期中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为,利率只是一个比例,它的分母为一特定货币量,分子为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所放弃对这笔钱的支配权而换取债权得到的报酬。

由于利率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这就意味着,如果利率的数值较低,即如果因放弃现金而得到的报酬有所下降,那么公众想要持有的现金量将超过现有的现金供给量;如果利率上升,将会出现没有人愿意持有过多的现金。假如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则在一定条件下,货币数量将与流动性偏好共同决定实际利率。流动性偏好是一种潜力或者函数关系的倾向,在利率为给定数值的情况下,它决定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所以,如果我们用 r 表示利率,用 M 表示货币数量,用 L 表示流动性偏好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M=L(r)$ 的函数关系。它可表示,一定数量的货币是以怎样的方式在什么地方进入经济体系的。

流动性偏好为什么能存在?因为被用于现行业务交易的货币和被用于财富储藏手段的货币是有区别的。就前者而论,在一定的限度内,为得到流动性而损失一定数量的利息是值得的。但是,考虑到利率从来都不是负值,那么,为什么人们不采用能赚取利息的方式,而宁肯用收益很少和没有利息的方式来持

利率的不确定导致购买长期债券再将其换成现金较持有现金更具风险,人们宁可用现金交易有效债券。



债券

债券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机构直接向社会借债筹措资金时，向投资者发行，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债券的本质是债权的证明书，具有法律效力。债券购买者与发行者之间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债券发行人即债务人，投资者（或债券持有人）即债权人。

有其财富呢？要想充分解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将在第十四章中对其进行说明。但是，此处应指出一个必要条件。假如没有这个必要条件，作为财富储藏手段的货币对流动性偏好就难以存在。

这个必要条件是：对于未来的利率存在着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人们无法确定未来的各种利率将会怎样变化（利率会因放款期限长短而不同）。如果能确定地预期到未来所有时间的利率，则一切未来的利率就能根据现在不同期限的债券利率推算出来。这又是因为，现在不同期限的债券利率，又会根据有关未来利率的信息而相应地做出调整。

相反，假如未来的利率是不确定的，那么与持有现金相比，购买长期债券后再把它转换成现金，就会存在风险，从而给它带来损失。根据现行概率计算出来的利润或数学期望值，必须能够补偿失败的风险。

而且，如果存在有组织的债券交易市场，对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还为流动性偏好的存在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因为不同的人对前景的估计是不一样的，一个与市场价格所表示的主流观点不同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持有流动性资源的理由，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他将可以从中获利。

这与此前我们详细讨论过的与资本边际效率有关的内容很相似。在以前的论述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群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价值，而不是取决于“最好”的看法。与此相似，对未来利率的估计（由群众心理所决定的）也会影响流动性偏好——但此处需补充的是：那些相信未来利率会高于由市场所确定的现期利率的人们，有理由持有具有流动性的现金，同时，那些观点与此相反的人们，将会产生借入短期款项来购买长期债券的动机。市场价格将决定于“空头”卖出量与“多头”买进量相等的那一点。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三类流动性偏好取决于：(1) 交易动机，即个人或经营商由于现行交易而产生的对现金的需要；(2) 谨慎动机，即出于安全考虑，把全部资源的一部分用现金的形式加以保存；(3) 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比市场上一般人更了解将来会发生什么，并企图从中获利。正如我们在资本边际效率中所论述的那样，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债券交易市场使我们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如果缺少有组织的市场，因谨慎动机而产生的流动性偏好将大大提高；同时，如果存在有组织的市场，又会为投机动机而产生的流动性偏好的大幅波动创造条件。

如果假设由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而产生的流动性偏好，它们所吸收的现金数量对利率变化（不考虑利率变化对收入水平的反作用）的反应不太敏感，从而，货币总量在减去以上被吸收的货币数量后所剩的余额，可满足由投机动机所产生的流动性偏好的需要，则利率和债券的价格将会被决定于这样的水平：此时，某些人愿意持有的现金（因为在这一水平，他们对于债券未来的价格有“空头”的预期）与可用于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数量正好相等。这样，每一次增加货币数量都必然会导致债券的价格上升到很高，以致超过某些“多头”的预期值，促使其卖出债券换取现金来加入“空头”行列。但除了短暂的时期之外，如果投机动机产生的货币需求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货币数量的增加将会立即使利率下降到这样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就业量和工资单位能够得到充分提高，使得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能够把增加的货币数量完全吸收。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在一般情况下，流动性偏好曲线表现的是货币数量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它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它表示的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利率将会下降。这是因为：首先，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随着利率的下降，由交易动机所产生的流动性偏好有可能吸收更多的货币。因为，如果利率的下降能够使国民收入得到增加，那么为方便交易而持有的货币量，将按照大致相同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因持有充足现金的便利而付出的代价（用利息的损失来表示）也将下降。其次，如上所述，由于某些人对未来利率的看法不同于市场上的一般看法，每一次降低利率都会使他们所愿意持有的现金数量增加。

尽管这样，还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使货币数量增加了很多，但它对利率也只能产生相对较小的影响。这是因为：大量增加的货币数量，有可能会增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安全动机所产生的流动性偏好也有所增强；同时，对未来利率的预测有

贮藏货币

货币具有贮藏的职能。贮藏货币是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被保存起来。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能够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减少时，多余的货币就退出流通；当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增加时，部分被贮存的货币就进入流通。充当贮藏货币的必须是足值的金银（铸币或条块）。

可能达到高度的一致，从而哪怕是现期利率出现细微的变化，都可能使大量的群众把股票或债券转换成现金。有趣的是：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对货币数量变动的敏感性，竟会对不能确定的事物的各种不同的看法依赖到如此程度。

货币投资与贮藏

我们现已首次把货币引入我们的因果关系中，并初步对货币数量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体系进行了探索。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草率地认为：货币就像是使经济体系兴奋起来的酒。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提醒自己，仍有几个容易脱手之处存在于酒杯与嘴唇之间。因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即使货币数量的增加有可能会产生使利率降低的预期，但如果公众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加比货币数量的增加还要大，那么利率就不会因为货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其次，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即使利率的降低可以产生使投资量增加的预期，但如果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下降比利率的下降更快，则利率的下降将不会使投资量增加。再次，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即使投资量的增加可以产生就业量增加的预期，但如果消费倾向降低，那么，投资量的增加也不会使就业量增加。最后，如果就业量有所增加，那价格也将随之上升，而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是否容易上升也部分地制约着价格上升的程度。在产量增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流动性偏好所受的影响是：需要增加货币的数量才能维持一定的利率。

尽管投机动机所产生的流动性偏好，与我在《货币论》中所谓的“空头状态”相当，但这两者决不是同一事物。因为，“空头状态”在该书中被定义为一种关于资产价格和债券价格一起与货币数量相联系的函数关系，而不是利率（或者债券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货币的贮藏手段一般在银行金库可以得到体现，大量的货币贮藏，金库的安保可见一斑。

贮藏货币可以被认为是与流动性偏好最接近的一个概念。诚然，如果我们用“贮藏货币的倾向”代替“贮藏货币”，那么二者几乎就是相同的事物。但是，当我们把“贮藏货币”看作是现金持有量的实际增加时，那么，它的意义不仅不够完整，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误解，其原因是，它会使我们把“贮藏货币”和“不贮藏货币”看成是简单的两者必选其一的事物。因为，贮藏货币的决策是用来权

衡两种利益的结果，而不是绝对地或在根本没有考虑流动性会带来什么好处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它另外一面的情况。而且，如果贮藏货币被看作是实际持有的现金量，则实际贮藏货币数量的改变就不可能是群众决策的结果。群众的贮藏倾向能做的不过只是决定利率的水平；在此利率水平下，公众愿意贮藏的货币总量与现存的现金总量相等。这种贮藏货币与利率之间关系的习惯，部分地说明了：利率实际上是不贮藏货币的报酬，但为什么通常它却被当作是不花钱的报酬。

❁ 【解析】影响利率的因素

尽管我们知道有很多因素使得投资量的增加或减少，从而保持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的状态，但二者并不相同。因为资本边际效率代表的是借款者愿意付出的代价，而利率是贷款者所要求的代价。利率指的是在一段特定时期内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一般认为，利率取决于储蓄的供求相等的那一点。而储蓄又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第一种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消费倾向，因为它可以决定我们将收入的多少用于消费和储蓄，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种就是我们的流动性偏好，即我们愿意从现在持有的不论是当前收入中还是过去储蓄中保留下来一部分货币，用于对未来消费的支配权。而流动性偏好又由以下三种动机而决定：一是交易动机，即保留部分现

金用于个人或业务上的需要；二是谨慎动机，即出于安全考虑，把全部资源的一部分用现金的形式加以保存；三是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比市场上一般人更了解将来会发生什么，并企图从中获利。这三种动机都可以影响储蓄，进而影响利率的大小。同时，当利率下降时，货币的需求量将增大，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案例】28年前温州搞起浮动利率：中国首迈利率改革

资金借贷渠道不通畅，使得广大农村和乡镇企业不得不向高利贷公司借款。

案例适用：利率

温州苍南县金乡镇，这个已有621年历史的浙南古镇，至今仍然保留着发音独特的金乡方言，镇中的几条老街上，还可以见到清末民初时建造的老式四合院。28年前，正是这个偏远、古朴的小镇，拉开了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一位叫陈礼铨的乡镇信用社主任，带头在当地偷偷推行了存贷款浮动利率。



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触犯政策红线”“随时要掉乌纱帽”的举动，如今已作为温州人的创举，被写进改革开放的历史。

1979年秋天的一个午后，门可罗雀的金乡信用社内，陈礼铨与往常一样，喝茶、看报。已经连续数日没有人来存钱了，保险箱里的钞票不用半分钟就能点完。上一年，信用社又亏了12000元。

离信用社不远的一间平房里，一位老者正在主持一场特殊的集会：一叠叠钱被整齐地堆放在一张桌子上，从附近村镇赶来的男男女女坐在桌前，纷纷喊话：“我出两分！”“我出两分三！”“两分八！”“我出三分！”最终，“出三分”的那个人将桌上的钱扫入一个编织袋中，签字画押后迅速离去。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金乡镇民间集资的一个缩影。当地的民间融资渠道异常丰

富。有形式规则各异、完全以发起人的个人信用维系的各种“呈会”(由一个在当地较有威望的发起人牵头,组织一群人入会,每人按月交出一笔钱给指定的人,依次轮流。在这过程中利息逐月提高,最初拿钱的人所得最少,最后拿钱的人本息相加、所得最多),也有月息最高达到四五分的高利贷。

当时,镇上的徽章、商标作坊悄然兴起,订单不断,很多人四处奔波筹集生产所需的资金。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去镇上唯一的信用社贷款。“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钱。由于利息太低、存取款需要办手续,加上一些人固执地认为去信用社存钱会‘露富’,所以大家宁可把钱藏在家里,有的还专门用砖头砌到墙里去。存款不足,信用社自然没钱可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陈礼铨说,1979年初,整个信用社所有的资金加起来只有1803元,金乡镇居民的存款只有380元。

形势逼迫之下,陈礼铨打起了利率的主意。当时全国兴起改革的浪潮,最初粮食的购销开始有了双轨制,出现了议价粮。粮食价格的放开,使得市场活跃起来。接下来,又出现了其他一些价格浮动改革,如煤炭议价等。从这些迹象中,陈礼铨看到了原有的价格体系正在受到冲击,一个更趋向于价值规律的新价格体系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银行利率作为这个价格体系的组成部分,将来也一定会改变。

“粮食有议价粮,煤有议价煤,那么存贷款是否也能搞议价利率?”这个大胆的设想,让他既兴奋,又隐隐地担忧。兴奋的是,只要存款利息上浮到足够诱人的程度,自然会有人来存钱,有了钱,放贷也就有了资本;担心的是,当时利率作为国家管制最严格的物价,除了央行,没有谁敢动它分毫。

陈礼铨最终决定放手一搏。他甚至做好不当这个干部、回家种田的准备。1979年下半年,陈礼铨通过考察,决定在小范围内偷偷地搞一下“议价利率”: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设立信用社专项贷款利率,即存款月息提高到1分,贷款月息提高到1分5厘,专门为当地的个体户服务。当时的金乡信用社一共3人,谁都不敢声张。大家偷偷地拉存款、放贷款,不久这个消息在金乡个体户中逐渐传开,长年无人光顾的信用社逐渐有了人气。

次年,来信用社存贷款的人越来越多,陈礼铨知道,再偷偷摸摸地干下去看来是不行了。他找到当时的镇委书记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书记当场表态:可以试一下,有问题镇委承担责任;他又向当时的主管部门领导——农行金乡营业所主任陈岳清汇报,也得到了“试一下总没问题”的答复。

于是，当年50多岁的他，用自己的308元积蓄和信用社全部的1803元资金作为本金，同时说服镇党委把信用社迁出镇政府大院（当时的农村信用社大多隶属于政府机构），在镇繁华地段租了两间店面，开始办公营业。



信用社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欢迎，是在正常的利率浮动和“议价利率”得到实行的情况下。

1980年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宣布，从即日起，存贷款

开始实施新的利率，具体规定为：存息：存期一年，月息从四厘二上浮至一分；贷息：月息从七厘六上浮至一分五。偷偷运行近一年的浮动利率终于正式浮出水面。

存息的大幅上升，使得有闲钱的人更愿意将钱存入安全有保障的信用社；而贷息尽管也有一定幅度的上浮，但相比当时月息动辄二三分的民间借贷要低得多，急需用钱的个体户也愿意找信用社借钱筹资。

当年年底，金乡信用社吸引了浮动利率存款12.5万元。次年，存款数额更是达到54万元，并成功甩掉了建社26年来年年亏损的帽子，首次盈利1.6万元。

金乡信用社试行浮动利率，引起了农行系统的高度关注。1981年9月，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来金乡调研。调查组呆了19天，做了详细的调研，虽然觉得这事和法规相抵触，但又合情合理，得到了多数乡里人的支持。

从1980年正式推出浮动利率，金乡信用社在两年内一共放贷410万元，此前26年全社才累计发放贷款40万元。

群众有了钱，生产也扩大了：有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的金乡镇金星村，全村产值三年之内从13万元飙升至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升至672元。

考虑到刚刚富起来的农民兄弟怕露富的心理，金乡信用社还做出了金融储蓄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的，社里可以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的，可以用代号；怕取钱贷款被人看到的，信用社也可派人将钱送上门。

陈礼铨因为浮动利率改革，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金融红旗手。此项改革引起了全国金融界的高度关注，1984年3月，温州市农行同意在金乡、宜山、钱库、灵



人性化的存取款措施，登门送钱的行为为信用合作社
赚取了大量人气和信任度。

案例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实行管制利率，货币资金价格定得很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消费、分配和资金供求基本上取决于国民经济计划，利率的高低对经济调节起不了什么作用；同时人们储蓄不多，利率问题不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增加，闲置资金增多，储蓄生利动机增强；同时农村家庭工业和乡镇企业飞跃发展，所需资金剧增，利率变得十分敏感。1980年国家规定的储蓄存款年利率只有5.4%。农村信用社隶属于农业银行，要求执行国家的低利率政策。而当时民间借贷月息高的已经上升到3%，年息达到30%以上。温州苍南金乡镇农村信用社率先进行存贷款浮动利率改革，既使濒临关闭的农村信用社很快扭亏转盈，也抑制了民间高利率，为温州农民提供了较为廉价的创业资金。实践证明，金乡镇农村信用社浮动利率改革是成功的，不仅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而且开创了我国浮动利率改革的先河，拉开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资料来源：佚名：《28年前温州搞起浮动利率：中国首迈利率改革》新华网2008-10-10）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



古典学派一贯认为利率是一个使投资需求与储蓄的意愿能达到均衡的因素。他们忽略了投资的增加并不是随着每一笔储蓄的增加而增加的。古典学派理论是荒谬的，因为他们所假定的收入不变，资本需求曲线和利率与储蓄量的关系曲线两者可以独立移动是矛盾的。

古典学派的理论

什么是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呢？我们一直都是在他们的理论中熏陶出来的，而且到现在为此，我们都毫无保留地接受着这个理论。然而，我认为很难将其论述清楚，在现代古典学派的重要著作中，我们也很难找到能将此理论论述明白的文字。

其中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古典学派的传统是把利率当作一个使投资的需求与储蓄的意愿达到均衡的因素。投资代表对可投入的资金的需求，储蓄代表它的供给，利率则是能使二者相等的资金的“价格”。利率必然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量和储蓄量相等。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是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主要著作。这本书出版于1890年。该书曾被西方经济学界看成是划时代的著作。马歇尔在这本书中所阐述的经济学说被认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核心是“均衡价格论”。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我们虽然找不到以上那样直截了当的说法，但我们却可以发现他的理论和这种说法很相似。例如，在《经济学原理》中有这么一段：“既然利息是市场上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利率常常趋于一个均衡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的总需求量恰好等于资本的总供给量。”又如卡塞尔（Cassel）教授在其所著作的《利息的性质与必然性》一书中说，投资形成等待资本的需求，储蓄构成等待资本的供给，其意思是说，利率是使二者趋于相等的价格。卡佛（Carver）教授所著的《财富的分配》中第六章，清清楚楚地把利率看作是使得等待的边际负效用与资本的边际效率二者趋于相等的因素。夫卢克斯（Flux）也这么认为：“……储蓄与利用资本的机会，会自动调整……只要净利率是大于零的……都将会会有储蓄存在的意义”（《经济原理》第95页）。陶希格（Taussig）教授刚开始是说：“利率会定于

古斯塔夫·卡塞尔

古斯塔夫·卡塞尔 (1866—1945) 是瑞典经济学家，曾长期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理论研究中，他摒弃了英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的边际效用价值说。他认为两国货币的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这就是“购买力平价说”。卡塞尔还提出了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之一的卡塞尔经济周期论。

陶西格

陶西格 (1859—1940)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1883 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经济顾问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并被推荐为《凡尔赛和约》经济条款的起草人之一。主要著作有：《美国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一项经济史研究》、《美国关税史》、《经济学原理》、《国际贸易》等。

瓦尔拉斯

又译为瓦尔拉斯，法国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创始人，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建者之一。早年进入巴黎的矿业学院学习，之后曾从事多种不同的职业。瓦尔拉斯于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经济学，1870 年被聘任为瑞士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瓦尔拉斯一生致力于一般均衡论的研究。其著作主要有：《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社会经济学研究》和《实用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点，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恰好引起储蓄的增加”（《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第 20 页）。后来他又同时画了一天储蓄的供给曲线和表示当资本数量增加时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需求曲线（《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第 29 页）。瓦尔拉斯 (Walras) 在他的《纯经济学》附录 I 和 II 中论述“储蓄与新资本的交换”时是这样表达的：在每一个可能的利率之下，由各人意愿的储蓄加总在一起得到的总储蓄与由

马歇尔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曾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划时代的著作，并把马歇尔称作新古典学派的代表。



卡塞尔是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利息的性质与必要性》是其代表作。



卡佛是经济学家，他认为边际储蓄与边际生产率是影响利率的两大因素，这就是“边际储蓄投资利润率”。



华尔拉斯认为利率是使得储蓄量和储蓄需求量相等的变量，并未跳出古典学派理论范畴。



各人意愿投资加总在一起得到的总投资，二者是趋于相等的。利率就是使得二者相等的变量。因此，利率必然定于这样一点，使得储蓄量和储蓄需求量相等。可见，华尔拉斯的理论，并没有跳出古典学派的理论范畴。

人们已经习惯了接受这种思想：无论何时进行储蓄，都会自动使得利率下降，从而自动刺激资本的生产。他们认为：利率会正好下降到这种必要的程度，从而使资本的产量的增长和储蓄的增长相等。同时，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必要进行特殊干预的自我调节过程。另外人们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观念，即投资的每一次增加，如果没有储蓄倾向的变化予以抵消，必然会提高利率。

根据我们上几章的分析，古典学派上述的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让我们先从一些相同点开始。

古典学派接受了储蓄与投资二者相等的观点。马歇尔确信总储蓄和总投资是相等的。他们认为：一个人每次增加储蓄的行为都必然会造成相应投资的增加。在当前讨论的这个范围内，我的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与古典学派的投资需求曲线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异。而当我们涉及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时，我们的意见开始产生分歧。这是由于他们强调利率对储蓄倾向的影响。但是，他们不会否认收入水平也会对储蓄量产生影响。这些相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命题，即假设收入水平

是给定的，当期利率必须处于这样一点，在该点，对应于不同利率的资本需求曲线与对应于不同利率的给定收入的储蓄量曲线相交。

但是，在这之后，错误的东西进入古典学派的理论之中。如果古典学派仅仅得出如下推论，即在对资本的需求曲线以及利率的变化对意愿储蓄量的影响为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和利率之间存在着一种唯一的相互关系，我们对此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而且，这个命题还引出另一个命题，即如果利率对资本的需求曲线以及利率对给定收入水平下意愿储蓄量的影响都是给定的，那么收入就必然使储蓄量等于投资量的一个因素。但事实上古典学派的理论不仅忽视了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而且还包含有思维上的错误。

古典学派假定在不修改其关于给定收入决定储蓄量的条件下，就可以考察资本需求曲线的移动对利率的影响。古典学派利率理论的自变量是资本的需求曲线和不同利率在给定收入条件下的不同储蓄量；而当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时，新的利率就由两条曲线的交点来决定：一条是新的资本需求曲线；另一条是体现利率与给定收入中储蓄量的关系的曲线。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资本的需求曲线移动，或者体现利率与给定收入中储蓄量的关系的曲线移动，或者这两条曲线同时移动，则新的利率就由这两条曲线的交点的新位置来决定。但是，这是一个荒谬的理论，因为该理论所假定的收入不变和它关于两条曲线能够相互独立地移动的假设是矛盾的。如果两条曲线中的任何一条移动，那么，收入就会变动，建立在收入给定这一假设之上的整个理论就会崩溃。这种处境只能用某种更复杂的假设来解救，即假定上述曲线移动时，工资单位会自动变化，变动的数值恰好足以使它对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形成一个新的利率，这个新的利率正好抵消前提假定的曲线的移动，从而使产量仍保持在曲线移动前的水平。因而，这种假设只能适用于与长期均衡有关的情况，而不能形成短期理论的基础；甚至在长期中，也没有这种假设能够成立的理由。我认为，古典学派理论实际忽略了收入水平变化所起的作用，还忽略了收入水平可能是投资量的函数。

因此，古典学派理论所使用的函数：投资量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与给定收入下的储蓄量对利率变动的反应，都不能为利率理论提供所需要的素材。但是，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在利率既定条件下，收入水平将是多少，或者说，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利率水平将为多少。

古典学派的理论错误之因

古典学派的错误来源于把利率当作等待的报酬，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不贮藏货币的报酬。其实，各种贷款和各种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只是它们风险的大小不同，因此，由贷款或是投资得到的收益可以看作是其愿意冒风险的报酬，而不是等待的报酬。实际上，报酬和所谓“纯粹”利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它们都是甘冒一种不确定性风险的报酬。只有当货币仅仅被用来满足交易的需要，而不是用作贮藏价值的手段时，一种不同的货币理论才是合适的。

然而，有两点或许能够使我们警惕古典学派的某些错误。



夫卢克斯为银行的工作人员们讲解储蓄利率。

首先，大家都同意：当利率提高时，对给定收入中的储蓄量是否必然增加并不确定；同时，却没有怀疑投资需求曲线中的各点会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下降。但是，如果收入曲线和投资需求曲线随利率上升而一起下降，那么，就不能保证一条既定的收入曲线和一条既定的投资需求曲线会有交点。这暗示我们：不能单凭这两条曲线来决定利率。

其次，古典学派通常假定，货币数量的增加有降低利率的倾向，至少在短期内的初始阶段是这样的。然而，古典学派提不出任何理

由说明，为什么货币数量的变动会影响投资需求曲线，以及在给定收入中的意愿储蓄量。这样，有两种利率论，在第一卷价值论中是一种，在第二卷货币论中是一种，两种差别很大。但他们并没有对此而感觉不安，同时也没有尽力去调和二者的关系。新古典学派试图把二者加以调和，却把事情引向最糟糕的混乱之中。因为新古典学派的推论认为：必定存在两者供给的来源来迎合投资需求，即正常储蓄，也就是古典学派所谓的储蓄。以及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储蓄。于是产生了“自然的”、“中性的”

或者“均衡的”利率说法。这也就是使得投资等于古典学派的不包含任何“强制储蓄”的正常储蓄。

最后，古典学派得出的一个最浅显的解决方案，即在一切情况下，货币数量能够保持不变，则这些复杂情况就不会产生了，而货币数量不变，则投资超过正常储蓄的结果就不会存在了。

因此，传统的分析是错误的，它没有把经济制度的自变量正确地分离出来。储蓄和投资是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因素。它们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率这三个因素所导致的后果。这三个决定因素本身又是复杂的，而且每一个因素都会由于其他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但是，从

它们的数值不能相互推算的意义上来说，它们仍然是自变量。传统的分析发现储蓄取决于收入，但忽略了收入取决于投资的事实。收入取决于投资的意义为：当投资改变了，收入必然改变，从而使储蓄的变动等于投资的变动。

那些认为“资本边际效率”决定利率的理论没有获得大的成功。在均衡时，利率当然等于资本边际效率。因为，直到二者相等之前，增加（或减少）当期投资规模都是有利的。而要想由此形成利息理论或由此推出利率，则会引起循环推理的问题。因为“资本边际效率”部分地取决于当期投资规模，而在计算出这个规模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利率是多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新投资的数量会被推进到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之点；而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告诉我们的不是利率为多少，而是在给定利率的条件下，新投资的数量将被推进到哪一点。

还有一些人认为，可以从资本边际效率求出利率，但也没有取得成功。在均衡状



陶西格是美国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以美国总统威尔逊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态，利率固然是等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因为，如果二者不相等，则增加或减少当前的投资量，必然会有利可图。但是，以此作为利率理论，或由此推出利率，这种循环推理是错误的。马歇尔曾经试图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推理，但他在推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其他问题。因为，资本边际效率一部分是取决于当前投资量的多少，而我们要计算当前的投资量，就必须首先知道利率为多少。而我们仅能知道的是：新投资的产量会达到这一点，即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率。因此，资本边际效率能告诉我们的，不是利率将变为多少，而是当利率已知的情况下，新投资的产量将扩大到什么地步。

经济学家总是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消费减少使利率趋于下降，投资增加会使利率上升。但是，如果上述二者所决定的不是利率，而是就业总量，那么我们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的看法将会有深刻的变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如果把消费愿望的减退不当作增加投资的因素，而是当作减少就业量的因素，这就代表着对消费愿望减退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

【解析】古典学派利率理论的错误及贡献

古典学派一向是把利率当作一个使投资的需求与储蓄的意愿达到均衡的因素。投资代表对可投入的资金的需求，储蓄代表它的供给；利率则是能使二者相等的资金的“价格”。利率必然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量和储蓄量相等。在古典学派利率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已经习惯接受了这种思想：无论何时进行储蓄，都会自动使得利率下降，从而自动刺激资本的生产。他们认为：利率会正好下降到这种必要的程度，从而使资本的产量的增长和储蓄的增长相等。同时，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必要进行特殊干预的自我调节过程。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投资的增加并不是随着每一笔储蓄的增加而增加的。另外，有一点是和我的观点相一致的，即假设收入水平是给定的，当期利率必须处于这样一点，在该点，对应于不同利率的资本需求曲线与对应于不同利率的给定收入的储蓄量曲线相交。但是，古典学派假定在不修改其关于给定收入决定储蓄量的条件下，就可以考察资本需求曲线的移动对利率的影响。古典学派利率理论的自变量是资本的需求曲线和不同利率在给定收入条件下的不同储蓄量；而当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时，新的利率就由两条曲线的交点来决定：一条是新的资本需求曲线；另一条是体现利率与给定收入中储蓄量的关系的曲线。这是一个荒谬的理论，因为该理论所假定的收入不变和它关于两条曲线能够相互独立地移动的假设是矛盾的。

【案例】台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

案例适用：利率改革

将利率作为一项制度来全面、综合考虑、并结合相关制度进行创新的典范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金融自由化的经验可总结为三点，总体上完全符合制度变迁的理论，且基本上符合麦金农所提出的“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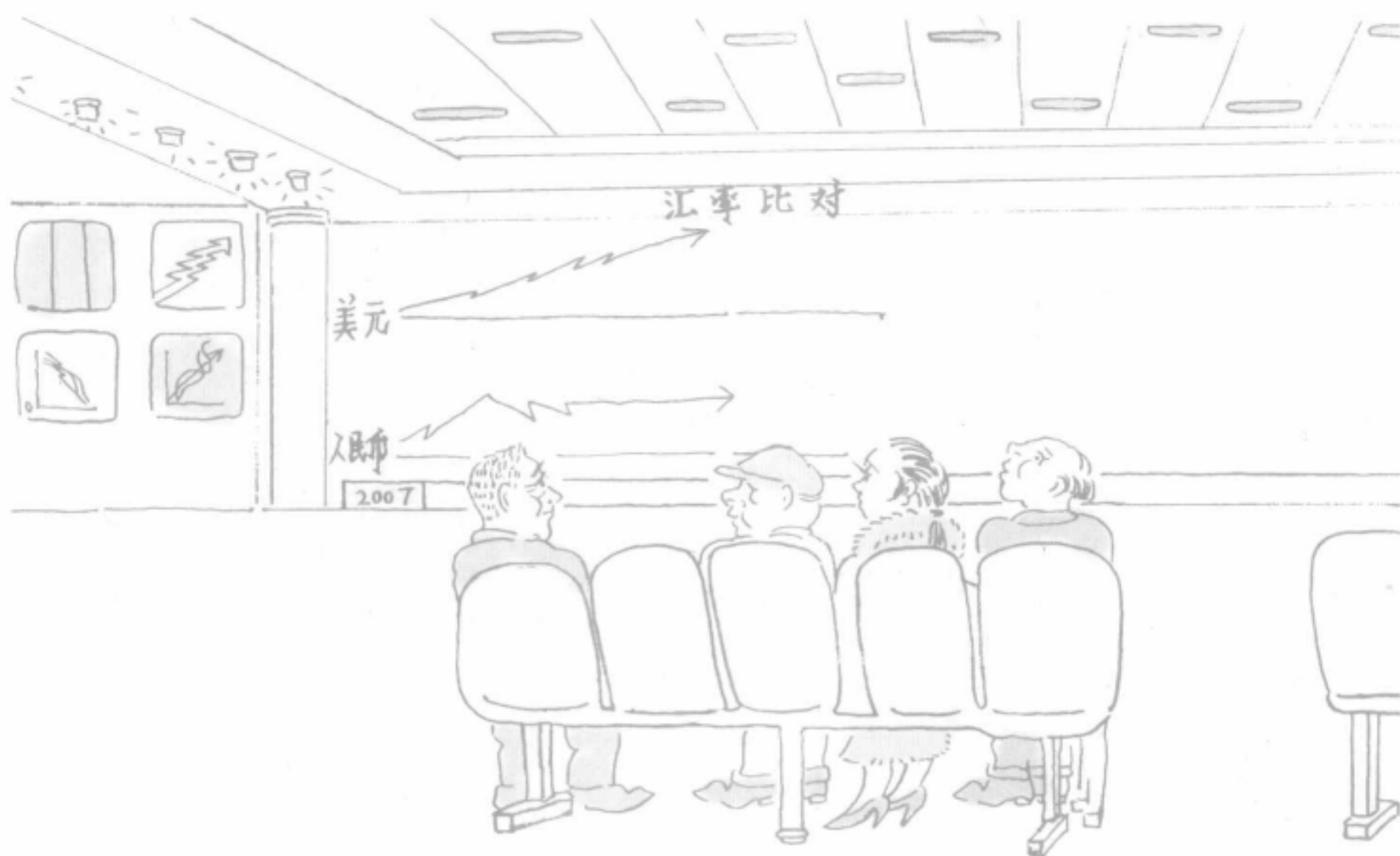
一是准备时间充分。台湾利率自由化先是经过5年的起步准备，首先从法律上突破了存款利率必须由金融当局直接管制的规定，再经过9年的逐步放宽才最终实现市场决定利率。1975年当局允许在原有的《银行法》制定的最高限内自由浮动，然后是银行放款利率由银行公会议定幅度并报请台湾“中央银行”核定实施。该幅度在1979年由

原来的0.25%扩大为0.5%。1980年实施《银行利率调整要点》，某些金融商品的利率可由各银行自行制定，同时由台湾“中央银行”核定的放款利率上下限差距逐渐拉大。1985年各银行开始建立“基本放款制度”，放款利率加码基础由原来的台湾“中央银行”核定的上下限，改为对信用最佳的客户进行短期放款时所收利率。1987年台湾“中央银行”进一步扩大银行放款利率幅度，将短期放款上下限幅度扩大为4%，中长期放款上下限幅度扩大为4.25%。1989年新《银行法》的出台才彻底废除了台湾“中央银行”核定利率上下限的规定，真正实现银行利率自由化。

二是强调自由化顺序。在推动金融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的初期，台湾就有人提出金融自由化的顺序应该是：先强化金融检查体系，再将国营银行民营化，最后是准许新银行的设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台湾当局高层人士更加强调这一点。“行政院

台湾政府颁布《银行法》，真正实现了银行利率的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使得外汇汇率的变动更为活跃，较之金融管制更具灵活性。

政务委员”郭婉容在分析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国家时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按照先稳定物价、降低关税，再利率、汇率自由化，而后才开放资本移动的自由化顺序进行。台湾“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也多次宣称：外汇交易自由化必须按先经常帐后资本帐、先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的顺序开放。台湾当局基本上也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做的。以解除外汇管制为例，1987年修正《管理外汇条例》，解除经常帐交易的外汇管制，厂商可自由持有外汇加以运用，而资本帐仍未放开，只是由以前的“管出不管进”改为“管进不管出”。此后逐步提高汇入款上限，同时进一步取消对资本金汇出的限制，经过一系列调整，目前允许每人每年的汇入或汇出金额为500万美元。当局计划到2000年才实现资本帐“完全放开、特许例外”的目标，以保证外汇交易自由化的合理顺序。

三是采取渐进策略。如台湾开放保险市场的资本流入。并非一次性全部放开，而是分三个阶段，先允许外资购买海外发行的互助基金，再允许外商投资法人直接投资，最后才允许外商个人直接投资。从整个金融自由化的做法来看，无论是时间先后还是业务范围，都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渐进策略。以放宽租金取得为例：1983年当局公布《国际金融业务条例》，准许金融机构在台设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以加强国际金融活动；1984年成立境外金融中心(OBU)，承做境外金融业务；1986年修正《外国银

行在台设立分行及代表人办事处审核准则》，放宽外国银行在台分行的业务范围；1989年成立台北外币拆借市场；1990年同意本地银行海外分行、在台外商银行的海外总行以及联行参与拆款；1990年放宽外国专业投资机构投资岛内证券的资格条件，并开放外国银行在台经营储蓄部及信托部，以及办理承销及代客买卖有价证券业务，同时将外国银行分行收受新台币存款总额的上限，由其汇入资本的12.5倍提高到15倍；1994年删除外国银行增设分行的家数及地点限制；1995年全面开放与外币相关的OBR业务；1996年全面取消本地企业在海外发行可转换的公司债券的限制；1997年删除外国专业投资机构必须附资金汇入计划书及投资计划书的规定。

.....

案例评析：

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经济市场化的中坚战，是金融改革系统工程的重点和难点。探索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实施途径，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利率市场化模式，首先必须把握该项改革的次序性和渐进性原则，才能取得这一制度变迁的最大收益。这里所指的次序性是指利率体系内部和与其相关的制度环境的改革步骤与程序，如果次序错位则会加大金融风险，难保金融安全。次序性强调各项变革组合依时间排列的空间结构；而渐进性则强调利率改革工程的启动需要相关的制度环境存在和成熟为基础条件，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延续过程。

（资料来源：佚名：《制度、次序与利率市场化》，财会论文网2008-6-27）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 动机和业务动机

消费者愿意储存多少现金，取决于他们的流动性偏好动机，心理动机包括收入动机、业务动机和谨慎动机，此三者的强弱取决于现款的能力和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另外，投资动机可以让我们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

投资动机及利率变化

现在对流动性偏好的动机做更详尽的分析。在这里讨论的，大致与别人所谓的货币需求相当，又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公众愿意将其收入的多少以现金的形式来保存，可以通过他们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来衡量。因此，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增加，可能预示着流动性偏好的降低，但二者实质并不是相同的。因为人们可以选择周转流动性与否，但往往是根据其储蓄的多少，而非全部收入。而且，资本的收入流通速度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以为全部的货币需求都与收入成比例或与收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只有一部分货币需求与收入成比例或与收入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个名词忽略了利率的重要作用。

在《货币论》中，我从收入存款、业务存款和储蓄存款三方面研究了对货币的需求总量。为了这三种目的中的每一种而持有的货币都构成一笔笼统的款项，持有者不必把它严格划分为三个部分，同一笔款项可能主要是为了一种目的而持有，其它则是次要的。因此，一般较好的方法，就是把个人在一定情况下对货币的总需求当作一次性的决策。

在分析动机时，有必要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别。第一类大致相当于收入存款和业务存款，后两种类别相当于储蓄存款。这些类别是：交易动机（包括收入动机和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

收入动机

它能使人们做出持有一定数额现款的决策。它的强弱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以

因开发或炒作因素，地产的升值将出人意料，有敏锐市场洞察力的投资者从中得益甚多。



及两次收入间的正常期间的长短。严格地说，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这个概念只有在这种场合才是适用的。

业务动机

企业也同样需求持有现款，用于没有收到销售款之前的销售开支；经营者所持有的在进货和销售之间作为支付之用的现款也属于这一种类。这种需求的强弱程度由当期产量的价值及销售环节的多少决定。

谨慎动机

一种动机是为了应付突然需要支付现款的意外事件和突然的有利的购买机会。另一个动机为了持有货币价值不变的资产以便偿付未来货币价值额不变的债务。

以上三种动机的强弱取决于现款的能力和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如果持有现金的成本增加，则会削弱持有现金的动机；反之，则会增强对持有现金的持有。

投机动机

在正常情况下，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主要由经济制度的一般活动和货币收入水平来决定，因而这种货币需求量是稳定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正是由于投机动机的作用，我们才能通过控制货币数量进而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经验指出：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总量常常表现出随着利率的逐渐变动而不断地变化。理由在于：一般情况下，银行体系总可以在市场上以买卖债券之法来增减现款数量，买的越多，引起利率的下降就越大，反之亦然。不过，公开市场业务主要影响短期利率，对长期利率影响较小。

在讨论投机动机时，重点是要区分在流动性偏好不变的条件下，由于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改变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以及由于流动性偏好的改变而造成的利率变动。公开市场业务能影响这两种利率，因为它既能改变货币数量，又能引起对中央银行政策预期的改变。由于信息变化所产生的预期变动而导致流动性偏好本身非连续性变化，因此，它所导致的利率的变化也具有非连续性。只有当信息的变化被作出不同的解读时，或者信息的变化对个人利益的影响不同时，才可能会使债券市场上的交易活动增加。如果信息的变化对每个人的判断和做法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那么，利率会立即被调整到与新条件相适应的程度，而无需任何市场交易。

因此，对于每个人都同样处于类似境况的最简单情形，境况或者预期的变化不会

货币需求量图解



国家金融机构控制着货币的供应量，必须时刻了解货币需求总量。

收入存款



人们的收入存款一般是以存折、银行卡和一般家用流动资金的方式存在。

业务存款



业务存款是企业或事业单位等以公司账户的形式在银行账面上的货币表现形式。

储蓄存款



储蓄存款是为居民个人积蓄货币资产和获取利息而设定的一种存款；中国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10万亿人民币。



收入动机使人们作出持有一定数额现款的决策，强弱取决于收入量和两次收入的时间间隔。



当期产量价值和销售环节所决定的商业资金周转，是货币需求的业务动机。



资本家用储蓄存款放贷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或物质利益，以及获得社会效益和占领市场份额等，皆为投资动机。



为应付突然需要支付现金的意外事件和有利购买机会，或为保值持有资产，为谨慎动机。

造成货币在个人之间的转移，它只会使利率发生必要的变动，正好抵消个人在初始利率水平下，为适应新环境而改变持有现金量的欲望。对于每一种境况和预期状态，都有一个适当的利息存在，通常不会出现任何人改变他所持有的货币量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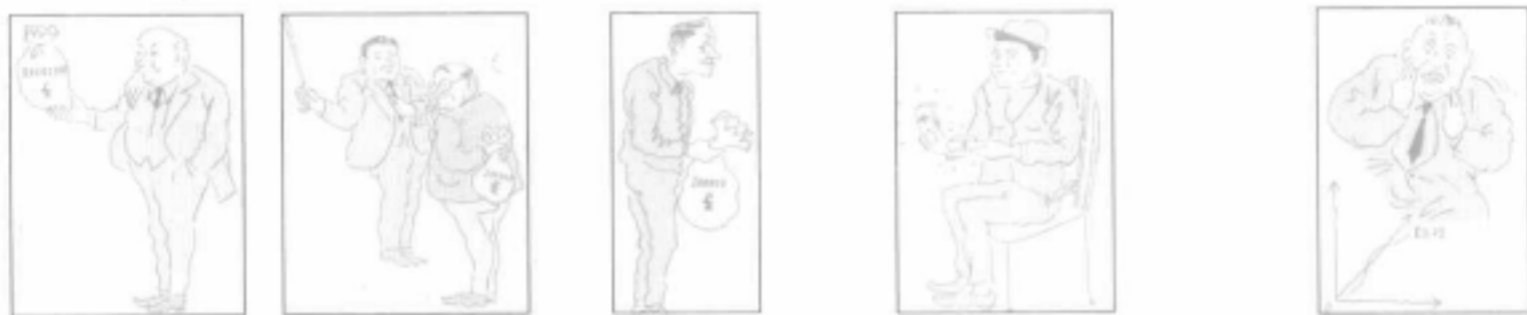
不过，上述这种改变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影响，境况或者预期的变化常常会造成个人调整货币的持有量。这种不同影响的部分原因在于境况不同造成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不同；也因为他们对信息有自己的理解。因此，新的均衡利率会与货币持有量的再分配同时出现。但我们更应该关注利率的变化，而不是现金持有量的改变。此外，利率的变动通常是对信息的变化所做出的主要反应。

流动性偏好函数与各类动机的函数关系

个人为了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持有的现金，与为了满足投资动机所持有的现金，固然不是完全无关的，但总体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两组现金持有量看作是无关系的。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假定，由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决定的现金持有量和由投机决定的现金持有量完全无关。

设 M_1 代表为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决定的现金持有量， M_2 代表为满足投资动机决定的现金持有量。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现金，我们有两个流动性偏好函数 L_1 和 L_2 。 L_1 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 L_2 主要取决于当前利率和预期状态之间的关系。因而：

$$M = M_1 + M_2 = L_1(Y) + L_2(r)$$



其中， L_1 代表收入 Y 与 M_1 的函数关系， L_2 代表利率 r 与 M_2 的函数关系。现在我们需要研究：(1) M 的改变与 Y 和 r 的关系；(2) L_1 形状的决定因素；(3) L_2 形状的决定因素。

M 的改变与 Y 和 r 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知道 M 的改变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假定 M 是由黄金构成的，那么 M 的改变只能由开采金矿而来。于是金矿员工又属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一，则在这种情形下， M 的改变将直接引起 Y 的改变，因为新开采的黄金必定是被金矿所有人而获取。假定 M 的改变，是由于政府印发纸币，则情形是完

证券

证券是各种财产所有权或债权凭证的通称，是用来证明证券持有人有权依据券面所载内容取得相应权益的凭证。证券按照性质不同可分为证据证券、凭证证券和有价证券。人们通常所说的证券即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是一种具有一定票面金额，证明持券人有权按期取得一定收入，并可自由转让和买卖的所有权或债权证书。股票和银行定期存单等都是**有价证券**。

全相同的，因为新印发的纸币也必定被其所有人获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的收入水平不够高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全部 M 的增加都吸收在 M1 中，因此还有一部分货币会另求出路，用于购买证券或其他资产，这样就会使利率降低，从而使得 M2 增加。同时，因为利率的降低，将刺激收入 Y 的上升，使得 M1 也增加。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即如果要增发货币，则银行体系必先放松其信用条件，使得有人愿意将其债券卖给银行，以换取新的现款。

现在，我们把后一种情形作为典型的情形加以分析。我们假定：要改变 M，必先改变 r。当 r 改变以后，则一部分因为 M2 的改变，一部分因为 Y 的改变，进而引起 M1 的改变，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均衡。至于在这个新的均衡的情形下，新增加的现款是如何在 M1 和 M2 之间分配的，就需要看投资对利率降低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以及收入对投资增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因为，Y 一部分取决于 r，则当 M 改变一定量时，直至 r 改变到这样的程度，使得 M1 和 M2 改变量之和恰好等于 M 的全部改变量。

L1 形状的决定因素

我们把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定义为 Y 对 M1 的比例，用 V 代表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则：

$$L1(Y) = \frac{Y}{V} = M1$$



V 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取决于银行业和工业组织的特点、社会习惯、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持有闲置现金的成本。不过，短期里，上述情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把 V 视为一个常数来看待。

通货膨胀达到了极致，人人都是“亿万富翁”，货币的购买力下降，甚至出现了背着一袋钱去购物的现象。



M2 和 r 之间的关系

对利率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是解释人们持有代表流动性偏好 L_2 的现金 M_2 的唯一原因。因此，既定量 M_2 和一定水平的利率 r 之间并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人们关注的是 r 的绝对水平偏离其相对安全水平的程度。还有两个理由认为：在任何既定的预期状态下， r 的下降会引起 M_2 的增加。首先，如果人们对于 r 的安全水平的预期不变，则 r 的下降会减少市场利率相对于“安全”利率的数值，从而

使得持有债券的风险增大；其次， r 的降低会减少放弃流动性偏好的当期报酬，这种报酬相当于一种保险赔偿金，可以抵消由于利率变动引起的债券价值的损失。利率下降使得赔偿金减少的数额等于新旧利率的平方之差。

因此，利率是一个具有高度心理作用的变量。它的均衡值不会低于其充分就业时的水平，否则真正的通货膨胀就会来临，造成 M_1 总会吸纳掉不断增加的现款。但当利率高于其充分就业的水平时，长期利率不仅由货币当局的现行政策来决定，还取决于市场对货币当局未来政策的预期。短期利率易于被当局控制，一是因为当局能使人们相信其政策在短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二是债券价值的损失远远小于利息收入。然而，当长期市场利率下降到人们普遍认为“不安全的”水平时，它就比较难以控制。

因此，被公众认为具有实验性的或者易于改变的货币政策可能实现不了大幅降低长期利率的目标。因为，当 r 在一定水平以下时，它的下降会使 M_2 几乎无限制地增加。另一方面，同一政策如果被公众认为是合理的、现实可行的、符合公众利益的、具有坚定信念的、不易更改的，它就很容易取得成功。

利率更是一种高度遵循成规的现象，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行的观点。足够的信心可以持久维持任何一个利率水平。围绕着这一持久不变的数值，利率还会有波动，尤其是 M_1 比 M 的增长更快时，利率就会上升；反之，利率就会下降。但是，这一持久不变的利率却可以在几十年内长期处于高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尤其是，如

果流行的观点认为利率可以自行调节,因为由社会成规所决定的利率水平被认为是客观上具有比社会成规更坚实的基础,那么,在公众和当局看来,就业量没有达到最优与利率所处于的不合适的水平完全无关。

因此,把有效需求维持在足以保证充分就业的水平,其困难之处在于:一方面是由社会成规决定的长期利率相当稳定;另一方面是资本边际效率具有易变性和高度不稳定性。

乐观方面在于:由于社会成规并不来源于确切的知识,所以它对货币当局持续而一贯的有限度的政策并不总是过分地加以抵制。在一定范围内,公众能习惯于利率的温和下降,从而社会成规也能适应利率的温和下降,在下降后的基础上,社会成规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就为进一步的下降铺平道路。

决定利率的因素及货币数量

上面的论述可归纳为一个命题:在任何既定的预期状态下,除了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以外所要求的持有现金数量,取决于货币当局创造的利率,而这恰恰是流动性偏好函数 L_2 所总结的。

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量和利率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同时,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动也会影响利率。因此,这里的特定分析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货币量的变动和利率的变动之间是否有着某种特别直接和重要的联系。我认为这种关系的确存在,因为银行制度和货币当局都是货币和债券的经营者。

如果货币当局准备根据特定利率买卖所有期限的债券,那么,利率体系和货币量之间就存在直接联系。在货币管理的技术上,最重要的改进是由中央银行按照规定的价格买卖任何期限的优质债券,而不是按照单一的银行利率

西方中央银行发行的升值债券具有低风险的优点,引来竞相抢购。



买卖短期票据。

然而，在现实中，银行系统所决定的债券价格的“有限程度”在不同体制中是不同的。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我们完全能够使得价格控制在两个方向上同样有效。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限制：货币当局并不是同等对待不同期限的债券的，他们更偏爱短期债券。这种条件下，利率和货币量之间的关系会受到相应影响。如果货币当局只经营短期债券，我们就必须考虑短期债券的价格对长期债券所施加的影响。

因此，货币当局对不同的债券所建立的利率体系是有限度的。也包括：

(1) 货币当局自身的限制，因为货币当局只愿意经营特殊类型的债券；

(2) 当利率下降到某种水平后，存在着人们只愿意持有现金而不愿意持有债券的可能性，即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当局失去了对利率的有效控制，这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可按照很低的利率向银行系统无限制地借款；

(3) 由于流动性偏好曲线变成了一条水平线，利率完全失去稳定性的事例曾经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过；

(4) 把有效利率压低到一定数值以下存在困难。这些困难包括：把借款者和最后贷款者撮合一起的成本；放款者所要求的在纯粹利率之上的风险费用，尤其是道德风险的费用。纯粹利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上述费用和风险的下降。因此，典型的借款者所必须支付的利率可能比纯粹利率下降更慢，现有银行业和金融组织也不能把借款利率压到某种最低水平以下。

在一个静态社会，或者在一个每人都确切知道未来利率水平的社会里，流动性偏好函数 L_2 或贮藏货币的倾向，在均衡状态时总是等于零。所以，在均衡状态下， $M_2=0$ ，而且 $M=M_1$ 。从而， M 的任何变动将使利率发生波动，一直到收入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在该水平， M_1 的变动等于 M 的变动。此时， $M_1V=Y$ ，其中， V 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Y 是总收入。这样，如果在现实中有可以衡量的产量 Q 和价格 P ，则我们会得到 $Y=QP$ ，从而 $MV=QP$ 。它和传统形式的货币数量论基本是一致的。

$$M = M_1$$

$$Y = QP$$



从解释现实世界的目的来看,货币数量论的最大缺点在于没有区分开由于产量的变化而引起的价格变动与由于工资单位的变化而引起的价格变动。这种粗略的解释或许来自货币数量论的假定:假设没有贮藏货币的倾向和充分就业总是存在的。如果真是这样,则 Q 是一个常数, M_2 则等于零,那么,在 V 是常数的条件下,工资单位和价格水平都会直接与货币数量成比例。

【解析】流动性偏好动机与储蓄

消费者愿意将其收入的多少部分就现金来保存,取决于消费者的流动性偏好动机。这些动机如下:一是收入动机。它能使人们做出持有一定数额现款的决策。它的强弱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以及两次收入间的正常期间的长短;二是业务动机。企业也同样需求持有现款,用于没有收到销售款之前的销售开支;经营者所持有的在进货和销售之间作为支付之用的现款也属于这一种类。这种需求的强弱程度由当期产量的价值及销售环节的多少决定;三是谨慎动机。一种动机是为了应付突然需要支付现款的意外事件和突然的有利的购买机会。另一个动机为了持有货币价值不变的资产以便偿付未来货币价值额不变的债务。以上三种动机的强弱取决于现款的能力和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如果持有现金的成本增加,则会削弱持有现金的动机。反之,则会增强对持有现金的持有;四是投机动机。正是由于投机动机的作用,我们才能通过控制货币数量进而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经验指出: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总量常常表现出随着利率的逐渐变动而不断地变化。一般而言,个人为了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持有的现金,与为了满足投资动机所持有的现金,固然不是完全无关的,但总体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两组现金持有量看作是无关的。因此,在任何既定的预期状态下,公众除了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意外所要求的持有现金数量,取决于货币当局创造的利率,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量和利率存在着对应的关系。

【案例】我国公开市场操作

案例适用:公开市场操作

自1998年中央银行恢复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来,一直以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主要操作工具,操作的主要形式为现券买卖、正回购、逆回购等。现券买入、逆回购,为投入基础货币;现券卖出、正回购,为回笼基础货币。由于2002年以来外汇储备增加较多,为“对冲”由于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当一部分债券用于

正回购质押，央行自由可用的债券大幅度减少，导致继续以正回购方式保持基础货币稳定难以为继，公开市场操作面临无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决定发行央行票据。

央行票据是指人民银行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发行的、期限一般在一年以内的短期债务凭证。它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商业银行持有，其直接作用是吸收商业银行的部分流动性。2003年4月22日，人民银行开始直接发行央行票据，首次发行额为50亿元，期限6个月，以贴现方式发行，发行价格为98.91元，参考收益率为2.198%。它标志着中央银行票据正式成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工具之一。

央行向商业银行发行票据的直接结果，是将商业银行原存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转换为存在央行的央行票据。这一过程对商业银行来说，其资产和负债总量不变，但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将原本由商业银行持有，可以直接用于发放贷款的超额准备金存款，转变为仍由商业银行持有，但却不能直接用于发放贷款的央行票据，从而减少了可贷资金量。发行央行票据是近年来货币政策操作中采取的一项政策措施，被视为我国2003年货币政策运用的最大亮点，标志着中央货币政策走向成熟。

案例评析：

央行票据是中央银行为了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等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身获得资金融通的需要，而是为了调控货币供应量变化。央行票据是人民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而出台的一项货币政策工具，其发行的直接目的是“对冲”由于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的基础货币过快增长，它是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一种新的形式，带来了中国金融宏观调控中的工具创新。

央行票据以中央银行信用为保

证,其安全性、流动性都很高,可以在央行和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回购、抵押等交易,具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工具的特征。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引入央行票据替代回购品种,增加了公开市场操作的自由度。过去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无论是正回购还是现券买断,都受到其实际持券量的影响,使得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并且,我国的国债在品种、期限、结构上并不十分有利于公开市场操作。由于财政部几乎不发行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因此现券操作品种为中长期固息债和浮息

债。操作中长期债券的弊端在于对债市的冲击过大,尤其是对中长期债券的利率影响直接,与货币政策操作的短期性要求会产生冲突。引入央行票据后,开辟了除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之外的第三大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央行通过对票据进行滚动操作,增加了其公开市场操作的自由度和针对性,加强了对短期利率的影响,增强了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能力。

发行央行票据不仅使中央银行进一步具备了准确控制超额准备金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货币政策间调控的有效性,同时,它更有灵活性。公开市场操作之所以受到各国偏爱,就是它具备主动性、经常性、可逆性等优势,因而有较高的灵活性。许多经济学家都十分推崇公开市场业务,甚至将它视为惟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弗里德曼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货币稳定计划》一书中认为,公开市场业务具有如下优点:一是它能主动、及时、精确地影响基础货币。二是由于公开市场业务究竟属于抵消其他影响的防御性业务,还是属于改变政策的主动性业务,难以区分,所以其告示效果不大。三是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不必决定证券的收益率或利率,因而不会直接影响银行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收益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继承了公开市场操作的优点,如可以连续操作,力度可以随时变化,在发行规模、发行频率等方面较为灵活等。相对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说,当准备金率的提使超额准备金转变为法定准备金后,商业银行这部分资金既不能用于现金支付,也不能流通。而央行票据虽不能用于现金支付,但可以流通交易,起到了既在总体上吸收商行部分流动性,又在个体上给予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作用,同时央行票据的市场交易完全是自愿行为,不像提高准备金率对金融体系容易产生猛烈冲击,且往往对所有金融机构形成相同的紧缩力度,缺乏市场弹性等。因此,它可以减少因政策冲击而产生的金融波动,有利于平稳地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意图。由此可见,发行央行票据具有市场化、灵活性的优势。

从对冲操作的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发行央行票据也是较理想的选择。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的主要目的是收回由于购买外汇储备而增加的流动性,对冲操作的结果是人民银行外汇储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同时增加。由于外汇储备是有收益的,而央行票据采用市场化方式拍卖发行,有很强的流动性优势,一般来说,其利率低于正回购利率,从而以央行票据为基础的对冲操作也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总之,央行票据是中央银行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内管理和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储备的一种新形式,它增强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不失为当前特定的经济金融形势下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现实选择。

(资料来源:广东商学院:《货币银行学精品课程教学案例》<http://bank.jpkc.gdcc.edu.cn/>)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 几点考察

个人储蓄行为将压低消费品价格和降低资本边际效率。利率影响下，资本具有稀缺性。且资本必须保持足够稀缺性，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率的水平，而利率则取决于心理和制度的影响。通过对利率的控制，可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储蓄影响投资和消费

打个比方来说，个人今天决定储蓄时，表示他今天少吃一顿，而且他不会同时决定把今天省下的钱花在以后的什么时候。这样，从事餐饮业的企业不仅现在会蒙受不景气的影响，而且他们将来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这就是说，个人的储蓄行为不是用将来的消费需求代替现在的消费需求，而是纯粹减少现在的消费需求。此外，一般人们推测未来消费时，往往是根据现在的实际消费量进行预测的，以至于当前消费的减少会抑制未来消费。因此，个人的储蓄行为，不仅仅压低消费品的价格，而且还会使得现在的资本边际效率降低；故既减少当期消费需求，又减少当期投资需求。

如果储蓄不只是代表限制当期消费，还代表了推迟的未来消费，它对未来的影响的确是很不相同的。因为此时投资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会有所增进，并且使得当期消费所用的资源转移到未来消费上来。不过，这种资源的转移可能不是完全的，因为推迟消费使得生产曲折迂回，导致了为未来消费而生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低于当期利率。结果，将来消费的增加对就业的有利影响就不能马上实现。实际上，个人储蓄的决策并不包含未来消费的订单，而只是代表对当期订单的取消。因此，由于满足消费是就业存在的唯一理由，其他条件不变时，消费倾向的降低会使就业减少。

事情之所以很复杂，就是因为个人在进行储蓄时，并不是用一个事先具体规定的未来消费来代替现在的消费；而且即使如此，生产未来消费的现期所需的经济活动在数量上未必是等于将此储蓄用于现在消费所需的经济活动的数量。储蓄只是单纯的要持有“财富”，取得这种权力之后，何时消费就显得不确定了。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对有效需求而言，个人的储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结果是一样的。这种错误看法来自一种谬论，即持有财富的欲望的增加和对投资需求增加基本上是一致的，投资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刺激它们的生产。从而，个人储蓄对当前投资的推动与当前消费的减少对当前投资的推动是相同的。

这种谬论源于人们相信，财富所有者尽管希望得到资本资产本身，但他更想拥有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未来收益完全取决于对有效需求和供给之间关系的预测。所

以，如果储蓄行为不能促进未来收益，它就无法刺激投资。就个人储蓄而言，要使得储蓄达到持有财富的目的，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新资本资产的产生才能完成。储蓄行为具有财富转移的两面性：一是别人的财富转移给储蓄者；二是该储蓄者也会将财富转移给别的储蓄者。这些财富的转移不利于新财富的创造。新财富的创造取决于它的未来收益能否达到当期利率所决定的水平，边际新增投资的未来收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完全取决于在某一特定日期对某一特定物品的需求的预期。



新财富的创造取决于它的未来收益能否达到当期利率所决定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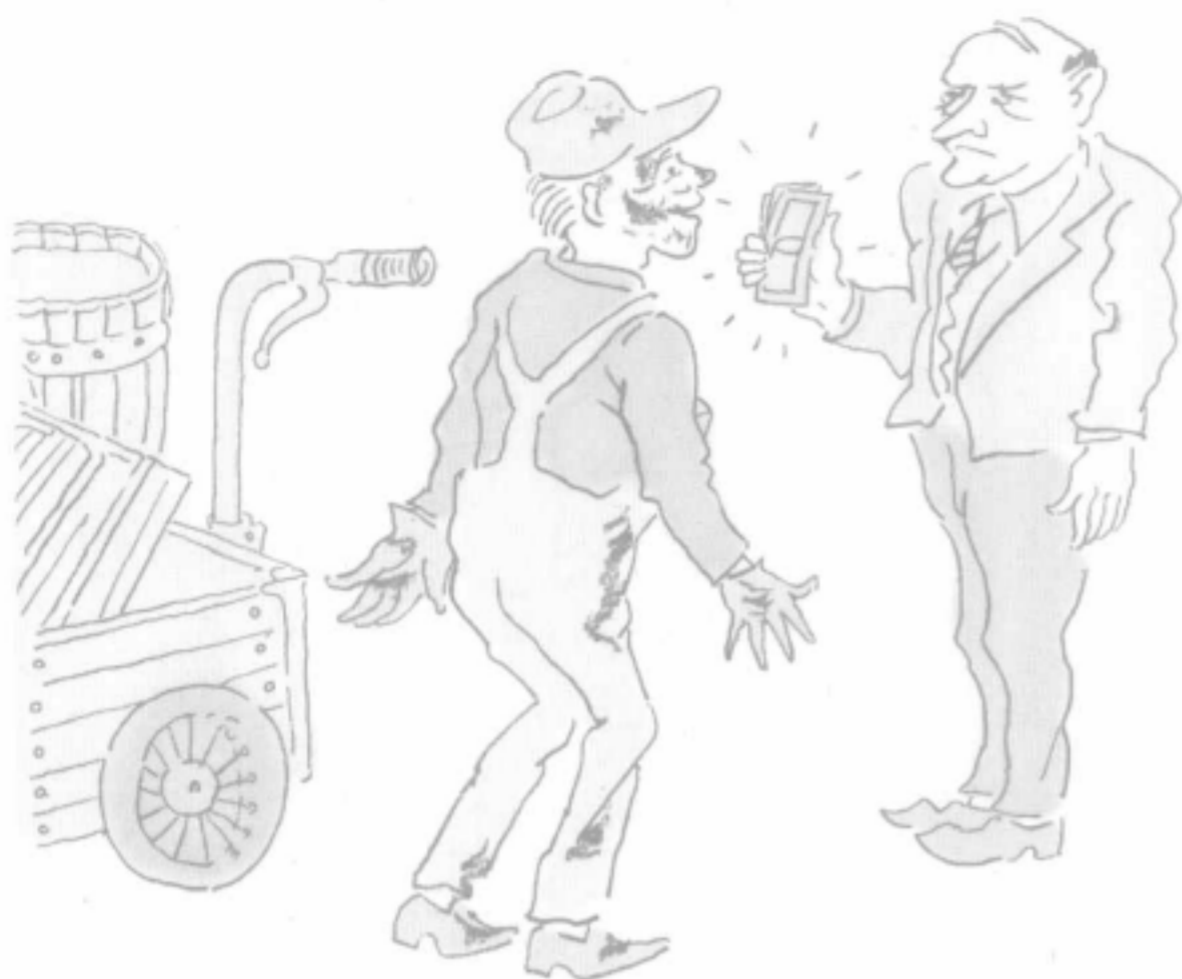
上述结论是不能忽视的，即使财富所有者追求最好的预期收益，因为除了拥有实际的资本资产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办法持有财富，即拥有货币或债券，使新增投资品的生产者进行生产的未来收益不能低于当前利率标准，而当前利率是取决于以流动性和非流动性形式来持有财富的意愿强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对供给量。

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

在资本品的寿命周期中，它的累计收益会超过原有的成本，其唯一的原因在于资本品具有稀缺性，并且由于制造资本品的货币要取得利率而继续得以维持这种稀缺性。如果资本的稀缺性变得较少，超额收益就会减少，但其生产性并没有减少。

因此，我所认同的古典学派以前的理论认为：每一件物品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协助生产要素包括工艺或技术、自然资源和过去劳动的成果。所以，应该把劳动（包括企业家和他助手的劳务）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它只有在既定的技术水平、自然资源、资本设备和有效需求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可以部分地说明，在货币单位和时间单位之外，我们把劳动单位作为我们经济体系的唯一物质单位的原因。

某些长期的生产过程在物质上是有效的，有效并没有因为周期长而具有物质效率，由于时间会造成损坏和浪费，有些长期过程甚至缺乏物质效率。在劳动力不变时，



每一件物品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劳动是唯一生产要素，工人通过劳动获得报酬，是劳动价值的体现。

有益于迂回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是有限的。劳动力在制造车间和使用车间的分配上，应该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当生产过程更多地采取迂回的形式时，即使物质效率在增长，产品的价值相对于劳动成本不会没有限度地增加。只有拖延消费的愿望达到一定的程度，使得充分就业下的投资大到使资本的边际效率是负值时，一个更长时间的生产过程才是有利可图的。实际上，我们应该使短期的生产过程保持足够稀缺性，使它们的物质效率超过由于提

早完成生产而可能遭受到的损失。所以，只有正确的稀缺性理论才能够把对应于利率是正值或是负值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两种情况都概括进去。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来说明：相对于劳动量，劳务和设备是稀缺的和昂贵的。劳动的环境并不都是相同的，均衡的条件要求在较差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物品，必须保持足够的稀缺性以获取高价。但是，如果时间的流逝变成一种较好的工作境况，短期过程就应该被保持足够的稀缺性程度。

当生产过程的最优的迂回性的比例不变时，我们应该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过程。这一比例是指能够在适当的日期满足消费者的延迟需求。换句话讲，它是指：在最优条件下，生产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组织，并且能够提供满足消费者有效需求的产品。

任何物品在利率为零时，都会有一个最优的时间间隔，并且此时劳动成本最低。短于最优间隔的生产过程则在技术上焦虑较低，如果长于最优间隔，则会因储藏费用和损耗，也是低效率。新的项目在利率大于零时出现，它会伴随生产过程的时间延长而增长，以缩短最优的生产期间。同时，为了未来该物品的交货而投入的生产要素会减少，直至该物品的未来价格提高到足以弥补成本增加时为止。利率小于零时，则情况相反。如果消费者需求不变，那么，不同时期的投产相互之间是竞争的关系。因此，



只有未来时期的投产收益不足以弥补从负利率中得到的微小回报时,现在投产才是理智的。绝大多数产品的现在产出效率都会比未来生产时低,因此,就算利率是零,要想今天的生产比未来更有利可图,这种生产的比例还是有很严格的限制的;当利率上升时,这种类型的投产所占的比例会变得更小。

资本同边际效率及利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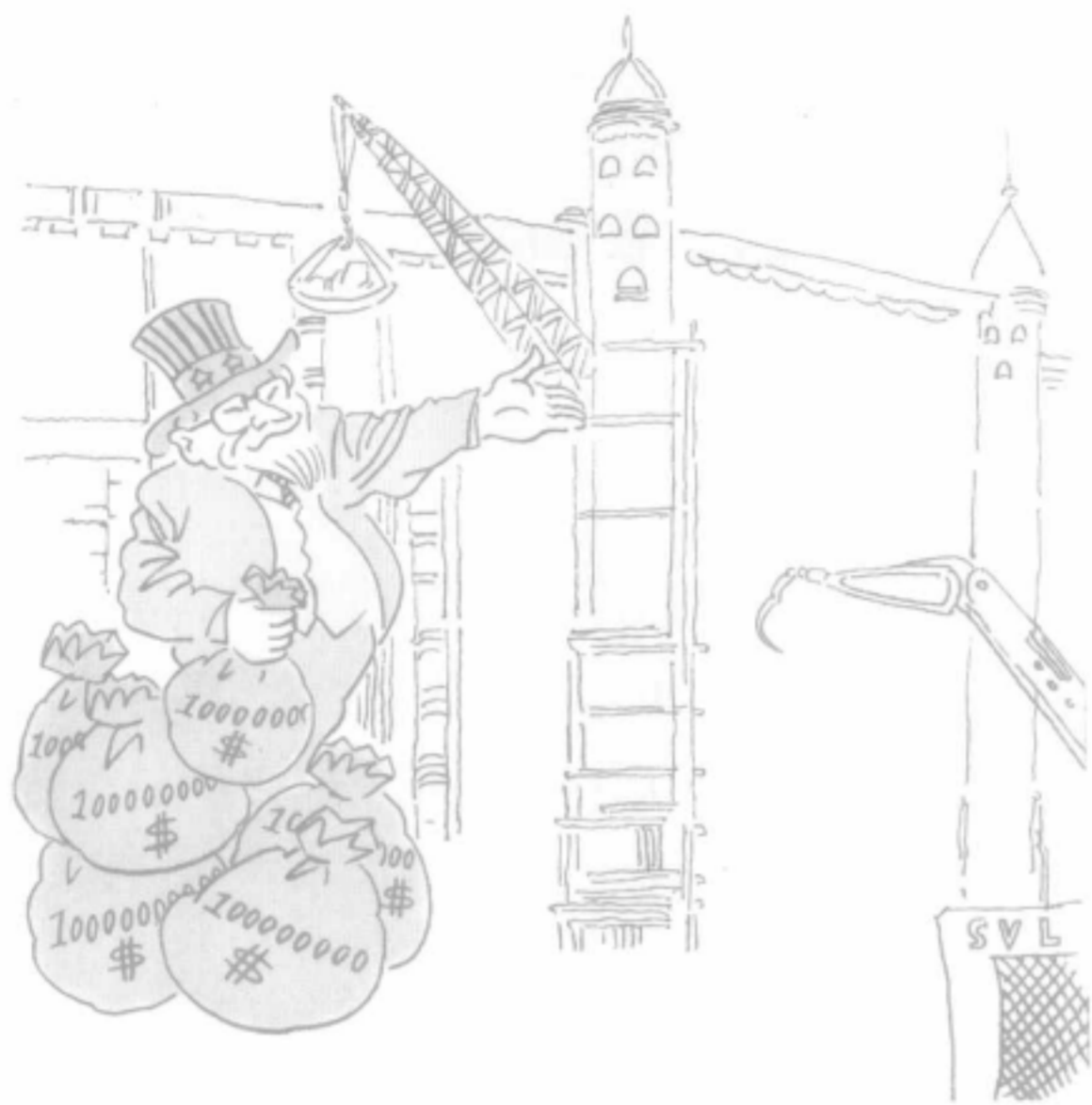
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资本必须保持足够的稀缺性,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率的水平,利率则取决于心理和制度的状况。假定社会中的资本边际效率为零,并且伴随投资的增加,它会继续下降,甚至小于零,同时,货币被“保存”起来的储存费用为零,而且安全可靠,使得其利率不会小于零。那么,在充分就业的情形下,该社会还会进行大量的储蓄吗?

假定经济的初始点处于充分就业,如果企业家还是通过他的全部资本量来提高就业,则他们必然遭受损失。所以,社会的资本存量一定会减少,直至社会总储蓄为零时为止。因此,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均衡时的就业水平很低,而总储蓄则为零。而且,围绕这一均衡水平,经济活动可能表现出伸缩性。资本的边际效率可能会大于零,也可能小于零,从而使得经济在“繁荣”和“萧条”间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为零时的均衡状态下的资本存量必然要小于能够使得充分就业时的资本存量,二者的差额会使得失业在储蓄为零时也会出现。

此外,经济中可能还有另一种均衡:资本量大到足以使资本边际效率为零,财富也等于充分就业和利率为零下的储备。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资本边际效率等于零的资本量不一定与此时的储蓄量相等。所以,如果这种有利的可能性确实能够起弥补作用的话,那么,它可能发生在利率为零之前的某个逐渐下降点上。

我们假定社会体制和组织的双重因素使得持有货币的费用很低,从而使得利率不能小于零。实际上,它们和心理因素共同使得利率处于远高于零的水平。在自由放任社会中,如果利率不能继续下降,那么,我们很难实现财富的再增长。如果最低的利率水平明显地高于零,则在利率达到这一最低水平之前,我们很难满足整个社会积累财富的愿望。

积累的财富过多会使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要快于利率的下降幅度。如果这种情况



即使把积累财富的欲望转向拥有不能增值的财富，也会增加社会福利，如修筑豪华宫殿，但其缓解有效需求的作用仅仅是偶然的且浪费的。

发生在自由放任的社会中，它会阻碍现实经济可能提供的合理的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平。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社会的利益，合理控制消费倾向和投资量，不应该听任它们自由放任地分配。

充分就业下的投资等于社会意愿的储蓄，利率等于资本边际效率。如果此时利率的下降没有资本边际效率那样快，那么，即使把积累财富的欲望转向拥有不能增值的任何财富的资产，也会增加社会福利。因而，历史上才会出现许多宫廷帝王通过横征暴敛来大兴土木，过着糜烂的奢侈生活。但是，所有这种缓解有效需求不

足的方法仅仅是偶然起作用的和非常浪费的，我们不应该继续使用它们。

通过利率控制影响经济和社会

假定我们的决策可以影响利率，使得该利率下的投资量恰好可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又假定国家也从事经济活动，以弥补私人企业经济活动的不足，从而使得资本设备的增长逐渐达到饱和，但同时这又不过分，不会对当代人的生活构成过重的负担。

基于这样的假设，在一个运行良好、具有现代技术资源、人口的增长不太快的社会里，我想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是可能把充分就业时的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到接近于零的。此时，我们将处于几乎静止的社会中，社会变化和进步完全取决于技术、偏好、人口和制度的变革；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价格按照其与构成产品的要素成本成比例的原则来确定。

我认为资本的充裕程度是可以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为零的，这也是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的方法，因为积累起来的财富逐渐丧失了增值能力。

企业经营和管理技术在预测未来收益时可能是发挥不同作用的，因为我们上述说的是没有任何风险的纯粹利率。因此，除非纯粹利率是负的，否则个人的投资技巧仍

然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 【解析】个人储蓄及资本的稀缺性

个人的储蓄行为不是用将来的消费需求代替现在的消费需求,而是纯粹减少现在的消费需求。此外,一般人们推测未来消费时,往往是根据现在的实际消费量进行预测的,以至于当前消费的减少会抑制未来消费。因此,个人的储蓄行为,不仅仅压低消费品的价格,而且还会使得现在的资本边际效率降低;故既减少当期消费需求,又减少当期投资需求。这是因为,在利率的影响下,资本是具有稀缺性的。相对于劳动量,劳务和设备是稀缺的和昂贵的。劳动的环境并不都是相同的,均衡的条件要求在较差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物品,必须保持足够的稀缺性以获取高价。如果资本的稀缺性变得较少,超额收益就会减少。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资本必须保持足够的稀缺性,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率的水平,而利率则取决于心理和制度的状况。假定社会中的资本边际效率为零,并且伴随投资的增加,它会继续下降,甚至小于零,同时,货币被“保存”起来的储存费用为零,而且安全可靠,使得其利率不会小于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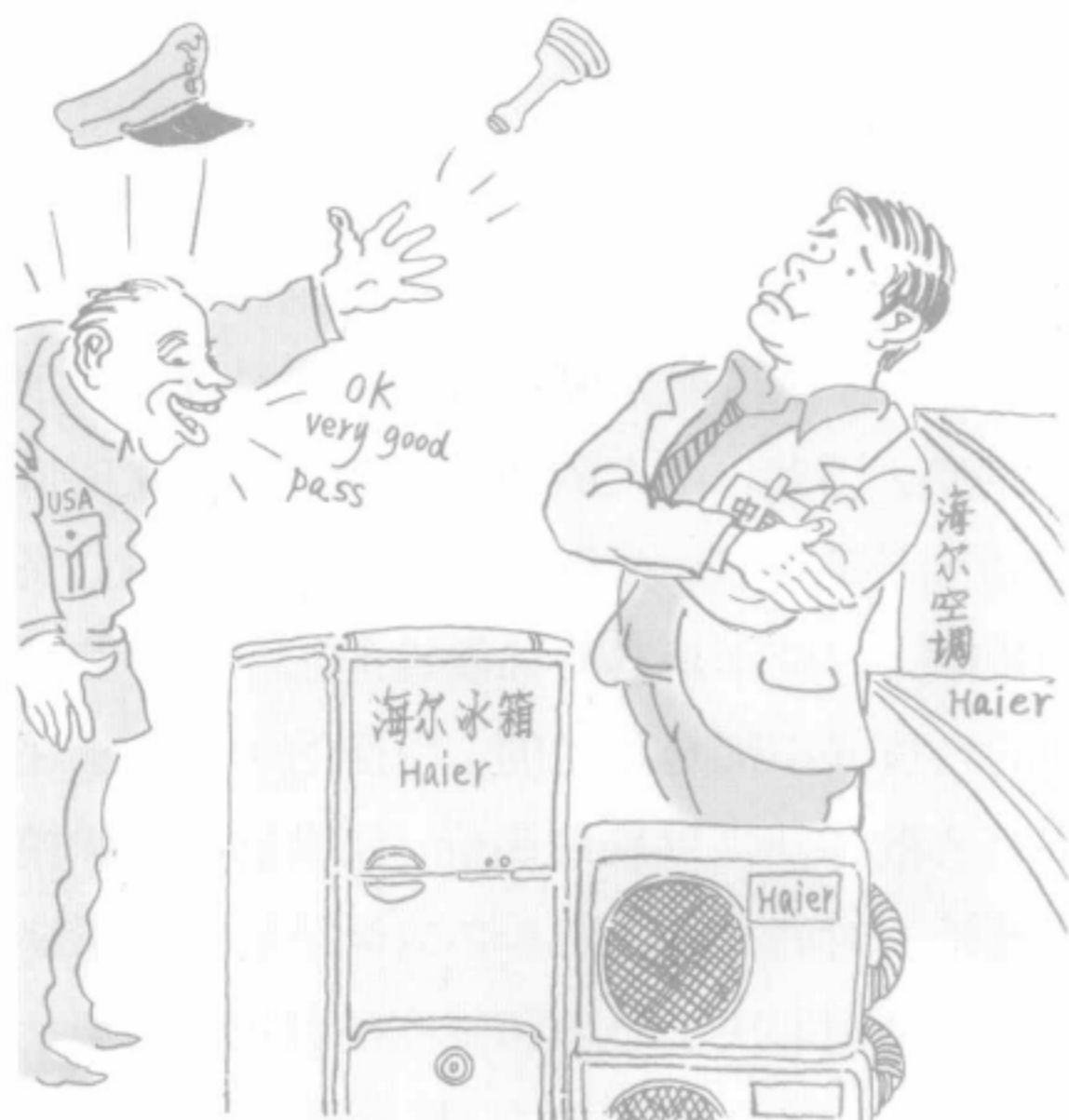
❁ 【案例】海尔集团的发展与资本运营

案例适用:资本稀缺

海尔集团公司的前身青岛冰箱厂是于1984年在引进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成立的。在此之前,冰箱厂是一个亏损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当时人们的质量意识还相当淡漠。1985年4月,冰箱厂当众砸毁了有严重质量问题的76台冰箱,极大地提高了工人们的质量意识,这样做的结果是1988年荣获国家质量奖,1990年获电冰箱行业唯一的国家

海尔集团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其生产工厂已实现现代化。





海尔已发展成为全球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产品行销全球，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代表。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认为企业的壮大发展均须通过某种资本运作来完成，海尔也不例外。

质量管理奖。到1991年，连续五年被全国消费者评为“最受欢迎的轻工产品电冰箱类”第一名，这时的冰箱厂，无论是品牌的知名度还是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1991年12月份，以青岛电冰箱厂为核心企业，以空调器厂、冷柜厂为紧密层企业，经过改制，组建了海尔集团公司。海尔集团通过技术开发、精细化管理、资本运营、兼并控股及国际化，使集团公司迅速成长为1996年在全国500强中名列30位的大型企业集团，1992年到1996年五年间，海尔集团销售收入从8亿元飙升至61.6亿元，1997年1-8月份销售收入达66亿元。目前海尔集团产品包括电冰箱、冷柜、空调器等13个门类5000余个规模品种，并批量出口到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海尔商标在1996年的无形资产价值达到77亿，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家电第一名牌。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格勒曾说过：纵观世界上著名的大企业、大公司，没有一家不是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通过资本运作发展起来的，也没有哪一家是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利润的积累发展起来的。

海尔集团发展如此迅猛，完全得益于有效的资本运营模式，抓住有利时机，实现了低成本的资本扩张，其中最显著的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股权融资，发行海尔冰箱股票，募集社会资金；二是以无形资产兼并有形资产，进行兼并重组，实现高效率的规模扩张。

1993年国家发展资本市场，海尔集团抓住这个机遇，积极筹备冰箱公司上市，1993年11月份海尔冰箱股票上市，募集资金3.69亿元，1996年通过配股又募集资金1.43亿元，这些资金先后用于扩大冰箱产量及相关项目上，得到了最有效的运用。股票的上市也使企业面临了新的压力，由过去仅面对用户、员工，转变为要面对股东、员工、用户。股东要求企业每年给他较高的利润回报，员工要求工作环境不断改善，工资待遇不断提高，这样一来，企业上市后面临的压力比上市前大得多，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必须形成一个股民、员工、用户互动的价值链，从而保证资产质量的不断提高。上市三年多，海尔通过改制，使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冰箱产量是由上市时1993年的30多万台，猛增到1996年的151万台，增长了5倍，企业利润总额也由1993年的8187万元，增长到1996年的20065万元，增长了2.5倍，员工的工作环境、工资收入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提高，公司股本由1993年上市的1.7亿元扩张为1996年末的3.26亿，而公司每股收益却由上市时的0.41元，增长为1996年的0.55元，公司在三年的时间里，股本翻一番，而每股收益不但没有稀释，反而有提高，也就是说企业在不断扩容的同时，资本利润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从根本上保证了股民的权益。通过股票上市从而转变企业的机制，形成股民、员工、用户互动的价值链，这是他们在资本市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成功地利用资本市场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外，公司在企业兼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功。在这方面，海尔提出了“吃休克鱼”的思路。所谓休克鱼是指硬件条件很好，管理却滞后的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落到了市场的后面，一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把握住市场就能重新站起来。在国内现行体制下，活鱼不让吃，吃死鱼会闹肚子，因此只有吃休克鱼，而海尔擅长的就是管理，还有手中的王牌价值77.36亿元的海尔品牌，这样就找到了海尔与“休克鱼”的结合点。在资本运营的实践中海尔集团坚持“吃休克鱼”的策略，十三年来共兼并了亏损总额5.5亿元的十四家企业，盘活了14.2亿元资产。

从青岛电冰箱总厂发展到现在，随着企业制度的完善、管理的深化，海尔集团在

企业兼并及盘活资产方面，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8—1990年）主要是投入资金，全盘改造。青岛电冰箱总厂通过与德国利勃海尔合资，引进了先进技术，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同时，狠抓产品质量，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到1985年6月，生产出我国第一台四星级电冰箱，1988年荣获中国冰箱史上第一枚金牌。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电冰箱总厂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都有所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考虑由原来的单一产品经营向多种产品经营转变。1988年电冰箱总厂兼并了当时的青岛电镀厂，改造为微波电器厂，通过向微波电器厂注入资金引进生产设备，经营管理和企业效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第二阶段（1991—1994年）主要是投入资金，输入管理，扩大规模，提高水平。

在这期间，青岛电冰箱总厂无论是在品牌的知名度还是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经多年探索后首创的OEC管理获得了三位副总理的肯定，被国家经贸委向全国推广，各地企业纷纷竞相学习，一时传为佳话。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规模还相当小，年产电冰箱共有30万台，而要在中国家电市场获得发展并逐步走上国际市场，必须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为了壮大实力，实现强强联合，电冰箱总厂1991年兼并了原青岛空调器厂和青岛冷柜厂，通过投入资金，狠抓企业管理和海尔文化，依托海尔的品牌和服务网络，经济效益得到了可喜的提高，1992年到1996年，冷柜、空调的产量分别提高了4倍、14倍。

第二阶段兼并方式与第一阶段相比，除了投入资金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将海尔的企业文化与OEC管理体系移植到被兼并企业中，创造出一个具有活力的新机制，使企业迅速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此阶段的兼并方式主要是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以海尔名牌及OEC管理体系移植到被兼并企业中，转换机制，实现精神变物质。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是海尔集团兼并原青岛红星电器公司。该公司原来在青岛是与青岛电冰箱厂齐名的企业，其生产的琴岛夏普洗衣机是国内三大名牌洗衣机之一，但由于该企业管理不善，企业缺乏凝聚力，致使企业效益连年滑坡，至1995年企业状况相当糟糕：总资产为4亿元，而总负债达5亿多，资不抵债1.33亿，负债率高达140%多。当青岛市政府决定将红星电器公司整体划归海尔集团的消息一公布，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这么大的包袱背得动吗？”而海尔集团接管红星电器公司后，将它改组为海尔洗衣机总公司，在输入成套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以对人的管理为重中

之重，把海尔的“名牌战略”、“用户永远是对的”、“真诚到永远”、“向服务要市场”、“卖信誉不是卖产品”、“高标准、业绩化、零缺陷”、“创造市场”、“人人是人才”一系列企业经营理念贯注于员工身心，由此来统一企业的思想，锻造员工的意志，重铸企业的灵魂，这些理念像一只无形的手将原来的几乎溃不成军的职工队伍凝聚起来，并提升到一种有序、自律、迅捷的作业状态，使其勃发出强大的生命张力，使企业获得了超常发展：三个月扭亏，第五个月赢利150万元，第二年一次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荣获中国洗衣机“十佳品牌”、消费者购物首选品牌、开箱合格率等8项第一；市场占有率到1996年底，在全国百家大商场的份额已上升到22%，1997年上半年又上升到28.31%，比第二名高出5个百分点。国际市场占有率更是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名牌，全自动洗衣机出口日本数量已占到全国出口总量的95%，占日本进口总量的61%……在此基础上，1997年5月兼并后的洗衣机公司以品牌作为投资控股兼并了广东顺德洗衣机厂，组建了顺德海尔电器公司，并在两个月之内恢复生产，创造出了让“可怕”的顺德人都连称可怕的海尔速度；1997年9月又与杭州西湖公司合作，利用海尔无形资产的价值，没有投入一分钱，控股组建了杭州海尔电器公司，研制开发出海尔牌系列彩电。

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化生产运营中，无形资产管理及企业的培养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使海尔的产品种类迅速增多，整体竞争力大大增强。海尔集团资本运营的模式就是“吃休克鱼”，兼并一个企业时主要考虑兼并之后能否带来效益，而不以该企业的财务报表为依据，为了休克鱼的复苏，有时需要付出资金，但如果可以很快在一个领域里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这样就值得做。兼并红星电器公司时，它亏损了近2亿元，但比起重新建厂还是很划算，而且红星的设备、销售网络还比较完善，这样只要把经营管理抓好，整个企业很快就能上去。当时，海尔派去的第一个部门，不是财务，不是科研，而是海尔企业文化中心。他们深入红星员工，耐心讲述“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讲述OEC管理的深刻内涵，这就是海尔企业文化，其精髓就是“先造人才，再造名牌”、“造物先造人”，正是用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无形资产来盘活有形资产，海尔由此创造了中国大企业集团资本运营里程上的新思路、新模式。

海尔集团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及企业兼并重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

1. 进入资本市场的目的。海尔公司是1993年通过冰箱股票上市才进入到资本市场的,进入资本市场后,他们深深感到进入这一领域,其目的不应简单地为了筹集资金,而应通过改制使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公司整个资产的保值、增值,使股民的利益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2. 在企业兼并重组方面,他们成功之处在于有成功的企业文化和成熟的可扩大推广的海尔管理模式。海尔通过向被兼并企业注入海尔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员工的思想,把海尔企业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以及“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工作作风灌输到每个员工心里,使整个企业的精神风貌有一个质的飞跃,使企业形成一种凝聚力。也就是说,海尔进行企业兼并重组,并不是把几个企业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向被兼并方输入海尔文化,转变观念,转换机制,实现精神变物质,从而提高“联合舰队”的整体战斗力。

近年来有的国有企业不太景气,不能说不与企业没有良好的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文化有关,使企业没有凝聚力,从经营机制上看,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没有真正得到转换,有些公司上市的目的只是着眼于筹资,而不是保证企业资本利润率的逐步提高。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在逐渐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逐步转换经营机制,使企业资产不断增值,这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所在。

案例评析:

海尔集团的成功在于,在经济社会资本稀缺的前提下,懂得从提升设备技术、劳动者素质还有管理水平入手。另外,在资本稀缺的因素下,良好的资本运营手段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资料来源:佚名:《海尔集团的发展与资本运营》,慧聪网 2003-12-31)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货币利率对新资产的边际效率有制约性，从而对就业水平起着特殊的限制作用。不同商品具有不同的利率，不同的货币利率也是不相同的。货币利率具有这样的特性，它能使当前产量增加时，以货币自身所计量的利率比任何其他资产用其自身计量的利率更加难以下降。

利率的特征

货币的利率对新生产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有制约性,因而它也对就业水平起着特殊的限制作用。因此,人们会问:货币和其他资产相区别的特殊性是什么?是否只有货币才有利率?非货币经济社会会发生什么情况?



麦子作为商品,也存在类似利率的东西,用其本身价值来计量,如现货小麦价格与期货价格存在差别。

实际上,利率只是把在将来(例如一年以后)支付的货币减去该笔货币现在价格作为分子,把现在的价格作为分母,所得的一个百分比。这样说来,每种资产都存在着一个类似利率的东西。假定今天交货100石麦子,如果你想在一年之后交货,那么就会规定一个具体的数量,比如说须交105石,则该麦子的利率为每年5厘,须交95石,则利率为负5厘。同时,耐久性的商品也不例外,都有一个用它本身计量的利率。

拿麦子来说,麦子在市场上的期货价格以及现货价格,是与麦子的利率有一定关系的。但因为计算期货价格的是未来所支付的货币,而不是麦子,因此,货币利率也掺杂在其中。其关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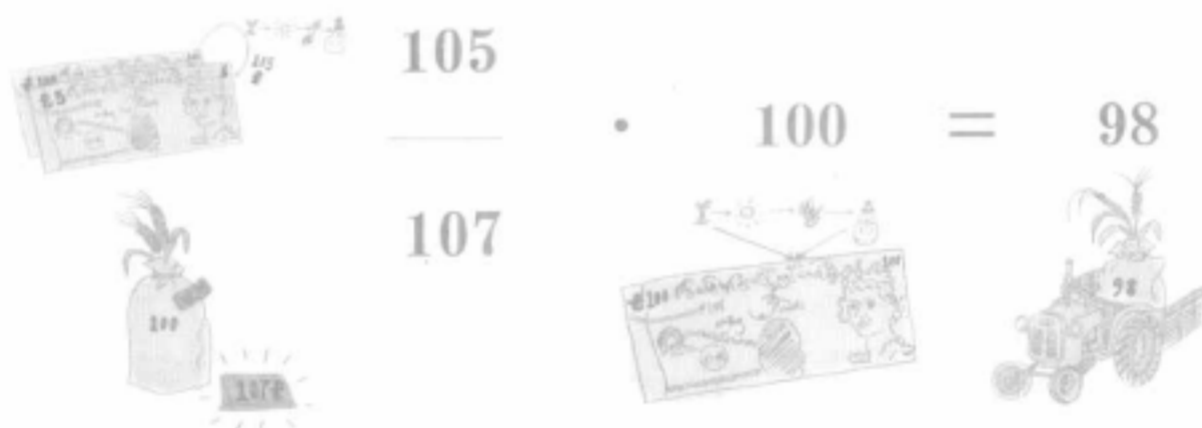
设麦子的现货价格为每100石100英镑,一年后期货价格为每100石107英镑,货币利率为年息5厘,那么麦子的利率是多少呢?可以这么说,由于货币利率为5厘,则100英镑在一年后就变为105英镑,那么在一年后可以购得 $\frac{105}{107} \cdot 100 = 98$ 石麦子。而用这100英镑可以购买现货是100石麦子。因此,现货100石麦子可以购得期货98石麦子,故麦子的利率为年息负2厘。

期货

一般的期货指的是期货合约，即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这个标的物，又叫基础资产，对期货合约所对应的现货，可以是某种商品，如铜或原油，也可以是某个金融工具，如外汇、债券，还可以是某个金融指标，如三个月同业拆借利率或股票指数。广义的期货概念还包括了交易所交易的期权合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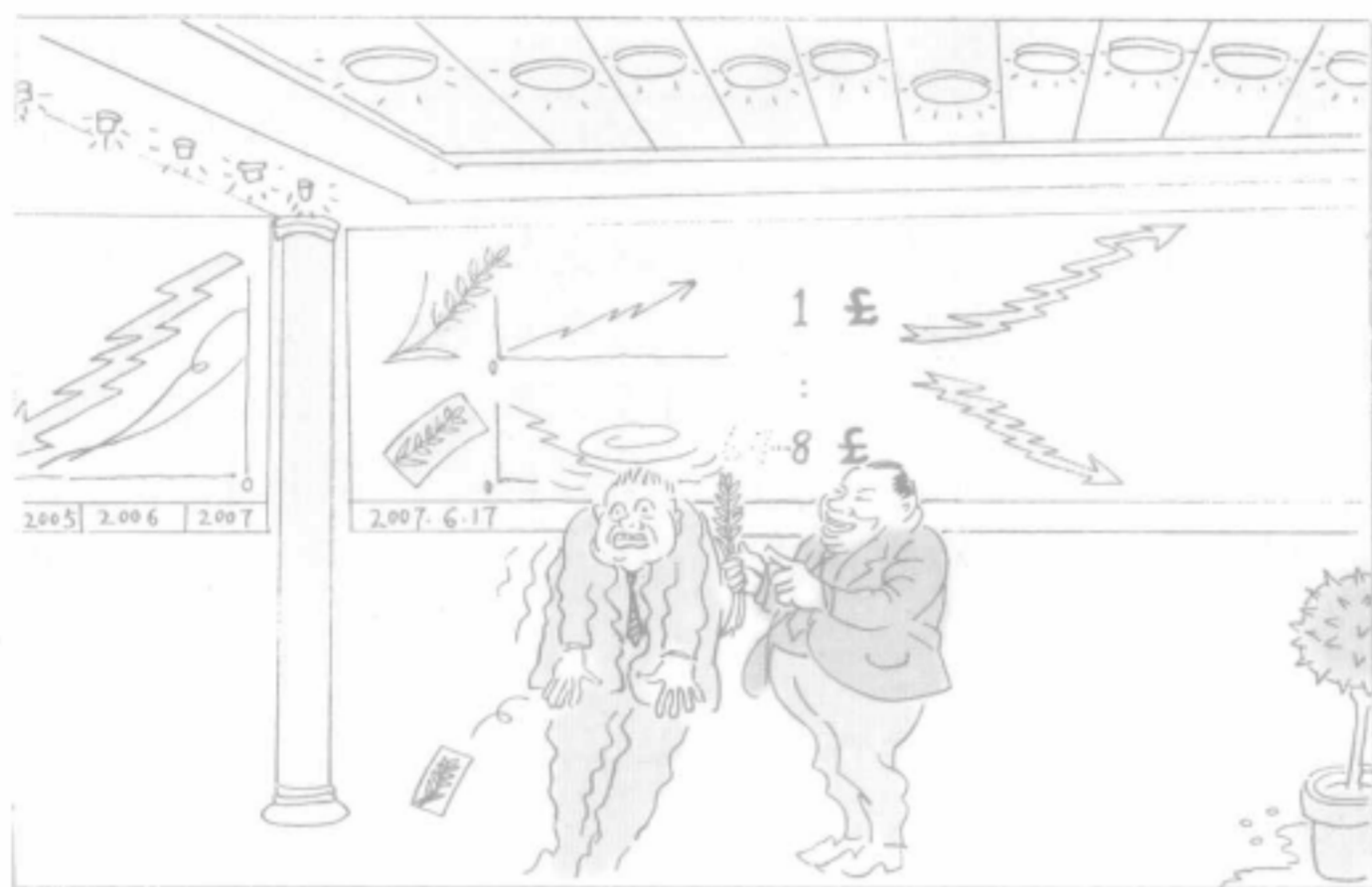
英镑

英镑是英国国家货币和货币单位的名称。英国虽是欧盟的成员国，但尚未加入欧元区，故仍然使用英镑。英镑主要由英格兰银行发行。最常用于表示英镑的符号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为英镑取的ISO*4217货币代码为GBP。除了英国，英国海外领地的货币也以镑作为单位，与英镑的汇率固定为1:1。



因此，我们推测出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利率。因为从市场来看，不同商品“现货”与“期货”合同的差别是不同的。各种商品自身的利率中，真正起作用的很可能是位居最高数值的货币的利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不同商品存在不同的利率一样，不同的货币的利率也是不同的。

现在每种商品都可以作为标准来衡量资本边际效率，我们能够随便地选择一种商品来表示其他任何资产的价值。我们以小麦为例来计算任何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的价值和以小麦计量的该资产的贴现率（它等于该资产的边际效率）。实际上，资产的贴现率就是作为衡量标准的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如果它不会变化，那么我们采用任何一种作为衡量标准，由此得到的每一项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都将相同。因为引起资本边际效率变化的分数的分子与分母是按照相同的比例变化的。但是，如果我们预期作为衡量标准的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了变化，那么根据作为衡量标准的商品的变



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会按照相同数量发生改变，故其边际效率大小的顺序与衡量标准无关。

化，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也会发生同一百分率的变化。例如，作为两种衡量标准之一的小麦，预期其货币价值以每年 $a\%$ 的比例平稳上升，同时假定另一项资产以货币计量的边际效率为 $x\%$ ，则它用小麦来计量应该是 $(x - a)\%$ 。由于所有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会按照相同的数量发生改变，因而资本资产的边际

效率大小的顺序与选择的衡量标准是毫无关联的。

如果有某种复合商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具有有一种代表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复合商品计量的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当做唯一的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不过，这里所遇到的困难和我们建立唯一的价值标准的过程是一样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种结论：货币利率同其他利率相比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殊性。那么，我们在以前各章里所赋予货币利率在现实中具有支配地位的重要性，到底来自于它的哪些特点呢？为什么产出量和就业量与货币利率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小麦利率或者房屋利率密切联系在一起呢？

不同类型资产的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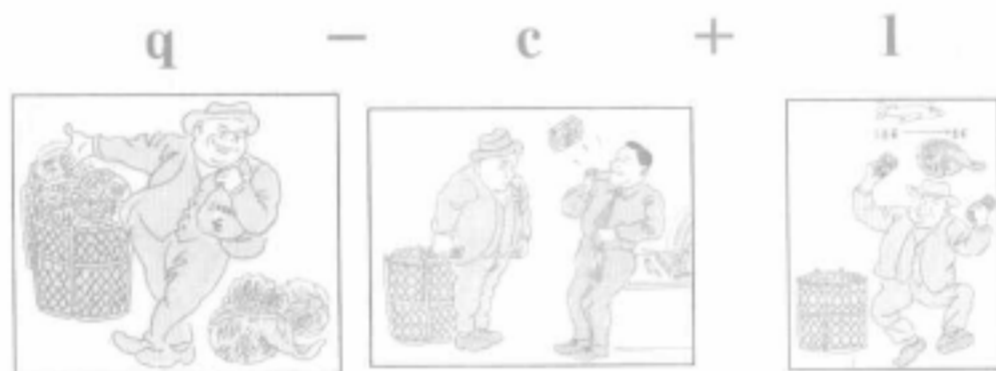
我们来考察一下各种商品利率在一个时期内对不同类型的资产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既然每一种商品都轮流被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每一种商品的收益也就必须用它的自身的数量来衡量。

不同类型的资产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三种性质：①通过其有助于某种生产过程，或者为消费服务，一些资产可以生产出一个用其自身来计量的收益或者产量 q ；②除了货币以外，绝大多数的资产不管它们是否被用于生产某项收益，都会受到损耗，或者

仅仅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引起一些费用（除去它们的相对价值的任何变化），即它们会引起一种用其自身计量的保管费 c 。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通过划出一条线来区别在计算 q 时应减去的费用，还是在计算 c 时应加上去的费用，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所关心的只是 $q - c$ ；③资产的变现能力代表了它在一个时期内向人们提供的一种潜在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不同资产的原始价值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它们提供的各自的便利性却是不同的。我们把人们愿意为资产变现能力所提供的潜在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而支付的代价称之为流动性升值 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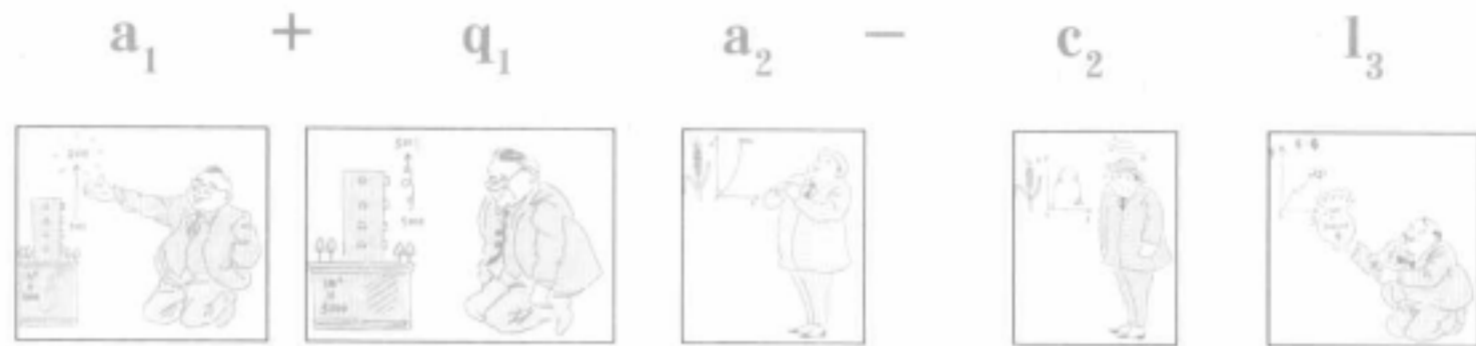
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一种资产预期全部收益等于它的收益减去保管费加上它的流动性升值，即 $q - c + l$ 。换句话说， $q - c + l$ 就是商品自身的利率，其中， q 、 c 、 l 是用该商品自身作为标准来衡量的。



一般情况下，正在使用的资本或者消费资本的收益 (q) 应该大于它的保管费 (c)，而它的流动性升值 (l) 却是微不足道的。对于流动性商品的存货或者剩余闲置不用的资本，以及消费资本来说，它们要承担保管费，却没有任何收益，而且它们的流动性升值通常也是微不足道的。至于货币，它的收益为零，保管费用几乎也为零，但它的流动性升值却非常大。不同商品的流动性升值程度是不同的。货币虽然可能承担某种程度的保管费，但是它和所有其他资产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流动性升值大大超过其保管费，而其他资产的保管费则大大超过其流动性升值。

要决定不同类型的资产在均衡状态下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知道各种资产的相对价值要发生的变化。我们把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同时假定住房的预期升值（或者贬值）比例为 $a_1\%$ ，小麦为 $a_2\%$ 。我们令 q_1 、 $-c_2$ 和 l_3 分别作为它们自身衡量标准，则 $a_1 + q_1$ 、 $a_2 - c_2$ 和 l_3 ，分别被称之为住房折算成货币后的利率、小麦折算成货币后的利率以及货币自身的利率。因而，财富所有者是选择住房、小麦还是货币，

完全取决于 $a_1 + q_1$ 、 $a_2 - c_2$ 和 l_3 三者之中哪一个数值是最大的。在均衡状态下，根据货币计量的住房和小麦的需求价格必然是相等的，即 $a_1 + q_1$ 、 $a_2 - c_2$ 和 l_3 三者完全相等的。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价值标准的转换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决策，因为任何价值标准的改变必然也使得上述三项都做出同样的改变，即改变的数量都等于新标准（用旧标准计量）所预期的增量（或者减量）。



新生产出来的那些资产，它们的需求价格一般都应该大于其供给价格，而且他们的边际效率（以正常的供给价格计算）也都比利率（只要所用价值标准的衡量皆相同）更高。对于那些初始的资本边际效率至少等于利率的资产来说，它们的资本边际效率随着其存量增加而逐渐下降。除非此时的利率也下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恰好能够等于这种下降的利率，否则该资产的停止生产点便很快会来临了。当没有任何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率时，资本资产就不再会有进一步的生产。

我们假设有某种资产的利率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各种资产将如何进行调整呢？

商品因市场销路没打开，滞销而租赁仓库存放，所产生的保管费，要因该商品利率的变动才能得到补偿。



既然 $a_1 + q_1$ 、 $a_2 - c_2$ 和 l_3 三者必须是相等的，同时依据假定， l_3 是固定不变的或者是比 q_1 、 $-c_2$ 的下降更为缓慢，所以 a_1 和 a_2 必然上升。换句话说，除了货币之外，任何其他商品的现在价格相对于其未来价格来说必然趋于下降。所以，如果 q_1 和 $-c_2$ 继续下降，将会达到这样的点，在该点，生产任何商品都是无利可图的，除非该商品未来的生产成本与现在生产成本的差额，能够补偿现在生产的商品储存到未来高价出售时所需的保管费。

现在严格地说来，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货币利率限制产量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我

们应该说：当资产的数量普遍增加时，货币资产的利率下降最为缓慢，以致最终使得其他资产的生产都无利可图。因为当产量增加时，其他资产自身的利率会比生产有利水平时的利率低。此时，不同资产会接二连三地降低到有利可图的生产水平以下，直到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自身的利率大于任何一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水平为止。

如果我们把货币只是作为价值标准，那么，造成困难的原因并不一定是货币利率。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一道法令用小麦或住房代替黄金或者英镑作为价值标准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因为只要继续存在着这样一种资产，当产量增加时，它自身的利率难以下降，我们还是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货币的特点

货币利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即当产量增加时，以货币自身所计量的利率比任何其他资产用其自身计量的利率更加难以下降。我认为，我们对货币性质的这种假定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1. 抛开货币当局的行动，单纯对于私人企业来说，货币的生产弹性在短期和长期中都是零或至少是极小的，这一系数反映了生产货币的劳动量对单位货币所能支配的劳动增加量的比例关系，实际上零弹性说明了货币不能很轻易地被生产出来。

产出率的提高使得资产数量会增加，因为具有生产弹性的资产的利率会降低。但是货币不同，它不能很轻易地由劳动生产出来，其自身的利率难以下降。同时，货币不像谷物那样生长或者像汽车那样能够被制造出来，因而这就难以避免经济萧条。

2. 货币有别于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商品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替代弹性等于或者接近于零，即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升时，没有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商品能够替代它。所以，货币的这个特点在于它的效应仅仅取决于它的交换价值，而它的交换价值会和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同比例变化，结果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升时，没有其他生产要素来替代货币的动机或倾向。

这样，当以劳动计算的货币的价值上升时，人们不可能投入更多的劳动来生产货币；当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时，人们不会减少对货币的需求。所以，货币是购买力的无底洞。

此处唯一的限制条件在于：当货币价值上升时，人们怀疑这种上升势头能否持续下去。这种疑虑使得 a_1 和 a_2 会增加，这就等于提高了商品的货币利率，从而刺激其

他资产的生产。

3. 尽管货币的数量不能通过劳动转移来增加其供应，但我们还是不能说货币的供给是完全缺乏弹性的。当工资单位降低时，一部分现金会从其他用途中转移出来以满足流动性偏好的动机；当货币价值降低时，货币的存量在社会财富总额中会占有一个较高的比例。

下面几点理由，有力地印证了货币利率总是难以做出适度的下降：

(1) 工资单位的下降影响了其他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因为我们关心的是这种资本边际效率和货币利率的差额。如果工资下降，人们预期它还会再次回升。那么，结果对我们的论点是有利的；如果人们预期工资还会进一步下降，则资本边际效率对比的反应可以抵消利率的下降。



人们的预期工资进一步下降，资本边际效率对比的反应可以抵消利率的降低。

(2) 名义货币工资的刚性难以使以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迅速下降。否则，会出现更糟的情况，如果货币工资容易下降，人们往往预期它还会进一步下降，不利于资本边际效率。

(3) 最基本的因素在于货币具有流动性偏好的特点。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货币数量的增加超过某一点时，货币由于流动性而得到的收益并不随着它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即使它下降，也达不到其他类型的资产由于数量同等程度增加而导致的收益下降幅度。

在上面的分析中，微小的货币保管费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相当大的保管费会抵消持有货币而得到的好处。尽管面临比较小的刺激，但人们依然愿意增加货币的持有量，就在于流动性的好处，而不用考虑由于时间的流逝而大量增长的保管费。其他商品则面临储存费和损耗等费用高的问题，如果持有大多此类商品，则这些费用往往会抵消持有的好处。所以，当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人们必然会由于持有的数量较大而蒙受损失。

但是，货币并不是这样，因为它最具有流动性。因此，一些改革家们建议通过创



造货币的保管费来继续保持其货币资格。他们的思路是正确的，其建议也很有价值。

所以，货币利率的重要性是其三个特点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流动性偏好使得利率不与货币数量在整个财富中的比例变化相适应；第二，货币具有零值（或忽略不计）的生产弹性；第三，货币具有零值的替代弹性。第一种情形意味着货币的需求在财富的比例中更大；第二种情形意味着劳动不能被用于生产更多的货币；第三种情形意味着其他生产要素即使具有很好的货币替代性也不能缓解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唯一的缓解办法是：改变资本边际效率、增加货币数量、提高货币价值，从而使既定量的货币提供更大的服务。

因此，货币利率的提高会抑制对利率有弹性的一般商品的生产，而不能刺激货币的生产（假设货币生产完全缺乏弹性）。货币利率可以通过高于所有其他商品利率来阻止所有其他商品生产的投资，同时又不刺激货币本身生产的投资，因为我们假定货币是不能被生产的。由于投资动机的货币需求具有弹性，因此货币利率对于需求的微小变化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货币的零生产弹性使得我们不能通过自然调节作用影响货币的供给以降低货币利率。普通商品的情形则并非如此：它们的利率对于其需求反应敏感，波动性大；它们具有较大的供给弹性，这限制了其现货价格超过期货价格的差额。这样，对于普通商品来说，市场的自由力量会倾向于降低它们的利率，直到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在不存在货币和任何其他具有货币特点的商品的条件下，各种利率只有在充分就业时才能达到均衡状态。

所以，失业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想要得到海市蜃楼般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又是不能被生产的。补救的方法只能是劝说公众相信纸币也是货币，而且要求政府控制生产纸币的工厂（即中央银行）。

眼睁睁看着一版版钞票从手中出去，却与自己无关，印钞厂工人的心理素质，必然是久经考验的。



高利贷

高利贷是通过放货币或实物以牟取高额利息的借贷行为，即一种利息超过正常利率的借贷。对于高利贷的定义，我国民法学界历来有多种不同的看法。高利贷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它是信用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在现代银行制度建立之前，民间借贷都是利息很高的。

此外，传统上我们认为黄金最适合充当价值标准的特点，是因为它的供给缺乏弹性。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特点，最终成为形成问题的关键。

当所有现存资产自身的利率中的最大者等于所有资产的边际效率最大者时，投资量不可能进一步增加。这便是我们最一般的结论。

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时，这个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但是，如果有某种资产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都等于零，而且当其产量增加时，它本身利率的下降速度，比其它各种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用该商品本身来衡量）为慢时，这个条件在充分就业之前也能得到满足。

货币利率为唯一重要利率

我们已经指出：一种商品被作为价值标准，并不是使它的利率具有重要意义充分条件。不过，研究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货币利率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利率的特点与货币作为债务和工资的衡量标准，它们之间有多大程度的联系。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契约关系是用货币标准加以固定的，而货币工资通常比较稳定。这使得货币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升值。如果持有的资产和未来偿付债务的单位相同，以及同一单位的未来生活费相对稳定，则持有这种资产是很便利的。同时，如果将一种具有极大生产弹性的商品作为价值标准，人们便会怀疑这种商品的货币成本是否能保持稳定。此外，货币极小的保管费和高流动性升值在决定货币利率成为唯一重要利率时发挥同样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流动性升值和保管费之间的差额。而且，除去金、银和银行券之类的资产之外，大多数商品的保管费，至少等于作为契约和工资

的价值标准的商品所具有的流动性升值。因此，尽管契约和工资用货币为价值标准来对这一事实加以规定，并由此提高了货币利率的重要性，但这还不足以导致货币利率具有重要性。

其次，我们找不到货币的替代品。一般来说，正是货币工资的刚性才使得人们预期以货币衡量的产出价值会更稳定。如果我们寻找到某种商品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成本是相对稳定的，而且储存它的额外费用为零，即它的流动性升值大于保

管费，则该商品就可以被用来替代货币。因此，我们至少在逻辑推理上能寻找到货币的替代品。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不大可能得到这样的商品。

所以，货币的流动性升值总是高于保管费的差额，大于任何其他资产的这种差额，这一现象必然使得人们预期用货币衡量的工资具有更大的刚性。

正是上述各种不同的特点以积累的形式相互发生作用，共同使得货币利率成为唯一重要的利率。货币具有较低的生产弹性、替代弹性和保管费的事实，增强了人们对货币工资将会相对稳定的预期，而这个预期又强化了货币的流动性升值，并且阻止了货币利率和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之间异常的关系。幸好没有这种关系，否则货币利率便失去了其重要地位。

此外，由于消费倾向和投资因素较小的改变会引起价格的剧烈变化，庇古教授的实际工资相对稳定的观点在事实和逻辑上都是错误的。货币工资应该比实际工资更稳定，这是经济体系保持内在稳定性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假定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即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变化很小，则不会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庇古教授实际工资相对稳定的观点恰恰与此相矛盾。



工人签订契约和工资待遇均以货币为价值标准，但这还不足以导致货币利率具有重要性。

财富持有方式及土地货币化

我还想强调的是：“流动性”和“保管费”都是个程度问题，而“货币”的特征只是流动性相对高于保管费。

在一个“非货币”的经济体系中，没有一种资产的流动性升值总是高于保管费，只存在各种具体的消费品和资本设备。资本设备的互相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所能帮助生产的消费品不同；②产品价值的稳定性不同；③体现在它们之中的财富能够被“流动化”的程度不同。

因此，财富的所有者要权衡资本设备的“流动化”的能力和补偿风险的预期收益，从而决定持有财富的形式。流动性升值与风险费用部分相似，又部分不同。这种区别是我们的概率和我们在进行估计时的信心之间的差异。在计算商品本身的利率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未来收益中有多少是来自于流动性的，有多少是来自于风险补偿的。

“流动性”不是绝对的，只是程度的大小不同。持有不同形式的财富，要考虑财富的保管费和使用它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升值。“流动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由社会现实和社会制度来决定。然而，在任一时间，财富所有者对于流动性所表现出来的偏好是确定的，这是我们分析经济体系运行时所必需的。

在历史上，财富所有者曾经偏好于占有土地，因为他们认为土地具有高的流动性升值。由于土地具有低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人们持有土地的愿望和现代持有货币的愿望相同，都把利率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甚至我们可以用抵押土地时的高利率来量化土地的这种特点。土地抵押的高利率往往高于种植土地得到的净收益。禁止高利贷的法律主要就是反对这种借款，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早期的社会组织中没有今天的长期债券。如果土地抵押借款的利率很高，会阻碍投资（生产新资产），从而阻碍财富的增长。

经过几千年的个人储蓄之后，世界的资本资产积累还是非常贫乏，我认为这是由于过去对土地所有权、现在对货币所赋予的过高的流动性升值所造成的，而不是人类浪费的倾向或是战争的破坏所能解释的。

自然利率和最优利率

在《货币论》中，我曾把我认为的唯一的利率定义为利息的“自然率”，即储蓄量等于投资量的利率。我相信这是对维克赛尔的“自然率”的发展，而且使它更加明

确。他说自然利率是一种能使物价水平保持稳定的利率，但他没有明确规定物价水平的程度。

但我当时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任一就业水平下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率；对应于每一个不同的利率，都有一个使该利率成为“自然率”的就业水平，经济体系在该利率和就业水平下处于均衡状态。所以说，只有一个自然利率或者认为不论就业水平如何，根据这个定义，都可以得到唯一的利率，这些都是错误的。当时，我还不明白：在特定的条件下，经济体系是能够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非均衡状态的。

我认为，过去一直觉得很重要的“自然”利率理论对我们现在的分析不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确实存在一种唯一且重要的利率，那么，它应该是“中性”利率，即在经济体系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那个自然利率。我们把它称为“最优”利率更为恰当。中性利率可以严格定义为：产量和就业量达到均衡状态时使得整个经济体系的就业弹性为零的利率。

以上论述，更使古典学派的利率有意义，即经济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假设条件的问题。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假定实际利率总是等于我们所说的中性利率，或者实际利率总是等于能把就业量维持在某一固定水平的利率。那么，我们与他们的理论分歧也是很小的。古典学派的理论还假设：银行当局或者市场力量可以使市场利率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但它研究的是支配社会生产资源的利用和报酬的规律。因为假设条件的限制，产量只能取决于不变的就业水平以及当时的设备和技术。由此，他们的理论便能继续传承自李嘉图以来的传统自由竞争理论。



维克塞尔认为当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会引起物价积累性地上涨，反之则会引起物价积累性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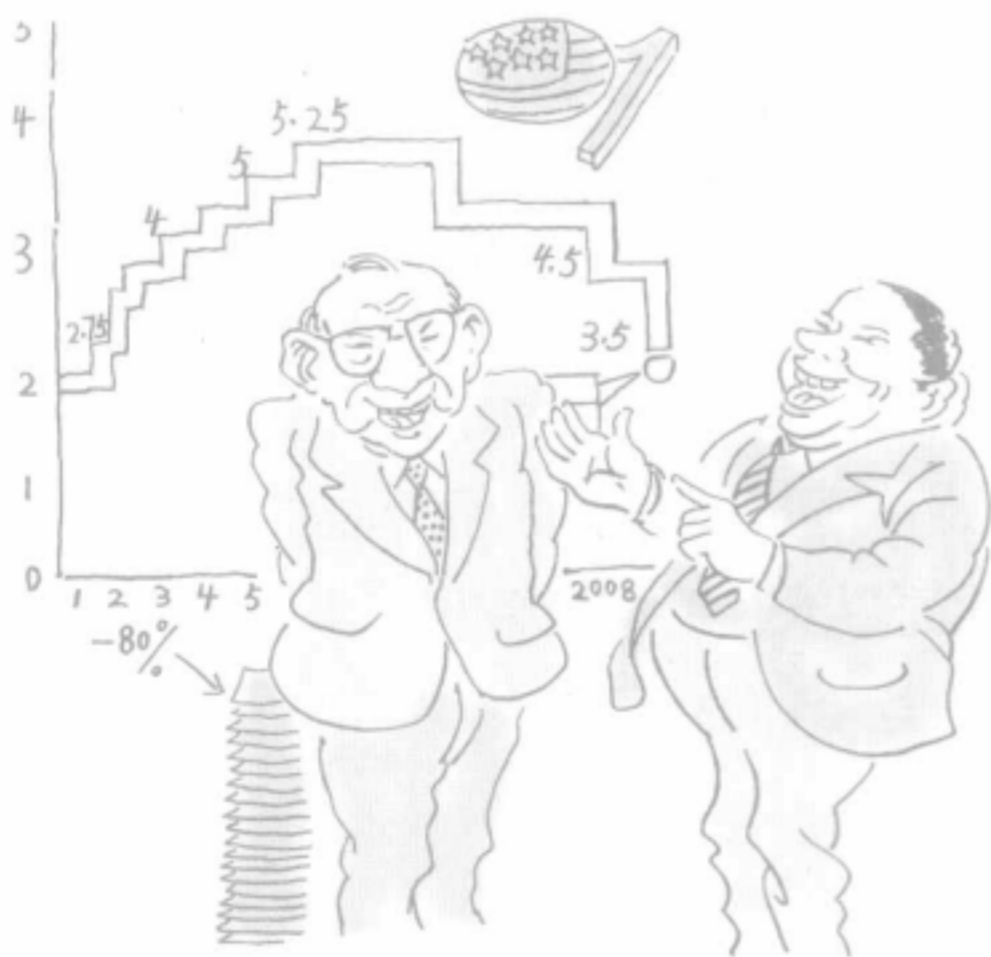
【解析】货币利率的特点决定货币的不可替代性

货币的利率对新生产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有制约性,因而它也对就业水平起着特殊的限制作用。实际上,利率只是把在将来(例如一年以后)支付的货币减去该笔货币现在价格作为分子,把现在的价格作为分母,所得的一个百分比。这样说来,每种资产都存在着一个类似利率的东西。同时,耐久性的商品也不例外,都有一个用它本身计量的利率。但是,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利率。因为从市场来看,不同商品“现货”与“期货”的价格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说与不同商品存在不同的利率一样,不同的货币的利率也是不同的。而货币利率同其他利率相比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殊性。当资产的数量普遍增加时,货币资产的利率下降最为缓慢,以致最终使得其他资产的生产都无利可图。因为当产量增加时,其他资产自身的利率会比生产有利水平时的利率低。此时,不同资产会接二连三地降低到有利可图的生产水平以下,直到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自身的利率大于任何一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水平为止。正因为如此,货币利率的这个重要性质,使得当产量增加时,以货币自身所计量的利率比任何其他资产用其自身计量的利率更加难以下降。

【案例】二战后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

案例适用:货币和利率

美联储采取廉价货币政策,购买低价债券,降低利率,以筹措军费。



上世纪40—50年代初,美联储为筹措军费,采取了廉价的货币政策,即钉住战前的低利率:三个月期的国库券利率为0.375%,长期财政债券利率2.4%。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利率上升到高于上述水平,而且债券价格开始下跌时,美联储就进行公开市场购买,迫使利率下降。这一政策在大部分时间内是成功的,但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引起了通货膨胀。1951年3月,美联储和财政部达成“一致协议”,取消钉住利率,但美联储承诺它将不让利率急剧上升。同时,美联储

正式独立于财政部，此后货币政策才开始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这也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50—70年代。这期间美国经济周期性扩张和收缩的特征非常突出，因此，扩张性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交替也很明显，货币政策目标经常变化。50年代，美联储控制的中介指标有自由储备金净额、三个月期的国库券利率和货币总量比，并按此次序来决定指标控制的重要性。结果表明，美联储对前两个指标的控制较好，对货币总量控制较差，这导致最初的10年内竟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到了60年代，又重新推行廉价的货币政策，同时重视财政政策的运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日趋上升，松的货币政策加之松的财政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从1965年的2.3%到1969年的6.1%。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了70年代滞胀的发生。70年代，美联储将货币总量作为中间目标，从M1和M2的增长率来看，美联储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为主，最终导致了1979年的经济危机。

80—90年代。7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被抑制，美联储又转向了平稳利率政策，并获得了极大成功。例如90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萧条，美联储在1990年7月到1992年9月间连续逐步降息17次，将短期利率从8%降到3%，促进投资与消费上升，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在1994年到1995年7月，美国经济过热时，又连续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1994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美联储将放弃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做法，今后将以调控实际利率作为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变。

目前，自1999年6月开始，为防止经济过热，美联储开始抽紧银根，半年中先后三次提高利率。但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仍没有减缓的迹象，于是在2000年2月2日、3月21日和5月16日又分别提高利率，使联邦

格林斯潘被认为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掌管美联储长达二十年之久。



基金利率达到65%。5月底公布的数据表明力度加大的宏观调控开始见效,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但2001年伊始,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进入了明显放慢的敏感时期。为刺激经济回升,从1月至6月底,美联储连续六次降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取如此大的降息动作,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分别为3.75%和3.25%,均为7年多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主要危险仍是疲软,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还会降息。虽然目前美国经济还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下半年美国经济形势将会出现好转。因为,首先,利率调整通常需要6至9个月的时间才能对经济产生全面影响。这意味着美联储今年1月开始的降息行动将在下半年充分发挥作用。其次,布什政府已开始实施其大规模减税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家庭下半年可获得450亿美元的减税。再次,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已开始回升,个人消费开支可望继续增加。

案例评析:

准确地选择货币政策指标是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前提条件。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中所选择的货币政策指标,应与该时期经济运行的特定情况相符合。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指标的选择标准是:第一,相关性。即所选择的货币政策指标必须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极密切的关系,并能作为一种函数关系存在的经济变量。第二,可控性。即所选用的货币政策指标的变动一定要为中央银行所控制,并能置于中央银行运用的控制手段的作用范围之内。第三,可测性。即所选用的货币政策指标必须具有明确而合理的内涵和外延,使中央银行能迅速而准确地收集到有关指标的数据资料,且便于进行定量分析,便于进行科学预测。第四,有效性。即选用这个指标,中央银行能区分出政策性效果和非政策性效果的作用。第五,适应性。即所选用的货币政策指标必须与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相适应。各国中央银行在选择货币政策指标时,一般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指标是货币政策工具最直接的控制对象,中央银行能够对它们进行紧密的控制;第二类指标则受第一类指标变动的影晌,从而间接地受到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但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却较第一类指标更为密切。一般为明确起见,称第一类指标为近期指标(又称操作目标),称第二类指标为远期指标(又称中介目标)。可选择的中介指标主要有: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资料来源:王旺:《二战后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中国企业培训网2006-10-31)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就业通论提要

预期收益的信心状态、流动性偏好的心理状况和货币数量等决定了新投资量。如果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则通过投资乘数与投资增加量或减少量相乘，就能推导出就业增加量。就业增加量的变化也会波及流动性偏好，继而对货币需求量产生影响。

经济体系的三种因素

现在我们可以综合我们的论点。首先，我们需要区分经济中的既定因素、自变量和因变量。一般来说，既定因素包括：现有的技能和可用的劳动量、可用设备的质量和数量、技术水平、竞争程度、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不同强度劳动的负效用以及监督和组织活动的负效用和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主要是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力量。我们并不是假设这些因素固定不变的，只是不把这种变化放在我们所涉及的范围内。自变量包括：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率。因变量包括：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

既定因素会影响自变量，但并不完全决定它们。例如，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一部分取决于现有的资本设备的数量（这是我们认为的既定因素之一），另一部分取决于长期预期状态（这是我们从既定因素中推得的）。但是，还有某些因素完全取决于既定因素，因而这些因素可以看作是既定的。例如，我们可以从既定因素中推知，当就



雇佣双方工资谈判达成交易所决定的工资单位是资本边际效率的自变量之一。

业水平已知的情况下，则国民收入（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水平将为多少。因此，在我们认为静态的经济体制中，国民收入就取决于就业量，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只取决于用于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即国民收入和就业量之间有唯一的函数关系。再者，既定因素还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出总供给曲线，该曲线体现了不同产品的供给的物质条件，即对应于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自变量）和从事生产该物品的劳动数量（因变量）。最后，既定因素还为我们提供了劳动的供给函数，揭示了在



哪一点上整个劳动的就业函数不再具有弹性。

资本边际效率由既定因素和不同种类的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来决定。利率则决定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因此，我们的最终自变量包括：①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流动性的态度和对资本资产预期收益的估计；②雇主和雇员达成交易所议定的工资单位；③中央银行所决定的货币数量。这些变量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量。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些变量，因为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最终因素。

我们把经济体系中的决定因素划分为既定因素和自变量两大类，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的，而且只能是以经验为基础。那些认为变化很慢，或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它们在短时期内所产生影响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以视为既定因素。反之，那些认为变化很快，又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有支配性影响的因素，我们就视为自变量。而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在任何时期，哪些因素决定了一特定经济体系中的国民收入或就业量。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精确地一般性结论，只要找出主要的因素就可以了。我们的最终任务是选择出那些能够被中央经济当局控制或者管理的经济变量。

就业通论概要

社会上有一种动力，可以把新投资的数量扩充到一点，在该点，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由各种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及其预期收益决定的）略等于利率。换句话说，资本品行业中的供给的物质条件、预期收益的信心状态、流动性偏好的心理状况和货币数量共同决定新投资量。

投资量增加（或减少）时，必然会引起消费量的增加（或减少）。一般说来，只有当收入增加（或减少）时，公众才愿意扩大（或缩小）其收入与消费的差额。换句话说，一般而言，消费常常是随着收入的改变而改变的，方向相同，但是消费改变的数量较小。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边际消费倾向来推知，当储蓄增加一定数量时，消费量应该增加多少；我们还可以通过投资乘数来推知，当投资增加一定量时，收入将增加多少。

最后，如果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那么，通过投资乘数与投资增加量或减少量相乘，我们就能推导出就业增加量。

然而，就业增加（或减少）会提高（或降低）流动性偏好，继而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这可以有三种途径：第一，就业增加使得产量的价值也增加（即使工资单位和

价格不变)；第二，就业量增加提高了工资单位；第三，短期成本增加时，产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的上升。

因此，这些关系的反应可以影响均衡位置，而且还会伴随其他关系的反应。而且，在各种自变量中，每一个因素都是可以随时改变的，甚至说改变的程度还很大。现实经济运行是及其复杂的，但是我们逐个分析这些自变量的方法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沿着这种理论框架来考察现实问题，就可以使问题更加容易处理。

保持经济稳定的条件

经济体系中的实际现象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各自不同的特征而呈现出许多特点。我们可以依据经验对它们进行总结，但在逻辑上却没有必然性。

我们生活中的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尽管它会经受产量和就业量的剧烈波动。而且我们的经济体系可以长期维持在充分就业以下的水平，同时没有任何复苏或完全崩溃的迹象。事实数据显示了充分就业是很难实现和持续的。最初的波动是很剧烈的，但在达到极端之前，似乎已经把自己完全消耗，这就呈现出一种既不绝望，也不满意的状态。正是基于波动在没有达到极端之前就把自己消耗殆尽最终又能恢复过来的事实，才使得经济周期理论呈现出规律性特点。价格也是如此，它在对干扰做出反应后，好像总能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经验中的结论在逻辑上未必讲得通，我们必须假定现行世界和心理倾向必然造成这些后果。那么，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样的心理倾向会使经济体系呈现稳定？这种倾向是否会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需要以下这些稳定条件来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

(1) 边际消费倾向应该使得产量和就业量两者之间比例的乘数略大于1，但数值并不是很大。

(2) 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应该使资本的预期收益或利率的温和变动不会引起投资量的剧烈变动。

(3) 就业量的温和变化不会引起货币工资的很大变化。

(4) 经济体系的波动向着一个方向变动到适当程度后自行扭转方向的条件：一个时期的投资量高于（或低于）前一个时期的状态继续持续的话，就会对资本边际效率产生不利（或有利）的反作用，但这种作用不会很大。

我们的第一个稳定条件，即乘数略大于1，但又不会很大，是符合人类本性的一个心理特征。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当期需求的压力会减轻，而超过已有生活水平的差额会增加。实际收入减少时，结果正好相反。因此，当就业量增加时，当期消费会扩大，但扩大的程度小于增加的收入，这是社会的普遍状况。

但是，不管这一心理规律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先验的信条，可以肯定，如果该规律不能成立，则经验事实就会展现相反的情景：即使是很

小的投资增加，也会引起有效需求的不断增加，直到实现充分就业；投资减少将会引起有效需求的不断减少，直到人人都失业。但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处于中间的位置，这也不排除不稳定性可能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是起主导作用的。不过在这个狭窄的范围之外，我们的心理规律必然毫无疑问地会发生作用。此外，乘数虽然大于1，但在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很大，否则一定量投资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量的巨大变化。

第一个条件说明，投资量的温和变动不会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无限大变动；而第二个条件说明，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或者利率的温和变动，不会引起投资量巨大的变动。现实的经济状况是：生产设备大幅度增加产品的生产，从而引起成本递增。的确，初始生产时，存在大量的剩余资源使得在一定范围内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但当这些剩余资源被大部分利用时，这种不稳定性就消失了。还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是对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所造成的变动进行了限制，主要是限制向上而不是向下的波动。

我们的第三个条件符合我们有关人类本性的经验。因为工人维持货币工资的斗争基本就是维持较高的相对工资的斗争。工人们不会在就业增加时奢望更高的货币工资，也不愿意为了免受失业痛苦而忍受大幅度的削减工资。

此处，我们再次面临和上述相类似的问题：不管这个结论是不是先验的信条，经



经济体系首先假定现实世界具备稳定条件如稳定的就业量，从而进行变量的研究。



失业工人与在职工人竞争上岗，结果总是导致货币工资的大幅降低，从而引起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

验都表明，这样的心理规律在实践中必然是成立的。如果任由失业工人为了工作而进行激烈的竞争，那么结果总是导致货币工资的大幅度降低，这又必然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而且，撇开充分就业不说，经济中不可能有稳定的均衡状态，因为工资单位可能会无限下降，直到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的巨大变动所引发的压低利率的作用足以恢复充分就业为止。这样的话，经济中只有充分就业这一稳定的点。

我们的第四个条件倒不是关于稳定的条件，而是关于经济萧条和经济复苏交替存在的条件。这个条件的假定是：资本资产有着一定的使用寿命，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损耗，并不是所有资产都有很长的生命周期。因此，如果投资量下降到低于某一最低水平时，那么只要其他因素不发生巨大变化，资本边际效率必然会提高到足够的程度，以使投资量恢复到最低水平之上，只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同样，如果投资量高于前期水平，那么只要其他因素也没有大的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会下降到足以导致产生萧条的程度，这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由于这个理由，复苏和萧条能够发生在前三个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如果这些有限度的复苏和萧条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而又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那么这必然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和投资量的增加，从而引起经济的上升运动。当投资量逐渐累计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从而使得经济又呈现向下的运行态势。

因此，我们的四个条件足以解释实际经济现象的特征：经济运行总是上下波动，但会避免就业和物价剧烈波动的极端状态，而是经常处于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不均衡状态。不过，经济运行也总是高于最低就业水平的，否则我们的经济会受到威胁。

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这个中间性位置由“自然的”倾向所决定的，即决定于只要



没有改变措施就会持续维持下去的那种倾向,从而也就认为这种中间性状态是由于必然性的规律所支配的。实际上,上述四个条件一向都是通行无阻的,它们不论是对现实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是可以改变的。

【解析】投资量与就业量

资本品行业供给的物质条件、预期收益的信心状态、流动性偏好的心理状况和货币数量共同决定新投资量,可以把新投资的数量扩充到一点,在该点,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由各种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及其预期收益决定的)略等于利率。因为,投资量增加(或减少)时,必然会引起消费量的增加(或减少)。一般说来,只有当收入增加(或减少)时,公众才愿意扩大(或缩小)其收入与消费的差额。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边际消费倾向来推知,当储蓄增加一定数量时,消费量应该增加多少;我们还可以通过投资乘数来推知,当投资增加一定量时,收入将增加多少。因此,如果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那么,通过投资乘数与投资增加量或减少量相乘,我们就能推导出就业增加量。然而,就业增加(或减少)会提高(或降低)流动性偏好,继而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这可以有三种途径:第一,就业增加使得产量的价值也增加(即使工资单位和价格不变);第二,就业量增加提高了工资单位;第三,短期成本增加时,产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的上升。因此,这些因素都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就业量。

【案例】欧洲青年失业的治理及成效

案例适用:失业治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就在持续快速地增长。这其中,青年群体的失业状况又比其他年龄群体更加严重。2004年欧盟25国总体失业率为9.2%,其中青年失业率为18.5%,青年失业率超过20%的有11个国家。

总体而言,欧洲国家的青年失业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青年失业率高于其他年龄群体的失业率。其次,弱势青年群体的失业尤为严重。在欧洲,女性青年的失业率普遍高于男性,残疾青年的失业率高于健康青年,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年失业率较高。第三,青年重复失业现象严重。

青年是劳动力市场中的特殊群体,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将青年失业治理纳入本国的战略性就业政策中,并且制订了专门针对青年失业的计划或政策,形成了一整套从立法到社会项目的治理青年失业的政策体系。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角度来说,针对青



欧洲国家的失业率中青年群体占了很大比重，青年失业者四处飘零，精神迷茫。



在治理青年失业政策方面，很多西方国家都将职业培训教育作为重要的一部分。

年的就业政策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供给政策、需求政策与匹配政策。

从供给政策上看，从数量上降低青年失业率的直接途径是减少青年劳动力供给；从质量上提高青年就业能力的途径是教育与培训。在治理青年失业的供给政策方面，很多国家都将完善教育培训体系作为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以知识与学位为导向的学术教育与以工作为导向的职业培训教育之间，各国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在职业培训方面，德国的教育体系不失为一个成功范例。尽管青年失业问题同样困扰着德国政府，但是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德国的青年失业率是成人失业率的1.5倍，但1990年以后，德国的青年失业率低于成人失业率。德国的高度结构化、系统化的教育体系是缓解青年失业的重要支撑。其中，学徒教育体系是德国教育体系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在德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必须接受非全日制的为期三年的特殊职业培训。学徒系统是大多数接受过低级、中级中等教育青年的选择，甚至高级中等学校毕业生以及大学毕业生也选择参与这个培训系统。除了在校培训，企业实践是吸引德国青年参与学徒系统的重要原因。企业为青年提供培训的职位，而培训成本可



以从企业的应税收入中扣减。与德国不同,英国在提升就业能力方面的两个重大举措是充分利用志愿者行动为学生创建新的基础学位以及提供工作实践机会。基础学位是新的与就业相关的高等教育资格,旨在为特定的企业或行业部门提供雇主所需要的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学生全职学习二年(或业余学习更长时间),获得基础学位之后,还可以继续学习以获得正式的荣誉学位。志愿者行动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为学生提供在社区中工作实践的机会,为大学生发展技能与获得工作经验提供帮助,强化大学与地方社区的联系。

在需求政策方面,欧洲各国普遍着眼于创造工作岗位。由于认识到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欧洲各国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家庭雇工、信息服务等新兴行业,增加就业岗位。例如,法国1997年实施了“青年就业计划”,由政府出资补贴雇主,在教育、文化、社会服务等行业为失业青年提供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岗位。除了创造就业岗位以外,欧洲各国还尝试通过降低青年劳动力成本来刺激企业对青年的劳动需求。这类项目主要有四种措施:一是利用一些社会项目来提供与正式就业相区别的合同(例如学徒合同、工作培训合同等),合同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二是降低雇主为青年支付的准固定劳动成本(包括社会保险费用、福利费用等);三是降低企业解雇青年的成本(例如简化解雇程序、为解雇提供法律保护等);四是对雇佣青年的雇主提供工资补贴。

随着就业观念的改变,自我雇佣作为一种就业方式被世界各国广泛地推广。在欧洲,小型企业以及自我雇佣在创造就业方面的作用愈见明显,通过鼓励青年创立小型企业不仅能够减少青年失业,还可以增加整个经济的劳动力需求量,并且有利于经济部门的多样化和灵活化。因此,支持青

随着就业观念的改变,自主创业和自我雇佣成为青年新的就业形式。



年创业的相关项目和措施在欧洲国家被广泛应用。例如英国自1982年起实施了一个名为“Livewire”的青年创业方案竞赛项目，将有创业想法的青年与当地的企业咨询师（或指导师）联系起来，咨询师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咨询建议。青年准备好创业计划以后，评委会将会对其进行评估，最佳创业计划将会获得首期1000英镑的奖励。竞赛分地区进行，各地区的胜出者将会参加全国的比赛。借助媒体宣传，这个项目得到了大众的关注。

青年就业匹配政策的核心在于向青年提供就业信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效率损失。在促进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匹配有效性方面，欧盟各国都设立了各种职业服务机构，收集并管理劳动力市场信息，及时为青年提供就业信息。例如，在芬兰有不少职业介绍机构通过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专门为年龄在18~30岁之间、外语较好的青年向其他国家联系工作。在英国，启动于1998年4月的“青年新政”(NDYP)即是失业6个月以上的青年提供帮助的综合性计划，其目标在于帮助青年人找到永久性工作并提高他们的长期就业能力。通过这个计划，政府在4个月内将为长期失业青年提供四种选择：补贴就业、参加全时教育与培训、参加志愿部门、参加环境部门。值得指出的是，欧洲国家针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不仅从总体上关注青年，还特别关注青年中的弱势群体。在德国，对于青年中的弱势群体（包括社会弱势青年、学习障碍青年、生理或心理残疾青年，以及外国移民青年），政府提供了一个特殊的项目来支持这一群体的就业，助其完成职业培训并且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

在欧洲，为青年就业而实施的项目总的说来主要提高了青年的就业率，减少了青年寻找工作的时间，增加了失业青年的就业机会。在供给政策中，德国高度系统化、结构化的教育体系无疑是成功的。德国的教育系统为青年提供了一致而持续的支持。德国的这一教育系统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对于各种教育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每种教育都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学术性最少的教育途径——学徒系统。

在需求政策方面，通过直接创造职业岗位和降低青年劳动力成本来减少青年失业的政策效果明显。特别是在福利国家，通过提供与正式就业相区别的劳动合同以及降低雇主为青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似乎能取得相对较好的效果。但是最近在法国发生的针对“初次雇佣合同法”的争论与冲突也表明，尽管同时承受着高解雇成本和高青年失业率，但是社会（尤其是青年）也难以接受与传统的正式就业相区别的不稳定就业合同。虽然这种增加合同弹性的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雇佣/解雇成本，便于企业调整

生产以适应激烈竞争与不断变化的市场,从而鼓励企业扩大招募青年工人,以便能长期提高青年总体就业,但是由于不稳定合同所提供的就业保障水平较低,它也可能使青年陷入不公平和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增加了青年个体的失业风险。另外,激励青年创业的政策也在不断增长的疑问中发展。虽然自我雇佣作为一种就业方式已经在欧洲国家推广,但是创业却并没有引起欧洲青年的强烈兴趣。原因可能在于青年大多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能力。据英国社区事业有限公司调查,青年人在调查市场、在竞争中差异化自己的产品与服务、管理现金流与记账、寻求财务支持四个方面,都存在着经验不足的情况,从而限制了他们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同时社区事业有限公司还发现,创业青年正急于寻找与他人交流经验的机会,希望得到持续的建议和支持。实际上,如果缺乏必要的培训以帮助青年逾越能力、经验的鸿沟,那么鼓吹创业便不是解决失业的方法,因为这只会使得青年忙忙碌碌却以失败告终。有效的创业计划必须包括关于创业的先期教育、培训、咨询和指导在内。除此之外,青年创业在治理青年失业方面遇到的最根本难题在于,并不是所有青年都适合成为企业家。

案例评析:

综观欧洲各国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到欧洲各国在治理青年失业方面有两点共识,一是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改善。在当今经济形势不大好,就业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其他各国在治理失业问题上取得的成效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资料来源:杨伟国,程诗:《欧洲青年失业治理及其借鉴意义》,人大复印资料2006-12)

第五编



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解决失业和经济萧条的有效方法，能提高社会的购买能力，减少过剩产品堆积，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经济学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的理论，前者适用于社会总体的产量和就业量的理论，后者适用于厂商或单个行业的价格决定理论。

●本卷精彩内容导读目录

货币工资减少对利润和就业量影响图解 / 221

◎案例：“零工资就业”与“大学生过剩说” / 224

◎案例：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矛盾 / 233

影响货币数量的因素图解 / 243

◎案例：货币和价格的决定 / 247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货币工资的改变

货币工资改变所产生的后果相当复杂。古典学派的“货币工资的减少会增加就业量”是错误的；除去通过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影响之外，我们不能通过货币工资的减少来不断增加就业量。

古典学派关于劳动需求的错误理论

如果我们能将货币工资改变时所产生的影响提前讨论，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古典学派之所以一向认为经济体系具有自动调节的特点，就是因为他们假想货币工资具有自由的伸缩性。而一旦货币工资显示其刚性，他们就把经济体系失调的原因推到货币工资的刚性上。

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充分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货币工资改变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复杂的。在某种情形下，降低货币工资确实能（像古典学派假想的那样）刺激产量。古典学派将这个问题解释得很简单，即当其他情形不变时，货币工资的降低，会通过制成品价格的降低而刺激需求，继而增加产量和就业量，并一直增加到该点，即劳动者愿意接受的货币工资的减少正好抵消由于产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劳动边际效率的降低。



古典学派这样解释，简直等于是说，当货币工资降低时，社会的需求是不受影响的。其理由是：总需求是取决于货币数量和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乘积。当货币工资降低时，并没有明显地看到货币数量会减少或者货币收入流通速度会降低的情况。他们甚至还可能会认为：如果工资降低，则利润就会增加。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经济学者还是会承认的是，当货币工资降低时，一部分劳动者的购买力会降低，故总需求多少会受到影响。不过，他

们还会指出还存在其相反的一面，即有一部分人的货币收入没有减少，这些人的实际需求就会随着价格水平的下降而增加。对于劳动者来说，除非他们的需求弹性小于1，否则当货币工资降低，就业人数增加时，他们的总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在新的均衡状态下，就业量会增大。

对于这种分析，我是完全否定的。这种分析虽然可以代表许多经济学家的想法，但是他们很少将其分析的方法详细论述。他们的逻辑推理过程是：任何既定的行业中，产品的供求曲线相互联系共同导出一条新的曲线——在其他成本不变（除了产量所引起的改变以外）的条件下，代表该行业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它把就业量和相应的工资水平联系起来，在任何一点的曲线的形状都表示对劳动需求的弹性。随后这一概念在未经实质性修改的情况下，被应用于整个行业。依据同样的理由，古典学派认为在整个行业中也存在一条劳动需求曲线，把就业量和不同的工资水平联系起来。

我认为古典学派的推理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特定行业的需求曲线只能建立在对其他行业的需求与供给曲线的性质以及总有效需求不变的假设基础上。所以，把有关个别行业的观点转而用于所有行业上去是错误的做法，除非把总有效需求固定不变的假设也转而运用到所有行业整体上去。然而，这个假设会使得论证变成通过歪曲对方观点的做法来驳斥对方。因为，虽然没有人会反对伴随着总有效需求不变而货币工资减少会相应地增加就业量的命题，但是，这里所争论的问题恰恰是，减少货币工资能否改变用货币积累来衡量的总有效需求。或者争论的问题至少是：减少货币工资能否使总有效需求的减少与货币工资的减少不完全同比例变动。然而，如果不允许古典学派理论用类推的方法把特定行业的结论扩大到整个行业，那么，该理论就完全不能回答货币工资的减少对就业有何影响的问题，因为它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



当企业家的劳动成本支出较大，而企业利润又较低时，因企业家的失望，就业量将又回到初始水平。

货币工资

货币工资即名义工资，是指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货币数量。名义工资不能确切反映出工资的实际水平，因为名义工资不变，而实际工资可以因为物价的涨跌而升降。货币工资不随劳动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而迅速做出相应调整，特别是，当劳动的需求量低于供给量时，货币工资下降后出现刚性。这主要是因为劳动者存在着对货币收入的幻觉。

货币工资通过三种因素对就业量的影响

我和古典学派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分析方法上的不同。我用自己的分析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①假定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率保持不变，则货币工资的减少是否具有直接增加就业量的倾向？②货币工资的减少通过它对上述三个因素的某些影响，也是否会对就业量在特定方向上产生某些影响？对于第一部分的问题，我持否定态度。我们已经指出：就业量和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具有唯一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有效需求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之和，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率都不变，则有效需求也不变。如果企业家还要在这种条件下增加总就业量，则他的收益就必然小于其总供给价格。

我认为古典学派的“货币工资的减少会增加就业量”的观点是错误的。最初，企业家预计降低货币工资会增加就业量，但他忽略了货币工资的减少对其产品需求的反作用，并按照在获取一定利润的前提下能比过去销售更多产品的设想行事。如果所有的企业家如此行事，那么他们实际上不能增加利润，除非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使得收入增量会等于消费增量；或者除非投资量增加，并且正好等于收入增量与消费增量之间的差额。而投资量的增加又只能在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相对于利率有所增加时才能出现。企业家对从产量的增加中所获取的收益会感到失望，而且就业量又回到初始水平。这是因为，当企业家根据预计产品能卖掉的价格而提供一定规模的就业量时，会给公众一笔收入，使这笔收入中进行储蓄的量大于当期投资量。二者的差额就构成企业家的亏损。对于这种情形，不论货币工资的水平如何，都肯定会存在的。因而，在这个时期，要用周转资本代替投资以填补储蓄大于投资的差额，企业家顶多只能推迟他们失望日期的到来。



因此，除去通过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影响之外，我们不能通过货币工资的减少来不断增加就业量。要想研究货币工资减少对就业量的影响，我们只能继续考察它对这三个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实践中，我认为对这三种因素最主要的影响很可能如下所述：

(1) 货币工资的减少或多或少会降低价格。所以，它会引起实际收入两方面的再分配：①收入从工人手里转移到边际直接成本中的那些报酬没有减少的生产要素；②收入从企业家那里转移到食利者那里，后者的货币收入因为契约的规定是固定不变的。第一种再分配可能会降低消费倾向；第二种再分配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如果食利者属于社会中的富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少发生变动，那么这种收入的转移也会降低消费倾向。总的看来，我认为收入的再分配很可能影响消费倾向的降低；

(2) 假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而且货币工资的减少又是对于外国货币工资的减少而言，那么，这种变动有利于投资，因为它会增加贸易顺差。当然，假设这种有利之处不会被关税、限额等方面的变动所抵消；

(3)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货币工资的削减虽然可以增加贸易顺差，但也可能恶化贸易条件，而这除去新增雇员之外，还会降低就业者的实际收入，从而可能提高消费倾向；

(4) 如果货币工资的减少被认为是相对于未来货币工资的减少，则会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从而有利于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减少导致货币工资预期的降低或者甚至有极大可能性的进一步降低，那么它会降低资本边际效率，进而延缓投资和消费；

(5) 工资总支出的减少以及物价和工资收入某种程度的下降，会减少为取得收入和基于企业经营目的的现金需求，因而会依据这个减少量降低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偏好曲线。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这会降低利率和增加投资。此外，如果因为工资的减少引起公众的不满而削弱政治信心，则由这个原因而引起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加可能会大于实际流通中现金需求量的减少所能抵消的部分；

(6) 由于某一企业或某一行业的货币工资的削减总是有利于该企业或行业，于是货币工资的普遍减少也可能在雇主们心中产生一种乐观情绪。进而破除对资本边际效率做出过分悲观的估计，使得事态再次按照更加正常的预期发展。另一方面，劳资纠纷可能抵消这一有利因素。由于每一行业的劳动者会坚决抵制本行业的工资削减，使

实际工资

实际工资是以工人所得的货币工资实际上能购买多少生活消费品、开销多少服务费做标准来衡量的工资。实际工资是反映工人实际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生活资料价格和劳务收费不变的情况下，名义工资的增长就表现为实际工资的提高；如果生活资料价格和劳务收费提高，以及赋税等等加重，那么实际工资就会呈现下降趋势。

得所有行业的货币工资的削减非常困难。在劳资双方谈判时，对雇主们削减货币工资的抵抗要比对物价上升所造成的实际工资逐渐和自动下降的抵抗更为强烈；

(7) 债务负担的增加造成企业家的压抑，其作用可能部分地抵消削减工资带来的乐观情绪，这不利于投资。此外，较低的价格水平对国债，进而对实际赋税负担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对企业经营的信心产生十分不利的影晌。

弹性工资政策和弹性货币政策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我们假定实际收入的再分配会降低社会的消费倾向。因而，只能借助于投资的改善来使得货币工资的减少有利于就业。而资本边际效率的情况是：相信货币工资已经到达最低点。最不利的情形是：货币工资会逐渐慢慢下降，而每一次的削减都会削弱将来是否能维持工资水平的信心。当有效需求处于减弱时期，如果货币工资突然很快地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以至于没有人相信工资会无限制地继续下降，这种情况反而有利于加强有效需求。从而，就资本边际效率来说，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以固定货币工资为目标的政策比随着失业量的变化而增减货币工资的政策更为有利。

上面的结论表明，古典学派不得不把论证的重点放在工资和物价的下降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上。如果货币数量本身是工资和物价水平的函数，那么他们的理论就很难成立。但是，如果货币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它的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数量就会由于货币工资一定程度的降低而无限制地增加。同时，它的数量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一般也会大大增加，增加的程度由工资在边际直接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和边际直接成本中的其他因素对工资单位下降的反应来决定。

货币工资减少对利润和就业量影响图解



货币工资引起价格降低



增加贸易顺差



工人收入转移成直接成本



企业家的收入转移到食利者



实际工资减少有利投资



新增员工降低收入



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



劳动者抵制削减工资



利于投资和消费 降低利率增加投资



债务负担使企业老板降薪



老板与员工进行劳资谈判





弹性工资（计件工资）政策有利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但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维持稳定的工资水平是最可取的政策。

因此，我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有两种方法对利率造成同样的影响：一是降低工资，从而保持货币数量不变；二是增加货币数量而保持工资不变。因此，对第二种方式的限制，在做出相应的修改后也适用于第一种方式。如果货币数量轻微增加，它对长期利率的影响很小；如果它增加很多，则又怕会通过动摇信心而抵消它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同样，货币工资轻微的削减也可能难以产生什么影响；货币工资大幅度的削减，也会动摇信心。因此，没有理由相信，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或单一的伸缩性货币政策能使经济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弹性工资政策和弹性货币政策，在理论分析上，虽然同样都是可供选择的改变货币数量的手段。但是，二者在其他方面却有天壤之别，尤其是下面四个突出的方面：

(1)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能用法令规定工资政策来统一削减每一阶层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工资削减只能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和不规则的工资变动得以实现，但这些变动违背了社会正义和经济利益的准则。另一方面，许多政府都在控制货币数量，因而我倾向于主张实施相对易于应用的弹性货币政策，而不是难以实行的弹性工资政策；

(2) 如果货币工资是非弹性的，那么一部分价格的变动，将主要对应于当期设备由于增加产量而导致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这样，在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将保持一种实际上最理想的关系，一切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是通过契约用货币规定的。由于多数的社会阶层的货币收入是缺乏弹性的，那么具有正义感的人也必然选择这种弹性货币政策，而不是工资政策；

(3) 通过降低工资单位来增加以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的方法，会加重债务人的负担；而通过增加货币数量同时保持工资单位不变的方法，会得到相同的货币增量，但不会加重债务人的负担；



(4) 如果利率的下降是通过降低工资水平的方法实现的,它会从两个方面压低资本边际效率,从而也会推迟和延缓经济复苏。

因此,如果通过就业量的逐渐减少来削减劳动者的货币工资,这种政策一般不会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这种政策的主要后果是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只有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中,诸如意大利、德国或者俄国,国家依靠强制的法令可以成功实施弹性工资政策。但在法国、美国或者英国不可能实行。

我认为,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制度来说,维持稳定的一般货币工资水平是最可取的政策。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如果该国同世界其他国家通过外汇比价的改变而能够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话,该结论也同样适用。货币工资的总体水平至少在短期内应尽可能地维持稳定。

这种政策会使价格水平比弹性工资政策具有更大的稳定性。除“被管制的”或垄断价格之外,短期的价格变动反映了就业量的变动对边际直接成本的影响;长期的价格变动则反映了由于新技术或新投资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变动。

尽管如此,如果就业量有大幅度波动,价格水平也将会随之产生相当大的波动,但波动的幅度要小于弹性工资政策下的情况。

这样,在执行刚性工资政策时,短期内要稳定价格,就必须避免就业量的波动。另一方面,在长期内仍有两种政策选择:一种是随着技术进步和设备升级而允许价格的缓慢下降,同时保持工资稳定;另一种是允许工资缓慢上升,同时保持物价稳定。总的来说,我还是偏向于后一种政策选择,其原因是,预期未来的高工资比预期未来低工资更容易使实际就业量维持在充分就业的一定范围内。另一原因在于:减少债务人负担带来了社会收益;在衰落行业与兴旺行业之间的调整更为容易;货币工资轻微上升的趋势可能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鼓舞。



【解析】货币工资如何影响就业量

古典学派之所以一向认为经济体系具有自动调节的特点,就是因为他们假想货币工资具有自由的伸缩性。当其他情形不变时,货币工资的降低,会通过制成品价格的降低而刺激需求,继而增加产量和就业量,并一直增加到该点,即劳动者愿意接受的货币工资的减少正好抵消由于产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劳动边际效率的降低。我认为古典学派的“货币工资的减少会增加就业量”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因为货币工资改变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复杂的。最初,企业家预计降低货币工资会增加就

业量，但他忽略了货币工资的减少对其产品需求的反作用，并按照在获取一定利润的前提下能比过去销售更多产品的设想行事。如果所有的企业家如此行事，那么，他们实际上不能增加利润，除非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使得收入增量会等于消费增量；或者除非投资量增加，并且正好等于收入增量与消费增量之间的差额。而投资量的增加又只能在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相对于利率有所增加时才能出现。因此，除去通过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影响之外，我们不能通过货币工资的减少来不断增加就业量。



欧美大学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压力。

【案例】“零工资就业”与“大学生过剩说”

案例适用：工资与就业

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9%，在世界上排60多位。位于中下水平，不仅低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菲律宾、泰国这些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大学毕业生年复一年找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流东奔西突，已经成了中国新的人口流动潮。他们的求职故事大多充满兴奋、懊丧，冲动、失落，自信与自卑，然而千篇一律，繁复又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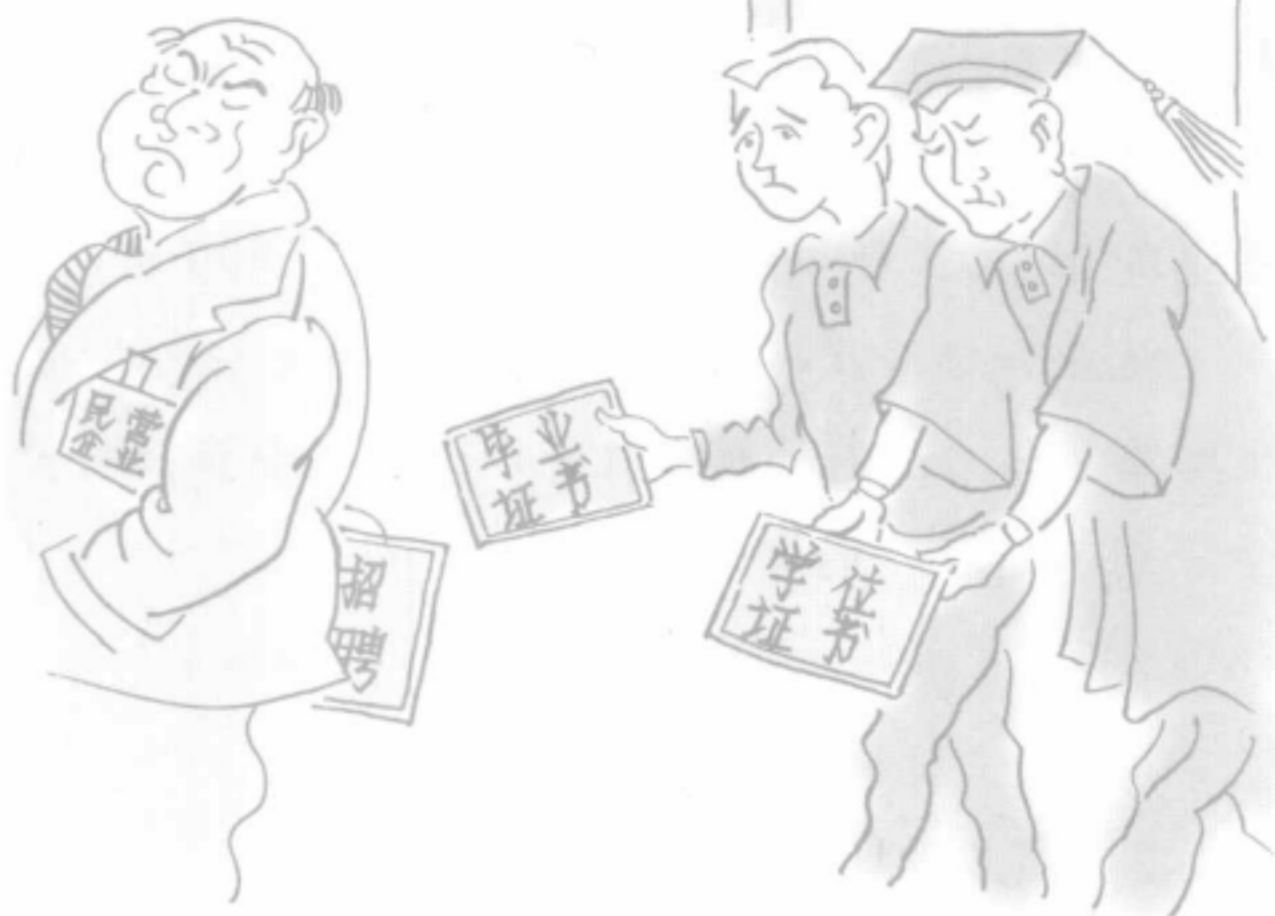
“零工资就业”是2006年新发明

出来的说法。实际上，不拿工资去实习，毕业后在单位里先干着，等待录用的情况，早已有之。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显示，有0.8%的被访者处于“零工资就业”状态。世界变化太快，词汇有一点跟不上。2006年，“零工资就业”这个容易望文生义的词汇，被越来越多的人吃惊地记住了。最后劳动保障部门出来说话了，表示“零工资就业”属于违法行为，用人单位不能以任何方式选用或接受劳动者从事无报酬工作。

当然，这种表态对于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不易产生直接作用。新词汇、新形势背后是年轻人惶惑的脸色。这些年轻人的脸色背后是一长串数字。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空前的413万，这个数字比2005年多了75万，在校学生1500万左

右，是1999年的2.5倍以上。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在21世纪最初5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4.5%。而这些年关于大学生太多的言论已经不绝于耳。“这种说法一般以‘中国大学生数量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表述出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说，“另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劳动力过剩’。”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年轻人东奔西突，全国范围流动，千篇一律的求职初的兴奋、失落和焦虑。



多了吗？“大学生过剩说”

的最大论据是近些年的就业市场。2001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所谓初次就业率，是将截至统计时间时“已经签约、确定单位等待签约、准备从事自由职业或创业、就读研究生，以及准备出国和申请不就业的毕业生人数，除以当年毕业生总和，得出的一项衡量大学生就业情况的指标”。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承担的国家“十五”重点课题“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的调查，2001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70%；2002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64.7%，比上年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2003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50%，比上年又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

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改变了原来每年6月份统计就业的做法，将统计时间改为每年9月。2003年和2004年的9月公布的初次就业率分别为70%和73%，2005年9月的初次就业率变化不大，为74.5%。而如果仅以“已经签约”一项衡量，2003年9月，签约毕业生占总毕业人数的31.9%，2005年9月“已经签约”的人数，也不过比此略高一点。

这意味着每年约有30%的毕业生的确面临窘境。按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主持的“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划分标准，就业率在90%以上表示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率在70%—90%之间表示供求基本平衡；就业率在

50%—7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压力；就业率在30%—5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困难；就业率在30%以下表示可能产生就业危机。

这份报告说，“显而易见，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的就业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毕业生的起薪在下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5年12月发布的《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表明，2005年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49元，比2003年增加32元。当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20.3%。

就业和起薪状况打破了近50年的大学生就业无忧的心理惯性，也给高校和在校生增添了压力；高等教育收费以来，那些节衣缩食供养大学生的家庭，也要面临上大学“划不划算”的考虑。

案例评析：

大学生就业难的话题我们已经毫无避讳，而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过低工资水平而导致的吗？其实都不是的。“零工资就业”提出，更让我们不得不深思。是大学生过剩了吗？其实也不是。大学生就业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供应突然放大造成的供需失衡，一方面是就业制度改革跟不上招生制度改革，从更深远看，决定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结构。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从工资水平入手。

（资料来源：田江东：《零工资就业》与“大学生过剩说”，新浪网2007-01-13）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就业函数

就业函数表示的是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就业函数是总供给函数的反函数。就业函数表明当一厂商、一行业以至整体行业面临一定有效需求时，将要提供多少就业量才能使其产量的供给价格等于它的有效需求。

就业函数与就业弹性函数

就业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反函数，而且是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就业函数表示的是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说明：当一家厂商、一个行业或者行业整体面临一定的有效需求时，它们将提供多少就业量才能使其产量的供给的价格恰好等于这种有效需求。设一家厂商或一个行业的有效需求（以工资单位计量的）为 D_{wr} ，该厂或该行业所引起的就业量记为 N_r ，则就业函数就可以写作 $N_r = F_r(D_{wr})$ 。或更精确一些，设我们可以假定 D_{wr} 是总有效需求 D_w 的唯一函数，则就业函数也可以写作 $N_r = F_r(D_w)$ 。这就是说，设有效需求为 D_w ，则 r 行业中所提供的就业量将为 N_r 。

$$N_r = F_r(D_w)$$



本章就将讨论就业函数的若干特点。除此之外，还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要用就业函数来替代所谓的供给曲线：第一，就业函数所选用的单位，都是用来表达相关事实，而绝不选用一些性质不明的单位。第二，就业函数比所谓的供给曲线更容易解决相关全体行业或全部产量等问题（以区别于在一特定环境下，单独一厂或一行业所遇到的问题）。其原因如下：

就一种商品而言，要替该商品作一条需求曲线，必须首先假定社会中每人的收入不变；如果收入改变，那么需求曲线就必须重新作出。同样，要替一种商品作一条供给曲线，也必须先假定行业中各厂的产量为既定的；如果该行业总产量改变，那么供给曲线也将随之而改变。因此，当我们研究总就业量改变时其他各行业是如何反应的，那我们决不能仅仅根据各行业的需求曲线或是供给曲线得出。因为这些曲线不是唯一的，而是随着我们对总就业量所作的假定而不同，两组曲线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如果用就业函数，该函数适用于所有行业，并反映总就业量的改变，同时也比较容易




得出。

我们假定消费倾向是既定的，又假定第十七章中作为既定的其他因素也不变；设我们所要论述的问题是：当投资量改变时，就业量将随之作什么改变。在这种假定下，若有一个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量，就存在着一个与之对应的总就业量。不仅如此，因为有效需求水平已知，则将有一特定的收入分配方式与之相应。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相对于每一水平的总有效需求，存在着在各个行业产品之间分配该有效需求的唯一的分配方式。

由此，如果我们知道了总就业量，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各行业中的就业量。也就是说，如果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总有效需求量已知，我们便可以推导出各行业中的就业量，因此，我们可以把一行业的就业函数写作 $N_r = F_r(D_w)$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就业函数的第二种形式。这样有一个好处便是：如果我们要知道，相应于一特定量的有效需求的所有行业的总就业函数，那么只要把各个行业的就业函数相加起来就可以了，即：

$$F(D_w) = N = \sum N_r = \sum F_r(D_w)$$






因此，以上我们假定的是：相对于每一水平的总有效需求，存在着在各个行业产品之间分配该有效需求的唯一的分配方式。但当总支出改变时，用于单个行业产品的相应的支出一般不会同比例地变化。部分原因是当个人收入增加时，他们用于各个行业的购买量不一定同比例增加；另一部分原因是不同商品的价格弹性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花费增加的收入，那么就业量的变化仅仅取决于总有效需求变化的说法只是一种粗略的表达。因为增加的有效需求部分在不同商品间的分配方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就业量。

在短期里，上述的考虑更是特别重要。所谓短期，是指时间短到无法预见有效需求的量和方向的改变。某些产品的生产需要时间，因而增加它们的供给实际上不可能太快。这样，额外的需求突然引向它们，则它们会表现出一个数值低微的就业弹性，即使它们在有充分准备时间下的就业弹性接近于 1。

生产时期这个概念的主要意义正在这里。一种产品，如果对它的需求有 n 个时间



跳楼价、大甩卖、血本、清仓大处理，诸如此类的字眼逸见于各处卖场，过剩存货的处理永远需要这样的噱头。

未来需求的变动表明，企业家的准备时间不论有多长，由于一定投资量增加而改变的初始的就业弹性不可能比它最终的均衡值大，除非在生产每个阶段都有过剩的存货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消耗过剩存货也是对投资量增加的一种抵消。假定生产在初始条件下的每个阶段都有过剩存货，则初始的就业弹性可能接近于1。当存货已经被吸收掉，但在较早生产阶段生产的产品按照适当的速度形成供给增加到来之前，就业弹性将会下降；而当新的均衡来临时，就业弹性又重新上升。但这又被某些条件所限制，因为当就业量增加时，租金和利率的提高可能吸收掉更多的支出额。在一个变动的经济中，价格的完全稳定是不可能的，除非有某种特殊机制，使得消费倾向暂时发生适当程度的波动。但是，由此引起的价格的不稳定性不会刺激利润动机，从而造成更多的生产能力。因为价格的不稳定性带来的意外收益将完全由处于接近产品最

单位为既定的准备时间，而且如果这样它提供的就业弹性是最大的。那么，就说该产品的生产时期为 n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消费品作为一个整体显然具有一个最长的生产时期，因为它们总是除以每一个生产过程的最后阶段。因此，如果初始的消费增加引起有效需求的增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初始生产弹性低于其最终的均衡水平的差额要比最初冲击来自投资的增加的情况要大。此外，如果增加的需求是具有相对较低就业弹性的产品，则需求增加的大部分将成为企业家的收入，较小的部分才是劳动者和其他直接成本因素收入。这对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企业家可能比劳动者从增加的收入中储蓄更多。然而，对这种情况不宜过分夸张，因为它们的作用大体上是相同的。

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指的是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时，人民的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影响物价之下跌，造成通货紧缩。长期的通货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续出现三个月下跌，就表示已经出现通货紧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的定义为：价格和成本正在普遍下降即是通货紧缩。

后生产阶段的企业家获得，而不拥有适当的特殊资源的企业家不可能得到这种意外收益。在波动较大的社会中，这种稳定政策也不能完全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价格每一次微小的暂时的变动，就必然造成更大的非均衡状态。

有效需求的弹性因素

我们知道，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必然引起社会的就业不足，即人们愿意接受低于现行实际工资的工资而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结果，有效需求的增加会引起就业量的增加，一直到这样一点，在该点，愿意接受市场实际工资的劳动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工作。

在达到该点之前，既定的资本设备下使用更多的劳动所造成的报酬递减，被劳动者愿意接受的递减的实际工资所抵消。在达到该点之后，要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就要对劳动者支付相当于更多产品的报酬作为条件；而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却又会带来产品数量的递减。所以，在该点之后，严格的均衡状态的条件要求，工资和物价以及利润，随着支出的增加都作同比例的增长，而包括产量和就业量在内的实际变量的均衡位置仍保持不变。这也就是说，此时粗略的货币数量论完全适用，因为产量不变，而物价却和 MV 以完全相同的比例上升。

然而，要把以上结论应用于现实，我们还必须记住以下一些限制条件：

(1)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物价的上涨会使得企业家盲目扩大生产，他们习惯于把销售额的上升当作扩大生产的信号，因此会增加就业量，甚至超过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润的水平。在新价格中，企业家实际上低估了他们的边际使用者成本。

(2) 价格的上升将会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企业家，而不利于以固定收入谋生的



租金领取者。这种收入的再分配有可能反作用于消费倾向。这个过程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已经开始。如果租金领取者比企业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低，那么，和相反的假设（企业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相比，实际收入从租金领取者那里转移出去将意味着：只要有货币数量的少量增加和利率的微小下调，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当充分就业已经达到之后，如果第一种假设状态（租金收取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继续存在，则物价的进一步上升将意味着利率必须上升以阻止物价无限制地上涨，而货币数量的增加将小于支出增加的比例。

而如果是第二种假设状态（企业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继续存在时，则情况会相反。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如果租金领取者的实际收入会减少到某一点，在该点，作为租金领取者相对贫困的结果，上述第一种假设状态会转变为第二种。这个情况可能出现在充分就业达到的前后时间。

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明显的非对称性，或许使人们感到有点疑惑。因为在有效需求收缩到充分就业水平以下，则会压缩就业量和物价；而有效需求扩展到充分就业水平以上，则只能影响到物价。实际上，这种非对称性反映了一个事实：当实际工资低于一定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应时，劳动者可以拒绝工作，从而使该就业量不能实现；但当实际工资不低于一定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却不能强行就业，使该就业量得以实现。

✿ 【解析】有效需求和就业函数的关系

就业函数表示的是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它和总供给函数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反函数，而且是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其目的在于说

明：当一家厂商、一个行业或者行业整体面临一定的有效需求时，它们将提供多少就业量才能使其产量的供给价格恰好等于这种有效需求。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必然引起社会的就业不足，即人们愿意接受低于现行实际工资的工资而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结果，有效需求的增加会引起就业量的增加，一直到这样一点，在该点，愿意接受市场实际工资的劳动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工作。在达到该点之前，既定的资本设备下使用更多的劳动所造成的报酬递减，被劳动者愿意接受的递减的实际工资所抵消。在达到该点之后，则要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就要对劳动者支付相当于更多产品的报酬作为条件；而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却又会带来产品数量的递减。所以，在该点之后，严格的均衡状态的条件要求，工资和物价以及利润，随着支出的增加都作同比例的增长，而包括产量和就业量在内的实际变量的均衡位置仍保持不变。

【案例】 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矛盾

案例适用：就业原因

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

(1) 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置、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由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国外商品大量涌入，引起市场需求过剩，将造成严重失业问题。



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2) 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

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业、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3)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种农村剩

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4)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

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5) 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200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2010年将达7.52亿左右，比2000年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人口的大量增长，就业人口基数庞大，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失业问题将越发严重。

案例评析：

就业的问题是深层次的，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那些有影响的就业矛盾就愈发地体现出来。要打破这种矛盾局面，就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资料来源：如文：《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的几点思考》，中华励志网2008-3-21)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价格论



价格论的分析对象是货币数量变化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目的在于决定价格对于货币数量变动所相应做出的反应程度的大小。经济中的一般价格水平是由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和总体产量的规模决定的。

经济理论划分及物价的决定因素

我认为传统经济学家在物价决定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困局：当讨论价值论时，他们总说价格决定于供求状况，这包括边际成本以及短期供给弹性等因素；当讨论货币与价格理论时，他们则认为决定价格的是货币数量、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流通速度与交易额之比、货币贮藏、强迫储蓄、通货膨胀或紧缩等因素。

为了避免对价格论与价值论发生的这种理解上的相互隔离现象，我想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学划分为价值论以及分配论部分与货币论部分，而应当分为微观与宏观两大领域的理论：一方面是适用于厂商或单个行业的价格决定理论，研究如何把既定数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及报酬大小；另一方面则是适用于社会总体的产量和就业量的理论。假定我们所研究的仅仅是某一厂或一行业，而就业量不变，又暂时假定其他厂或其他行业的情况也不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的确可以不顾及货币的特点；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讨论决定全体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的因素时，就需要一个有关货币经济的系统理论。

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分：一方面是静态均衡论；一方面是动态均衡论。在后一种经济理论体系中，未来的种种预期都将影响目前的情况。之所以这样分，是因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将现在和未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定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人们认为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就可以依据正常的经济动机而活动，从而决定在均衡状态时，怎么将资源分配于各个用途。然而，在事实中，以往的各种预期不一定都会实现，而且今天对未来的预期又可以影响到今天的行为。这样，货币将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了。

就某一行业来看，它的产品价格取决于两部分：一部分取决于进入它的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一部分决定于生产规模。这个结论完全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行业。因而，经济中的一般价格水平一是由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决定；一是由总体产量的规模决定。如果在设备与技术保持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总体产量的规模



就是就业量。当然，我们讨论到社会总产量时，就必须考虑到任何一行业的生产成本一部分是由其他行业产量的多少而决定。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有效需求的改变对于成本和产量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情况简单化，假定边际成本中各生产要素的报酬以同一比例改变，换句话说，它们都随工资单位作同比例的改变，同时假定设备与技术不变，那么一般物价水平取决于工资单位和就业量。因此，改变货币数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分为两部分：一是货币数量对于工资单位的影响；二是货币数量对于就业量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关系，我们进一步假定：①社会上闲置资源的生产效率是完全相同的，可以相互替代，即要素具有同质性。②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存在大量闲置的生产要素，而且要素需求的增加不带动要素价格的上升，即工资的上涨。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有失业现象存在，工人工资就不会变化，生产报酬不增不减。因此，当货币数量增加时，若还伴有失业现象，则物价丝毫不受影响，就业量则随有效需求作同比例的增加，而有效需求的增加是由货币数量的增加决定的；但是，一旦经济中实现了充分就业，则只有工人工资与物价随有效需求呈现同比例的增加，就业和产量不做任何的改变。因此，当有失业现象存在时，供给弹性是完全的；当达到充分就业以后，供给弹性为零。假定有效需求的改变比例与货币数量改变的比例相同，那么关于货币数量的论述如下：“当有失业存在时，就业量就随着货币数量作同比例改变；当达到充分就业以后，物价就随着货币数量作同比例改变。”



企业总体产量规模庞大，可以决定经济中的一般价格水平。

影响货币数量的因素

在上节简化的两个条件下，我们可以证明货币数量论能够很好地成立。但是，由于现实的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是更为复杂的，很多因素都参与进来进而影响上面的假定，我们还需要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对于货币数量的影响：

(1) 有效需求的改变并不与货币数量的改变成同一比例。

(2) 由于资源性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而随着就业量的增加，它的收益是递减的，而不是完全不变的。

(3) 资源并不可以完全相互替代，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当有些商品已经达到供给无弹性时，而有些商品则还有闲置资源可以供生产之用。

如果市场对某一商品表现出极大的需求量，企业加大投入，增加员工生产，有效需求的增加，也可引起价格水平的提高。



(4) 工资单位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就已经呈现出上涨的趋势。

(5) 构成产品边际成本的各个生产要素的报酬并没有按照相同的比例改变。

价格论必须研究以上所列的五个复杂因素，因为价格论分析的对象应该就是货币数量变化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决定价格对于货币数量变动所相应做出的反映程度的大小。我们首先分析货币数量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有效需求的增加，既

可以带来就业量的增加，又可以引起价格水平的提高。所以，经济运行的常态是价格水平往往伴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渐上升。

继而，我们再具体地分析这五种复杂因素对于货币数量论的影响：

(1) 货币数量的改变主要通过它对利率的作用进而对有效需求量产生影响。假定这是影响的唯一渠道，那么影响的大小就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①流动性偏好曲线。它告诉我们，利率必须降低多少，然后人们才愿意持有经济中新增加的货币量；②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它告诉我们，利率降低到某一特定量时，它会增加多少投资

雇主

雇主在汉语中一般称老板。雇主通过支付薪水以交换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雇主范围包括从临时雇请保姆（佣人）的家庭到政府直至各行各业的法人组织。在西方概念中，政府为最大的“雇主”，但是绝大多数劳动力资源分布于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当中。雇主提供工资给工人，换取工人的劳动权力，取决于雇员是否按时完成指定任务。

量；③投资乘数。它告诉我们，投资增加到某一特定量时，会增加多少有效需求的总量。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指出：这三个因素本身也同样受到其他复杂性因素2、3、4和5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进行具体分析时，要认真考虑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能把经济分析绝对化。此外，“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和有效需求量与货币数量的比值是很接近的，区别在于有效需求是一种预期的收入，而不是已经实现了的收入；它是指总收入，而不是净收入。但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取决于许多复杂而变化的因素。

(2) 因为报酬与报酬不变部分取决于工人的工资与其效率是否成比例，如果工资与效率是绝对成比例的，那么就业量的增加不会引起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但是不论每个工人的个人生产率有多大的差异，也不论资本设备的效率如何，工人工资总成本还是逐渐上升的。再加上实际利用的资本设备的效率不同，也会引起产品单位边际成本的上升。因此，一般地说，既定设备的产量增加会引起供给价格的增加。

(3) 当经济中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源时，产量增加不会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太多。当闲置资源被逐渐消耗时，甚至进入“瓶颈”状态，则产量的增加会受到限制，继而使得若干商品的价格急剧上涨。供给的弹性与时间长短有很大的联系：时间越长，经济越容易调整，则供给的弹性也会越大。当时间较长时，各种机器设备容易调整，此时有效需求的变化如果出现在大量闲置资源的条件下，则需求更大的会引起产量的增加，仅仅会部分引起价格的变动；时间越短，经济越容易出现“瓶颈”状态，实质上是经济的调整能力和速度有限，则有效需求的变化更可能会引起价格的大幅上升，而不是增加经济中的就业量。

(4) 工资单位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就可能已经上涨。工会倾向于提高工人

们的工资，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企业在经营较好、效益不错时，往往也会接受工会的条件。因此，任何有效需求的部分增加量有可能被用来满足一部分的工人工资的增加。从实际生活来看，工资单位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和有效需求的变化成同比例变化，而是间断性的变化。这些间断性的不同的工资取决于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及工会与雇主的力量对比。

(5) 假定进入边际成本的不同生产要素的报酬都按照相同的比例变化，但是实际上，不同生产要素以货币计量的报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刚性。而且相应于货币报酬的改变，还具有不同的供给弹性。否则，我们可以说，价格水平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工资单位和就业量。

在边际成本中，或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边际使用者成本，它可能同工资单位作不同比例的变动，而且波动幅度也较大。假设有效需求增加时，人们加快设备的更新，则边际使用者成本可能急剧增加。

为了许多目的，我们假设，进入边际直接成本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报酬，随着工资单位的改变而同比例地变动的做法是可以的。但我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对边际直接成本中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采取加权平均，并把这一数值称之为成本单位。这个成本单位接近于上述的工资单位，可以被认为是根本的价值标准。在技术和设备既定的情况下，价格水平由成本单位和产量规模来决定。因为存在着短期内报酬递减的规律，产量增加时，价格水平上升的比例大于成本单位增加的比例。当产量增加到一个水平时，以各生产要素作为代表单位的边际产品，等于足够生产该产量的生产要素所要求的最低报酬，此时经济就实现了充分就业。

当有效需求量的进一步增加不能再引起产量的任何增加，而全部作用仅仅是导致一个与有效需求完全同比例增加的成本单位的上升时，我们看到此时经济中便出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直到今天，货币数量的扩展完全是存在的，只是程度的大小不同，我们不能清楚地划分哪里是真正的通货膨胀点。因为在该点之前，货币数量的增加总能引起有效需求不同程度地增加，所以货币的增加部分地作用于成本单位的提高，部分地作用于产量的增加。

我们可以说：真正的通货膨胀到来以前的分界线的两边存在着一种不对称的情况。当有效需求缩减到这个分界线以下时，它以成本单位计量的数量就要减少；当有效需求扩大到这个分界线以上时，将不会增加它以成本单位计量的数量。我认为之所



影响货币数量的因素图解



影响货币数量的五个因素



有效需求与货币数量的改变不是同一比例



资源无法全部替代



工资上涨



产品成本不变



五种因素对货币数量论的影响



利率作用的影响



工资与效率不成比例



利用闲置资源



利率大幅降低



投入量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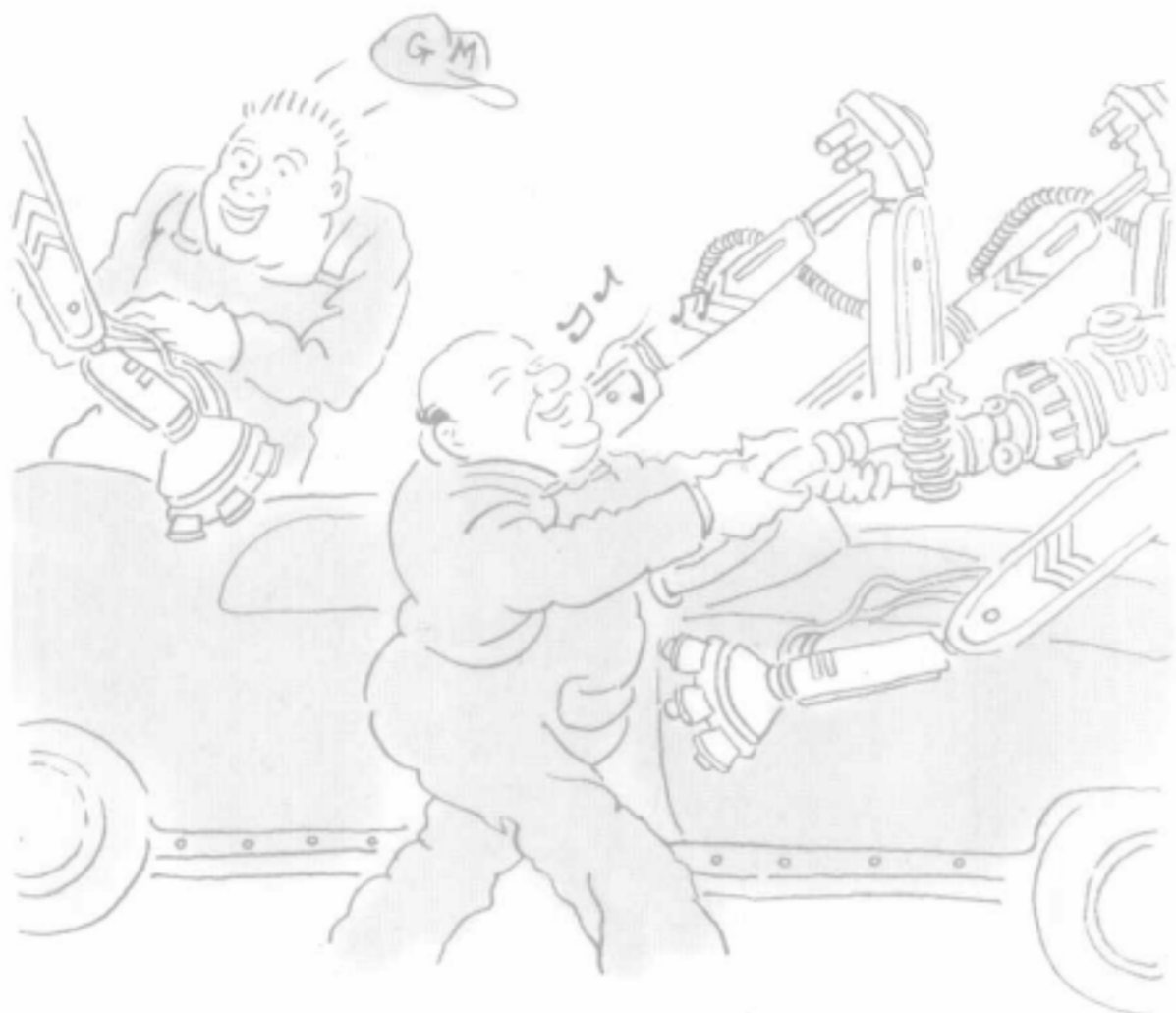


工会官员要求
为员工加薪



企业经营良好





当市场需求量稳定，企业技术设备完善，工人就业上班稳定时，货币数量也是稳定的。



充分就业情况下，利率下降至稳定状态，工人的薪金将接近或达到期望水平。

以会出现这种不对称现象，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假设：生产要素，尤其是工人，总是倾向于抵制他们的货币报酬的减少，而没有任何的动机去拒绝货币报酬的增加。同时我认为这个假设显然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即如果货币报酬的变动不是普遍性的，那么某些特殊的生产要素将因其报酬的增加而受益，因其减少而受损。

相反，只要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趋向，那么货币工资会无限制地下降，不对称的情况就会消失。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在充分就业水平以下就没有稳定的状态，一直到利率不可能进一步再降低或者工资成为零为止。要使得货币经济体系表现出任何的稳定性，我们就必然要求某种生产要素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使不是固定的，也至少应该是有刚性的。

认为任何货币数量的增加都会造成通货膨胀（除非通货膨胀仅指价格上涨）这个观点，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假设是：当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减少时，它们的供给必然将减少。



货币数量变动对价格的长期影响

以上主要是讨论在短期内货币数量的变动如何影响价格。但是，在长期内，二者的关系是否会比较简单些呢？

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概括而不是纯理论的问题。如果历史上的流动性偏好有某种长期一致性的倾向可以衡量，并采取流动性偏好在悲观时期和乐观时期的平均值，则在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粗略的关系。例如，在长期内，当利率超过某种心理上的最低水平，国民收入可能有某种相当稳定的比例以货币形式存在着，而公众又总是不愿意长期持有更大比例的货币。因此，如果超过活跃的流通所要求的货币数量大于上述稳定的国民收入比例，则利率就会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趋势。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利率的下降会增加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的增加会达到一个或者多个半临界点，在该点，工资单位呈不连续的上升趋势，继而产生对价格的相应影响。如果多余的货币数量占有的国民收入的比例低于正常值，则会发生相反的趋势。这样，一个时期内利率波动的净影响在于形成一个平均数，以适应国民收入与货币数量之间的稳定的比例。公众的心理会使这个比例与现实相符合。

这些趋势作用于经济向上时比向下时所遇到的阻力要小。如果货币数量长时期内处于非常不足的状态，那么我们一般通过改变货币本位或者货币制度以提高货币数量来解决，而不是压低工资单位，从而增加债务负担。当货币相对充足时，工资单位上升；当货币相对缺乏时，人们会寻找某种手段来增加有效的货币数量。因此，长期的价格走势几乎总是向上的。

在19世纪，平均每十年来说，人口的增长、新发明的涌现、新地域的开发、公众信心的状态、战争的次数和消费倾向一起形成一个资本边际效率曲线，该曲线在满足财富所有者利率要求的条件下同样可以使得社会就业量水平处于令人满意的程度。工资单位有时会受到调整，但更常见的是货币本位或者货币制度，以保证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能充分满足正常的流动性偏好，不低于上述利率的数值。通常工资单位是趋于稳定上升的，不过劳动的效率也是增加的。因而，我们看到力量平衡的结果使得价格保持相当的稳定。一方面是单个雇主所构成的群体的力量很强大，他们能阻止工资单位的上升使其不高于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当时的货币体系既灵活又保守，提供的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平均货币供给量，使得银行的利率满足了财富所有者在其流动性偏好影响下所能接受的最低水平。不过，平均的就业量水平还是没有达到充

雇主群体的力量很强大，
足够阻止工资单位的上升，
雇主们控制生产成本，
尽量令其不高于生产率
的增长。



分就业水平，但是也没有低到使人难以忍受从而引发革命的程度。

我想今后的资本边际效率比19世纪时要低很多。因而，难以仅靠控制货币数量形成的利率水平来满足财富所有者的要求，也很难维持合理的就业量水平。只要能保证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的适量供给，就能够得到二三十年内可以接受的社会就业水平。那么，甚至我们在19世纪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我们只要通过适度的通货贬值就能够找出一条出路。

我认为经济中最稳定、最不容易变动的因素，甚至将来也可能存在的，便是财富所有者能够接受的最低利率。如果合适的就业水平下的利率大大低于19世纪的平均值，那么，很难通过控制货币数量就能达至一点。借款者的预期收益，从中再扣除：①向放款者借款的交易成本；②所得税和附加税；③补偿放款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费用。剩余的便是净收益，它能诱使财富所有者牺牲流动性偏好的代价。如果在可以接受的平均就业水平条件下，这个净收益低微到不足道的程度，那么，老一套的好办法也变得无能为力了。

总的来说，在长期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的关系取决于流动性偏好；价格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则取决于工资单位上涨速度与生产率增加速度的对比。

❁ 【解析】价格论的分析对象及分析目的

价格论分析的对象是货币数量变化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决定价格对于货币数量变动所相应做出的反映程度的大小。经济学可以分为微观与宏观两大领域的理论：一方面是适用于厂商或单个行业的价格决定理论，研究如何把既定数量资源分配与各种用途及报酬大小；另一方面则是适用于社会总体的产量和就业量的理论。就某一行业来看，它的产品价格取决于两部分：一部分取决于进入它的边



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一部分决定于生产规模。这个结论完全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行业。因而，经济中的一般价格水平一是由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决定；一是由总体产量的规模决定。如果在设备与技术保持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总体产量的规模就是就业量。一般来说，有效需求的增加，既可以带来经济就业量的增加，又可以引起价格水平的提高。所以，经济运行的常态是价格水平往往伴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渐上升。当有效需求量的进一步增加不能再引起产量的任何增加，而全部作用仅仅是导致一个与有效需求完全同比例增加的成本单位的上升时，我们看到此时经济中便出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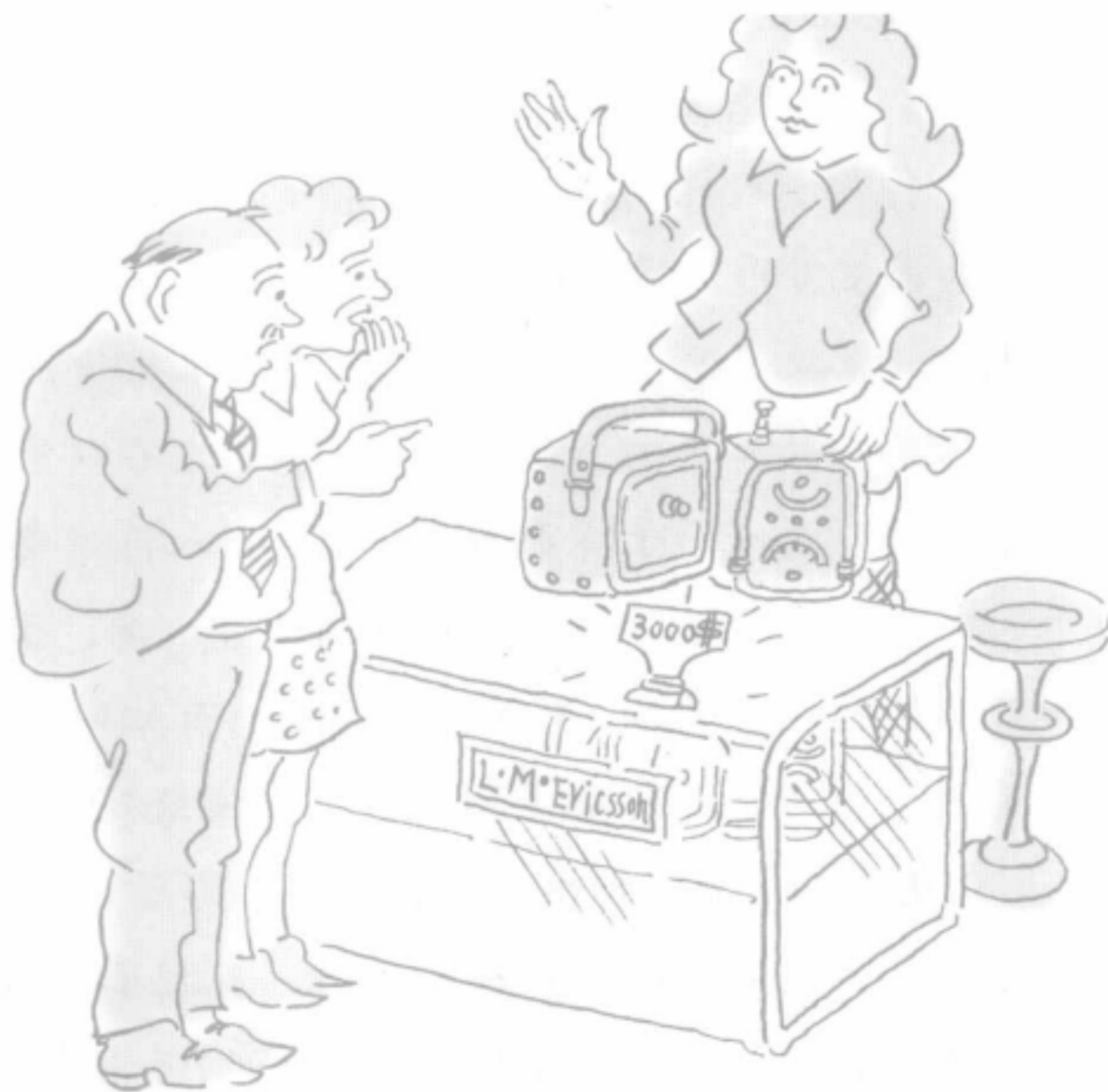
❁ 【案例】 货币和价格的决定

案例适用：货币和价格

价格指的是一单位的商品能够卖多少钱，或者一单位货币能够买多少单位产品。价格反映的是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它的一端连接产品，一端连接货币。要知道价格怎样决定，首先要知道货币是什么，及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货币是以物为对象的一般化要求权，它不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和货币的载体是分离的，货币是货币，货币的载体是货币的载体，它们不是相同的东西。把货币看成是一般等价物的人可能是把货币和货币的载体混为一谈的结果。货币载体可以为货币提供信用，也可以不为货币提供信用。以纸、符号作为货币的载体，它们不能为货币提供信用，因而有人认为纸币是价值符号。相反，以黄金作为货币的载体，由于黄金可以为货币提供信用，因而认为黄金才是真正的货币。其实，黄

商品的价格反映的是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货币是价格的表现形式。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金银天然是货币；纸币、黄金或贝壳，都只是货币的载体，永远是一般化的要求权形象化的符号。

金也好，纸、符号也好，它们都是货币的载体，而不是货币本身。货币永远是货币，它永远是一般化的要求权。货币的载体则不一样，它今天是纸，明天是符号，昨天则是黄金或贝壳。

货币是一种权利，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存在权利就有可能存在货币。权利是不对称的人的关系，只要有人就存在人的关系，只要存在人的不

对称关系就存在权利。权利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权利的质文明一点讲是人之间不对称的关系，野蛮一点讲就是人对人的压迫与统治。权利的量是指权利的大小，权利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由权利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吗？供给和需求是属于分配领域的东西。权利从来是抢来的，不是分配来的，没有实力，谁会分配权利给你？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非常正确的。权利的量由人的需要决定，死人没有需要，所以，没有人去统治死人。当人有安全的需要，就有保护你安全的权利，听话就安全，不听话，就不安全，黑社会就是这样获得权利的。

货币作为一般化的要求权，它的量同样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就货币的流通范围而言，如果把货币流通范围的人集合的话，货币的量为零，因为在不考虑黄金和外汇的情况下，贷款永远等于存款加现金，如果把使用货币的人看成是一个人，这时此人的左口袋是存款和现金，右口袋是贷款，左右口袋一合并，货币就是零了。人的需要决定货币的量是以影子货币为基础的，穷人再需要货币，他也无法得到货币。而影子货币又是用影子价格计算产品而得到的货币量，影子货币一是和影子价格有关系，另外和产品的数量有关系。影子价格和价格有相同的一面，我们是不是会循环论证呢？当然不会，因为影子价格是初始状态任意给定的价格，至于非初始状态下的影子价格，则是前期的价格，价格的变化会引起影子价格的变化，由于初始状态下的影子价格是任意给定，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追索，直到不矛盾为止。

货币是由影子货币转换而来的，影子货币转换为货币的过程就是具体的要求权一



般化为一般化要求权的结果。货币的流向由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需求级次越高的产品，价格越高，集合人需求级次越低的产品，价格越低。比如房子和牙膏，房子集合人需求级次高，它就好比牙膏贵很多。就生产房子和牙膏而言，生产房子的需求级次高于生产牙膏的需求级次，因为造一栋房子的人肯定要比造一盒牙膏的人多，在人既定的情况下，造房子对人的需求级次高于造牙膏。

价格由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需求级次高的产品，价格就高，集合人需求级次低的产品，价格就低。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是变化的，今天高的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明天可能变低。集合人需求级次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价格的变化。集合人需求级次可以是人的平均需求级次，也可以不是集合人平均的需求级次。在分配均匀的情况下，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就是集合人平均的需求级次，在分配不公的情况下，集合人的需求级次由少数人的需求级次决定。

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可以由少数人决定，是因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基本需求和派生需求。比如一个3口之家有一套3居室

的房子就够了，可是，这家因为有钱，他们买了10套3居室

的房子，这10套房子里，有1套是基本需求，另外9套是派生需求。而有些人因为没有钱，他们一套房子也买不起，显然，能够买多套房子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有人为了欺骗广大的人们，鼓吹需求是真实的，其实，基本需求是真实的，派生需求从来就没有真实过。这些人忘了基本的逻辑，那就是产品即是满足人需要的物品，也是吸收货币的工具。可能有人认为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产品的价格，就是多数人决定产品的价格，这是不对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来就是少数人决定产品的价格，不然，人们凭什么去投机？

人的需求有多种层次，可分为基本需求和派生需求；低价的牙膏和高价的房屋，都只是基本需求。



又凭什么进行资本运作。

需求级次决定产品的价格，它既体现在生产领域，也体现在分配领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广泛使用货币，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这时决定价格的是需求级次，这次是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级次。由于生产者少，劳动力多，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级次比较低。生产者需求级次决定劳动力价格为 P 。在分配领域，分配产品的人多，决定集合分配者需求级次的是有钱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很可能就是生产者，集合的生产者由于分配的是他们自己的产品，他们自然会将产品的价格提高。


价格的决定，表面上是所谓的供求，实际是集合人的需求级次。需求的基础是需要，决定价格的最终力量是人的需要级次。由于有需要的人不一定有钱，有钱的人可以有派生需求，决定价格的直接力量是货币。货币可以来自于生产领域，也可以来自于分配领域，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大部分来自于分配领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就已经不远了。

案例评析：

价格反映的是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它的一端连接产品，一端连接货币。要知道价格怎样决定，首先要知道货币是什么，及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一定时，那么随着产品需求量的增长，就会提升价格的上涨。可以说，影响价格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深层次的需求。

(资料来源：宏观经济学案例集：《案例三：货币和价格的决定》)

第六编



通论引起的几篇短论

一国的经济活动交替性地经历繁荣和萧条状态称之为经济周期。经济繁荣时，经济活动兴旺，投资热情高涨，消费活跃，基本实现充分就业。萧条时期，经济活动萎缩，失业率上升；重商主义是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奉行的，至今能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经济政策应该是国家干预措施和自由竞争相结合，以确保经济发展走向良好的趋势。

●本卷精彩内容导读目录

◎案例：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及其特征 / 260

◎案例：美日贸易摩擦及各自的对策 / 281

◎案例：美国扶持农业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 / 293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略论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经济繁荣阶段后期，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幻想破灭时，市场价格就会突然甚至灾难性地下降，加之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使流动性偏好急剧增加，利率上升，导致投资严重降低，经济进入萧条阶段。利率降低可能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那么经济又开始进入繁荣阶段。

经济周期运动

前面的论述已经解决了任何时期的就业量决定的问题。对于经济周期现象，我们也同样能够从理论上得以理解。经济周期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我还是特别强调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以及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对于引发经济周期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尤其是这种周期的时间顺序和期限长短的规则性，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因而，经济周期最好被认为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变动所造成的，并且常常由于伴随着经济体系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的变动而更加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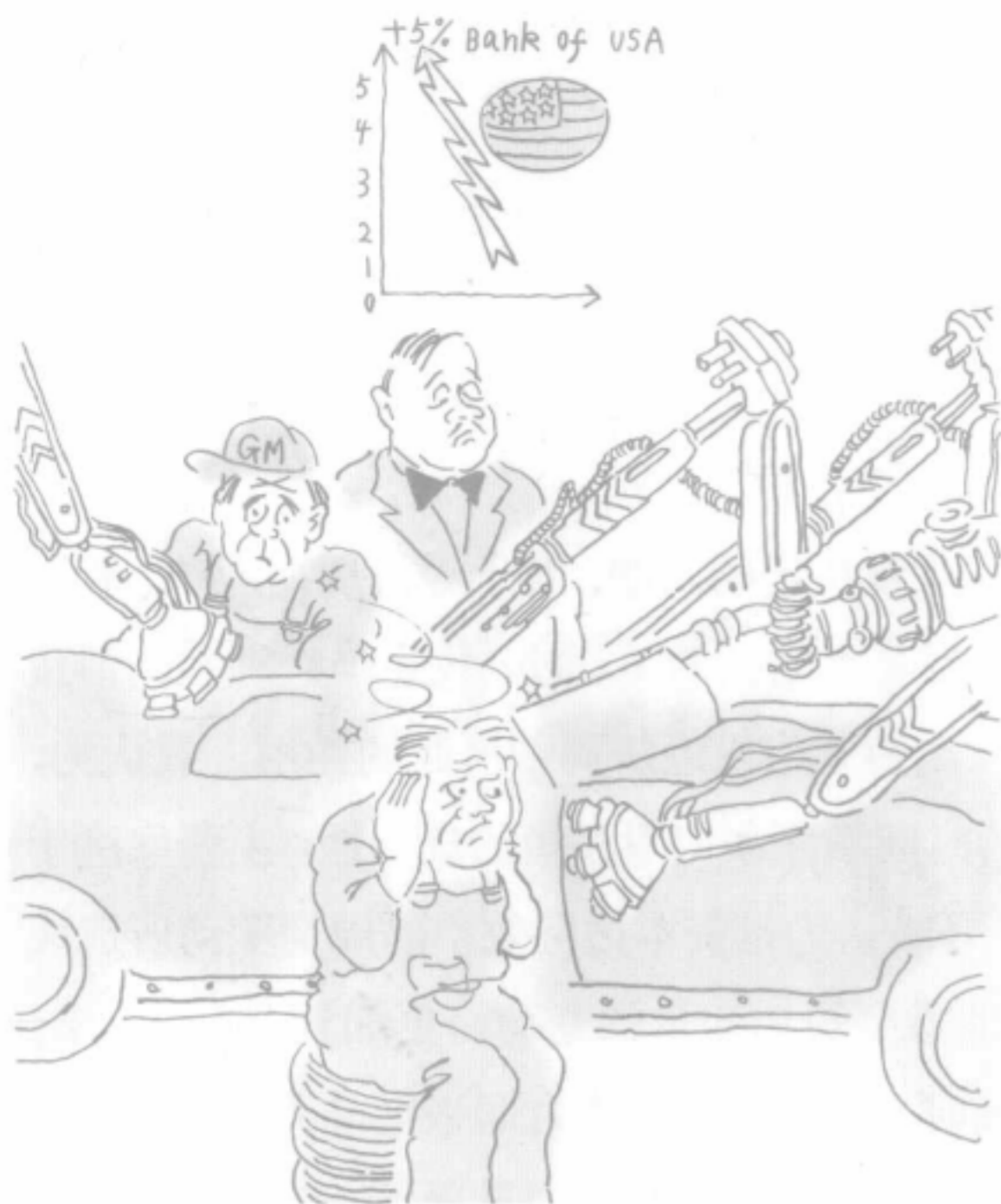
周期运动是指，当经济体系向上发展时，初始的力量集合起来推动其向上，而且它们还相互影响积累而增强一直到某一点；在该点，它们的力量逐渐丧失，逐渐地被相反方向的力量所代替；相反方向的力量最初也是集合起来的，并相互影响而加强，一直发展到最大程度，于是也逐渐衰退，向相反的方向演进。这里的周期运动不仅是指向上和向下的趋势一旦开始，不会在同一方向持久地继续下去，而且到最后是走向其反面。它还表明运动中的时间顺序和期限长短上具有相当明显程度的规则性。

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特征必须加以解释，就是危机现象：向上趋势被向下趋势所代替的转折过程常常是突然的和剧烈的；而向上趋势代替向下趋势的过程中，是相对平和的，一般没有一个激烈的转折点。

任何投资量的变动，如果没有相应的消费倾向的变动与之相抵消，就会造成就业量的波动。而投资量又被高度复杂情形所影响。因此，影响投资本身或者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因素（例如农业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根本不可能全部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但是，我认为，就19世纪典型的工业经济周期来说，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应该是具有周期性特点的。

经济衰退的根源

我们从繁荣阶段的后期和“危机”的来临开始谈起。资本边际效率不仅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品量和它的现时生产成本，而且还取决于对资本品未来收益的当前预期。所



经济繁荣后期，对资本品未来收益的过度乐观使人们低估了利率的上升，结果是使企业陷入危机。

以，对耐久性资产而言，对将来的预期在决定新投资的适当规模上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这种预期的基础是靠不住的。预期的难以捉摸导致耐久性资产投资突然的和剧烈的变动。

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依据利率的上升来解释“危机”。但是，我认为，对危机的最典型的最有力的解释，不在于利率的上升，而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

在经济繁荣阶段的后期，是以对资本品未来收益的强烈的乐观预期为特征的。人们都认为这种乐观预期足以补偿资本品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利率的上升。这是在购买者和投机者影响下的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性质问题：

购买者不清楚他们在购买什么；投机者更关心的是预测市场心理的变动，而不是合理估计资本品的未来收益。结果，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幻想破灭时，市场价格就会突然甚至灾难性地下降。另外，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带来的沮丧情绪和对将来的担心，必然使流动性偏好急剧增加，因而导致利率上升。从而，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和利率的上升严重降低了投资。然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本质因素还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特别是那些曾经促成一次繁荣的新投资重点的资本品的边际效率的崩溃。至于流动性偏好，除去与交易增加和投机增长相联系的那部分以外，只有到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会增加。

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使得经济处于萧条之中，这又会带来利率的降低，而利率的降低又可能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但是，目前资本边际效率可能已经彻底崩溃，以至于利率的降低也不足以使经济复苏。资本边际效率的恢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决定于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信心的恢复是无法控制的。经济萧条的这种特点被银行家和工商界的人士正确强调，却被



经济学家们所低估，因为他们相信“纯粹货币”的治疗办法。

因而，我认为要想解释经济周期的时间因素，就要从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恢复的因素中去找。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向下运动的持续时间是具有规律性的：第一，既定时代的正常经济发展所决定的耐久性资产的寿命；第二，多余存货的保管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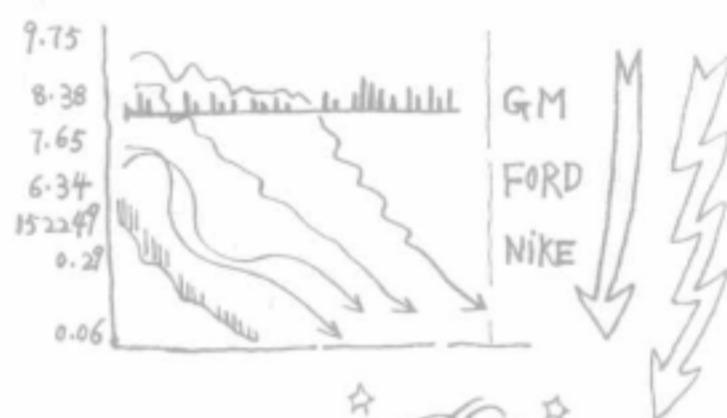
我们接着分析经济危机发生时的情况。只要繁荣继续存在，很大一部分新投资就会有好的收益。幻灭感的到来，原因在于：对未来收益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由于耐久品存货的稳定增加，现行收益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现行的生产成本被认为是高于以后的数值。怀疑一旦发生，就会迅速扩大。这样，在萧条开始时，可能有大量的资本设备的边际效率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呈负值。但要想通过磨损、腐蚀和老化来重新使资本设备短缺，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是一定时期资本设备平均寿命的多少的稳定函数。萧条阶段的长短与耐久性资产的寿命实际上和一定时代正常的经济增长率有着确定的关系。

第二个影响萧条的因素起于多余存货的保管费。它迫使存货在一定时期里被吸收，这个过程代表一种负投资，而这又会进一步损害就业。只有这种吸收过程结束时，就业才会明显地改善。

另外，在经济运动向下的阶段，大量的经营资本的减少是负投资的又一个因素。一旦衰退开始，经营资本的减少，会强化经济的下降趋势。在萧条的早期，存货增加的投资可能会抵消经营资本上的负投资；紧接着是存货和经营资本同时出现短期的负投资；过了经济谷底之后，存货的进一步负投资抵消经营资本的再投资；最后，当复苏已经进行相当时间时，这两个因素又同时有利于投资的增加。因而，耐用品投资波动的扩大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一斑。

不幸的是，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也不利于消费倾向。它会引起证券市场价值

当股市疯狂到连丝毫不懂股票的理发师、卖菜大婶都开始购买股票时，股市离崩盘也不远了。



的剧烈下跌。对于那些依靠借钱投资的人来说，股票价格的剧烈下跌会对他们产生消沉的影响。这些人的投资价值的涨落甚至比他们的收入多少对他们的消费支出具有更大的影响。

同样，当经济复苏一旦开始，它的自我扩大的影响方式是很明显的。无论是在经济萧条还是复苏时，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除非投资市场的心理状态能使自己做出巨大逆转，否则就不可能避免就业量的大幅度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如此深远的变化。因此，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听任私人完全自由地进行投资，政府有责任去控制社会投资。

救治经济萧条及失业的方法

有些人认为，投资过热是繁荣阶段的特征，避免过度投资是救治萧条的唯一办法；低利率不能阻止萧条，而高利率却能避免经济极度繁荣。高利率治理繁荣比起低利率治理萧条更加有效，这个论断是合理的。

我认为并不能从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推出这些人的观点。我想：过度投资的定义是含糊不清的，它可以指注定要失败的投资，或者在严重失业情况下没有用处的投资；也可指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每一种资本品都非常充裕，甚至在充分就业的情形下，没有一种资本品能够取得超过其重置成本的收益。严格地说，过度投资是指投资若再增加即为浪费。即使在这个意义上的过度投资，救治繁荣的办法也不在于依靠高利率，而在于采取果断的措施，即用收入再分配以及其他办法来刺激消费倾向。我们看到：繁荣阶段的典型情况，是指投资决策是在不稳定和不能持久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是因为，投资是由预期所推动的，而预期注定要失望。

繁荣的幻觉可能使某些特殊类型的资本资产的生产过于充裕，以致其中的一部分产品在任何条件下都代表资源的浪费。就是说，繁荣会把投资引向不正确的方向。除此之外，繁荣阶段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投资取得的实际收益是在更高的预期收益下得到的；但当幻想破灭，这种预期又被相反的“悲观错误”所代替。使得我们达到一种状态：住房短缺的同时，人们却住不起现有的房屋。

可见，医治繁荣之法不是高利率，而是低利率，因为低利率可以使所谓的繁荣继续下去。正确的医治经济周期之法，不是取消繁荣，致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萧条状态；而是取消衰退，使我们永远处于准繁荣状态。



所以，最终要走向萧条的繁荣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①在预期正确时，利率高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②预期状态被错误的想法支配，而只要这种预期状态存在，过高的利率就不能充当刹车的手段。繁荣是一个状态：过分乐观的情绪战胜了某种水平的利率，而经过冷静的分析，该水平被认为是过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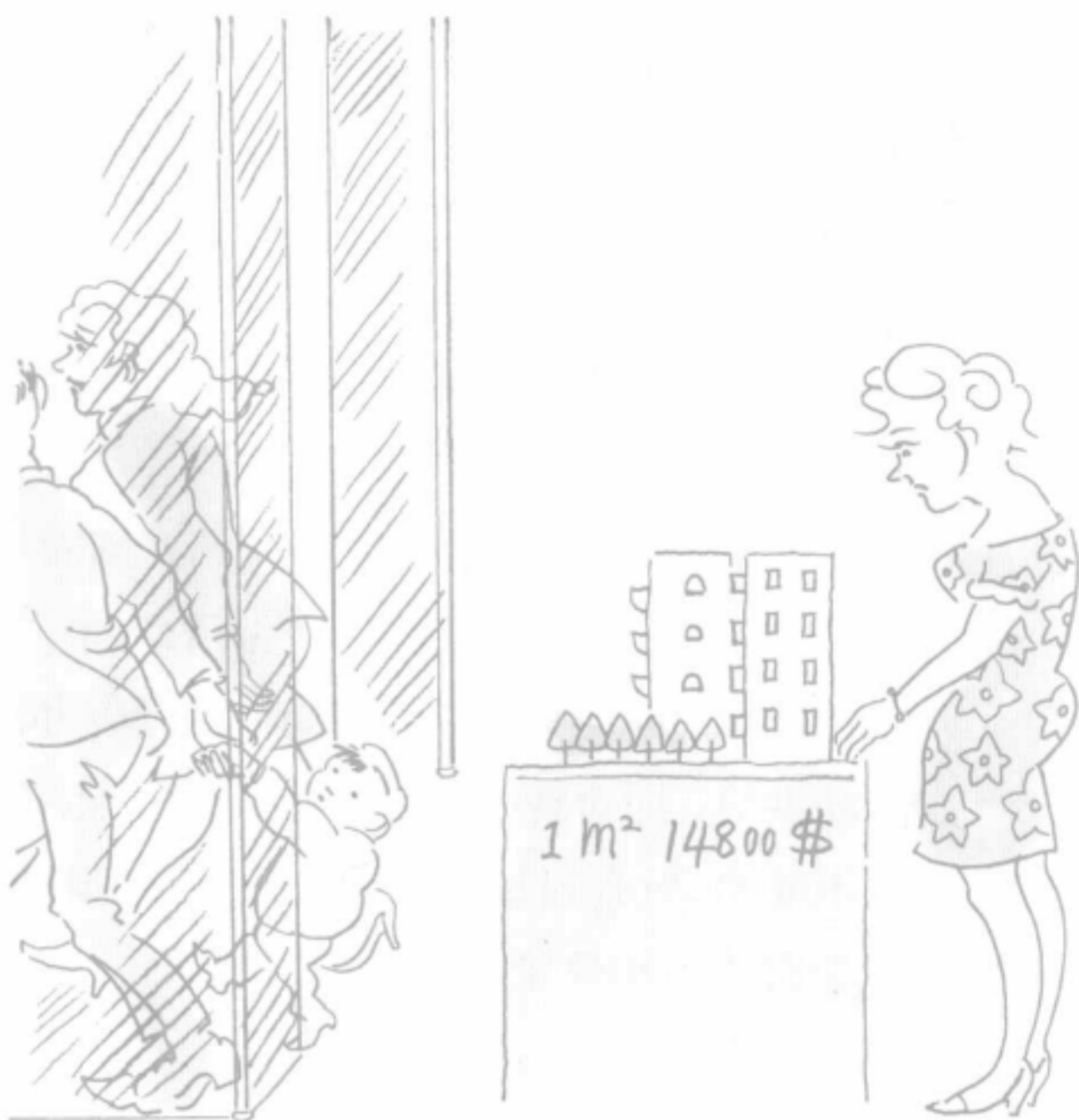
在富有的国家里，要想在现有的消费倾向下长期维持大致的充分就业，那么需要大量的新投资。这里所谓的充分投资是指任何类型的耐用品投资的增加，其总的毛收益会超过其重置成本。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充分投资状态不曾出现过，但我们也不能否定它出现的可能性。

此外，假定当代经济繁荣会暂时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或严格意义上的投资过度状态，那么，把较高的利率当做适当的补救法，仍然是荒谬的。我认为，真正医治之法在于，通过收入再分配或者其他方法再提高消费倾向，从而使得一个较小的当期投资量能够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

一个重要的思想派别认为，现代社会长期就业不足的根源在于消费不足，即由于社会习惯和财富分配造成了过低的消费倾向。

在现行情况下，投资量是没有计划和控制的：一是在于资本边际效率是易于变化的，这又由投资性的私人判断所决定；二是因为长期利率难以下降到某一成规所决定的水平之下。因而，增加投资是不现实的，只有增加消费才能提高就业水平。

我和这个思想派别的不同只在于，当增加投资仍然对社会有利的时候，该派却过分强调增加消费。在理论上，该派忽视了有两种途径可以扩大产量的事实。即使在资



经济的繁荣会把投资引向不正确的方向，繁荣破灭时，却出现住房短缺而人们住不起现有房屋的现象。

本增加迟缓时，更好的方法是集中力量增加消费，在决策之前，也应该对各种可能性都适当考虑。我深信增加资本对社会的巨大利益，所以应使它增加到资本的增加不再具有稀缺性为止。

我完全赞成双管齐下的政策组合：①在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时，由社会控制投资量；②实施增加消费倾向的各种政策。因为，在目前的消费倾向下，仅靠投资是不能维持充分就业的。所以，有充分的理由使两种政策同时起作用——促进投资，同时又促进消费。不止是在现行消费倾向下，使消费随着投资的增加而相应提高，而且还在于，通过提高消费倾向来使消费达到更高的水平。

另一学派的思想认为，解决经济周期问题的办法不在于增加消费或增加投资，而在于减少劳动供给，即对现有的就业量重新分配，同时不增加就业和产量。但我认为目前的时机不成熟，只有到每个人都认为增加闲暇时间给他带来的好处大于增加收入所带来的好处时，这种政策才能实行。

其他经济学派的理论

有一派思想认为，在经济繁荣的初级阶段解决经济周期问题的办法是用较高的利率来遏制繁荣的发展。D·F·罗伯森先生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实际上假定充分就业是不现实的。我们最好的愿望是比现在远为稳定的就业水平，其平均值货币比现在的

罗伯森认为经济繁荣初级阶段解决经济周期问题的办法是用较高的利率来遏制繁荣的发展。

的水平稍高些。

假定控制投资或消费倾向的政策不变，那么，我认为提高利率的办法甚至可以抑制最盲目的乐观情绪，从而产生更有利的平均预期状态。以预期的落空为特点的萧条阶段会导致如此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以致如果事先加以抑制，有用的投资的平均水平可能会高一些。这个学派的理论正确与否应依据事实，而事实又是缺乏的。但是，它忽视了消费的增加对社会带来的好处，是毋庸置疑





的。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危险的和不必要的失败主义的想法，默认经济体系的缺点而不加以补救。

这种论点只是想法混乱，完全缺乏依据。它认为在繁荣时期，投资会超过储蓄，较高的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储蓄，使二者恢复均衡。还有人认为：伴随着投资增加而增加的储蓄是有害的和不公正的，因为这会引起价格的上升。但是，我认为价格的上升主要不是由于投资的增加造成的。供给价格通常会在短期内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其原因是由于物质上的收益递减，还可以使用来自用货币计量的成本单位的上升。如果供给价格不变，则价格就不会上升。但是，当投资增加时，储蓄还是会增加的。如果储蓄不变，消费倾向的增大也会导致价格的上涨。

有人说，货币数量增加是一种祸害，因为它引起利率降低和投资增加。然而，新增加的货币也并不“强迫”任何人接受，它只是为了满足流动性偏好的要求而增加。更有人说，经济繁荣是以“资本消耗”为特征，这是指由过度的消费倾向引起的负净投资。除非把经济周期现象同战后欧洲通货膨胀间发生的通货逃避相混淆，否则，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即使这个说法是对的，降低利率也是比提高利率更合理的治理投资不足的办法。

在早期的研究中，杰文斯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是由农业收获量的波动所造成的。当某年谷物特大丰收时，该年谷物的追加是等于该年现时投资量的追加；而当某年歉收时，从谷物存货中取走的部分代表相应的现时投资的减少。这样，在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社会中，影响这种流转的谷物数量的增减的原因，成为影响投资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在当代，农业作为经济波动的原因的重要性变小了，原因有二：第一，农产品在总产品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第二，世界农作物数量波动的百分比远远小于单个国家农作物数量波动的百分比。

早期经济学家认为农业收获量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如谷物丰收，则该年投资量与谷物的追加是相等的。



甚至在今天，密切关注原料存量的变动在决定投资上的作用，依然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当达到最低点之后，从萧条到复苏的速度之所以缓慢，主要是因为把过多的存货量减少到正常水平所造成的紧缩经济的影响。在繁荣阶段破灭以后，存货量的积累缓和了崩溃的速度，而其代价则是使得后来复苏的速度减慢。因为，如果没有存货的负投资，则其他方面的投资量足以产生一次经济向上的运动；而在负投资条件下，这些投资量达不到足够使经济向上运动的程度。

【解析】经济周期的根源及特征

经济周期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我还是特别强调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以及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对于引发经济周期所起的作用。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尤其是这种周期的时间顺序和期限长短的规则性，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因而，经济周期最好被认为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变动所造成的，并且常常由于伴随着经济体系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的变动而更加复杂。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依据利率的上升来解释“危机”。但是，我认为，对危机的最典型的最有力的解释，不在于利率的上升，而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因为，在经济繁荣阶段的后期，是以对资本品未来收益的强烈的乐观预期为特征的。但是，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幻想破灭时，市场价格就会突然甚至灾难性地下降。另外，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带来的沮丧情绪和对将来的担心，必然使流动性偏好急剧增加，继而导致利率上升。从而，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和利率的上升严重降低了投资。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使得经济处于萧条之中，这又会带来利率的降低，而利率的降低又可能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随后经济又开始进入繁荣阶段。

【案例】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及其特征

案例适用：经济周期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可采用如下方法：将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由上升开始到下降的年份作为周期的开端，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由重新上升到最高水平的年份作为周期的末端。按照这种方法，我国在1953—1994年大约出现了9个经济周期，其平均长度为4.6年，平均扩张长度为2.3年，平均收缩长度为2.2年，扩张收缩比为1:1。这一时期经济周期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我国 1953—1994 年社会总产值环比增长率周期波动划分

| 年份 | 增长率(%) | 周期序列 | 周期长度(年) | 周期类型 | 峰顶值(%) | 谷底值(%) | 落差(%) |
|------|--------|------|---------|------|--------|--------|-------|
| 1953 | 18.7 | 第一周期 | 3 | 增长型 | 18.7 | 6.1 | 12.6 |
| 1954 | 8.5 | | | | | | |
| 1955 | 6.1 | | | | | | |
| 1956 | 17.9 | | | | | | |
| 1957 | 6.1 | 第二周期 | 2 | 增长型 | 6.1 | 32.6 | 26.5 |
| 1958 | 32.6 | | | | | | |
| 1959 | 18.0 | 第三周期 | 7 | 古典型 | 19.0 | -33.5 | 52.5 |
| 1960 | 4.7 | | | | | | |
| 1961 | -33.5 | | | | | | |
| 1962 | -10.0 | | | | | | |
| 1963 | 10.2 | | | | | | |
| 1964 | 17.5 | | | | | | |
| 1965 | 19.0 | | | | | | |
| 1966 | 16.9 | 第四周期 | 4 | 古典型 | 25.3 | -9.9 | 35.2 |
| 1967 | -9.9 | | | | | | |
| 1968 | -4.7 | | | | | | |
| 1969 | 25.3 | | | | | | |
| 1970 | 24.2 | 第五周期 | 6 | 古典型 | 24.2 | 1.9 | 22.3 |
| 1971 | 10.5 | | | | | | |
| 1972 | 4.5 | | | | | | |
| 1973 | 8.6 | | | | | | |
| 1974 | 1.9 | | | | | | |
| 1975 | 11.5 | | | | | | |
| 1976 | 1.4 | 第六周期 | 3 | 古典型 | 10.3 | 1.6 | 8.7 |
| 1977 | 10.3 | | | | | | |
| 1978 | 13 | | | | | | |
| 1979 | 8.5 | 第七周期 | 7 | 增长型 | 17.1 | 4.4 | 12.7 |
| 1980 | 8.4 | | | | | | |
| 1981 | 4.4 | | | | | | |
| 1982 | 9.5 | | | | | | |
| 1983 | 10.2 | | | | | | |
| 1984 | 14.7 | | | | | | |
| 1985 | 17.1 | | | | | | |
| 1986 | 10.1 | 第八周期 | 3 | 增长型 | 15.8 | 10.1 | 5.7 |
| 1987 | 14.1 | | | | | | |
| 1988 | 15.8 | | | | | | |
| 1989 | 5.2 | 第九周期 | 6 | 增长型 | 21.7 | 5.2 | 16.5 |
| 1990 | 6.6 | | | | | | |
| 1991 | 11.4 | | | | | | |
| 1992 | 21.7 | | | | | | |
| 1993 | 21.8 | | | | | | |
| 1994 | 20.2 | | | | | | |

从该表中可归纳出我国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

(1) 周期长度不规则，发生频率高

从1953—1994年，我国共发生9次周期性经济波动，最长为7年，最短为2年，平均长度为4.6年。经济周期长短不一，呈现极不规则的状态，这说明我国的经济运行受随机因素影响较大。美国在1796—1937年共发生17次经济周期平均长度为8.35年。与美国相比，我国经济周期发生频率相对较高，既不同于一般国家经常出现的长周期，也不同于平均长度为40个月的短周期。

(2) 波动幅度大

从经济周期的振幅看，从峰顶到谷底的落差最大的是52.5%，最低的也有5.7%，9次经济周期的平均振幅为21.41%。如此大的经济波动是不多见的。

(3) 经济周期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

①从1950—1956年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基本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其中，1950—1952年间，经济增长具有恢复性质；1953—1956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为混合经济阶段。该周期为接近平均周期长度的增长型周期，经济波动幅度较小。②从1957—1978年为单一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波动频繁，波动幅度也较大。共发生5次经济

周期，其中包括4个古典型周期，经济出现严重的停滞或负增长。从第2个周期到第5个周期是波动最大的4个周期，落差分别达到26.5%、52.5%、35.2%和22.3%。尽管经济波动幅度较大，但物价没有明显的波动，这主要是因为物价处在政府严格控制之下。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轨变型阶段。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1979年以来，共发生3次经济周期，它们都是增长型周期。与过去相比，波动幅度大大减缓，周期长度有增加的趋势。





势，而增长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说明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稳定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相关度逐渐增强，物价开始成为反映经济景气波动的重要指标之一。

(4) 经济周期的扩张与收缩比值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经济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约为1:1，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上升期与下降期比值2:1。一般而言，经济周期上升期的经济效益要高于下降期的经济效益。这说明我国经济整体效益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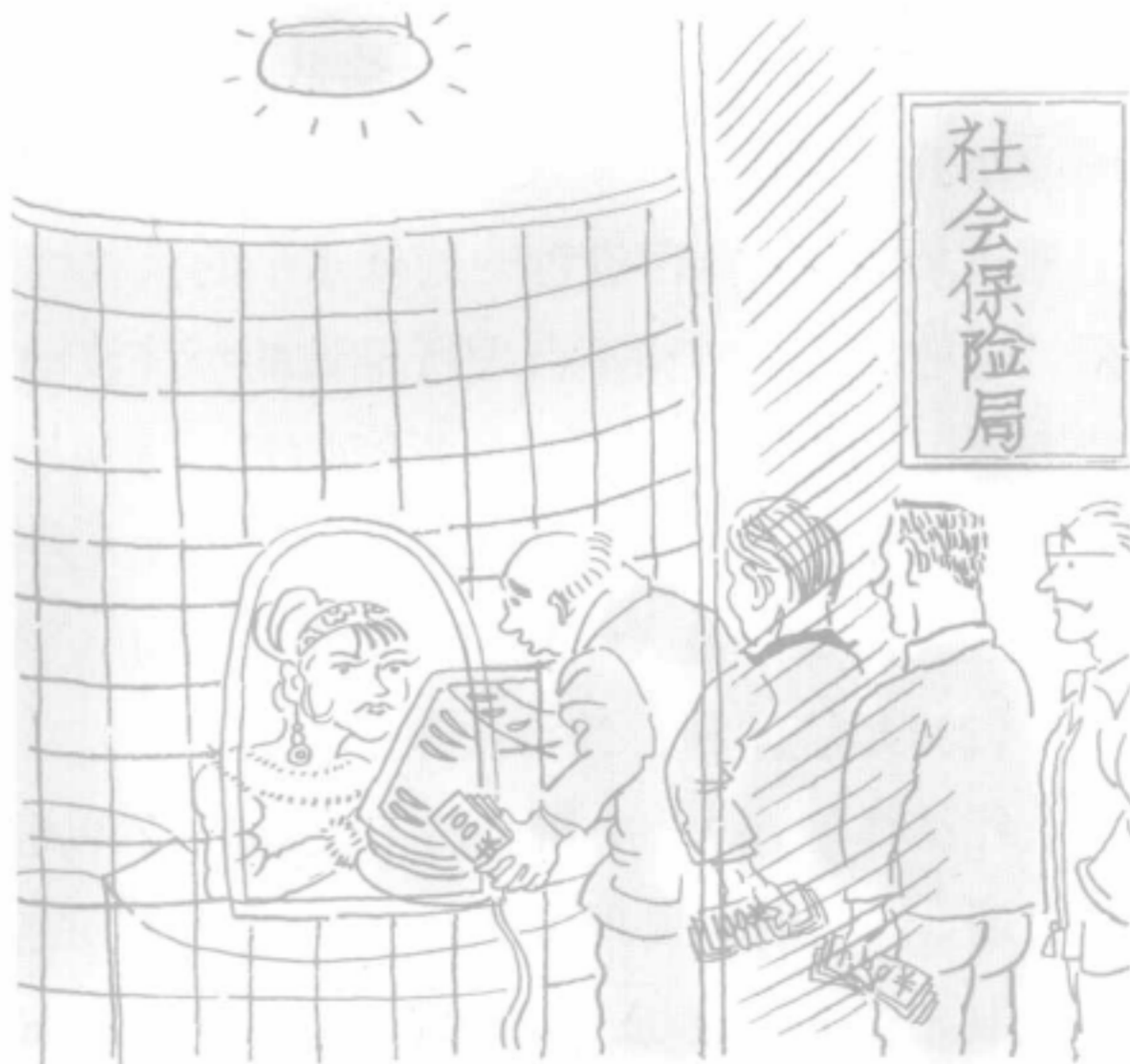
案例评析：

对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可从投资过度理论和心理理论等方面进行解释。但应该注意到，由于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等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我国经济周期的原因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1) 投资的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

过度投资理论认为，过度投资使资本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结果会造成经济波动。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形态与社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的形态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说，投资波动是导致我国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但在我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自身的特征。

一是资源约束下的投资冲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目的决定了国家或企业部门总是力图在尽可能大程度上扩大再生产规模，于是很自然地形成一种“扩张欲望”，或称为“投资饥渴症”，再加上投资责任不明确、投资扩张自我约束机制薄弱等原因，使得投资扩张冲动增强，投资增长率常常上升到惊人的高度。在高度投资扩张的同



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会影响其消费需求，如对未来的支出，即购买养老保险等。

时,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特别是电力、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投资不足,发展严重滞后,使投资扩张引致需求推动的经济增长遇到资源供给“瓶颈”的制约,最终出现经济的大幅波动。二是投资效益过低。投资效益低必然对应着较弱的乘数效应,从而使得投资的高速增长只能带来较少的国民收入增量,这显然又会对下一期的资本积累造成影响,使连续的投资增长无法再继续下去。于是,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链条出现中断,经济增长出现不可避免的下降。

(2) 心理预期的影响

心理理论认为,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又影响投资需求和厂商的投资行为,最终将影响经济的周期波动。从我国的情况看,在前几个周期中,心理预期因素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不明显。但在后几个周期中,心理预期的影响比较显著。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医疗、住房、教育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力度逐渐增大,使居民增加了对未来支出的预期,这使得人们的即期消费减少,而各期的储蓄增加;受供求变化、商品价格不断走低的影响,投资回报率偏低,企业对未来投资收益的预期降低,投资意愿减弱。这说明,周期的收缩期延长一般与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预期不乐观有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我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1) 经济结构不合理

经济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比较间接的,因而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但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中,经济结构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①忽视市场需求,盲目进行一些低水平的重复性建设而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引起供求失衡。这是由产业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经济波动。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相协调——投资增长远远快于消费需求的增长,结果造成需求结构不合理而引发经济波动。③收入平均化和收入差距扩大化并存,导致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不稳定。这是由收入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经济波动。

(2) 经济体制、经济决策的影响

经济体制、经济决策虽然不是形成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能创造或消灭经济周期,但它们的出现可能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形式如周期的振幅、波型、长度等具有很大影响。这也是我国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就经济管理体制而言,无论改革前或改革后,在经济运行中始终存在着与经济周



期波动相关的两股力量：一股是由投资的无责任制所产生的“投资饥饿症”或“投资扩张”，另一股是由分配上的“大锅饭”及管理上的僵化所形成的生产活力的丧失和经济效益的低下。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府决策不出现失误，也会在经济运行中内在地产生出投资需求无限扩张的冲击力量。

就政府干预经济的决策而言，我国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管理经济职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不仅本质不同，而且作用程度更大。因此，经济决策和政治需要在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服从于政治目标的追求，政治目标以及政治运动引起的狂热，常常支配经济机制以不符合规律的方式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相应扩大，生产决策权和投资权趋于多元化。计划部门指令性的投资控制效力呈下滑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市场动态、投资活动的趋势等指标来预测经济周期的发展前景，“景气循环”的可预期性显著提高，市场信号和投资回报预期的利益刺激，正在成为引导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总体上看，经济周期呈现振幅渐缓、周期长度渐长的趋势。

（资料来源：刘慧，路正南：《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分析》，新知税收网 2005-7-20）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重商主义认为贸易顺差有利于本国经济，而逆差则是有害的。一般认为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好处通常大于重商主义所说的。在一个工资单位、国民素质和货币制度都比较稳定的社会里，政府应该高度关注该国的对外贸易平衡状况。

重商主义及贸易顺差

大约有 200 年的时间，重商主义学说一直认为：贸易顺差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它使得外国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而贸易逆差则是有害的，尤其造成了大量贵金属的外流。但是，在过去的 100 年里，自由贸易论则提出了与重商主义学说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尽管从短期来看，逆差对该国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在较长的时期里，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贸易逆差；由于外贸机制是能够自行调节的，人为对它进行干扰不仅是无用的，而且进行干扰的国家会变得极为贫困，丧失了本来可以获得的国际分工的好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传统的观点称为“重商主义”，而把较新的观点称为“自由贸易论”。

现代经济学者一方面认为，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好处通常比重商主义所说的更大；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重商主义学说本身在思维上是比较混乱的。

马歇尔对于重商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过重商主义的好处，更不要说重商主义学说中所谓的真理。我将在下面对此进行考察。现代自由贸易论者也持有相同的态度。在鼓励“幼年”产业和改善贸易条件的论战中，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让步对重商主义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 20 世纪的前 25 年，关于财政政策的论争中，我不记得是否有哪个经济学家认可了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增加国内就业量的观点。我自己的经历是最适合的了。1923 年，我还是一个古典学派的追随者，完全相信学过的重商主义，我记得自己当时写道：“贸易



马歇尔对于重商主义并未完全否定，他的理论可称为“自由贸易论”。

利率

利率又称利息率。表示一定时期内利息量与本金的比率，通常用百分比表示，按年计算则称为年利率。利率，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是指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借贷资本总额的比率。利率是单位货币在单位时间内的利息水平，表明利息的多少。利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金融变量，几乎所有的金融现象、金融资产均与利率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保护主义唯一做不到的事，就是不能医治失业……有一些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证时可能得到的，但又是不能实现的利益，这里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不过，宣称可以医治失业却是保护主义谬论的最赤裸的和最粗劣的形式。”由于早期的重商主义理论，我们找不到文献可以参考，古典学派就向我们灌输：重商主义理论基本上就是胡说八道。可见，古典学派的统治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又是非常完整的。

现在，我用自己的观点来说说重商主义学说中的科学成分。然后，再把它同重商主义者的实际论点相比较。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利益仅仅是指一个国家的利益。

通过国际贸易，出口商品，是获取贵金属，以降低国内利率的重要途径。



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当一国的财富迅速增长时，可能会遇到新投资诱导不足的阻碍。在既定的消费倾向（它由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国民特点所决定）下，一个国家的利益主要依靠来自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诱导程度。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形成总投资。在总投资量单独由利润动机决定时，在长期中，国内投资由国内利率决定，而对外投资则由贸易顺差大小决定。因此，在一个国家庇护直接投资的社会里，政府的经济目标理所当然地要关注国内利率和贸易的差额。

贸易顺差

贸易顺差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出超”。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贸易顺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在特定年份对外贸易活动状况。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因为这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贸易顺差为相对而言，一方为顺差，则贸易的另一方为逆差。

如果工资单位相当稳定，短期平均的流动性偏好的波动程度也是相当稳定，银行业遵守的成规变化也不大，那么利率将由满足社会的流动性需求的贵金属数量（以工资单位衡量）来决定。同时，在一个国家没有大量对外贷款和国外财富的时期里，贵金属数量的增减主要由贸易的顺差或逆差来决定。

因此，政府当局高度关注贸易顺差是具有双重目的的，而且这也是促进这两个目标实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既然政府当局在那时不能直接控制国内利率，也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的其他诱导，那么，它增加对外投资的唯一直接手段就只能是增加外贸顺差，这也是政府增加国内投资的唯一间接手段，通过顺差可以赚取贵金属和降低国内利率。

不过，实施这一政策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在国内利率很低时，投资量会使得工人工资上升，提高国内人工成本，不利于一国的出口，也就损害了贸易的顺差；二是在本国利率低于其他国家时，利率的下降会导致贵金属流向国外，也不利于贸易顺差的积累。因而，重商主义政策不能被过分推行，特别对于那些居于重要国际地位的国家来说，上述限制作用所产生的风险就更大，因而国外成本的下降和利率的上升，会加剧国内成本的上升和利率的下降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一个工资单位、国民素质和货币制度都比较稳定的社会里，政府应该高度关注

19世纪，英国大力倡导自由贸易政策，其商品销往全球，东亚、南美、非洲，到处充斥着英国的货物。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顺差能获得更多财富。它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各行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

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舍尔的巨著《重商主义》至今仍是该领域研究的权威之作。



该国的对外贸易平衡状况。原因在于适当的贸易顺差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逆差却使得经济陷入泥潭之中，难以走出来。

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也知道通过限制贸易来实现顺差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限制顶多只能是促进了短期贸易顺差的增加，但在长期里，这一限制政策是不利于顺差的积累的。19世纪中叶英国贸易顺差的积累正是来自于它所大力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一战后欧洲的例证也充分验证了

要想获得更多的贸易顺差，我们就不能试图通过限制贸易来实现。

因此，我们通常都不赞成一国采取限制贸易的做法。古典学派过分夸大了国际分工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好处，不过这些好处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它在规模上也不小。本国从他国得到的贸易顺差也恰好是他国的贸易逆差，这两者的和正好是零。因而，贸易的顺差还是逆差只是看待的角度不同，整个世界的贸易差额还是零。这也就给那些贸易顺差国提了个醒：顺差国要学会节制，因为过多的去追求顺差只能给其他国家造成更多的损失，引起“以邻为壑”的国际间恶性竞争。所以说，一个国家只能从国际分工中获得一份相对合理的收益，而不能变得贪得无厌。最后，单纯凭借限制贸易来实现目标也是不可靠的选择，包括私人利益、行政无能和任务本身所带来的困

难都会给预期目标带来障碍。

因此，我批评的重点是针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他们认为利率和就业量可以自动调节到最优水平，这根本就是错误的。此外，他们对待贸易差额也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受到这种错误理论的支配，英国政府一方面让银行利率听由市场涨落；另一方面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度。结果造成了以下的景象：一方面是利率的自由变化无法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它无法对就业进行调整来避免失业；另一方面，在固定的汇率制度中，银行利率将不可能成为保护贸易差额的手段。

古典学派理论在两个方面做得不错：一是论述了厂商理论；二是分析了产品分配（资源数量既定）理论。但是，我认为那些比古典学派更早的经济思想的先驱者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早在16和17世纪，一些经济思想的先驱者们就关心整个经济体系，关心如何使整个体系的全部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状态，他们分析的方法是很智慧的，但却被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抛弃了。此外，重商主义者倡导禁止高利贷法、保持国内的货币存量以及防止工资单位的上升等办法来千方百计地压低利率，这些做法都有可取的地方。还有，如果由于国内货币不可阻挡地外流、工资单位的上升等原因，造成货币供给量严重不足，此时重商主义者只能通过货币贬值的办法来恢复货币存量，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

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更是经济政策的实践者，但他们却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我们通过赫克舍尔教授的巨著《重商主义》来讨论重商主义的功过是非，该书首次将两个世纪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呈现给一般读者：

(1) 重商主义者强调高利率是财富增长的主要障碍。利率是由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来决定的，所以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降低流动性偏好；另一方面增加货币数量。以此达到降低利率、促进财富增长的目的。

在与配第的争论中，洛克第一次运用抽象的理论来表述了利率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配第对最高利率限制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他是反对这种观点的。洛克认为货币有两种价值：一是使用价值，它由利率来决定。这时，它具有土地的性质，而它的所得——地租，相当于利息。二是交换价值，它与利率无关，而是由货币

贵金属

贵金属主要指金、银和铂族金属（钌、铑、钯、铱、铱、铂）等8种金属元素。这些金属大多数拥有美丽的色泽，对化学药品的抵抗力相当大，在一般条件下不易引起化学反应。它们被用来制作珠宝和纪念品，而且还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一般而言，贵金属常指用于货币的金银。



对于金银充当货币，洛克这样写道：“人类同意给金银赋予一种想象的价值。”



马林纳斯认为单纯追求增加贸易而削价出售必然损害本国的利益。

总量与商品总量的比例关系来决定的。所以说，洛克是双重货币数量论的鼻祖。第一，他认为利率取决于货币数量与贸易总价值的比值；第二，他认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货币数量同市场上商品总量的比值。但是他混淆了这两种比例关系，也忽视了流动性偏好波动的可能性。不过，他还是忙于论证降低利率对价格水平没有直接的作用，而只有在利率的降低引起了货币或商品的进口和出口的比例改变时，它才会影响价格，但我想他并没有真正全面论述过。

重商主义者容易区分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他们也没有忽视这样一点：过大的流动性偏好会使贵金属被储藏，从而失去对利率的有利作用。在另一些场合，他们认为，为了增强国家的力量，应该由国家积累金银；而施勒特则直截了当地反对这种政策。

(2) 重商主义者们清楚价格过低的危害，以及过度竞争会损害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因此，马林纳斯在他的《商法》(1622年)中写道：“单纯追求增加贸易而削价出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在价值论上，不仅论证了劳动价值论，而且还确定了这一原理的最早理论体系。他的代表作《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很早就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全球发行。而他本人也因此被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售的结果必然是损害本国的利益。商品价格过低，贸易量不见得会增加，这是需求量很小和货币稀缺的结果。它们使东西变得很便宜。相反，当货币充裕、需求增加、商品变得昂贵时，贸易量就会增加。”

（3）重商主义者最早把失业原因归纳为“惧怕进口货物”和货币稀缺，这在两个世纪以后，被古典学派认为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重商主义者的政策是一箭双雕的：一方面，国家可以处理掉会成为失业根源的过剩货物；另一方面，国家的货币存量会增加，从而会降低利率。

从重商主义者的实践中，我们的确感到：长远来看，储蓄倾向总要大于投资诱导。投资诱导的不足是引起经济问题的关键原因。现在的投资诱导不足是因为资本的积累量太大；过去的各种风险和意外灾难也同样会引起投资不足。个人通过节制消费来增加财富的欲望大于企业家增加国民财富的动机。

（4）重商主义者也知道他们的政策是只顾及本国利益的，因此可能引发战争。他们承认，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于国家利益以及增强国家力量。

重商主义者对于国际货币制度的态度是很短浅的，我们当然可以指责他们。不过他们的现实主义态度却比一些现代人的混乱的思想好得多。这些人宣称只有通过固定的金本位制和自由的国际借贷，才能促进持久的国际社会和平。

在一个使用货币契约和长期内成规不变的经济制度中，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和利率由国际收支状况决定。一战时，政府当局只有采取以牺牲邻国为代价的出口政策来吸引贵金属流入，别无他法来治理失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像国际金本位制度那样，造成国家间的利益对立。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就必须争夺海外市场和贵金属。随着财富的增长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减低，这种争夺会逐渐升级以至于两败俱伤。正统

经济学家的说教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因为当某些国家在盲目地斗争以寻求出路时，为了取得自主的利率又要求他们抛弃金本位下的种种义务，而正统的经济学家却教导这些国家说，恢复先前的金本位束缚是走向经济全面复苏所必须的第一步。

实际上，我们应该采取相反的办法。采取不受国际关系影响的自主利率政策，并实施一项能直接使国内就业达到最优水平的国家投资计划，这才是既有利于本国同时又有利于邻国的互惠的明智选择。如果所有国家都同时采取这种政策，那么世界经济便会恢复健康。

禁止高利贷法

重商主义者意识到了问题，却没有把这些疑问解决掉。而古典学派则根本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完全地自由放任才是可取的，他们的理论前提直接否定了公众“怕货”的心理。结果，导致经济理论的结论与基于常识的判断之间并不相符。古典学派理论推翻了普通公众的“怕货”观念，但同时自己又是错误的。

我回忆起博纳·劳面对古典经济学家的那种愤怒和困惑交织在一起的态度，因为他们否认确实存在的事实。古典学派经济理论比宗教甚至有更强的力量，因为它让人们凭借思想的力量排除活生生的现实，这比起让人们信奉本来就神秘的宗教更加困难。

博纳·劳是加拿大裔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他是唯一一位生于英伦以外的英国首相。



还存在一种类似的、却被古典学派鄙夷为幼稚的学说，但它却符合社会现实。我们应该为它平反昭雪，让它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个学说是指，利率不会自动调节到对社会有利的水平，而是经常趋于上升，因而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通过法令、习俗，甚至不惜以道德制裁来加以抑制利率的提高。

在中世纪以及其以前的社会里，当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风险和意外事故，不仅减少资本的边际效率，也增加了流动性偏好，并使其达到过高的水平，从而不利于

印花税

印花税是以经济活动中签立的各种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等应税凭证文件为对象所征的税。印花税由纳税人按规定应税的比例和定额自行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即完成纳税义务，现在往往采取简化的征收手段。印花税源于荷兰，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在国际上盛行。

投资，阻碍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利率自然会有上升的趋势，这也必然会阻碍社会的投资。因而，反高利贷便成为古代社会中重要的一项经济政策。

古典学派灌输给我们的是：中世纪教会对待利率的态度一直是错误的。我也天真地以为当时耶稣教会的教士们完全是为了摆脱他们荒谬的理论，而进行使贷款的回报与投资的收益相区别的论争。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想法才是最稚嫩的，因为这些讨论确实是一种诚实的学术探讨，以区分被古典学派理论混淆的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通过这种区分和辨别，我们一方面可以实现较高的资本边际效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法令、习俗和道德制裁来压低利率。

甚至亚当·斯密对禁止高利贷法的态度也是很温和的。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没有适当的投资机会，那么，个人储蓄也是可以用来放债的，未必都用来投资。他之所以赞成低利率的存在，就在于它可能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几率更大。为此，他受到了边沁的批评，边沁认为亚当·斯密过于谨慎地对待社会中的“创业者”，因为最高利率会使那些合理的和有益于社会的风险事业得到太低的报酬。不过，边沁在反对那种妨碍合理的风险事业方面的观点是正确的。

格赛尔的理论

此外，我们也不该遗忘另一位先知西尔维奥·格赛尔（1862—1930）。他的著作中有很多闪光点，只是深度不够，没有抓住本质。他的代表作包括：1906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的《全部劳动产物权的实现》；1911年在柏林出版的《利息新论》以及1916年在柏林和瑞士两地同时出版的《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秩序》（实际上是前两部作品的合著），英译本名为《自然的经济秩序》。

格赛尔的著作风格独特，全书既充满了冷静、科学的语言格调，也充满了崇尚社

伯纳德·曼德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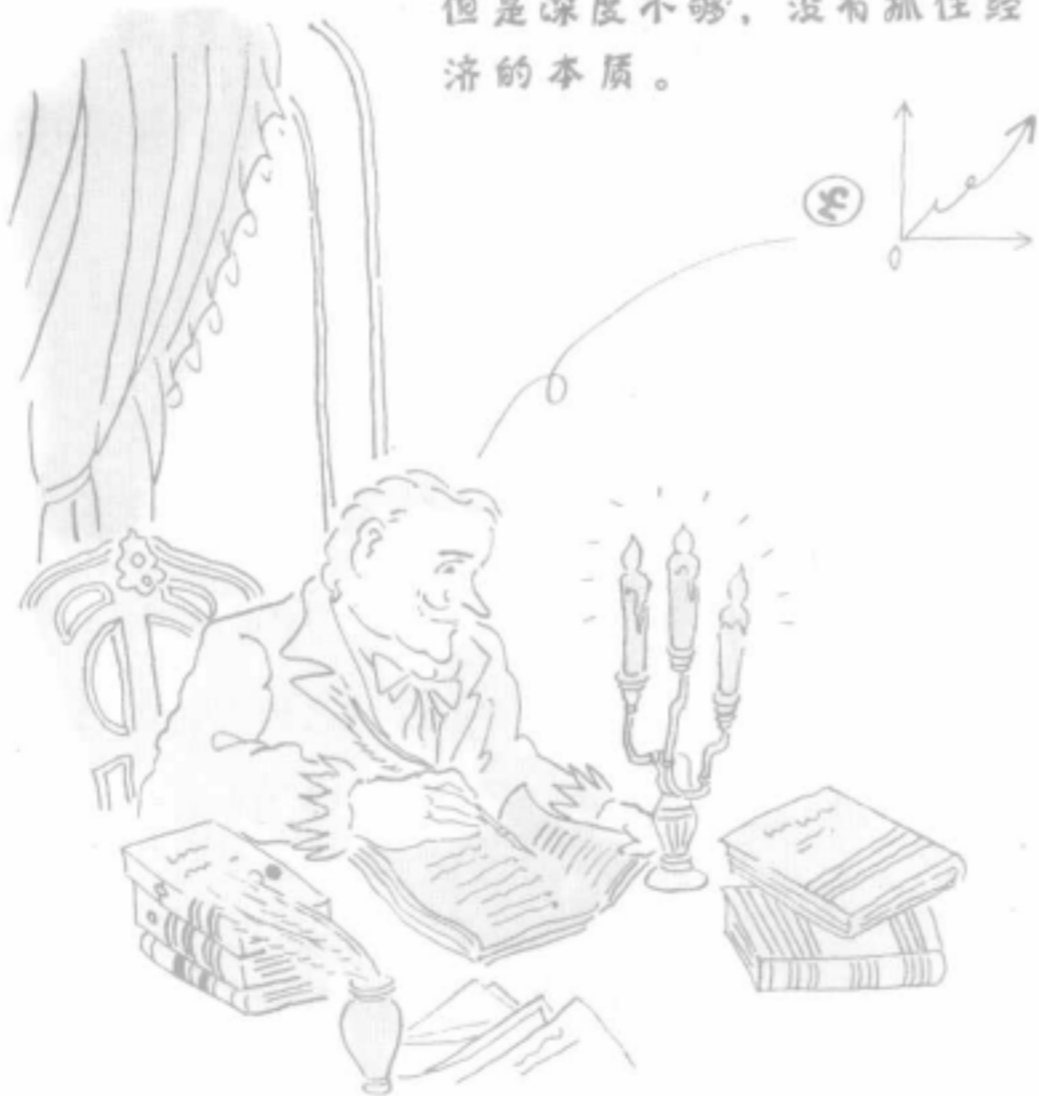
伯纳德·曼德维尔于1670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的一个世家。曾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医学和哲学，169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曼德维尔广为人知的著作有《蜜蜂寓言》一书。该书写作风格为讽刺性散文诗体，其写作初衷在于嘲笑同代人对人类的自负。除《蜜蜂寓言》外，曼德维尔还著有《关于宗教、教会和国家幸福的自由思考》等论著。

《蜜蜂寓言》

《蜜蜂寓言》是荷兰思想家曼德维尔的著作。该书18世纪初在英国出版后，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并引致了欧洲思想界和社会各界对它的批判。该书的核心是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从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曼德维尔坚持认为，在美德和商业社会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张力。

会主义的狂热与情感。从总体上看，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对自由放任的古典主义的一种反动。他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第一，他否定而不是接受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第二，他主张解除对竞争的束缚，而不是取消竞争。我相信，人们将来从格赛尔那里学到的更多于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

格赛尔的著作虽然有闪光点，
但是深度不够，没有抓住经
济的本质。



格赛尔对货币和利息理论的特别贡献简述如下：首先，他明确地区分了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论证了利率怎样限制实际资本的增长率。其次，他指出，利率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主要来自货币自身的特点，即货币的保管费很低，而且持有货币能得到收益。不同时代物质因素的变化明显大于利率的变化，他由此论证了利率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利率不可能由物质因素，而是由心理因素来决定。同时，在几乎稳定了利率条件下，实际资本存量的增

《国富论》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原因，以及如何改善，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亚当·斯密主张放任自由式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把自由竞争当作永恒的法则。《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自由主义的产生，也标志着欧洲经济政策由传统的重商主义向自由竞争的转变。

长率则取决于变动剧烈的那些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心理因素。

但是，格赛尔的理论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他所要表明的是：只是由于货币利率的存在，才导致了借贷收益的产生。他借用鲁宾逊·克鲁索和一个陌生人的对话对此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是，他只是说明了货币利率为什么不能是负值，却忽视货币利率是正值的原因。同时，他根本没有想起流动性偏好，因而他也没有解释货币利率不是生产资本收益的标准来决定原因。所以说，他顶多只建立了半个利率理论。

理论的不完备性使得他长期在学术界遭到忽视。不过，他还是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因为货币利率抑制了实际资本的增长；要想使得实际资本的增长迅速，就要求货币利率很低，甚至是下降到零。短期内，这是可能实现的，格赛尔为降低利率开出的处方便是“加印”货币。正是由于这个处方，使格赛尔一夜成名，也得到了欧文·费雪教授的赞扬。按照他的建议，流通钞票每月必须加贴印花才能保持其价值，而印花可到邮局去买。我认为，费用应该大致等于货币利率（不含印花费）超过与充分就业相适应的，对应于新投资量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差额。格赛尔实际所建议的费用为每周0.1%，每年也就5.4%，这个数值可能太高，正确数值只能从实验与错误中得来。

格赛尔的语言风格冷静、科学，也充满了崇尚社会主义的狂热与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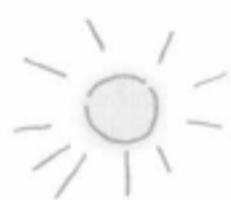


加印货币背后的思想是健全的，它可以作为我们的选择将其小规模付诸实施。但是，格赛尔没有指出要面临的许多困难，尤其是现实中还有许多物品也同样具有流动性，只是比货币的流动性小一些而已。货币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它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升值。这样，如果用加贴印花来去掉流通钞票的流动性升值，那将会有有一个很长系列的替代品起而代之，如银行货币、债券、外币、首饰及一般的贵金属等。

消费不足和过度储蓄

失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投资不足，我们上面的内容说的就是这个；二是消费倾向的不足。早期的消费不足理论不被重视，那些古典学派的大师们就更不屑一顾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也有消费不足的论述，它强调了奢侈有利、节俭有害的信念。节俭被认为是失业的原因，其理由有二：第一，相信不进入交换中的货币数量会减少实际收入；第二，相信储蓄会使得货币从流通中退出。拉斐马斯、配第、福特雷、施勒特、巴尔邦和卡里都倡导社会的消费行为，而谴责社会的节俭行为，认为消费，甚至是奢侈和浪费都能够促进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而节俭则会给国家带来经济萧条的灾难。



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实际表达了把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转换为整体的社会的公益的思想。



巴尔邦的观点主要是通过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一书的渲染而被广为流传的。《蜜蜂寓言》是一首寓言诗，内容描绘的是一个繁荣的社会令人吃惊的状况：一个蜂巢里的蜜蜂个个都很自私，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贪婪好色、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和嫉妒，总之，没一点好的，但整个蜂巢却是一派繁荣的景象；相反，另一个互助互利、大公无私的蜂巢却很没落。总之，该寓言实际表达了把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转换为整体的社会的公益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后来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说得明白。

这种荒诞之说，在两个世纪中，一直受到伦理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抨击。他们觉得节衣缩食的生活才是合乎道德的。他们认为，除去个人实行节俭、国家实行节约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健全的解决办法。

这个学说在另一个世纪的上层人士中再没有出现过。一直到马尔萨斯的晚年，才使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确定了对失业的科学解释的地位。然而，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却充耳不闻。消费不足理论一直到1889年在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一书中出现。这本书是相关著作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一本。J·A·霍布森先生用了几乎50年的时间，来反对正统经济学。该书的出版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但是，J·A·霍布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地方：他认为过度的储蓄使得实际的资本积累超过了经济需要的资本量。其实，这只是由于企业家错误的预期而产生的次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倾向大于实际需要的资本量。因而除了预期的错误之外，这个主要原因阻碍了充分就业的实现。此外，他忽视了利率和工商业信心状况的改变可能产生的影响。

虽然J·A·霍布森的论点是不完整的，但是，他第一次明白地陈述了：资本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储蓄倾向，而是由实际和预期的消费造成的需求所引起的。

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知道，利息只是借用货币而支付费用。他们不同意古典学派关于利率会自动调整来恢复生产和消费的平衡的观点。他们认为，利润下降导致储蓄的减少，必须通过两个途径中的任意一个来发挥作用：引导人们多消费一些或者减少生产。但当利润下降引起社会的总收入减少时，个人由于节俭所得到的补偿并不会相应地减少，以此用于增加消费；经济中存在过度供给时，利润的下降会抑制生产，而承认这种抑制作用正是他们的论点的核心所在。不过，他们的理论缺



霍布森与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是提出消费不足理论最早和最重要的一书。



道格拉斯少校的消费不足理论和 A+B 定理在所有消费不足理论中较为有名。

乏完整性，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率理论。结果，J·A·霍布森先生过分强调消费的不足导致过度投资，而没有很好地解释微弱的消费倾向导致失业。其实，这种失业现象的产生，正是由于缺乏充足的新投资量来补偿消费的不足造成的。偶然由于错误的乐观预期，使这种新投资可能暂时出现；但在总体上，预期利润率低于利率水平会最终阻碍这种新投资的发生。

大战以来，道格拉斯少校的理论在所有的消费不足理论中是最为有名的。原因在于：他抓住了古典学说的致命缺陷，而古典经济学家却无力反驳他。同时，他详细诊断了经济时弊，特别是提出 A+B 定理。道格拉斯少校与那些所谓正统学者相比，他至少没有忘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在诸多赞同异端消费不足理论的经济学家中，他也许不是一名少校级别的人物，而只是一名小兵。但他和曼德维尔、马尔萨斯、格赛尔和 J·A·霍布森一样，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宁肯对真理做出模糊的和不完整的认识，也决不坚持错误的说法。而古典学派的理论，固然逻辑清晰、前后一致，却是建立在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上的。

❁ 【解析】重商主义等理论的不足及科学成分

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当一国的财富迅速增长时，可能会遇到新投资诱导不足的阻碍。在既定的消费倾向下，一个国家的利益主要依靠来自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诱导程度。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形成总投资。在总投资量单独由利润动机决定时，在长期中，国内投资由国内利率决定，而对外投资则由贸易顺差大小决定。因此，在一个国家庇护直接投资的社会里，政府的经济目标理所当然地要关注国内利率和贸易的差额。在一个工资单位、国民素质和货币制度都比较稳定的社会里，政府应该高度关注该国的对外贸易平衡状况。原因在于适当的贸易顺差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逆差却使得经济陷入泥潭之中，难以走出来。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也知道通过限制贸易来实现顺差

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限制顶多只能是促进了短期贸易顺差的增加，但在长时期里，这一限制政策是不利于顺差的积累的。因为，本国从外国得到的贸易顺差也恰好是他国的贸易逆差，这两者的和正好是零。因而，贸易的顺差还是逆差只是看待的角度不同，整个世界的贸易差额还是零。过多地去追求顺差只能给其他国家造成更多的损失，引起“以邻为壑”的国际间恶性竞争。所以说，一个国家只能从国际分工中获得一份相对合理的收益，而不能变得贪得无厌。最后，单纯凭借限制贸易来实现目标也是不可靠的选择，包括私人利益、行政无能和任务本身所带来的困难都会给预期目标造成障碍。

❁ 【案例】美日贸易摩擦及各自的对策

案例适用：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

美日贸易摩擦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从未间断过，而且不断升级。

1. 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战后初期美国控制日本出口的97.4%、进口的74.8%。日本贸易逆差规模较大。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日本贸易开始出现逆差，但数额不大，1965年仅为4.4亿美元。其后不断增加，1969年增到15.6亿美元，1972年又增到49亿美元，占美国当年贸易逆差总额的53%。进入80年代，美日贸易逆差迅速增加，1987年达598亿美元。到了90年代，由于美国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另外，由于美日两国经济实力此长彼消，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时降时升。1998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升至63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占当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1686亿美元的27.2%（按美国统计占40%）。

从中我们可看出，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但比率是逐渐下降的。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日美贸易摩擦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已经成为政治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政治问题。以上所表示的比率说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比率，任何时期都超过20%，美国统计的数字比率最高时为58.6%，日本统计数字最高时也达到39.5%，这说明日美贸易摩擦不仅是经济问题，也带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热轧钢板是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美国对进口日本热轧钢板征收惩罚性关税。

2. 硝烟再起

美日贸易摩擦总是在日本产业后来居上，拳头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美国的相关企业竞争能力不足，比较成本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随着日本产业不断升级换代，产品不断高新化，美日贸易摩擦也就日益激化，这种状况持续到90年代中期。此时，美国知识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重新崛起，咄咄逼人，要更多地占领日本市场；日本经济虽然萧条不振，但日元贬值，在传统产品方面仍然严重威胁美国市场。

热轧钢板是最近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1998年底至1999年初，美国决定对进口日本热轧钢板征收惩罚性关税，进口厂家也需向海关缴纳保证金。最后，由于日本自动减少了对美的出口，争吵才得到平息。这期间，日本对美出口热轧钢板仅有238吨，为1997年底至1998年初的1/350。

大米是美日贸易摩擦的又一突出之点。大米是美国对日出口的主要农产品。1998年日本决定对进口大米征收1000%的关税，美国对此表示不能容忍。当年12月，日本对大米关税进行了调整，美国大米的关税降至350%。美日大米摩擦暂告一段落。1999年3月29日，日本通过粮事法修正案，提高进口关税，4月份实施，美日贸易摩擦又升温。

大型计算机的摩擦进入重要议程。1998年底，美国ITC认定，由于日本大型计算机出口到美国，美国大型计算机的价格下降，对厂家造成危害。同时，美国商务部也认定这是对美的倾销，美日双方对簿公堂。结果以日本的败诉而告终。

1999年，美日之间还发生了平板玻璃摩擦、植物检疫纠纷、电器通讯业准入摩擦，美国要求日本开放金融保险业、调整产业结构等。

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贸易摩擦涉及的产品越来越多，技术层次越来越高，经济领域越来越宽泛。美国对日本的要求从增加进口到开放市场和调整经济结构。今

后，美国在抑制日本经济整体国际竞争力的大前提下，势必要求日本进一步改变金融、保险、贸易、投资、国内商品流通等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带动美日经济交流。日本则要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保持和扩大日本在美国的市场，与美国争夺其他世界市场。

进入8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对此，美日双方都采取对策和措施，反击对方，维护自己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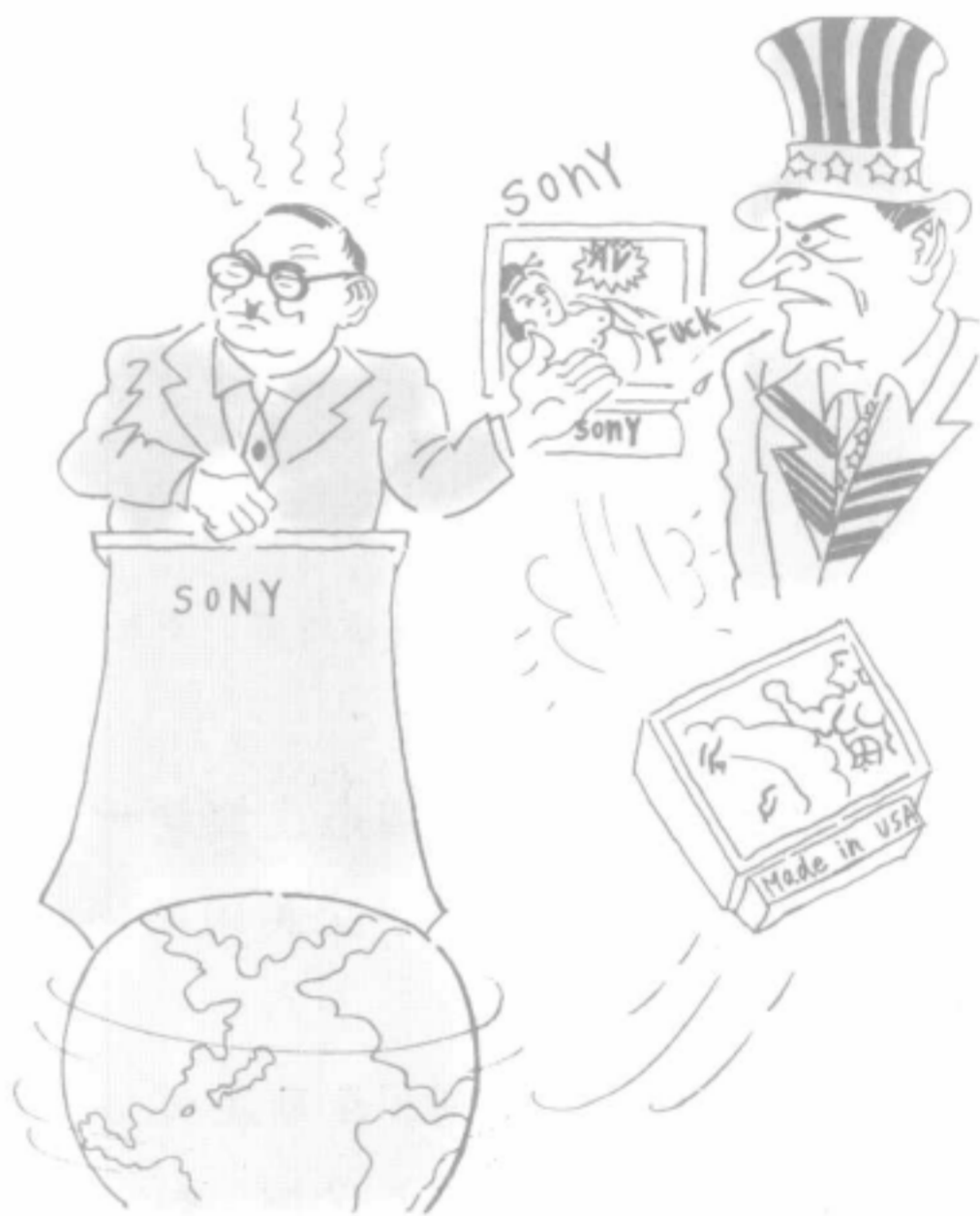
1. 日本的对策

在美日贸易摩擦当中，日本对美的对策总的来说是随机应变、拖磨兼用、并无定规。恰恰是这种对策，使日本一次又一次最终避免了贸易摩擦升级，防止了贸易战火的伤害，并从中获得大量好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对策：

(1) 推行战略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战后，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始终采取战略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然在1949年12月制定了《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对外出口的统制基本取消，但进口贸易一直推行保护主义政策。这就使日本的一些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有的行业甚至从一片空白变成为世界领先水平。如在电视机、半导体部门，日本已经完全击败美国而垄断了世界市场，在计算机软件

行业，日本已经可以和美国平分秋色。这样，日本通过推行战略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其产品对美国的竞争力大大提高，美国原有的一些国际市场份额也不得不让给日本产品。即使美国国内的一些市场，美国也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割爱。在美日贸易摩擦中，由于日本推行战略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较早，相对“理亏”，所以在美日贸易谈判中，日本只好处于守势。

(2) 以柔制刚。在长期的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常常采取以柔制刚的战略。日本



在电视机行业，日本已经完全击败了美国，垄断了世界市场。



二战后，美日双边贸易日益增进，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也不断深化。

在对美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表面看来，貌似软弱，常常采取低姿态，实际上，日本谋求的是在市场上处于优势，美国仅仅是在贸易谈判上处于优势。这样，日本的产品不断冲击美国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然而，在摩擦谈判上，日本采取拖磨兼用手段，不到最后阶段不让步，进而一次又一次回避了摩擦升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3) 迂回取胜。美日间的贸易摩擦，每次都是美国首先提出严厉的制裁声明，日本方面提出异议，双方讨价还价。进而日方抓住美方“理亏”的环节，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评，给美方造成心理和舆论上的压力。再者，日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加紧在侧面进行活动，暗中改变

不利地位。最后，在美国态度继续十分强硬的情况下，为了确保美国市场的份额，日方首先作出一些让步，接受美国的一些条件，并促使美国也作出让步，最后达成对日方有利的协定。

(4) 自主出口限制。在日美贸易摩擦达成协议后，对某些商品日本要进行自主限制出口，以缓解美日贸易摩擦。如在美日钢铁贸易摩擦发生后，日本主动采取对美贸易自主限制，使1999年1月日本对美钢铁出口比上年同期减少25.6%，出口总量仅为23.3万吨，连续两个月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同时，日本厂家也表示，1999年对美钢铁出口总量能控制在美国的许可数量之内，即270万吨的水平。对那些夕阳产业日本更是让步于美国，减少对美出口。通过这一措施，使日美贸易摩擦得到缓解。

2. 美国的对策

面对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持高不下，美国对日本不断采取反击措施，并取得了成效，抑制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进一步升高，其对策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 实施“公开的贸易政策”，制定惩罚范围。进入80年代以来，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高不下。美国便放弃过去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实施所谓的“公开的贸易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实行报复和制裁；另一方面，自己也开始实行战略性贸易。1987年3月，美国对日本四种电子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日本政府感到非常恐慌，中曾根首相急忙于4月底访问美国，向美国承诺开放国内商品、资本和劳务市场，允许美国企业参加日本机场等的建设，加紧实施“前川报告”的计划。

(2) “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美国在国际交往中，依仗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推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通过“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单方面向日本提出经济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以此来遏制日本商品向美国市场倾销，消除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障碍，迫使日本向美国商品和劳务开放市场。

(3) 通过政府谈判，兼用政治、外交手段扩大对日本的出口。在美日贸易摩擦中，美国不断要求日本政府开放国内市场，并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实现经济谈判得不到的收获，使日本在无奈中满足美国的要求，为美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开绿灯，在金融、汽车、钢铁、玻璃制造及其零部件、航空运输、农产品等领域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在进口贸易中也不得不更多地从美国进口商品，扩大美国商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4) 实行知识经济战略，力图从根本上战胜日本。80年代末期，美国看透世界政治经济趋势，进而腾出较多的政治、军事力量，集中发展知识经济，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美国成功了，取得世界知识经济第一强国的宝座。1998年美国知识经济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8%，而日本只有32%，如今这一趋势还在加强。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大提高了美国知识经济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抢占了部分日本市场，报了一箭之仇。

.....

案例评析：

美日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各自的国情不同，所采用的对策也不一样。美国看似被动，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当其产业弱化，竞争实力减退，日本产品大量进入，争去一些利益时，美国便对日本耿耿于怀。但是，正因为如此，美国消费者才获得了如同亚当·斯密所讲的更多的“财富”，美国的产业才得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调整，知识

经济才能够优先发展起来。日本似乎长期居于主动地位，获得了大量的贸易收入，但是其为多出口而设立的协调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内部交易”，以及相对封闭的市场机制，到了一定期间，必然酿造出“经济黑洞”、“金融黑洞”，最后受制于人。今后，美国将利用日本经济、政治的脆弱之点，大举进攻日本。日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远非美国所能比，市场潜力十分巨大，美国人怎能不到那里淘金？精明的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拱手相让市场的习惯，巧妙相争才是其特性，为此有可能想出更加高超的办法，战败美国。

（资料来源：于永达：《美日贸易摩擦及各自的对策》，商务部谈判办2006-12-15）

Chapter 23

第二十三章 略论《通论》可引起的社会哲学

财富分配不公平合理，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弊病。过大的收入差距容易激化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矛盾，阻碍社会发展，这需要政府实行国家干预政策，引导社会的投资消费行为。自由竞争经济应该和政府干预相协调，才能保证经济更好地运行。

社会财富分配及食利者

现实的经济社会明显具有两种弊病：一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另一种是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合理。

近几十年来，国家通过直接税的手段，已经取得了公平财富分配的巨大进步。不过，许多人要想继续推进公平分配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担心社会中避税邪风兴起；二是担心富人纳税过多，会引起他们的储蓄减少，而这就阻碍社会资本的增长。但我想，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之前，资本增长并不由低消费倾向决定；只有在充分就业时，低消费倾向才有利于资本增长。并且，现实中的企业储蓄已经足够了，只要我们重新分配收入来提高消费倾向，就会促进资本的增长。

有不少人认为，遗产税可以减少资本财富，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个国家的过大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税收政策是个很好的杠杆，能够起到调节作用。

遗产税所占税收的比例越多，那么其他税种（所得税和消费税等）课税必然减少，因而这可以增加社会的消费倾向，同时增加投资引诱。因此，社会财富的增长绝对不会由富人的节制消费来决定，这反而会使它受到阻碍。

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保持一定财富和收入的差距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这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为了赚钱和获得自己的财产而激发自身潜力，挖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但是，目前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又太大了，这是不利于我们的社会发展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拉大社会的鸿沟，激化社会阶级和阶



遗产税

遗产税有时也称“死亡税”。遗产税是以被继承人去世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征收的税，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征收的一种税收。征收遗产税，有利于健全国家的税收制度、适当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增加政府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财力。遗产税有助于加强对遗产和赠与财产的调节，防止贫富过分悬殊。

层的矛盾，阻碍社会发展。

传统认为：储蓄的多少取决于利率的高低。而实际上我们知道，只有有效的储蓄才是重要的，它必须要由社会的投资来决定，这又要求社会要保持一个低的利率。因此，如果资本的边际效率在一定时期内不变，那么，利率必须维持在充分就业下应有的数值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这样的话，只要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不变，我们要持续降低目前过高的市场利率，才可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

我确信社会对资本的需求是有限度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使其边际效率下降，一直低于利率为止。持久性资产的总收益，包括劳动力成本、风险补偿成本以及技能和监督成本。资本稀少使得资本能取得利息，但国家可以维持社会的一定储蓄量，能够让资本不再稀缺。

所以，我认为，食利者阶级会自然被消灭，无须通过暴力革命；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出现重大改观。在经济政策上，我们便可以确立两种目标：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稀少，以减少食利者阶级；第二，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得金融家、雇主等人在获得合理报酬的条件下为社会服务。

至于在什么范围之内，国家应当增加人们的投资诱导和鼓励人们的消费倾向，同时在一两代人中使



应该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得资本家在获得合理报酬的条件下为社会服务。

得资本不再稀缺，这些只能由经验来决定。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加强，那么，充分就业时的资本积累率可能比现在的稍高一些。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征收过高的收入税和遗产税可能要受到舆论的批评，因为此时只需要比现在更低的资本率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了。至于在何种范围内、用什么方法，可以要求当代人多节约一些，以便为后来人创造充分的就业投资环境，那是另外一个待以解决的问题。

政府干预与个人主义

国家和私人可以主动地合作。当然，依然有很多领域是完全由私人来活动的。国家必须通过改革税收体制、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来引导消费倾向。此外，利率绝不能仅仅依靠银行的影响，来奢望达到社会最适度的投资量。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办法是全面的社会化的投资。只要国家能够决定生产工具的资源总量，并且能够合理确定生产工具所有者的回报，那么，国家就履行了它应该具有的职责。而且，实行社会化的各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渐进式地实施，不必打断社会上的一般传统。

我们并不是说古典学派的逻辑是错误的，而是批评该理论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假定前提。由于他们这些理论分析前提没有贴近现实，所以，他们的理论也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当然，古典学派自身的理论逻辑没有问题，他们主张私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利己性，决定了经济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去生产以及如何分配等方面，这些分析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此外，他们也分析了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怎样在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进行兼容，我们也是赞同和欣赏的。所以，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的协调，必须由中央控制以外，实在没有更多的理由来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实际上，我们说现实经济制度有弊端，并不是说通过中央决策就可以解决了，假如我们面对的是经济中的就业问题时，我们的任务是要解决更多的失业问题，而不是调整已经就业人员的工作结构。

所以说，我完全赞同格赛尔的意见：我们要填补古典理论的不足，而不是单纯地抹杀它；我们更要研究自由竞争在什么范围内是可行的，以此来充分挖掘经济主体的力量和整个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其实，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应该是传统政府职能的扩展，目的也同样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斥私人竞争的作用，很多的经济舞台上都仍然还有私人在唱主角，个人主义的传统优点还在继续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只有政府的干预和市场的调节相结合，

我们的经济才能更好地运行。

确切地说，在利己心的驱动下，个人的分散化自主决策能够显现出更大的效率。这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最大优点。同时，如果我们能够避免一些个人主义的弊病，那么，个人主义绝对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它也比任何其他制度更能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这是经济发展给个人带来的更多的机会，这种生活的多样化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更加绚丽多彩，远比单调的国家主义好得多。

我想，政府干预经济、引导社会消费和投资的行为，应该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避免现实经济的毁灭；政府职能的这种扩大，也恰恰是个人主义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而并不是像某些美国金融家所说的那样：

它侵犯了个人主义。因为有效需求的不足使得大量的社会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既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又给企业带来了灾难。通过国家对于经济的适度干预、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够有效地增加社会的财富量，改变当前的状况。

当今的集权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依靠极端的方式解决了社会的失业问题，但却丧失了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和经济效率，它们推行政治专制和经济集权。而我们作为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我们要捍卫民主自由，要继续维持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只能通过国家的有效干预与个人主义的结合来实现。

后论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要建立的国际经济新体制比旧体制好得多，它可以使得世界各国分享国际贸易的好处，而不是依靠损害他人来发展自己、为本国捞私益。实际上，



政府职能扩大，是个人主义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金融家们的个人理念的影响，必须和国家的有限干预结合起来实现。

世界发生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独裁者利用人们的好战心理；二是国家经济的萧条和无法解决的大量社会失业问题。尤其是用争夺世界市场来企图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

因而，传统的经济制度安排，包括国内的自由放任和国际的金本位制使得一国只有通过他国的逆差才能实现本国的顺差，各国为了争夺海外市场而不断地激化矛盾，国家间的利益是对立的。而在新体制下，各国能够各自实现自己的充分就业，消除了国家间的利益对立，也能使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依然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所以，我们倡导建立这种国际经济的新体制，实现各国的共赢。

这种思想能不能实现？这种思想能不能继而形成社会演变的原动力？这种思想所要伤害的利益是否比所要效劳的利益更明显和强有力呢？

我不想做出回答，因为即便是简单地概括这些问题，也需要一本专著。不过，我可以预言：谁说这种思想在未来不会有多大的力量，谁一定是错误的。实际上，统治世界的力量只不过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很现实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的影响，但他实际上往往已经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握政权的某些狂人，自以为他的思想授命于天，而实际上则是来自以前的某个三流学者的拙著。我很确信，既得利益的影响远不如思想那么强大。不论或早或晚，不论是好是坏，存在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解析】国家干预经济和市场自我调节

现实的经济社会明显具有两种弊病：一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另一种是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合理。但是，保持一定财富和收入的差距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这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为了赚钱和获得自己的财产而激发自身潜力，挖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但是，目前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又太大了，这是不利于我们的社会发展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拉大社会的鸿沟，激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矛盾，阻碍社会发展。这时，就需要政府干预经济，引导社会消费和投资的行为，同时，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避免现实经济的毁灭；政府职能的这种扩大，也恰恰是个人主义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应该是传统政府职能的扩展，目的也同样是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充分就业。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斥私人竞争的作用，很多的经济舞台上都仍然还有私人在唱主角，个人主义的传统优点还在继续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只有政府的干预和市场的调节相结合，我们的经济才能

更好地运行。

【案例】美国扶持农业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

案例适用：政府调节

由于农业生产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而自然条件的变化对农产品供求与价格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可能影响农业的稳定，这使美国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对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以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 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的教育、科研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举办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中心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最为典型的是田纳西流域工程计划。193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负责进行了以修筑水库堤坝、综合利用水资源为主的大型公共工程，并在与各州及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下，共修建了29个大坝，控制了洪水，疏通了千余公里的航道，改善了水源供应，发展了鱼类及野生动物的繁养，还开辟出优美的游览区。这一大规模综合开发试验区取得的成功，使田纳西流域的收入增长了4倍，并提供了充足的电力。在农业教育和科研方面，每个州都建立一个州立农业学院，或者在州立大学设立农学院，各州赠地给学院建立农业试验站，联



美国政府加大对农业投入，以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证了农业与农产品价格的稳定。



美国在州立大学设立农学院，建立农业试验站，政府为农业发展与应用研究提供经费。



邦政府的农业部设研究试验局，组织农业科研工作。同时，政府为农业发展与应用研究提供经费。

(2) 推行休耕、限耕计划，控制耕种面积。针对美国不断出现农产品生产过剩问题，为避免由此推动农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导致农场主收入下降情况的出现，美国政府每年制定有偿休耕、限耕计划，以控制农产品生产，协调供求关系（这一计划目前主要适用于饲料粮食、小麦、稻谷和棉花这几种主要产品）。具体方法是：每一农场主的基本耕种面积要分为三个部分，即计划内面积、弹性面积和环保性休耕面积。计划内面积必须耕种计划作物并可得到政府的补贴，弹性面积可耕种任何计划作物和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计划外作物，但不能获得政府补贴；环保性休耕面积是不耕种的面积。农场主是否参加政府的休耕、限耕计划是自愿的，但凡是参加这一计划的农场主都可得到现金、实物或贷款补偿。

(3) 价格支持政策。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农民收入，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一些主要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即保证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价格不低于官方提出的最低价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邦政府采取了无追索权贷款和政府购买的手段。所谓无追索权贷款，就是由联邦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发放给符合条件的、生产特定农产品的农场主的一种贷款。贷款率，即单位农产品的贷款额，是由联邦立法机构或农业部长根据立法规则确定的。如果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高于贷款率，那么农场主在出售农产品后，可以归还这一贷款加上应付利息；如果农产品价格低于贷款率，农场主可以不归还贷款而把自己的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并且不负担任何费用或罚款。显然，贷款率就是支持价格或最低价格。如果贷款率高于市场价格，必然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这时，政府必须负责收购多余的农产品以维持支持价格，这就是所谓的政府购买。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政府购买是维持支持价格的基本手段，但目前这一手段只用于牛奶和糖两种产品。

(4) 直接收入支持政策。就是通过直接给农场主提供收入支持，保障他们收入的稳定。其具体手段包括目标价格和差额支付。目标价格，就是政府设置一个用于计算支付农场主收入的价格，或者说是理论上的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那些符合规定条件的农场主就可依法获得差额支付或补贴。支付率，即单位农产品应得的支付额或补贴额，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和贷款率两者之高者的差额。就是说，当市价高于贷款率，则支付率就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如果市

价低于贷款率,则支付率等于目标价格与贷款率之差。直接收入支持政策的实施范围主要是玉米、小麦、棉花等主要农产品。

(5) 为农产品的销售创造市场。包括扩大国内消费和促进农产品出口。在扩大消费方面,美国政府在支付社会福利费用时尽量增加食品的消费,这包括向低收入者发放用于领取食品的“食品券”,向在校儿童供应有政府补贴的早、午餐等。扩大出口方面,早在1954年美国根据国会通过《480号公法》(1959年起称为“粮食用于和平计划”),以赠予和长期优惠贷款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大量提供粮食、奶粉等食品,以帮助解决国内的农产品过剩问题。70年代后,美国政府主要采取提供补贴和给买主以出口信贷的办法来促进农产品的出口。直到目前,联邦政府仍对小麦等农产品的出口给予补贴。同时还对一些农畜产品的进口实施严格的限额制度,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

案例评析: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美国政府对于农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这些政策使农场主的收入稳定提高,使他们应付经济危机能力得到加强,从而保证了美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当然,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财政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因此,近年来美国经济界对现行的农业政策展开了各种形式的争论,有的主张取消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而代之以收入保险政策,有的主张采取“收入稳定补贴”政策等,但由于长期实行的这些支持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改革现行政策的阻力较大,因而现行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动的可能性不大。

在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仍属弱势产业,其特殊的生产条件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客观上需要政府的扶持。而美国对农业的支持的多种政策中,政府财政投资、直接支出安排与政府购买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美国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开发增长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资料来源:南京审计学院财政学精品课程教学案例:《案例八:美国扶持农业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

附录一



凯恩斯年谱

1883年

6月5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剑桥出生。

1892年

9岁

剑桥大学授予其父内维尔·凯恩斯科学博士学位，9岁的凯恩斯不仅亲临庆典，还收到大量的礼物。

1897年

14岁

入伊顿公学，在20名入选学生中，凯恩斯名列第一。

1902年

19岁

10月，凯恩斯以数学和古典文学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1906年

23岁

凯恩斯从剑桥大学毕业，参加公务员考试，并进入外交部印度事务部工作。

1908年

25岁

6月，辞去印度事务部的工作，重返剑桥大学，当一名经济学讲师。

1909年

26岁

以一篇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另以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获亚当·斯密

奖。

1908年—1914年

在剑桥大学任职讲师，主讲：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货币理论和证券投资。

1914年

31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凯恩斯作为货币问题专家，前往财政部任职，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

1919年

36岁

年初，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6月，因不满和会赔偿委员会的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和疆域划分问题，辞去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

8月，以个人投资者的身份，投身于外汇期货市场。

同年，出版《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引起广泛争论，使其成为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

1920年

37岁



- 凯恩斯预见德国即将出现信用膨胀，以此为由，卖空马克，此后破产。
- 1921年 38岁
通过写作，凯恩斯的经济情况好转，又开始了商品和股票投机。
- 1923年 40岁
出版《论货币改革》一书，提出解释远期汇率的“利率平价说”，首次引入无套利原理。
- 1924年 41岁
凯恩斯投资57797英镑，到1937年增值506450英镑，在证券业中建立了自己的声誉。
- 1926年 43岁
发表《自由放任的终结》，提出改进资本主义的口号，公开表明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主张政府进行“高度有效的管理”。
- 1928年 45岁
凯恩斯预言道：“有史以来，人类将首次面对一个真正永恒的问题——如何利用工作以外的自由与闲暇，过快乐、智慧与美好的生活。”
- 1929年 46岁
凯恩斯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是年，西方世界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凯恩斯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开始被广泛接受。
- 1930年 47岁
发表《货币论》一书，论述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经济的均衡。
- 1931年 48岁
11月，开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写作。
- 1932年 49岁
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应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实行通过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新政纲领”。
- 1933年 50岁
年底，凯恩斯公开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称赞罗斯福的经济改革。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
- 1934年 51岁
10月，凯恩斯应邀访问美国，并由劳工部长帕金斯安排，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 1936年 53岁
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创立了宏观经济理论，西方世界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通论》的发表被经济学界称为“凯恩斯革命”。
- 1939年 56岁
1939年秋，凯恩斯亲自指导R·斯通（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等人将会计学中的平衡原理、账户体系以及复式记账方法，引入了国民收入统计，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 1940年 57岁
英国政府请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财政大臣的顾问。12月，在为政府起草的战争目标声明中写进了自己的思想，明确强调战后的社会保障和充分就业政策。
- 1941年 58岁

凯恩斯兼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职位。

1942年 59岁

4月，凯恩斯出任英国音乐与艺术促进会主席。同年，被英国皇室授予“勋爵”爵位。二战期间，凯恩斯参与了国际清算联盟方案的起草工作。

1943年 60岁

在国际清算联盟会议上，凯恩斯提出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的方案，力图使英国重新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1944年 61岁

7月，凯恩斯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即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大会期间，参加了世界银行草案的起草工作。

1945年 62岁

1945年秋，凯恩斯率英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同美国当局讨论美国给英国的特别贷款问题。

1946年 63岁

剑桥大学授予凯恩斯科学博士学位。4月21日，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在其位于索赛克斯(Sussex)的家中逝世。《泰晤士报》为其撰写的讣告说道：“要想找出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



附录二



经济学名词术语速查索引

第一编

古典经济学派 古典学派可以这样定义为：尊重亚当·斯密的理论传统，采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信奉李嘉图的分配论、价值论和地租理论，遵循自由贸易主义的原则的经济学派。

实际工资 实际工资是货币工资水平与生活费用的比例，它与货币工资水平成正比，而与生活费用的上涨呈反方向变动。以工人所得的货币工资实际上能够买多少生活消费品、开销多少服务费做标准来衡量的工资。

摩擦失业 指由于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缺陷所造成的临时性失业，一般是由于求职的劳动者与需方提供的岗位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而形成的失业。

自愿失业 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概念，即工人由于不接受现行的工资或比现行工资稍低的工资而出现的失业现象。

非自愿失业 又称“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工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但仍找不到工作而形成的失业。

需求曲线 需求曲线是显示价格与需求量关系的曲线，是指其他条件相同时，在每一价格水平上买主愿意购买的商品量的表或曲线。其中需求量是不能被观测的。需求曲线可以以任何形状出现，但符合需求定理的需求曲线只能是向右下倾斜的。

供给曲线 表示在商品的每一价格水平下能够供给多少某种商品。

庇古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庇古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福利经济学》。该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

边际负效用 当就业量既定时，工资的效用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这里边际负效用必须理解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导致其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接受在他们看来效用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工资。

李嘉图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做出了系统的贡献，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最著名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发展了有关地租、工资和利润的理论。由李嘉图开创的经济学理论学派，被称为“李嘉图学派”。

总需求函数 表示在每一种物价水平时，消费者想要购买的物品和劳务量的曲线。它告诉我们在任何一种既定的物价水平时经济中需求的所有物品和劳务量。

总供给函数 是指总供给（或总产出）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以价格为纵坐标，总产出（或总收入）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总供给函数的几何表示为总供给曲线。

有效需求 即预期可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亦即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

资本边际效率 资本边际效率是指一种贴现率，这种贴现率正好使一项资本物品在使用期内的各年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等于这项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

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分为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消费支出占收入增加支出的比重。平均消费倾向是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边际生产率 当劳动量不变而资本（生产资料）相继增加时，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量或价值依次递减，即所谓“生产率递减律”，最后增加一个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量或价值，称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它决定利息的高低。

货币资本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它是产业资本在其循环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职能形式。它的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

知识资本 可以被看作是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本或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净值。这样，知识资本可以被看作是知识转换过程的最终结果，也可以被看成是转化为公司的知识产权和智力资产的知识本身。

第二编

国民所得 是经济成长的指标，从国民生产总额 GNP 中减去资本折旧和间接税则为国民所得。国民所得衡量的是一国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社会提供产品的能力。

投资 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投资可分为实物投资和证券投资。前者是以货币投入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一定利润；后者是以货币购买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间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

效率工资 指企业支付给员工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工资促使员工努力工作的这样一种激励与薪酬制度。

市场出清 市场出清是指在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地消除超额供给（供给大于需求）或超额需求（供给小于需求），从而在短期内自发地趋于供给等于需求的均衡状态。

收入 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劳务收入、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利息收入、股利收入等，但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

毛利润 指主营业务收入只减主营业务成本。看主要经营项目的盈利水平。毛利润 = 收入 - 成本。

补充成本 非自愿的、意料之中的设备折旧，即预期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部分，称为补充成本。



意外损失 由于未预料到的市场价值的变化, 或者是由于意外的老化及灾难产生的破坏, 造成的实际损失, 称为意外损失。

基本补充成本 在资本设备购置初期, 原来所预期的补充成本。

当前补充成本 根据当前销售以及当前预期重新估计的补充成本。

净收入 个人或公司的盈利总额, 即总收入扣除业务成本、折旧、利息、税款及其他开支以后的个人或公司最后的所得或收入余额。

净储蓄 即净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

强迫储蓄效应 是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效应之一。假定经济已经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来强制储蓄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涨。这里所说的储蓄, 是指用于投资的货币积累, 主要来源于家庭、企业与政府。

第三编

收益 从生产上或商业上所获得的收入。

时间贴现 时间贴现是指个人对事件的价值量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的心理现象, 它是行为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根据行为结果的价值抉择行为, 对行为结果价值的认知会受到时间的影响。

预算 是指企业或个人未来的一定时期内经营、资本、财务等各方面的收入、支出、现金流的总体计划。它将各种经济活动用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

预算赤字 即财政赤字, 指一国政府在每一财政年度开始之初, 在编制预算时在收支安排上就有的赤字。若实际执行结果收入大于支出, 为财政盈余。

折旧基金 是企业对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磨损减少的价值, 以折旧费的形式计入产品成本并按月提取损耗价值的补偿基金。它属于企业收入中的一个项目, 是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的重要来源。

折旧率 “固定资产折旧率”的简称。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额与固定资产原始价值比率。它反应固定资产价值分摊到成本费用中去的程度。

偿债基金 亦称“减债基金”。国家或发行公司为偿还未到期公债或公司债而设置的专项基金, 很多发达国家都设立了偿债基金制度。一般是每年从发行公司盈余中按一定比例提取, 也可以每年按固定金额或已发行债券比例提取。

资本存货 存货是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由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燃料、发出商品、在产品、产成品等组成。

利率 又称利息率。表示一定时期内利息量与本金的比率, 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按年计算则称为年利率。就其表现形式来说, 是指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借贷资本总额的比率。利率是单位货币在单位时间内的利息水平, 表明利息的多少。

边际消费倾向 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率, 也就是增加的1单位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的

消费部分的比率，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曲线的斜率，它的数值通常是大于0而小于1的正数。

通货膨胀 一般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的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第四编

重置成本 指企业重新取得与其所拥有的某项资产相同或与其功能相当的资产需要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资本边际效率曲线 把所有不同种类资产的表格或曲线汇总以得到一个曲线，用以说明总投资量与其所导致的一半的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称为投资需求曲线。

货币政策 狭义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广义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流动性偏好 由于货币具有使用上的灵活性，人们宁肯以牺牲利息收入而储存不生息的货币来保持财富的心理倾向。货币流动性偏好是人们喜欢以货币形式保持一部分财富的愿望或动机。

贮藏货币 即货币的贮藏手段，指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被保存起来的职能。

投资需求曲线 投资需求曲线表示投资的总数量与额外1个单位投资的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收入存款 即人们持有一定数额的现款，其强弱主要取决于收入多少和两次收入之间的正常期间的长短。

储蓄存款 指为居民个人积蓄货币资产和获取利息而设定的一种存款，储蓄存款基本上可分为活期和定期两种。

业务存款 企业用于未收到销售款之前的销售开支。

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对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的需求和欲望。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消费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并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步发展，消费领域不断扩展，消费内容日益丰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

货币工资 即名义工资，是指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货币数量，即工人付出劳动力时所得到的以货币表现出来的工资。而实际工资是指工人用货币工资实际买到的各类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

第五编

就业函数 就业函数表示的是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

就业弹性 指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就业弹性的变化决定于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就业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成本构成就业的单位成本。



本位货币 本位货币是一国货币制度规定的标准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家出于经济条件或政策上的考虑，用法律的形式将本国货币与之固定地联系起来，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以及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

第六编

经济周期 又称商业周期，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

消费不足理论 一种把经济危机原因归结为消费品的生产超过了人们对消费品需求的理论，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它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赶不上消费品的增长。消费不足的根源则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穷人购买力不足和富人储蓄过度。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

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的国际贸易理论或政策。关税、进口配额、外汇管制、烦琐的进出口手续、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等都是国际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

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都使用金本位制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铸币平价来决定。

遗产税 遗产税即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国外有时也称为“死亡税”。遗产税有助于加强对遗产和赠与财产的调节，防止贫富过分悬殊。遗产税是以被继承人去世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征收的税，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应用的一种税收政策。